

古镜今鉴

为政卷

# 领导干部读 群书治要

刘余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第六十五讲 为政以德 / 001

治国理政的九项纲领 / 003

以道德的力量，让天下人敬畏 / 008

斋庄盛服，非礼勿动 / 012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 / 014

## 第六十六讲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 020

使民以时，百姓归心 / 022

睦邻友好，诚不相欺 / 024

人民是国之根本 / 029

## 第六十七讲 为政在于得人 / 033

其人存，则其政举 / 034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 / 037

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 / 039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 044

得民心者得天下 / 048

## 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为政卷

### 第六十八讲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 051

-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 052
- 天地虽大，唯有至诚感人 / 057
-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 058
- 家道端则天下安 / 062
- 守本离末，民富德兴 / 064
- 礼义存，天下行 / 071

### 第六十九讲 践行传统，恪守五伦 / 073

- 守正固本品自高 / 074
- 教之道，贵以专 / 080
- 公生明，廉生威 / 085
- 百行孝为先 / 088
- 孝悌为仁之本 / 091

### 第七十讲 诗书立业，孝悌做人 / 095

- 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 096
-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 098
- 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 / 100
- 丧尽其哀，祭尽其敬 / 101
-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 106
- 人主贤，则豪杰归之 / 109
- 保证官员清廉为政 / 110
- 取信于民，则民心向之 / 112

老子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 / 114

### 第七十一讲 明察秋毫，任人唯贤 / 116

知人之法：八观六验，六戚四隐 / 117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 125

居视其所亲，达视其所举 / 127

八征观人，辨识贤才 / 129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 / 131

虚心下听，因人致人 / 134

公生明，偏生暗 / 135

### 第七十二讲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 138

君子易事而难悦 / 139

自私自利导致患得患失 / 141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 143

端心向公，苟利国家者用 / 149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 / 151

选人应秉持四慎、九虑 / 154

### 第七十三讲 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 / 160

养廉的智慧：重其禄，少其吏，尽其力 / 161

人尽其用，岗尽其能 / 167

知人善用，德行配位 / 168

知人者智，用人不疑 / 170

## 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为政卷

天下治道，莫大乎公 / 172

与天下同利者得天下 / 177

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 / 180

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 183

### 第七十四讲 修身为本，教学为先 / 185

位也者，立德之机也 / 186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 / 188

先公家之急，而后私讎也 / 190

贵其所尚，抑其所贪 / 196

治民之道，务笃于教 / 197

上行下效，知行合一 / 202

正己化人 / 204

### 第七十五讲 修从政之德，怀律己之心 / 206

孝悌亲仁，立身之本 / 207

圣贤教育感化民心 / 221

礼者，敬而已矣 / 225

### 第七十六讲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 229

以德感人，以礼教人 / 230

亲仁爱民，民不忍欺 / 231

道德教化，人能圣贤 / 235

德仁义礼，圣人所重 / 238

举善而教，仲尼所美 / 240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 245

### 第七十七讲 不学礼，无以立 / 247

君子有三畏 / 248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 251

道家：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 254

人贵有礼 / 260

礼之教化，正邪于未形 / 262

### 第七十八讲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 264

以礼治国，天下归心 / 265

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 271

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 / 274

富贵贫贱皆须知礼 / 276

婚礼的教育意义 / 277

以礼治国，防患未然 / 281

祭礼的文化内涵 / 283

### 第七十九讲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 286

曲高则和寡 / 287

音乐之道，与政相通 / 292

音乐呵护心灵 / 295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 297

第八十讲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299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 300

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 / 302

圣人养贤，恩泽万民 / 303

圣人爱民如子 / 305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 / 307

先恕而后教 / 308

为仁之道：恭、宽、信、敏、惠 / 309

安政养国，民自归附 / 311

第八十一讲 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 / 314

圣人之教，非仁则义 / 315

民有七亡，又有七死 / 319

第八十二讲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 322

富国八政，民生为本 / 323

准平调控，稳定粮价 / 333

学古入官，议事以制 / 334

成由勤俭破由奢 / 336

君为政，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 338

伦常道德，诚以行之 / 340

# 第六十五讲

## 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开篇讲了为政的纲要。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为政最基本的原则，也道出了作为领导者的最高境界，即领导者有执行力，能受到众人的支持与拥护，甚至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政”即政治，孔子认为一定要用道德来治理国家。

古注之中对北辰的解释不一，有的解释为北极星的名字，有的认为指地球北极与天空相对的方位。采取方位的说法比较合理，即在天空无星之处，这个空体是如如不动的，但是“众星共之”。“共”通“拱”，意思是围绕。空体譬如人君，众星譬如大臣和人民。人君如果能够“为政以德”，他的国家政治是本于道德的，合理、利民，君主安居其所，自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如同北辰之得众星围绕。得到臣民的拥护是结果，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为政以德。

《群书治要·新语》中讲，为政以德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得道者多助”。“夫善道存乎心，无远而不至也。恶行着乎己，无近而不去也。”如果所言所行都依据于道，即使远方的人，也会被感召而来；相反，如果恶行昭著，即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也会离去。

后面举例：“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献而至，麟凤白雉，草泽而应。”周公亲身实践礼义，以郊祀之礼隆重地祭祀他的先祖后稷，结果感召远在南海边的越裳国使者带着贡品来朝拜，麒麟、凤凰、白雉这些祥瑞之物都在草泽中应现，这都是天人感应的现象。相反，“殷纣无道，微子弃骨肉而亡”。商纣王荒淫无道，不听大臣的劝谏，不务正

业，骄奢淫逸，荒于朝政，最后他的庶兄微子都弃他而逃亡。所以“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是以明者可以致远，否者以失近”。上位者如果行善，百姓就对他爱戴，百姓欢喜、拥护他；行恶的人，子孙就会对他怨恨有加。所以明智的人可以招致远方的贤才，而行恶之人却连身边的人都会失去。这一段说明“为政以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为政的基本指导原则。

## 治国理政的九项纲领

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焉，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人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齐庄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尊贤也；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笃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禀称事，所以来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绥远人也；继绝世，举废邦，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治天下国家有九经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本段提出治国最基本的九项原则，如果能够了解、掌握这九项原则，就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

“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焉”，讲述治国理政的原则，即“修身也，

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人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治理国家天下有九项重要的纲领：修正己身，尊重贤人，亲爱家族，礼敬大臣，体恤重臣，爱民如子，招徕各行工匠，抚慰远方来的人民，安定各地诸侯。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经”当“常”字讲，表常理、常法；也当“径”字讲，即道路；也当方法的“法”字讲。“为”，治理。治理天下国家有九项准则、九项常法。“经”意味着这九项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准则，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只要领导者真正为天下苍生着想，真正以苍生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办理政治，就必须遵照这九项原则来行事。如若违背，国家肯定治理不好。

“修身”，《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作为国家的君主、最高领导者，修身是根本。孔子最敬佩的是尧舜的禅让政治。他们能够禅让就是因为他修身修圆满了，把天下让给贤德的人，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大学》讲了修身的次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依照这个顺序修身，才能够修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自古以来的圣人都是通过修身成就的。

“尊贤”，尊重贤能的人。“贤”指品德好且有办事能力的人，即德才兼备的人。做国家的元首也好，做团队的领导者也好，都要尊贤。怎样才能做到尊贤？假如一个人有嫉妒心，对贤人就尊重不起来，恭敬心提不起来，也很难做到尊贤。假如领导有傲慢心，就留不住贤德的人。假如领导者有欲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和享受谋取私利，而不是真正为天下苍生着想，那么道不同不相为谋，贤德的人就会离他而去。所以夏商周这些开国的人君、天子，譬如商汤之所以能够感召伊尹，文王之所以能够感召姜太公，都是因为有一颗爱民之心。这些贤德之人之所以愿意出来辅佐君主，是因为看到君主襟怀天下、心系众生，所以“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

怎样做才是尊敬贤人？不只是说君王对贤人有礼貌就是尊敬。听取并采纳贤人提出的政治建议，这才是真正的尊贤。贤人不一定是君王的臣子，贤人可能没有官位，但是他有德行、有能力，对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非常通达。如果君王不尊敬贤人，那么关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就不会告诉君王。这不是因为圣贤人齐法，而是因为他知道君王不尊重他，就是告诉了君王，磨破嘴皮，君王也不会采纳，所以他就不白费口舌了。

既然要尊贤，相对的就疏远身边的小人，即自私自利的人，君王甚至不用他们，才能真正做到尊贤。如果只是口上说尊重贤人，但是身边所任用的都是小人，贤人想贡献他的建议，即使上了万言书，君主身边的小人也会把它曲解，让君主不能够采纳。所以国君要真正尊贤，就要疏远身边的小人，特别是佞臣。佞臣会专门说君主喜欢听的话，专门迎合君主的意思。当然如果君主足够明智，是不会听佞臣之言的。但是谄媚的话听多了，即使是明智的君主，在不知不觉中也可能会接受小人的建议，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佞臣。近贤远佞，这是尊敬贤人的一个重要原则。

“亲亲”，第一个“亲”是动词，第二个“亲”是名词，是指家里的父母、兄弟、夫妻等亲属，当然还包括像叔叔、伯伯、堂兄弟等六亲眷属。古人都生活在大家族，远近亲疏的关系都有，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社会，各种关系非常复杂。亲亲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对父母的亲爱，也就是要尽孝道。这里虽然是孔子教鲁哀公治国的方法，但治国要从齐家开始，要讲孝道。家不齐，国就不能治。虽然是对国君讲的，但是对普通人而言也要讲孝道，这样才能学做圣人。

“敬大臣”，“大臣”是担任国家重大职责的臣子，在古代就是宰相、公卿，他们决定国家的政策、辅弼君主，是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人，必须敬重。用现代的话来讲，大臣就是国家元首以下的官员，各部的部长、各省的省长。尊敬不仅仅是对大臣很礼貌、很恭敬，还要尊重他的职权。

既然任用了他，他替国君出谋划策，国君就要尊重他的职能，不要处处干扰。

“体群臣”，“群臣”与大臣不同，大臣是在国家各种重大决策方面，提供国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让国君来决定。群臣泛指文武百官，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泛指国家中级公务员。“体”就是要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一般的办事人员，工作都很辛苦，在辛苦工作之中，就会有一些考虑不周的地方，办得不是很到位的地方，这些就要体谅，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所谓设身处地，就是虽然是处在国君、领导的位置，但是要站在群臣的立场，把自己想象为一般的公务人员。假使自己是办事的人员，辛苦上班，加班加点，而拿的工资、薪水又不是很高，如果自己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受到上级的挑剔、批评，自己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当然会很不舒服，会有怨言。这样换位思考，自己不愿意被别人挑剔、批评，就要能够体恤他们。他担任这一份工作，辛辛苦苦，因为事情很忙、很多，出一点差错也情有可原，可以宽恕。工作人员知道领导关心他、体谅他，就会更加尽心尽力地回报领导。

“子庶人”，“子”当动词用。“子”，本指小孩子。“子”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一个头，一横是两只手，下面是一个身体。小孩刚刚出生，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生活能力，所以叫赤子，就需要父母来关心、照顾。做国君的人，对于一般的民众，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关心他、爱护他、体恤他，做到爱民如子。“子庶人”，就是要以对待自己儿女的心，对待老百姓。

《群书治要·六韬》中记载，周文王曾经向姜太公请教怎样能够治理国家。姜太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就像兄长慈爱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看到百姓劳苦奔波，要发自内心地同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一个重要方法、重要原则。

“来百工”，“来”是一个假借字，“来”本是指麦子的“麦”字，是一个象形字，后来“来”字被借为“来往”的“来”，就变成了动词，“来”在此地作动词，是招徕、招揽的意思。“百工”，就是各种工匠，等于现在的科技人才、艺术人才、工商业人才等，都有一定的技能。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有专业、有技能的人才都要招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聘用他，如果国家不任用他们，他们就会有怀才不遇之感。如果国家能够聘用他们，给他们一定好的待遇，他们就会为你所用。一个国家拥有人才的数量居多，国家的经济一定会增长，发展就不成问题。

“柔远人”，“柔”就是怀柔，“远人”是指离别家乡而远来之人。譬如，从外国到我们国家做生意的，或者来旅游、作客、访问等人。在上位者要考虑到，他们背井离乡，很不容易，所以要用宽柔的方式体恤他们，与他们和谐来往。

“怀诸侯”，“诸侯”，就是周天子所封的各个诸侯国的国君。他们拥有自己的领地和臣民。“怀”是怀柔、安抚。“怀诸侯”是天子要把各国的君主放在心里，关怀他们国家的治乱兴衰，适时地对其进行安抚。就鲁国的鲁哀公来讲，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诸侯，他也面临与其他国的君主处好关系的问题。怎样处好关系？要关心其他的诸侯国君，用至诚之心与各国诸侯交往，联络感情。

在现代社会，各个国家都讲求外交。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无论与哪一个国家的国君联谊、互相访问，都要用诚心与其交往。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不诚心，完全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那么访问哪一个国家都不会取得成功。“怀诸侯”就是要求君王怎样关心自己的国家，也要怎样关心其他国家，这才是真正的怀诸侯，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共享和平。

## 以道德的力量，让天下人敬畏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修身则道立”，能够修其身，大道自会显现。如果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开始修养自身，身修好了，道自然就彰显。“道”是指我们的明德，明德得以彰明，这就叫“道立”。自己修身修好了，自然能够齐家，家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顺、夫义妇德，齐家之道就立起来了。修身做到圆满，就能感召贤德之人的帮助，治理国家、办政治也能够办得好，治国之道也就立起来了。

《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办理政治？孔子说：“《书经》中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说，如果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兄弟之间互相友爱，照着这样做，就是办政治了。所以办政治就是要把孝悌之道推广到全国。“子庶民”就是做到爱民如子，也就是把孝悌之道推广到全国百姓身上，这也是从修身立下的基础。所以说“修身则道立”，把身修好了，齐家之道就立起来了，治国之道也就立起来了。

在《论语》中孔子也多次强调，在位者的修身，对于治国起到基础并且关键的作用。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使一个领导者、在位者能够端正自身，办政治又有何难处？上行而下效，自己能够行为端正、廉洁无私、克己奉公，手下的人自然会起而效法。如果自己贪财好利、以权谋私，手下的人也会起而效法。所以如果你不能端正自身，就不能够端正别人。如果领导者修身修不好，就谈不上治国。楚庄王听了詹何的回答就说：“你说得太好了。”因此他依教奉行，使楚国大治，成为霸主。

这说明，修身修圆满了，国家也就治好了。修身和治国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在修身的过程中就已经是在治国了。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领导者而言的，对于普通人而言，能够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也是在改变周围人的道德行为了，已经是在为身边的人做榜样了，这就是在办政治。

“尊贤则不惑”，贤者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如果经常亲近德才兼备的人，并且顺承他的教诲，对于是非善恶的道理，就能够明辨而没有疑惑。“不惑”的意思很深，就修养圣人、贤人来讲，是把自己的迷惑全都去掉。不惑的境界很高，那就是中庸之道，就是“天命之谓性”的“性”。要开发自己的本性就要把“惑”去干净，天性自然显现。

“尊贤则不惑”与治国之道、为政之道有什么关系？治理国家、办政事都要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办的事情要能够让全国的百姓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要尊重贤人，让德才兼备的人来指导，才能够不惑。贤人来帮助国君治国、平天下，他的目的也是要成就圣人。成就圣人就要从替天下民众谋求福利做起。所以贤人办政治，不是为自己求得权力，不是让自己身居高位，为所欲为，或者是求得种种利益，受到国君的宠信。他的目的是为天下人办政治，这个政治称为圣贤政治，他是在为天下人服务、为天下人办政治的过程中成就圣人。假使国君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到自己的私利，就会和圣人的意志相违背，就不能够学做圣人了。不仅学不好圣人，相反，还会变成一个十足的小人。所以贤人不为自己办政治，不为自己的利益谋私。做天子也好、做国君也好，想要任用贤人，就必须尊重他，听从他的合理建议。

譬如，以现在办教育来做比喻。圣贤人办教育，他的目的是使人明明德。也就是说，他所设立的教育目标首先是让人懂得做人的根本，而且最终的目的是成圣成贤。唯有树立了这样的教育目标，才能够把人真正教好。这样的教育政策是明智的。如果你是国君，任用了这个贤人，他提出这样的教育政策，你就要明白并采纳。不能你向他请教后，他为你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但是你对此见解不理不睬，把它搁置一边，这就不是真正的尊重贤才。圣贤人的教育政策一旦能够实施，他所教导出来的人也是不惑之人。

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兴盛，首先都做到了一件事，就是尊贤。夏商周如此，汉朝也是如此。汉高祖如果没有礼敬张良、韩信、萧何等大臣、贤人，整个政策就不可能稳固。唐太宗如果没有礼遇魏徵，没有接受他的犯颜直谏，那也不可能成就“贞观之治”。唐玄宗一开始任用了韩休、张九龄这些贤才，所以才有“开元盛世”的出现。

“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能够使孝悌之道施于家族，把各种亲属关系都处理好，就能做到“诸父昆弟不怨”。“诸父”就是和你父亲同辈的，像叔叔、伯伯等亲属。“昆弟”，就是包括自己的亲兄弟、堂兄弟等，和自己同辈分的兄弟姐妹。“怨”是有怨言、怨恨。“怨”不是怨外人，而是指家族关系内部。为什么家族内部关系还有怨言？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怨从亲生”，这个怨就是从“亲”生出来的。亲族之间、亲属之间为什么还有怨？因为心中有偏向。做父亲母亲的要注意，如果你心中有偏向或者即使心中没有偏向，可是在外表现出来，让儿女有所误会便会产生怨言。做父母不容易，要时常用心观察儿女的心理，要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家里人对自己避免产生怨恨。所以国君如果能够亲爱自己的亲族，用心关心他们、照顾他们，这些伯伯、叔叔、兄弟等宗族的亲人都受到恩泽，自然就不会有怨言，不会有嫌隙。国君自己的家能够治理好，也是为天下人做出了一个好榜样，天下人都起而效法；反之，如果国君的家族成员都不和，老百姓也就会对他丧失信心。

“敬大臣则不眩”，君主能够敬重宰相公卿，专信而不疑，他们也会竭忠尽智地报效国君，君臣一心，和合共识，朝政就不会迷乱颠倒。“不眩”指办的事情非常明白，不会迷乱。说明任用大臣也要任得其人，他替你办事情办得井井有条、明明白白，不会混乱，更不会出错。这就是敬大

臣的效果。

“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君主如果能够体恤群臣，设身处地的加以体恤，群臣一定会怀感恩之心，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孟子》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如果你对属下的体恤，就像爱护自己的手足一样，那群臣对你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他会加倍地对你关爱，甚至是像爱护自己的腹心一样来对待你。

“子庶民则百姓劝”，“劝”是劝勉。如果国君把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儿女一样看待，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这样爱护、关心百姓，帮助百姓解决问题，老百姓会受到感化，把君主视作父母，拥护他、爱戴他。既然受到君主的感化，就不忍作恶，而相劝为善，大家彼此劝勉、鼓励去行善，不让领导者操心。

“来百工则财用足”，如果君主能够招揽各种工匠，就可以繁荣经济，财用自然充足，民富国强。“来”也有劳来的意思，就是对于百工、各种专业技术人才，要慰劳他，给他丰厚的报酬，而且要处处关心他，解决他的困难。这样百工、人才都来了，有人就有财。他的各种发明、各种事业全都发展起来，国家的财富自然就充足了。《大学》中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如果国君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人，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也会被感召而来。这些有技能的人才被感召而来，并全力以赴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就自然会创造财富。创造财富之后，要懂得如何运用财富，要把它用在进德修业上，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不能把财富用在骄奢淫逸、吃喝玩乐上，否则最终会导致“富不过三代”。所以虽然财用富足，但是还要懂得勤俭持家。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远人”，从远方而来的人。改革开放后，有很多外国人来到我们国家做生意，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背井离乡，所以我们国家的决策制定者以宽柔的政策来体恤他们，使他们到了我们国家就像回到自己的国家一样，感受到温暖，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

来我们国家工作、生活。

“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怀诸侯”，用怀柔的政策对待各个诸侯国的国君。要怀之以恩义，正之以礼仪。天子要帮助他解决困难，而且还要帮他兴起礼仪的教化，关怀他的国家治乱兴衰的状况，适时地对他进行安抚，各国诸侯都会归向于天子，天下的人对天子都会生起敬畏之心。什么叫敬畏之心？因为天子有威德，所以大家敬重，一旦天子有什么事，他们也会无条件地帮助。天子得到各个诸侯国的帮助，就是“得道者多助”，所以天下诸侯都成为天子的助力，这样就是“天下畏之”。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是要以道德的力量，让天下人敬畏。

## 斋庄盛服，非礼勿动

“齐庄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齐庄盛服”在《中庸》中作“斋明盛服”。“斋”即斋戒。在古代，不要说是天子诸侯，就是普通人在祭祀之前的三天，都要斋戒沐浴。斋戒有什么要求？就是不能喝酒、不能吃肉，还要夫妻别床，不能同房，这叫斋戒。“明”，当清洁讲，斋戒沐浴，就是要洗头、洗澡，把身体洗得很干净。“盛服”，在正式祭祀的时候，都要穿礼服、祭服。因为祭祀行礼有专用的礼服，所以叫盛服。斋是指内心，沐浴、盛服是指外在。“斋明盛服”，就是说内外都要恭敬，要做到内敬外庄。内在的斋戒是讲恭敬心，外在的就是干净，身体洗得很清洁。这是就祭祀而言。

为什么古代的天子诸侯都特别强调祭祀？因为强调祭祀祖宗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一个人对他的祖先能够念念不忘，定时去祭祀，那么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所以祭祀祖先培养的是一个人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祭祀也是一个教育的场合。在祭祀的时候，这种盛大的典礼，通过礼乐，会把人的心调得庄严、和谐，而且还要宣讲

祖宗的德行，讲祖上哪一朝、哪一代有哪一位有德行的人，对国家人民有哪些贡献。作为他的后代子孙，应该继承他的哪些美德，传承他哪些好的作风，让好的家道、家风代代相传，这是祭祀的目的。

上行下效，天子、国君带头祭祀，老百姓也会兴起祭祀之风，祭祀自己的祖宗，这都是深厚的报恩意识，也是提倡孝道很好的方式。“家不齐则国不治”，社会和谐安定也就很难达到了。古人看得深远，把礼看得很重要，因为它有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这里用祭礼中的一个例子，告诉人要“非礼勿动”。祭祀的时候，无论是主祭者还是陪祭者所站的位置、所行的礼，都有一定的规矩，不能乱动。“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礼的事情，不仅不能够去做，甚至连起心动念都不可以。

颜回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回又问：“请问其目。”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最后就是“非礼勿动”，“动”不是说不符合于礼的事情不要去做，对于颜回这样境界的人，“非礼勿动”就是不符合于礼的念头都不能起，要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处杜绝。

此处是拿祭礼来做例子，能够这样做，修身就有了基础。推而广之，不但祭祀如此，任何的言语行为都能够做到内敬外庄。对待一切人都能够如此恭敬，就能够诚意正心，自然就能够修身，治国、平天下也能够做得好。

《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如果让老百姓尊重我，对我效忠，竭尽全力，而且他们彼此之间还能够互相规劝，劝勉为善，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他一听这个问题，就知道问这个问题的人有什么需要改正、需要提升的地方。季康子问的是如何让老百姓尊重我、对我效忠，怎样让他们互相劝善规过、使社会风气良好。他的念头都是在向外求，都是想让别人怎样做。孔子马上

让他反省自己，从自身做起，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所以教育者和领导者先受教育，才是符合规律的。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你面对臣民百姓要非常庄重，懂得自重，别人才会重视你、尊重你。自爱而后人爱，自己爱自己，别人才会爱你。如果你穿得很庄重，老百姓就会觉得你尊重他、重视他，他也会对你表示恭敬之心，你也会感受到老百姓的敬重。

“孝慈则忠”，孝慈，就是说国君自己要做到孝，对父母孝，对百姓慈爱。不仅要求自己做到，率先垂范之后，还要教导百姓做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百姓人人都有孝道，懂得知恩报恩、饮水思源，就不会忘恩负义，对他的国君也会生起感恩之心，感恩则图报，所以说孝慈则忠。国君能够慈爱百姓，做到君仁，那么臣回报你的就是忠。居上位者要起到君、亲、师的作用，不仅当他的领导要管理他，而且还要对他进行教育，教导他做人的道理，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地去关爱他。所以一个领导者能够起到君、亲、师的作用，百姓自然就会对你尽忠，会竭尽全力地回报你。

“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如果把社会里贤德的人、好的榜样树立起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教导那些不能的人，大家都会劝勉为善。这也就是教导季康子要从自身做起，不要去要求别人的用意。自己做到了，别人自然会起而效法。

“斋庄盛服，非礼不动”是讲诚敬心是修身的基础。做任何事都要有恭敬心，内外真诚，内敬外庄，这样修身才有基础。

##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尊贤也”，“谗”，是谗言，《说文解字》中讲，谗是毁谤的意思。小人经常会向在位者进谗言，目的就是陷害某一位贤能的人。小人都是自私自利、有嫉妒之心的，生怕贤德的人受到重

用，抢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想方设法要说贤人的坏话，目的是让在位者不要重用贤人。这种进谗言的人也不简单，他的谗言为什么能够被在位者听得进去？他首先要对在位者恭维一番，获得他的好感，然后再毁谤某一个人，在位者对他的话就能听得进去了，即使是他毁谤别人的话，在位者听着也顺耳。

韩非说，如果一个人能亲君子远小人，事业就会发展壮大，国家就会治理得好；如果亲小人、远君子，那国家一定会混乱、衰亡。怎样辨别这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韩非说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凡是奸臣和小人，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领导者喜欢什么，他一定跟着赞叹、肯定；而领导者厌恶、不喜欢什么，他一定跟着毁谤。明白这一点，就要远离奸佞小人。

有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的关公是一位很刚直的人，至大至刚。有一个喜欢进谗言的小人，他喜欢给人戴高帽，夸奖别人。有一次关公说：“这个小入，如果让我遇到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留着这样的人实在会坏事情。”他正说着，这个小入就来了。关公说：“你就是好给人家戴高帽，今天我不能放你走，不能让你再这样放纵。”这个小入说：“哎呀，这也不能怪我，要怪就得怪那些一般人，他们都喜欢高帽子，所以我才送给他们。如果遇到像关老爷您这样的高人，我怎么能够戴得上去？”关公一听，这个人说得果然有道理，就把他放走了。放走这人之后，关公一想，他说：“一般人都喜欢高帽子，像遇到你这样的高人，就戴不上了。”这不是也给我戴了一顶高帽子吗？而且这个帽子戴得更高。由此可以想到，能进谗言的人总是有很多方法，让你能够听进他所说的毁谤人的话，并觉得合情合理。

怎样才能不听小人的谗言？自己必须明智，能够分辨别人所说的话。《论语》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自己首先要有知人之明，而要知人首先必须自知。譬如有人说你是圣人、大贤人，是大德，你就得好好想一

想：我真的是圣人了吗？我真的是贤人了吗？我有何德何能配得上人家称我圣人、贤人？这样一反省，你就不会被别人给你戴的高帽子所迷惑了。“去谗”就是要摒弃谗言，凡是有人来向你进谗言，都要把它摒弃不接受。不听他的话，甚至远离这些邪佞之臣。远离就是驱逐他，把他赶走，不让他在你身边。

“远色”，“远”，是疏远的意思，当它作动词时，读四声。“色”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两性的男女之色，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远离女色，对自己的德行亏失就太大了。《尚书》中说：“惟天福善祸淫。”“天道祸淫最速。”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淫乱的人，带来灾祸是最迅速的。如果一个国君沉湎女色不能自拔，就无心于朝政，无心于为人民服务，也就无心于治理天下了。

东汉时，有一个贤臣叫宋弘。有一天，他在和汉光武帝谈话，刚好宫廷里面换了几幅新的仕女图，仕女图上的女子都画得很美。汉光武帝和宋弘讲话时，眼神就飘到仕女图上。宋弘看到皇上的眼睛飘来飘去，注意力不集中，马上就提醒皇帝，说：“孔子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喜好女色那样喜好道德的。圣人的话十分管用，因为古代皇帝从小熟读圣贤之书，一经提醒，汉光武帝就不好意思了，马上说：“来人，把它撤掉。”并且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我听到这么好的教诲，马上就去做，这样可以吗？一个皇帝有这样的态度，也是百姓之福、社稷之福。

另一种说法，“色”是“巧言令色”的色。“令色”就是故意表现得很友善，摆出巧言令色的姿态，让你觉得这个人很好。而不论是哪一种意思，是“女色”的色也好，还是“巧言令色”的色也好，都是想从你这里取得好处，对这样的人就要疏远。这就要求自己做一个明白人，不要贪图“色”，这样才能够远离。不能够“去谗远色”，自己的品德就不能够提升，成圣成贤也就成了一句虚话。自己没有品德，想亲近贤人，也就不可能

了，因为志不同、道不合。

“贱货而贵德”，“货”就是财货。放眼社会，很多人把钱财看得非常重。没有钱的人想方设法地要去赚钱发财；已经有钱的人，还想继续发财。这里的“贱”指轻视。规劝一个人不要看重财货，他不会轻易接受。

但是古代的读书人都知道“财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为什么古代的读书人把钱财看得那么轻？因为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育人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学子成为君子、成为圣贤。所以“读书志在圣贤”“读书贵在变化气质”，都是以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目标，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要把自己本性的明德开发出来。本性之中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财富、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德能，你把自己本性的德能开发出来，就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用向外去驰求。学圣贤时，要修养自己的品格，建立自己的人格。建立自己的人格、品德和追求财货相比，哪一个更重要？财货最多不过是让我们维持世间的生存而已，但是对于一个希圣希贤的人而言，钱财只要能够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就够了，钱财多了反而是坏事。

就饮食而言，我们每天吃粗茶淡饭，不应有过分的欲望。所以读书明礼的人自然能够懂得“贱货而贵德”的道理，以道德为贵重。圣人的教育，就是把一般人爱财的心纠正过来，学做圣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乎大道。

学圣贤教诲为什么这样喜悦？因为读圣贤书，能够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能够把圣贤教诲落实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中，个人幸福美满、身心和谐、家庭和睦，社会也就能得到治理。

以上是讲“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尊贤也”。如果君主是一位有德之人能够不看重钱财，而以道德为贵重，自然会感召贤人来亲近他。贤人都以道德为重，而不以钱财为重，所以在各行各业都有圣人。“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亲亲”，就是对于家族的各种亲属要

讲究亲亲之道。“爵其能”，要给他一个爵位。譬如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之后，马上就把他的父亲尊称为“太上皇”。“重其禄”，“禄”是俸禄。做了国君，对于家族的人不能太刻薄，要关心他们，还要给他们好的俸禄。“同其好恶”，根据郑康成的批注、孔颖达的疏，“同其好恶”就是家族之间虽然有亲疏之别，但是要同等对待，平等待遇。在亲亲之义这方面不能有所分别，在义务上应该同等。“同其好恶”就是不能有所好恶的意思，这是郑康成的批注。有所好恶就是有所偏向，同其好恶就是不能偏向。郑康成的批注也有他的根据，但是圣人所讲的话，被记录在经书里面，不是只有一种意思。古人的批注有各人不同的理解，再权威的批注也只能解释其中部分含义，不能把经书的全部意思批注出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不同的人理解经义会有不同的境界。

根据雪庐老人的讲法，“同其好恶”就是“和”，譬如说父母所好的、所恶的，我们也要和他们有同样的好恶，和父母的好恶达成一致。好的方面，譬如说，读书人都喜欢琴棋书画，弹琴、下棋、学书法、画画，这些都是高雅的爱好，如果父母、亲人有这方面的爱好，你同其好恶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父亲母亲喜欢喝酒赌博，这些是不良的嗜好，你就不能同其好恶了。不仅不能同其好恶，还要劝谏他们。《论语》中说，“事父母几谏”。“几谏”就是委婉地劝谏，要劝父母把不良的嗜好改正过来。但是劝谏的态度一定要柔和，讲求善巧方便，做到“怡吾色，柔吾声”，不能因为父母做错了事，就可以对其俭朴厉气，大吼大叫。这不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事。

对于“爵其能”，还要强调一下。譬如，刚才讲到刘邦尊他父亲做太上皇，太上皇的位置很尊贵，但是刘邦没有让他的父亲垂帘听政干预政治，只是给他一个虚位而已。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国君对家人，只是给了父亲一个虚位，并不让其参与政事的管理。当然如果他真有办事能力，也是可以让他办事情的。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你还给他一个部

长、院长的职位，就会出问题。所以孔子说，国家的官位等要职不能随便交给家里的人，因为一旦他们做错了事，对整个国家和人民都会造成重大的伤害。所以“爵其能”，不是随便地把一个实职的位置给家里人，而是给他一个虚位，让他感到受尊重，但不让他干预政治。

“所以劝亲亲也”，施行王道、治理国家，都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国君对于这些亲族，要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赐给他们丰厚的俸禄，并且和他们有相同的好恶标准。他们的位置很尊贵、俸禄很厚重，就不会有怨言了。与他们有一定的好恶标准，就会相处得和睦。国君的家族、亲属之间能够和睦相处，他的家族就可以作为天下人的榜样，国家因此可以得到治理，同时也可以把孝悌的教化推行于天下。

## 第六十六讲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上一讲讲到“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笃亲亲也”，下面接着上一讲的内容继续讲解。

“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是大的意思，“官盛”就是高官，“任使”即任其差使。大臣属于高官，就不能让他们做琐细的事。琐碎的工作，就让他委任下属来办，不必由他亲自办理。高官的心思是用在制定长远的大政方针上的。至于政策制定之后如何执行，要交给事务官去办理。所以“任使”就是任用部属执行任务。

这是劝勉大臣的方法。这样做可以使大臣把他的智慧完全用在制定国家的长远方针政策之上，而不被琐细的事所缠身。他把智慧用在大事之上，不再过问细碎的事，就会更专注做大事。办事务性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譬如一项事业在实行之前可能会遇到种种的障碍和不被理解的待遇。这就需要具体事务的人，去让人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他要去和民众沟通，让人配合。“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士”是一般的臣子，相当于现在普通的公务员，在古时候叫作“群臣”。“忠信重禄”，郑康成注：“有忠信者，重其禄也。”对于拥有忠信品德的臣子，要加重他的俸禄，这对于劝勉群臣、士人是一个好办法。对于一般的臣子而言，这也是一种鼓励，鼓励人争先去做好忠信、行仁义之事。

因缘生在《中庸》的注疏上，对这一句话这样注解：“人君对待士人，必行忠信以感其心，赐厚禄以养其节。若能以身体之，则济济多士（人才济济），必皆尽力供职，竭忠以报之。”这是指人君对臣子忠信，就是对

士人忠信。用忠信的态度感化他，使人心归附，而且要给他很厚重的俸禄。用现在话来说就是高薪养廉，他就没有必要因为生活不济而贪污受贿。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得好，那么这些人才都会竭尽全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地来报效人君。

## 使民以时，百姓归心

“时使薄敛，所以子百姓也”，“百姓”是一般的民众，出自《尚书》。在《尧典》中记载，从天子到大臣，推广起来一共有100个姓，而这100个姓，就代表了所有的姓。当然“百”有多的意思，不一定就是100的意思。从现在的数字统计看，中国有两万多姓氏，是“万姓”。所以中国香港等地举办祭祀活动是在“中华民族万姓先祖纪念馆”。“百姓”实际包含了国家所有的民众。

怎样劝勉全国一般的民众？要做到“时使薄敛”。使用民众，首先要注意到“时使”，就是“使民以时”。“使民以时”的第一层含义，古人认为要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生产、生活。在古代农业社会，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建筑业，都有其适宜的时节，要顺着它的时节安排工作，就叫“使民以时”。

譬如，孟子讲的“不违农时”，不要违背农时。在农业时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春夏秋这三个季节，都是农忙的时候。不要在这些很忙碌的时节去役使人民。譬如农民忙着秋收时却让他去建宫殿，或者出兵打仗等；过了秋收季节，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再让老百姓做这些事，这才是使用民众的时候，这叫“时使”。当然对这句话也要做与现代相适应的理解，农、工、商、民都各有忙时，在他们不忙的时候来使用、役使才叫“使民以时”。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讲“不违农时”，现在是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也都要在他们不忙的时候才去役使他们。

“使民以时”的意思更深一步讲，就是一个人从小到大这一生的过程，处在什么样的年龄，就应该有适合其年龄的教导。譬如人在幼年的时候，记忆力是最好的，这时就让他多读诵经典并在生活中去力行。譬如学习《弟子规》，让孩子从父母的言行举止中学习《弟子规》，从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会使他受用终身。小孩的记忆力特别好，就要充分发挥他记忆力好的特点，让他把童蒙教育的经典都能熟记、熟诵，并且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在汉代，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的神童、圣童。为什么把他们称为神童、圣童？因为这些孩子到了十二三岁就可以把经书倒背如流。有人认为这样的孩子很聪明，实际并不是这些孩子很聪明，而是中国古人的教育，适合了儿童心理成长、发展的规律。孩子小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好，就充分发挥他记忆力好的特点，让他多记诵经典、读诵经典。等他长大，理解能力提升之后，才把他背诵的经典讲解出来。所以古代的孩子上学是不需要带课本的。上大学，老师就带他们到树林、河边、山坡下，然后把他们以前所背诵的经典讲解出来。他们学得很欢喜，也很轻松，因为他们都熟记于胸了，老师提到某句经句，他们都很熟悉。

《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贵以专”特别重要。参加过出国前英语培训的人都有体会。在出国之前的几个月要参加一个英语速成班，速成班的效果一般都很好。因为在几个月的培训中学员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英语之中了。所以短短的几个月，学员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快。这就是“贵以专”的效果。

我们再看世界冠军，譬如乒乓球冠军、网球冠军、世界足球先生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才，就是因为他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打乒乓球、打网球、踢足球上。同样，那些弹钢琴或拉小提琴的人，要能够成才，成为世界顶尖的钢琴家、小提琴家，也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弹钢琴或者拉小提琴上。而当他把钢琴弹好后，其他的乐器也就能触类旁通。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就像凿井一样，只有在一个地方深入下去，深入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挖到水。对一个人，在孩提时代要给他适宜的教育；到了壮年，他应当有一份好工作，能够为国家效力，为人民服务；到了老年，他应安享晚年，生活能够有保障，得到良好的赡养，过上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使其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所以古人把养老和育幼都看得特别重要，使人安排好一生的时间，按照他的年龄给予适时的引导，这也叫使民以时。所以按照人的成长规律来教导人民，这也是“时使”或“使民以时”的应有之义。

“薄敛”，“薄”是比较轻微，“敛”是由国家向老百姓征收的田粮和赋税。在古代，老百姓基本都是用粮食向国家缴赋税，到后来改用货币代替。国家向老百姓收赋税的时候，要看老百姓的财力、农作物的收成好不好，还要体谅百姓生活的实际情况。如果国君能够体谅民间疾苦，在收赋税的时候就不会太重，这也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叫薄敛。“时使薄敛”就是役使民众在农闲时向他们收取赋税，也要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这样，老百姓自然就会拥护国君，就能收到劝勉百姓的效果。

## 睦邻友好，诚不相欺

“日省月考，既禀称事，所以来百工也”，“日省月考”，“日省”，每一天都去省察，看一看他做了多少事情；“月考”，考核每一个月他的工作量是多少。“既”通“饩(xì)”，指生的粮食。“禀”通“廩”，指米粟之类的粮食。“既禀”就是古代官府发的米粟之类的粮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他的酬劳。“称事”，“称”，相符、相称。“既禀称事”，根据考核的结果，确定这个月应该给他的酬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绩效考核，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能够合理分配薪俸和奖金，这是招揽各行各业各种工匠的方法。

“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绥远人也”，“绥”，安抚。“远人”，从远方、外国来的人。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对于鲁国而言，鲁国以外的人，譬如说齐国、晋国等国家来的人，都是外国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到我们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远人”，无论是来旅游、经商，还是来长期定居，都称为“远人”。应该怎样对待“远人”？“送往迎来”，他们来的时候，要迎接；他们回国的时候，要欢送。关于“送往迎来”，在中国古代，有一整套接待礼仪，以对外国人尽地主之谊。外国宾客到来的时候，我们要为他做周到的安排；他回去的时候，也要照顾好归途的事宜。如果他要长期定居在我们国家做一个侨民，更要善意地对待他。

除了送往迎来以外，还要“嘉善而矜不能”。他有好处、有善处，譬如说他品德好、能力强、贡献多等，用一个“善”字来概括，就要奖励他、劝勉他。“矜”是同情，凡是能力不够的，我们还要关心、协助他。譬如外国人来到我们中国，首先语言上可能不是很通达，就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使得彼此的沟通没有障碍；他对我们国家的风俗习惯不甚了解，或者他在生活工作方面有不适应，都要热心的去帮助他。能够这样做，就可以安抚外国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自然就会向他们国家的人介绍，说：“我们到中国去，中国人对我们很友善，是一个礼仪之邦。”

唐朝之所以出现万国来朝的局面，就是因为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彬彬有礼，礼仪完备周到。他们回去之后，就向自己的国君报告。他们的国君就把唐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即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心悦诚服地向他学习。这样就建立了良好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国民外交最好的一种方式。

“继绝世，举废邦，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继绝世”，就是哪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要能够让它继续下去，不要灭亡。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的第一条就是讲

孝道，而尽孝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父母、祖宗，如果是天子，还要教天下的人都尽孝道；如果是一国的国君，也要教导全国的百姓都尽孝道。天子、国君怎么样教化民众？《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也就是要拿出实际的表现来教，上位者怎么做，老百姓就会怎么效仿。譬如周朝，周天子得了天下之后，他首先建立太庙，祭祀他的始祖，报答祖先。建了太庙之后，就使得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能够祭祀祖宗，这是天子建太庙、尽孝道的表现。不仅如此，还要想到天下人，让天下人都懂得尽孝道。天下人之中也包括了前代的帝王。

夏朝亡国时，夏桀王为商汤王所灭，虽然汤王灭了夏朝，但他把夏朝王室、贵族分封到杞地，建诸侯国杞国，让杞国世世代代的子孙来继续夏朝的香火，永久地祭祀夏朝的祖宗。到殷朝末代，商纣王被周武王所灭，但是周武王同样把殷朝后裔建成一个诸侯国，即宋国，让宋国的子子孙孙祭祀历代祖宗，这就是“继绝世”。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古人人心的厚道，真的是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把仁爱之心尽到了极致。

“举废国”，就是哪个小国被大国灭了，其他有正义的大国，要想办法让它建立一个后代，不要让它被永久地废除。“举”就是把它举出来，譬如一个小的国家已经亡国很久了，甚至于后代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如果国家的君主是一个有道之君，讲求孝道，就要想办法把这个被废除已久的小国的后代找到。把它的后代找到之后，推举出来，让他们延续这个小国家，让这些后代能够继续祭祀他的祖宗，这都是提倡慎终追远。

《论语》中记载，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如果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提倡祭祀祖宗，那么民风自然就淳厚。这都是教导人孝道，教导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人心厚道，社会风气淳朴，就不会再有恶事、坏事出现。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都在于人心善恶，如果能

够把人心转变，很多的社会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古人治天下，都是从根本处下手，建立礼仪、音乐的教化目的都是要扭转人心，使人心变得恭敬、和谐。人心恭敬、和谐，就不会作奸犯科，更不会成为乱臣贼子。

“继绝世，举废国”，重要的意思就是要让后代子孙能够一直继续祭祀他的祖先。如果我们懂得续家谱的话，把这个家谱推上去，无论是百姓还是万姓，不论多少个姓，一直往上追溯，追溯到最初的时候，祖先都是三皇五帝。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中华儿女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族，绵延了五千多年而不衰。这也是“继绝世，举废国”的真正原因，自己和万姓也好、百姓也好都是一体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下人都是一个共同体。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真正化解矛盾冲突，实现世界和平。

“治乱持危”，看到其他国家有内乱，就要帮助它把内乱平定下来。在春秋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齐桓公、晋文公时代的霸业，一方面是对付外族，所谓“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重、尊奉周天子为王，“攘夷”，对于外国那些夷狄要共同防范，不让他们侵犯到中国境内来，这是他们共同的霸业。对于周天子所治理的各国诸侯之间，如果发现哪个国家有内乱，就要帮助它平定内乱。譬如孔子时期，“陈恒弑其君”，在齐国发生了一个臣子杀君主的事件。孔子就请鲁国的君主出兵讨伐，平定齐国的内乱。可想在当时，一个国家的君主如果是真正的有道之君，就会帮助其他国家平定内乱，这个叫“治乱”。这是真正地帮助别国平定内乱，而不是借着平定别国内乱的名义，去干涉别国内政、去掠夺别国的资源。“治乱”与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同的。“持危”，看到其他国家有危险，或国内有种种危机出现，就要把它扶持起来，不要让它的危险或危机持续下去。“治乱持危”，就是对待其他国家，要讲究一种国际正义，而且存心一定是帮助对方国家。

“朝聘以时”，就周天子来讲，他要求各国的诸侯定时朝见，而诸侯

与诸侯之间也要互相来往，这叫“朝聘”。“朝聘以时”，就是要讲究在适当的时机互相朝聘。两国之间相互报聘、拜访，都要选择适当的时机。朝聘以时，就是强调平时就要注重讲究敦睦邦交。有一种友好的关系，互相来往、互相沟通才能避免误解，在自己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别的国家也会来帮助。“朝聘以时”要注重“厚往而薄来”，就是送给他国礼物时，一定要比他送来的礼物更厚重。这也体现了我们古人人心的厚道，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

“怀诸侯”，“怀”是怀柔、安抚的意思。统治者用安抚的政治手段笼络其他诸侯国。这也是讲究邦交、讲究睦邻之道，诸侯与诸侯之间，也可以得到彼此的诚心相待，这样天下怎么会不太平？这样平时互相来往，且礼尚往来，那么天下人就变成了一家人，这就是“怀诸侯”的效果。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讲求用什么动力推动落实治理国家、平天下的九项原则。“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在古代的注解里有很多种讲法。这里采取的一种讲法，是当“诚”字讲，诚就是《大学》中所讲的“诚意正心”的诚，也是《中庸》里所讲的真心，即“天命之谓性”的“本性”。本性在平时是不动的、是静态的，它所起的作用就是诚。也就是说，根据本性发起做事情的动力，就是诚。

所以治国平天下这九种原则、方法，都要围绕诚来发动，如果缺少了真诚心，那么什么事都做不好。因此对于“诚”，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用诚心来做事，就会表现得诚实、内外如一，口里所讲的话与诚实的心是一致的。如果口是心非，就不是“诚”了，是虚假、虚妄的，就和“诚”相背离。

如果一个领导者口里说自己是怎样关心人家，怎样爱护民众，关心一切民间疾苦，而实际上心里只想得到官位，享受高名厚禄，满足自己的欲求，这就是内外不一致，假仁假义，就是古人所说的伪君子。我们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诚，要认真地自我反省。如果一个人假仁假义，其实别人会

看得很清楚，欺瞒不了人。所以做任何事情，包括对待大臣、贤者，对待群臣、百工，以至于对待老百姓、外国人，如果缺少了诚心，那一切都是假的，让人看穿了就一文不值。所以“诚”字非常重要。当然，“诚”不仅是天子、诸侯要追求的，凡是从政的领导者，不管是什么级别、什么位置，甚至于乡镇长，都要追求“诚”。即使不从事政治工作的普通民众，如果想学圣人，要学道，缺少“诚”字，缺少了真诚心，就什么都不能成就。所以这个“诚”字是关键。

《大学》中，对“诚”下了一个定义。什么是诚？就是“毋自欺也”，不要自欺欺人。这都是提醒人们要时常反省，在做事、待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时是不是发自于内心的真诚之心？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那就很难感动人。所以中国人说“至诚感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如果没有诚心的话，就感动不了别人，也很难达到教化的效果。

## 人民是国之根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中国人强调民本，什么叫民本？整个的社会结构像一个金字塔，愈向上官位愈来愈高，人民处在最基础、最根本的位置上，所以强调民本是没错的。

《孟子》中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虽然人民处在基础的地位，但是人民是根本，应该把人民看得最尊贵。“社稷次之”，这个“社”指土地神，“稷”指谷神。在古代都要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所以经常用“社稷”代表国家。“君为轻”，强调君主是最轻的。这是古代贵民思想的代表。在贾谊写的政论书《贾子》中也说：“于政也，

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对于办理政事而言，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君主以人民为根本，官吏也要以人民为根本。既然人民是根本，那么应该怎样对待人民？《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国君能够让人民安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侍奉他们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如果国君有了忧困，人民也会忧伤；国君有了困难、危难，人民会愿意为他拼命效力。反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如果国君，把人民看作如泥土、草芥一样的低贱、不值钱，甚至随意践踏、欺凌，人民反过来就不会被国君所使用。国君有忧困，人民不会为他分忧。国君有难，人民不会为他去赴汤蹈火。

“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如果国君不能够使人民安乐，人民也不会为国君感到悲哀。当国君有困难时，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分忧。如果国君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也不会拼命的为国君效力。可见，一位国君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必须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把人民和自己视为一体。如果国君能够把人民视为与自己是一体的，那国君自己有了困难、有了问题，人民怎么会不为国君去效力？怎么会不为国君去分忧？

齐桓公在位时的一天，管仲和隰朋前来求见。他们站了一会儿，看到两只鸿鹄从天边飞过。齐桓公很感慨地说：“你看那只鸿鹄，时而南飞，时而北飞，不管四方有多远，它想飞到哪儿就能飞到哪儿。现在有仲父来辅佐我，就像鸿鹄有了羽翼，就像渡大河有了舟楫。仲父不教导寡人一句话，给我一句适时的教诲吗？”管仲回答说：“我想君主您一定是想称霸天下，干一番大的事业吧？既然如此，就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桓公问：“何为根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齐国的老百姓就是您的根本。贤德之人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就是因为掌握了治国的

规律，认识到了治国的根本，能够视民如伤、爱民如子，战战兢兢、小心谨慎。

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句话中也可看到，中国古人之所以没有提出人权的观念，是因为古人有这样的民本思想，领导者、统治者都能够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即从政治上利民，从经济上富民，从文化上教民，并且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既要领导管理人民，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去关爱人民，除此之外还要身体力行，教导百姓做人、做事的正确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君主、领导者就会产生感恩之心。

凡是有必要提出人权概念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百姓的权利被践踏，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因此才有提出人权的必要。人权的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就是因为把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而不是一体的。所以才需要提出人权来保护自己。中国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君民一体的关系之上的，所以领导者、统治者发自内心地去关爱百姓，倾听百姓的呼声，还要解决百姓的生活困难，想方设法解决民众的疾苦。而且最重要的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教化百姓。自己首先身体力行，为人民百姓做出良好的示范，百姓就会效仿学习，这样百姓才会受教并且心服口服。

有人误以为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愚弄老百姓的精神鸦片，实际上是没有深入理解四书等儒家经典所致。《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孝经》中讲孝道时，首先讲的就是天子、诸侯的孝道，后面才是卿大夫、士人及老百姓的孝道。所以领导者、统治者首先需要修身。四书五经里很少提到对老百姓的道德要求，基本都是对领导者、统治者的要求。告诉领导者、统治者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有威信的领导，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教育者和领导者先受教育，才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才没有把道德教育变成说教。所以儒家文化不是愚弄老百

姓的精神鸦片。而今人的这种态度伤害的是古圣先贤吗？今人批判孔子，批判周公，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真正受害的是当代的中国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谦虚、恭敬的心来学习圣贤经典，领会圣贤人的精神，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 第六十七讲

为政在于得人



## 其人存，则其政举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布”，陈列。“方策”，“方”是古代书写用的木板；“策”，把书写记录的木板和竹片装订在一起就叫策。“方策”就是现在所说的典籍。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施政方法和道理，都记载在典籍之中。

“其人存，则其政举”，如果有像周武王、周文王那样的圣王存在，仁政就可以推行。“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圣王消失了，仁政也会跟着止息。“故为政在于得人”，所以施政的关键在于得到圣贤人才。“取人以身”，要得到人才必须以修养己身来感召。“修身以道”，修养己身必在于遵循伦理道德。“修道以仁”，而遵循伦理道德的着手之处，就在于以仁爱存心。

治国理政的根本到底是在制度建设，还是在人心？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末，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制度很严苛，但是人心邪恶，这个国家能否得到治理？《汉书》中记载，如果重视法令的严苛，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结果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如果仅仅在法治监督机制上做文章，结果法律条款

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并没有改变邪恶的、以权谋私的心，法律监督机制虽然很严苛，但人们仍会想方设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法律监督机制再严密，也不能把生活中所有问题都考虑周全。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以汤止沸、以薪救火，使事态愈来愈严重。

历史上的秦朝，用法家的制度，严刑酷法治国，确实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人们不敢欺骗政府、不敢欺骗君主，因为当时的法令太严苛。但就是因为这种暴虐的统治，使得秦朝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

《汉书》中讲，“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仅仅任用能够使用严刑峻法的官吏治国，还盼望着使道德教化普盖四海，这是很难达到的，因为它违背了天道。天道是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上天有仁爱之心，好生而恶杀。所以办政治要顺着天道行事，应首先兴起教化之风，让人们知道善恶、邪正、是非，把人的廉耻之心提起来。但是如今（当时的汉朝）却废弃了德教，而仅仅重用能够使用法律惩治犯罪的人，认为他们很能干，而一般奉公守法的官吏却被认为是没有政绩的。这样，还想让德风在天下普遍形成，是不可能的。

《论语》中，孔子强调：“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没有事先给人们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做人的本分，不懂得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廉洁奉公等，而一旦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给他施以刑罚，这就被古人称为虐政。

单单用执法之吏治民，不仅治理不好国家，还会产生怨气、对立。所以要想促进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就要兴起道德教育，改变人的邪恶之心，把人的廉耻之心唤起来，这才是根本的方法。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如果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人们只要触犯了这些政令条款，就给他们施以刑罚，结果人们可能会因为惧怕处罚免于去做坏事，但是没有培养起羞耻心。“免”不只是免于去做坏事，而是做坏事，想方设法地免于法律的制裁，甚至以此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聪明

智慧的表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因为人们没有羞耻心所导致的。应该怎么办？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们，用礼义来教化人们，人们都学了礼义道德，他们会用礼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们的人格就得到了净化，不愿意再去做坏事了。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人不愿欺、不想欺。

所以仅仅健全了制度、法制、监督机制，而人心邪恶，也不能把国家社会治理好。反之，假设人心是好的、正的，但是制度还不够完善，这个时候国家能不能治理好？假如重视了道德教育，人心都向善，但是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呢？《汉书》中记载：“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古代的圣王都把伦理道德教育视为国家最重要的事。他们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乡间的学校），这些学校设立就像现在的“道德讲堂”一样，都是宣扬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教化明确了，道德风俗形成了，就会出现天下的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的景况。西周的成康盛世时期，就出现过监狱40年都没有一个犯人的情形。

《史记》中阐述：“汉兴，破觚而为圆。”“觚”是棱角，也就是说去除了严刑苛法而力求婉转。在汉朝兴起之后，就把秦朝的严刑酷法废除了。“斫雕而为朴”，把繁文缛节，即过分细密的法律条文等废除了，力求质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疏忽，法制不是很健全，甚至可以把吞舟之鱼（很大的鱼）漏下去。法网是一个比喻，指法律机制不健全，甚至很粗疏。但是因为兴起了道德的教化，结果是“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吏治烝烝”，即官员的道德修养都是蒸蒸日上的，没有作奸犯科、贪污受贿的事情发生，黎民百姓都治理得很好，过着和美而安乐的生活。

可见，社会治理包括反腐倡廉的根本，在于人心的教化，在于伦理、

道德、因果的教育，而不在于法律的严苛。所以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末，一定不能够混淆、颠倒。

##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

1999年，我在英国读书去超市看到超市里有很多的摄像头，下面写着：“CCTV在运行”。当时从中国过去的人，看到“CCTV”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央电视台。所以看到“CCTV在运行”，我以为中央电视台的影响很大，居然在英国的超市都能收看到。结果时间久了才发现，原来CCTV也是“中央监控系统”的简称。所以“CCTV在运行”是在提醒顾客，超市里有中央监控系统在运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

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些监控系统。我们到了超市，自己的言行都在监控中，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但是在四年半之后，我回到中国，发现各大超市、大街小巷，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单位，也都设置了中央监控系统。现在警方破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先进的科技，确实为我们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社会因为这些中央监控系统的使用、摄像头的增多而变得更加安定和谐了吗？盗贼会因为这些摄像头的设置就不去作奸犯科了吗？他们会用更加高科技的手段来应对监控系统，以科技来对治科技，并没有让他们从心底不想去犯罪。从这个对比之中，我们就清楚了到底哪一个是本、哪一个末。

当然强调人心的教化是根本，并不是反对要制定严密的制度，也并非认为法治和监督机制等不重要。只是要说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根本是人心的治理，兴起道德教化。换一句话说，如果缺少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人就活得没有人的样子了，这就是左丘明所说的“人弃常则妖兴”，人都不讲仁义礼智信、五伦八德，怪异的现象、妖魔鬼怪就会产生。所以现在要真正把国家治理好，使反腐败的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必须在加强法治监督机制的同时，兴起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这才是标本兼治。

这些阐述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所以这里讲“为政在于得人”，一定要使德才兼备的人处在领导的位置。这样，国家才能和谐富强。

《群书治要·孙卿子》中说：“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发挥作用，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圣贤君子，即使有了法律、监督机制，也不可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法律、监督制度等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但是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也就是说，法律制度是否制定得公平合理，以及能否合理公平地推行、体现仁慈博爱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和推行法律的人。认清这一点，才会把培养德才兼备的人并将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的位置，作为关注的重点。

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写了《追寻美德》一书。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仅仅对于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法律、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也是由人来推行的。他特别批判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而应该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伦理学的核心。他的这本著作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的观点也引起了西方社会的思考。仅仅重视正义规则设计的政治理念，已经在面临挑战。

在麦金泰尔的另一本书《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他就提问，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是谁之正义？正义成为缺少主体的正义。又因为西方有很多关于正义的理论观点，譬如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还有康德的义务论、罗尔斯的正义论，等等。他们从不同的前提

概念出发，得出了关于正义的不同观点，甚至这些观点还是相互矛盾、冲突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应该按何种理论去评价是非、善恶、美丑？接着，他又问何种更具合理性？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忽视了圣贤教育所导致的，结果大家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不能达成一致的观念。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用一句话就把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讲明白了：“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会顺着好的制度安排，才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的结果。可见，制度很重要。人们弘扬传统文化处处受限制，得不到保护、鼓励、尊重，这样显然没有办法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好的制度更重要。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把国家治理好，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够把好的制度实施、推行开来。换言之，必须有贤德的人，能够把正义的制度公平合理地推进，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 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

如果人人都能够有孔子、孟子等圣贤人的境界，修身的境界很高，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之下，都不会做恶事。

中国古圣先贤在设计制度的时候，也非常符合人情。他们知道希求成圣成贤的人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是少数，大多数人仍然喜欢财富、权势、受人尊重的感觉。所以他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就让有德行的人、对国家有功劳的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处于一定的领导位置。中国古人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古人的制度建设都是围绕着培养好人并把好人选拔到领导者的位置上来制定的。这样的制度设计就非常合理，而且也容易在社会上推行。

现在人误解古人不重视制度建设，是因为对传统文化没有深入了解。如果深入研究一下中国制度史，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建设实际非常

完善。中国古人虽然强调道德教育、人心的治理是根本，但是并没有否认制度建设的作用。

一方面，要反腐败，治理好国家，必须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但是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领导干部自我境界的提升，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修身。《大学》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次序一定不能够颠倒。“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首先是天子，然后才是百姓，所以教育者和领导者先受教育才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淮南子》中说：“无法不可以为治也。”如果国家没有法律、制度、规则，那么治理国家就无所凭依，人们不知道行为的是非、善恶、美丑。“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礼义廉耻，就没有办法推行法律、制度和规则。接着就讲到法律的局限性，“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之行”，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之人杀掉，但是不能使人具有孔子、墨子那样的德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可以把偷盗的人依法惩处，把他判刑、关进监狱，但是培养不出伯夷、叔齐那样高尚的气节及廉洁之风。“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效法的榜样，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因为他们是圣人的学生，心向圣贤。

由此可知，古人并不否认制度的作用，而是认为，并非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大治的结果，关键还在于用制度的人。

《中论》中讲道：“凡亡国之君，其朝未尝无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尝无先王之书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这句话回答了很多人都讨论的一个问题：既然传统文化这么好，为什么许多朝代都灭亡了？《中论》中说，那些末代使国家灭亡的君主，他的朝堂中不是没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商纣王有三个贤人，但是他们犯颜直谏，纣王不仅不听，反而陷害他们。“比干谏而死”，比干被他剖心而死，微子逃亡他方。他的府库之

中不是没有圣贤典籍，但是圣贤典籍被束之高阁，他根本不看、不去用，更没有身体力行。他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其贤不用，其法不行也”，虽然有贤德之人，但是不被君主所重用；有了好的治国理念、方法、策略，也没有被君主去推行。夏商周三代，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在夏商周初期的时候，都曾经出现天下大治的局面。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治国理念、方法，记载在典籍之中，但是他们的后代子孙，特别是亡国之君，没有按照这些制度、方法去治理天下，这是导致夏商周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为政在于得人”，关键是在位之人是否推行这些好的治国理念。

“取人以身”，领导者必须修正自身才能获得德才兼备的人。《傅子》中有这样一句话“举贤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听”，要想得到贤才，最根本是修正自身，按照圣贤人的教诲去做。“身不正，听不壹，则贤者不至”，“身不正”如果自己没有将身修端正；“听不壹”，“壹”字很重要，关于治国的理论方法、策略、制度一定要听经典中圣贤人的话。“经者，常也”，讲的是恒常不变的道理。《论语》中孔子的话，已经经过几千年的印证。如果有人认为它是错的，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理解，把不能理解的内容认为是糟粕；或者把圣人言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造成了曲解。

如果自己的修身不端正，所听的不是圣贤人的教诲，而是世俗的言论，就无法感召贤德之人。因为圣贤人知道即使他来到了你的国家向你进言献策，你也听不进去。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个是想自私自利、以权谋私的人，一个是想治国、平天下，为人民带来福祉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周厉王之所以任用荣夷公，就是因为两个人志趣相投，都有贪财牟利、残暴不仁的共同嗜好，最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所以求得贤才的根本，还是在于修正自己的身心，一心听从圣贤的教诲来治国。领导者如果具备美好的德行，自然会感召同类人，即贤德的人来教导他。如果领导者缺乏德行，即使身边有贤才也会离他而去。这是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用什么来修养己身？很多人说自己很善良，是个好人，其实都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得到的结果，不是按照圣贤人的标准。“修身以道”，“道”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圣人把“道”观察、总结出来，记载在经典之中。概括讲，修身的标准其实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把这些全都做到了，修身才有基础。

人之所以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善人、孝子、忠臣、好的领导者，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评价的。如果按照圣贤经典的教诲来看，很多人远远不是一个好人、善人。“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弟子规》中说，“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很多人说我只要心好就行了，他所认为的心好，往往以好心办了坏事，以自己的评价标准认为自己心好是不够的。必须按照《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的标准来修养己身，这是修身的基础。

“修道以仁”，修道从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入手。所以孔子的弟子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忠恕之道是行仁之方，即行仁的方法，告诉人怎样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

《孟子·离娄》中讲：“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假如有一人，以粗暴蛮横的态度来对待我，君子一定会反省自己：我对他一定还有不仁爱的、无礼的地方，否则他不会用这种态度对待我。自我反省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仁，也做到了礼，但是那个人粗暴蛮横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君子一定要再反省：我待他一定还没有尽心竭力。经过再次反省之后，自己也做到了尽心竭力，但是那个人对我的态度依然是粗暴蛮横。君子就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像他这样的人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计较的？”

所以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没有一朝之患。君子一生所忧患的是：舜是人，而我也同样是人。但是舜为天下人树立了榜样，影响可以流传到后

世，可是我却仍然不免是一个平庸的人，这才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之后应该怎么办？像舜那样去做就可以了。君子没有一直所担心的事，即君子不做不符合仁、不符合礼的事，即使只有一时的担心，君子也不认为值得担心。

可见，修养仁爱之心要从忠恕之道入手，即遇到事情要时时刻刻反省自己，反求诸己，而不是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怨天尤人。修行是修正自己，如果我们还有怨天尤人的心，那就说明自己的嗔心没有完全断除。“一啄一饮，莫非前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别人之所以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你，而没有这样对待别人，一定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想，自然就会心平气和。

再者，“人不学，不知道”，经典中说，“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殊无怪也”。因为他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是再上一代，也都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而我们有幸接触到圣贤教诲，能够用圣贤教诲修养己身，修正自己的行为，相比于他，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人，而他却是一个可怜悯者。这样一想也就不必责怪他了。

《礼记·中庸》说：“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孔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一生都过着坦荡荡的生活。《论语》的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只要把自己做好，端正自身而不要求别人，就没有怨了。君子的目标是追求道德学问，成就圣贤人格，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君子只担心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道德学问没有提升，不能明明德，而不担心别人对自己不好。其实来到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来成就自己的，“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就看自己怎样去对待身边的人事物。

随着修行境界的提升，所面临的考验也就更严峻。就像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硕士、博士，随着学业等级的提升，考试的题目也会愈来愈难。如果你完成学业，通过毕业考试，就可以升级，通不过则学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要把身边的人事物作为考验自己修行境界的考题，能顺利通过，境界就能提升。如果没有这些考官出现，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境界不够？要感恩这些考官。所以要变换角度，用积极心态来看待人事物。巴尔扎克说：“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但是对于弱者却是一个万丈深渊。”同样面临苦难、挫折，能干的人克服了困难和挫折，使之成为他成功的垫脚石；对于弱小的人而言，就是一个万丈深渊。他踏不过去，就会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所以就看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君子不担心别人不知道自己，不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没有提升，所以才能“德日进，过日少”。真正有德行、修养的人自然会认识他，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这些国君或者没有智慧或者心胸不够宽广，嫉贤妒能，担心他手下的弟子人才太多，会取而代之。孔子一生有德行、有学问，但怀才不遇，没有人能够重用他。他从来没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他乐在道中，他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喜悦，一种从内心发出的源源不断的喜悦，这种喜悦无关乎官位、财富和他人的认可。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有成就，达到世界的最高峰？就是因为他乐在其中，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所以能够取得学习上的成就。

##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于是为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

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

——《群书治要》卷十六《汉书四》

这句话强调古代人对太子即对继承人的教育。在这段话之前还有一句：“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古代君王的太子一出生，就要给他以礼仪的教化，教导他来习礼。而且习礼严格具体“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天也”，让有德行的成年男子背着他，还有专门的官员穿戴整齐。“端”，端服，正式的礼服，“冕”是礼帽。他要穿上端服，戴好礼帽，然后带着天子行祭天之礼。“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宫阙，国君处理朝政的地方。如果路过宫门，就要把太子放下来。“过庙则趋”，“庙”是祭祀祖先的宗庙，路过供奉祖先宗庙的时候，就要小步快跑，也是表示对祖先的恭敬，这都是教导孝道。“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所以太子从一个小孩的时候，教育就已经开始推行了。

下面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从前，周成王尚在襁褓（背负婴儿用的宽布带和包裹婴儿的被子）之中的时候，就已经请召公来做他的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艺；师，导之教训”。“保”就是保护太子的身体，要为他讲解养生之道，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保持身心和谐等；“傅”，以道德仁义来教导他，是太傅的职责；“师”，同样以圣贤教诲来启发他。“此三公职也”，这就是三公的职责。

“于是为置三少”，不仅如此，还要设立三少，就是“少保少傅少师”。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是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负责把太保、太傅、太师所教导的德行表演在生活之中，让太子随时看到、学习到。

“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所以在太子年幼懂事的时候，三公、三少就要给他讲明孝仁礼义的道理，引导他在生活中落实，并且把那些邪曲不正、奸邪之人驱逐出去，让他们远离太子，不让太子见到不好的行为。

“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因此选出天下品行端正的君子，以及孝顺友悌、见闻广博、有学问道德的人来帮助、保护他，让他们陪伴太子朝夕相处、同出同入。“卫翼”是辅佐的意思。实际少师、少傅、少保和太子一起成长，从小都是受圣贤教诲，志同道合，这也是培养了下一代朝臣。朝廷的重臣也是从这些太子的少师、少傅、少保之中选拔出来的。

“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所以太子一出生下来，所见的都是正事，所听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在他前后左右的全都是正人君子。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贯”通“惯”。这就像孔子所说的，从小养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样自然而然，变成习惯。他从小接触的是正确的教导，不正当的言行都没看到，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是正确的。

《汉书》中也引用了一段话，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古人对继承人的培养是何等重视。在之前讲道：“夏为天子，十有余世；殷为天子，二十余世；周为天子，三十余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夏朝天子传承有十几世，殷朝天子传承了二十多世，周朝天子传承了三十多世，但是到了秦朝，天子传承到第二世就灭亡了。人性本来都相差不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能长久，秦朝的君主无道而暴亡？这其中的缘故可想而知，就是教育继承人的方式不一样，重视程度不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些欧洲学者讨论，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绵延至今，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生生不息，究竟是什么原因？研究之

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国之中，最懂教育的就是中国人，而且这个教育是始从胎教，慎终追远，贯穿了一个人一生的过程。

很多人认为胎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却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之前就已经重视胎教了。孩子出生后的前三年，是对孩子教育最关键的时候，所以古人说“三岁看小，八岁看老”。

太子从小就要接受最好的教育，要把全国最有德行、最有能力的人选拔出来担任太保、太傅、太师，给太子进行最优秀的指导。一些人批评君主制度有弊端。实际上君主制度相对于民主制度而言，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特别重视对后继人才的教育，而民主制度没有做到这一点。

君主制度对后继人才教育的传统，至今仍然保留着。譬如，中国共产党设有党校。党校就是培养后继人才的地方，培养的是国家的中级、高级领导干部。中国古人重视通过学习经典来统一思想，为太子和大臣讲课的人都是各个方面的专家，请专攻《论语》的人讲解《论语》中的治国思想；请专攻《周易》的人讲解《周易》中为人的道理以及《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原因；请专攻《孝经》的人讲解自古以来孝治天下的原因以及唐玄宗身为一国之君，却亲自给《孝经》做批注的原因。经典中所记载的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是经过历史检验、大浪淘沙的结果。所以以经典来统一思想，会让大家心悦诚服。

对后继人才的教育非常重要，所以要始从胎教、始从家庭教育。古人说“闾閻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他是通过治理人心从而提升到治理国家的。而治理人心从胎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深谋远虑，这是从根本治国。从中可以体会，中国人治理国家考虑得非常深远。试想，孩子的母亲贤良贞静、温柔慈爱，而且忍让、谦卑、尊敬别人，孩子从小在这种环境下熏陶，长大之后怎可能有暴戾的倾向？怎么会出言不逊？怎么会为了与人家竞争，争得头破血流？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的院长曾请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世界冲突的根源在哪里？现在的世界冲突不断，矛盾冲突还不断升级，战争频发，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老教授很有智慧地说：世界冲突的根本在于家庭，在于家庭之间父子的冲突、兄弟的冲突、夫妇的冲突。的确，如果一个人从小在家里都没有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礼让的态度，走上社会怎么会和社会大众和睦相处？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利己与利他的冲突。譬如，在利益面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利还是利人？如果人人都想利己，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冲突。所以古圣先贤教导人们要礼让、敬让、谦让，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中国古人也因此能够化解冲突，跟各国和平相处。

郑和下西洋时，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将先进的造船术、造纸术、陶瓷、茶叶等作为礼物送给沿途的国家，从没有和当地的人发生任何冲突，反而将这些国家都变成友邦。他没有侵占别的国家一寸一尺的土地，更没有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所以直到现在，南洋的很多国家，还有保留三宝庙来纪念郑和。

这表明，传统文化不是从枝末而是从根本解决问题。

## 得民心者得天下

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  
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  
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

——《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继绝”是继绝世的略语，意思是要恢复已灭绝的宗祀，承续已断绝的后代。“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

国家没有贤能的大臣辅佐和优秀的人才协助，而能成就功业、平定危乱，且延续已灭绝的国家，是从来没有的事。这句话强调任用贤能、德才兼备的人才来辅助，是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

《群书治要·诗经》中说：“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任用贤德、有能力的人是周室兴盛的重要原因。《汉书》中说：“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这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典语》中说：“夫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由他也。”社会治乱，就是社会治理的好坏、国家的安危，不是其他什么原因所导致的。“俊乂在官，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祸乱作”，如果君主喜欢有能力、有德行、有才华的人，并且把他们选拔在领导的位置，国家政治自然会清明。如果君主喜欢谄媚巴结的人，且使奸邪之人干预朝政，祸乱就不可避免。

《说苑》中说：“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没有恒常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恒常得以治理的百姓，如果得到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安昌；失去贤德的人，国家就会危亡，自古至今无不是如此。可见，重用什么样的人，对国家的治乱安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所以国家不必求大，而在求得民心；辅佐的大臣不必求多，而在求得贤良俊才。得民心的人，人民自然会拥护他；有贤臣辅佐的人，志士仁人自然来归附他。可见，治理好国家有两项重要的事，这两项事都很根本，第一是得到贤良俊才，第二是要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个自古至今屡屡被证实的规律。

《群书治要·魏志（下）》中说：“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夏朝、商朝和周朝历经了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哪里？“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共享幸福。“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莫救也”，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人民，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没有人去

拯救他。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能够和天下共享安乐的君主，人们也一定会与他共同承担忧虑；能够与天下共享幸福的人，人们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地拯救他的危难。可见，君主和领导者对百姓的态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

贤才不在于多，而在于是否真正有德行、有能力。把德才兼备的人请出来辅佐自己，并且能按照他的教诲去做，就真正可以实现国泰民安。

《群书治要·新语》中说：“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不从圣道而师贤者也。”从最高的领导者到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不遵从圣道，以圣贤为师的。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都要学习圣贤教诲，更何况是治理国家、治理天下的人？“故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在上位的领导者是一位有仁德之心的人，就会感召有仁德之心的人来做官；有道义的人在朝里做官，所感召的也是讲道义的人来做官。因此，“墨子之门多勇士，仲尼之门多道德”。孔子一生没有声名、没有地位，但是他自己有德行，自己所说的全都做到了，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的3000弟子、72个贤人就跟到哪里，不离不弃。这就是“德不孤，必有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结果。

“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周文王是一代圣王，所以他的朝廷之中也多是贤良、有道德、有智慧之人。秦始皇是一个暴戾之君，他的朝廷里也多是缺乏贤德之人。“故善者必有所主（主作因）而至，恶者必有所因而来，夫善恶不空作，祸福不滥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所以善人之所以能够被感召而来，是因为有贤德的人在位；恶人之所以被感召而来，也是因为恶人当政。所以福祸、善恶都是有原因的，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如果领导者自己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也就能任用贤德之人，这样就能感召更多的贤德之士来归心于你。这是能使国家安定、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因。

## 第六十八讲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公问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夫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公问曰：“敢问人道谁为大？”鲁哀公向孔子请教：“请问人道之中什么最重要？”孔子对曰：“夫人道政为大。”孔子回答说：“人道之中政治最重要。”如果能够把政治办好，国泰民安，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人心自然归附。所以在人道之中，办政治是最重要的，孔子也鼓励自己的弟子从政。要从政，首先自己要学为君子、学为圣贤，这样所办的政治才是圣贤政治。

“夫政者，正也”，“政”是端正。“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主的行为端正了，百姓自然会跟着端正自己的行为。所以政治就是要使人正。怎样使人正？领导者、国君要率先垂范，带领大家做正当的事。《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领导者的率先垂范作用。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如在位者、领导者能够端正自身，那么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如果领导者、在位者不能端正

自身，又如何去端正别人，使别人处事正当？

如果君主能够正身于上，官吏就不敢不正于下；官吏正身于下，庶民就不敢不正于郊野。国家没有不正的君主，朝廷没有不正的官吏，郊野没有不正的庶民，而国政却治理不好，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句话强调，在位者唯有端正自身，才能把政治办好。

在《论语》中，孔子讲得更加具体，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如果上位者重视礼，民众就不敢不恭敬。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很尊敬老师，在接见老师的时候，不是以君臣之礼。皇帝接见文武百官的时候，都是面南背北，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但是在见老师的时候，必须降级，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以主宾之礼来接见。这就是在提醒皇帝，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皇帝也有老师，也是老师教导出来的。老师教导有恩，就永远是你的老师，应该给予尊重。结果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自然兴起了尊师重道的风气。

《孝经》中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在位的人不能随便讲话，《论语》中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身为一国之君，身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每讲一句话，都要考虑到它的影响。讲的话要能为世人所称道；所作所为要能够给民众带来欢乐，让人们欢喜接受，让人听到之后能够依教奉行；他的德行、道义可以使人尊重；他做事情都能为人们所效法；他的容貌举止都有可观之处，都很文雅，为人们所仰望；他的一言一行、处事待人、进退，都符合法度。他这样统领民众，民众对他就恭敬又爱戴，纷纷向他学习、仿效，这样才能推行德教。这就是“上好礼”，在下的百姓都会生起恭敬心，也都会彬彬有礼地待客。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在上位的人好义，“义者，宜也”，他所做的事合情、合理、合法，那么民众就没有敢不服从的。所以在上位的人要按着规矩做，公平正义。这样才能让人心悦诚服。

《大学》中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像尧舜禹汤这样的圣王，他们行的是仁义，于是全国上下也兴起了仁义之风。而到了末代夏桀王、商纣王等，他们实行暴虐的统治，结果天下百姓也从而行暴。可见，一个国家、一个团队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乱象丛生，根源都在领导者身上。

在《德育课本》中记载：唐朝有一位官员叫张镇周，本来在寿春当官，后来他被调回自己的家乡舒州当都督。被调到自己的故乡任职，可想而知那里有很多的亲戚、故旧，如果他要徇私枉法，老百姓就会生起怨气，因为他有失公平；如果他一律铁面无私的话，那又伤人情。怎么办？他在还没有上任的时候，就先回到自己的故居，大摆宴席，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吃大喝了十天。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到了第十天，亲朋好友要离开的时候，他给每人送了一个大礼包，里边都是金银、绸缎等大家非常欢喜的东西。就在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流着眼泪说：“我回自己的故乡当官，而官员与人民要保持好距离，所以过了今天以后，我就不能跟你们常常这样吃喝、畅谈了，以后凡事都要秉公处理。”讲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试想，这些亲戚朋友在这吃了十天，又接受了他的厚礼，还听他说了这么一番真诚的话，看到他发自内心的难受，当然能够体会到他的难处。所以他在舒州当官之后，没有亲戚朋友通过私人关系来向他求情。他处理事情不徇私枉法，不徇私情，老百姓都心悦诚服，民心很快安定下来。中国古人处理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这就是符合义。所以“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位的人讲求信用，说话算话，信守承诺，民众就不敢不用情。“情”是情实，“用情”是以诚实相待。上面的喜好诚信，就没有人敢不用真情，没有人敢不尽忠。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真正做到了这些，即在上位者好礼、好义、好信，四方之民都会用布将小孩背负在背上，投奔你而来。

历史上，舜在历山耕田的时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到历山一年之后，这个地方成了一个小村落；两年之后，来投奔的人更多了，就变成了一个小城镇；过了三年，舜所在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城市。

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要想把中华文化推广到全世界，为世界和平带来希望，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用中华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祥和的状态，那么大家自然愿意来学习。

在历史上，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使天下的诸侯都向他臣服，原因就是他们能够以德义治国。做君王的，能够率先垂范，做到有道义，讲礼、讲信、讲义。外人来到这里访问，看到国家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人与人之间相处彬彬有礼，而后才愿意学习。

要想使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首先就需要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同时，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重塑礼义之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之后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sup>①</sup>一个充满希望、生机还有祥和之气的民族，自然会吸引众多的目光，吸引世界各国的人们前来学习中华文化，并且把爱好和谐、追求和平的中华文化带回到自己的国家。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才真正能够影响到世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才真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华人都非常激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龙的世纪。21世纪确实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是它不是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的世纪，而是中国文化得以普遍弘扬的世纪。这

---

① 习近平：《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

一点得到了西方思想家、哲学家的普遍认可。

如果在位者不好礼乐，大家即使来到这个国家，但是政治混乱，他们也活不下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现在很多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有人本想到这些国家投资做生意，但一看政局不稳，经常有战乱，也就不敢去了。所以要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重要的是要自己深入理解中华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生起信心，并且用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

鲁哀公接着问：“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哀公接着问：“请问如何处理政事？”即怎样具体落实？孔子回答说：夫妇有别，丈夫、妻子的职责要有所区别，父子之间要互相亲爱，君臣上下互相信任，这三个人伦关系端正了，万事万物的关系也就跟着理顺了。特别是作为国君，能够把这三种关系处理好，更能为国家的百姓做一个表率。

周朝之所以能够享国800年，成为历时最长的一个朝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家庭教育，有良好的母教。现在人把夫人尊称为太太，“太太”就是来自周朝的三位女圣人。文王的祖母太姜，母亲太任，夫人太姒，这三位都是圣贤的母亲，教导出圣贤的儿孙。所以现在把夫人尊称为太太，那是期许她要成为圣贤的母亲，为家族培养出圣贤儿孙。古时太子一出生，就会对他加强教育，所以教育是始从胎教，贯穿了他的一生，慎终追远。中国人最懂得教育，是历史上教育最成功的一个国家。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大部分时间之所以都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靠的就是教育。

“父子亲”，父子之间的亲情也不是圣人规定下来的，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怎样把这种自然的亲情保持一生，顺着亲的方向发展而不改变？“孝”上面是个“老”，下面是个“子”，告诉人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不能有代沟。如果有代沟，孝就不存在

了。这是“父子亲”。

“君臣信”，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要建立起信任关系。如果没有信任，在位者发号施令，在下位的人都不去执行，政令就不能够很好地实施。

所以这三者都能够做到，政治才能搞得更好。

## 天地虽大，唯有至诚感人

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智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天地可以说是最博大的，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可以说是最睿智的了，但不真诚就不能教化万民；父子之间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了，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王可以说是最尊贵的了，但不真诚就不会被人尊重。真诚乃君子遵循的品德操守，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这段话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必须守住一个“诚”字。“诚”是真诚，真则不假，诚则不妄，就是心里所想的和口里所说的要一致，不能口是心非。如果我们说一套做一套，说的都是假大空的话，就很难感动人。现在有些领导讲话，为什么不能引起共鸣，大家听了都想打瞌睡？因为他讲的是官话、套话，打动不了人心。司马光先生的修身就是从不妄语开始，也就是不能欺骗人，要诚心诚意地来对待一切人。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诚心。

天地的“诚”体现在“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没有偏私之心，不能因为小草没有大树高，就不去滋润它，不去盖覆着、承载、照耀它。天地平等无私，人也要效仿天地的无私无求，对万物付出而

不求回报，没有偏私。就像《老子》中所说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总是给予、帮助、利益他人、利益万物，但是不从万物那里索取或者希求回报，这才是真诚心。

“真”就是恒常不变。《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如果想休息一下，太阳可不可以一天不出来了？太阳不出来，万物就不能生长。所以“真”是恒常不变的，“假”就是变化的。看自己待人是不是真心，要看自己的心是不是时刻在变化。变化无常的心是假的，不是真诚的。真诚心没有变化，没有亲疏、远近和偏向，它是平等的。

真正的慈悲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的同情心，想拔人于苦、授人以乐的心，而且还要有切实的行动给予帮助，这才是慈悲的反应。从这些方面考虑，我们再看自己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是否在用真诚心，特别是领导者对属下有没有这种真诚心，如果没有这种真诚心，就不能感动人，让他为你竭忠尽智，你也就不可能达到“不忍欺”的境界。因为领导者感动了属下，所以他不忍心欺骗领导者。不忍欺就是靠真诚心达到的，这是最高明的管理。

中国人的管理不是管人、管财、管物，不是向外求，去管别人。最高明的管理就是把自己管明白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记载，当国家有天灾人祸、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皇帝都要下“罪己诏”，然后恭恭敬敬斋戒沐浴，之后再念祈祷文，就是忏悔书。上行而下效，皇帝、最高的领导者都能够反求诸己，那么群臣、百姓也会反省、忏悔自己的过失，灾难就很容易化解了。

##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

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卫君”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孔子时期，鲁国的南边是卫国，即现在的山东、河南一带。鲁国和卫国挨得很近，两国来往很便利，孔子的很多弟子都在卫国做官。卫灵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蒯聩，一位叫郢。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生活淫乱。据《左传》记载，蒯聩在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因为羞耻他的母亲南子淫乱，涉嫌想杀害南子，他就出逃奔往宋国。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的春天，卫灵公病重，想立公子郢为太子，但是郢拒绝接受。因为家有长子，蒯聩虽外出宋国，但尚在人世，所以郢不愿被立太子。这一年夏天，卫灵公过世，南子再次命公子郢继位，郢又坚决推辞。因为当时还有蒯聩的儿子辄在。于是辄被立为卫国的国君。同年六月，蒯聩在晋国赵鞅的帮助下返回到卫国的戚邑，此后蒯聩一直居住在戚地。到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冬天，蒯聩与浑良夫等人潜入卫家，挟持孔悝，强迫与他结盟，蒯聩以此取得了君位，立为庄公。鲁哀公十六年春天，蒯聩的儿子辄出奔，所以也把他称为出公辄。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从楚国返回到卫国，当时卫国是出公辄四年（公元前489年）。孔子的弟子高柴、子路等在卫国做官。孔子返回卫国的第二年，卫君就想请孔子帮他去办理政治，所以就有了子路的提问。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路问：“卫君等着夫子去辅助他治国，您若到卫国为政，现在的卫国政治混乱，人民不服从君主，您去办理政治，要从哪里做起？首先要办什么事？”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必也”是说，孔子不一定去卫国，他是有条件的。“正名”，“正

百事之名”，万物都有名，正名是要使名实相符。孔子说：“先要把卫国的名分定住。”孔子的意思是要从在上的领袖开始正名，即首先确定究竟谁应该为国君。“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不正，即名与事实不相符合，言语错误，不能顺理成章。名要是不正，就办不了政治。办政治要下命令，如果说出来的言语都不能按照规矩、道理来说，说出来的话也不符合礼，事就办不成。事是指普通的事。所以言不顺，办事就不能成功，办普通的事都办不成，更何况推行礼乐教化这么重要的大事。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治国必须以礼乐来教化，所以中国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清朝，都是以礼乐治天下。《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明礼乐是国家的大事，关乎全民的安危、国家的安稳。礼规范人的行为，乐调和人的内心；礼让人讲秩序，乐让人讲和谐。如果礼乐教育办得好，不需要司法、刑罚、监狱、警察，人们都可以做到路不拾遗。

孔子刚接管中都时，中都是一副破败的景象：游民多、乞丐多、盗贼多，而且社会风气败坏。孔子担任中都宰之后，推行礼乐教化，让大家都学习礼，凡是饮食起居都有礼的要求，他还制定了很多养生送死的礼节，让大家的言行举止都合乎礼。他还对原有的书吏、差役进行教育，以仁德教民，改善社会风气。他设立乡校，就是现在所说的道德讲堂。乡间的学校就是给人以礼义、道德的教化，让他们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能够入乡校读书。此外还提倡节俭，革除奢侈的恶习。所以礼就是从根本上提起一个人的感恩心、同情心、恭敬心、廉耻心。如果大家的言行举止都能够符合礼，那么社会自然就会井井有条。所以礼乐的教化不可思议。礼与法相比有什么优点？礼不仅仅规范一个人的行为，而且还引导人培养出一定的道德情感，潜移默化培养了人的恭敬心、感恩心、同情心，等等。

中国古人的礼乐教化强调的是治人心，而不是专注于惩罚人的行为。孔子治理中都不到一年，中都已得到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后人描写中都

的治理时，这样赞叹：“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四方则焉。”

孔子治理中都一年之后，“长幼异食”，古人讲究长幼有叙，尊敬长者，年长者和年幼者吃不同的食物，有时还不在于同一桌吃饭，而在不同的位置吃饭。

“强弱异任”，身体强壮，还有身体虚弱或有病的，老年人和年轻人，他们的任务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才显示出了平等。如果身体强壮的人和身体虚弱的、生病的人承担同样的任务，反而是不公，所以中国人很早就特别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帮助。

“男女别途”，中国人特别讲究防微杜渐，男女在走路的时候，不在相同的地方，这是不给他们过多的、特别轻易的接触机会。很多人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等思想是封建礼教，不以为然。其实礼教不是贬义的，礼的教化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孔子说“思无邪”，古代的戏剧、歌舞、小说等艺术作品，都秉持了孔子的这个理念，都是引导人们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能引起人们邪曲不正的念头、行为。而现在的视频、录像等，是唯恐人们思不无邪，这是不懂得防患于未然，失去礼教所致。古人把礼比作洪水的堤坝，如果把堤坝废除了，就会导致洪水泛滥，造成的危害很大。如果认为礼没有用，而把它废除，结果就更加可怕。正如孟子所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结果是人欲横流。

孔子治理中都之后，还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器不雕伪”。晚上睡觉不用关门也很安全，路上丢的东西没有人捡起来，为什么？因为人们都知道丢东西的人很着急，他还会回来找。器不雕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假冒伪劣产品，都是真材实料。一年之后，中都的治理就成为各地效法的榜样，大家都来学习。

后来鲁定公把孔子调回国都升任司寇，孔子离开中都的时候，老百姓倾城相送，东门外十里人巷，人们排着队恋恋不舍、含着泪和孔子道别。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意为刑罚用得不当。不当，一是指不公正，因为执法的人没有公正的美德，没有受过礼义的教化，他用刑时，喜欢给谁判重就判重，喜欢给谁判轻就判轻，全凭个人的喜好，没有公正之心。另一层含义，就是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盐铁论》中讲：“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这一句话把法律的局限性指出来了。法律能够给犯罪的人判处刑罚，但是培养不出人的廉洁之心，可以把犯罪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人的仁爱之心。所以没有礼乐教化，仅靠刑罚治理民众，就会出现“民免而无耻”的现象，即刑罚很严苛，百姓因为惧怕刑罚不敢去做坏事，但是依然有人会想方设法地做坏事却逃避法律的制裁，没有羞耻心。现在社会出现的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堕胎等，都是“免而无耻”的现象。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刑罚用得不当，人民感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就会天下大乱。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君子使用一个名词，必须用得恰如事实，能顺理地说出来；能够顺理说出来，必能行得通，所以君子说话不能随便。“苟”，是随便说。现在社会流行演说，很多年轻人都去学习演讲术，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演说者的口才很好，知识面很丰富，讲得似乎头头是道，但仔细一听，很多话都是违背大道、违背伦常道德的，这样会误导人心。

## 家道端则天下安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彖传》中说：家人卦，象征着女子守着正道，女子的正位就是居于家内；男子守着正道，男子的正位是处理外务。男女各自安守正道，这是天地间的义理。家庭中有严明的君长，这就是父母亲。父亲善尽父道，儿子善尽孝道，兄长善尽为兄之道，弟弟善尽为弟之道，丈夫善尽夫道，妻子善尽妇道，这样一来家道就能端正。所有家庭都能端正家道，天下就安定了。

家庭中有严明的君长，“严君”这里讲的是父母，父母也有作为君亲师的责任。如果仅仅把孩子养大，那是连动物都会做的事，但是怎样把他培养成才，甚至成为国家的栋梁，这就是父母的责任了。所以父母要教导孩子伦理道德，让他志在圣贤。在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因为有好母亲才有了好的儿孙。

譬如齐国的宰相田稷，做了三年宰相之后，拿了下属送的百镒（相当于2400两）黄金，这是相当大的数额，回到自己的家乡，准备用来侍奉他的母亲。母亲就问：“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金子？”田稷回答：“这是我三年累积下来的俸禄。”母亲说：“你当了宰相三年，难道这三年之中你不吃东西，生活都不用花钱吗？怎么可能存这么多钱？你这样当官，不是我所希望的。一个孝子只要尽心尽力、真诚侍奉父母就够了，不义之物是不能够拿进家里的，这会让父母担忧、蒙羞。况且国家信任你、爱护你，才让你当宰相，你应该对得起国家的栽培之恩。”母亲让他赶紧离开家，将这件事情弥补过来。田稷听了母亲的话非常惭愧，他回到朝廷，就把这些钱归还公家，而且主动请君主治罪。齐王非常佩服他母亲的贤德，于是赦免了田稷的罪，而且让他再做宰相。齐王也很有度量，很有智慧，能够体会到有这样的母亲，孩子的德行一定是有根基的，做错事也是一时糊涂。所以齐王再施恩于他，让他痛改前非，并且还把这百镒黄金赐给田稷的母亲。所以父母教导孩子时，一举一动都要谨慎小心。田稷的母亲了不起，她能这样做是因为她本身没有贪婪、名利之心。

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为官者，假如父母、妻子能够一开始就教导他为官清廉，不要触犯国法，他当官后很可能就会廉洁公正。一些贪官的背后大概会有一个贪婪的女人，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就让自己陷入了深渊。中国人讲“贤内助”，贤内助很重要，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做父母的不仅要把孩子养大，更重要的是让他有德行，能够让他知道做人的本分，起到君亲师的作用，这才能被称为严君。做父亲的承担好父亲慈爱教导儿女的责任；做儿子的要尽孝道，要承担起赡养、孝顺父母的责任；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帮助弟弟妹妹；弟弟妹妹要恭敬兄长；做丈夫的要担当家庭的经济责任，有道义、有恩义、有情义；做妻子的要有德行，能够把孩子教导好，相夫教子，这样整个家庭的家道就端正了。每一个家的家道都端正了，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 守本离末，民富德兴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阨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

——《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

“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要使百姓富裕，就要以农事生产为本，以流动的职业即商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

为末”，各种工艺，以实用为本，以雕琢装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买卖经商，以流通货物为本，以出售珍奇货物来谋利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陋而忘善，富则乐而可教”，这三者都能够守住根本，远离枝末，百姓就会富裕；如果远离根本而守住枝末，百姓就会贫穷。

这一段讲为政中的“务本”。首先看富民。古人所理解的富民与现代有所不同，并不认为刺激消费、发展经济、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增长才能使人民富裕。其实单单追求GDP的增长，往往还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的富裕，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古人说的富民，就是要让人们衣食无忧，首先解决温饱问题，所以“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为什么要生产各种各样的工艺？为什么要有各种各样的工匠？工匠制造器皿的目的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以实用为根本，而不是想方设法地雕琢、装饰。“商贾”，是商人，商业的作用是互通有无，把这个地方生产的，那个地方所缺乏的，能够互相沟通交流，所以是“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不是为了谋取利益，把那些少有的、稀奇古怪的东西拿来卖，引起人们的好奇心，然后将价格抬高，让人们去买，从中获利，这是枝末。

如果背离了根本去追求枝末，会导致哪些问题？第一就是分配不公。在《汉书》中讲，农夫和商贾的生活对比很鲜明，如果不重视农业这个根本，而是一味重视商业，农夫就会过着这样的生活：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伐薪柴非常辛苦，还要支应徭役，即支付税收，服劳役等。春天不能够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冷，四季之间没有一日是可以休息的。私下里还要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养育孤儿、抚育子孙等，其中包含了很多的辛苦。此外，还会有自然灾害、暴虐的政治、赋敛的不适时、朝令夕改这些事情加之于

身。他们拥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太多，半价就出卖了，他们没有的东西却要用两倍的代价来获取。结果就出现了农夫卖田地、住宅、儿孙来偿还债务的现象。商贾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大的商人积储了很多东西，在价格高的时候，他们可以加倍获得利润。小的商人坐在摊子上贩卖，因为他们手里有着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也就是原文中所说的“鬻奇”），每天在市场游荡，趁着上面征敛很急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所以得到的利润也是加倍的。这些商人，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但是穿的却是非常豪华的丝绸，吃的也是珍馐美味，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但是大地所生产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又因为他们家产丰厚，结交了王公大人，他们的势力可以超过官吏的势力，进行权钱交易。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游逛，“冠盖相望，不绝于路”，他们的伞盖，一路能绵延很远。这样就导致商人兼并了农夫，农夫流离失所。农夫吃不饱、穿不暖就可能作奸犯科。所导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犯罪率上升。

《说苑》中记载，魏文侯曾经向李克（李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刑罚的根源是什么？”李克回答说：“产生于人们邪曲不正、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奸诈、邪曲不正的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而过分放纵安逸的人，都把心思耗费在纹饰之上。”用现在的话说，商人过分安逸，就把心思放在了如何买奢侈品装扮自己上。“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农夫饥寒交迫，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这时不作奸犯科、不做邪曲不正的事是很少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装饰得很精美，并以此互相攀比、互相骄矜，看谁更加奢华。如果这样，要让人们不骄奢淫逸，也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奇技淫巧，奇技淫巧的事情就会愈来愈多，奢侈品的生产也会愈来愈多，最后导致的就是“国贫民侈”，国家愈来愈贫困，而人民愈来愈奢侈浪费。“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如果国家贫穷，而人民又奢侈浪费，贫穷的人为了过上好的生

活，就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而富裕的人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淫逸，这就等于驱使人们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人们已经被驱上邪路，又用严刑峻法来诛杀他们，就等于为人民设置了陷阱。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根本，而只是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

古人分析问题，分析得很透彻，看到忽视农业、重视商业会导致奢靡之风，带给社会骄奢淫逸，而且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很严重。贫穷的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就走上作奸犯科的路；过分安逸放纵的人，就会走上邪曲不正的路，放浪形骸，互相攀比谁更奢华，放纵欲望，很难不犯罪。

奢靡之风盛行，是不重视农业这个本业所导致的第三个问题。《崔寔政论》中说：“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炫耀，芬芳嘉味者也。”意思是，人之常情，人的习气、习染都是喜欢荣华富贵，喜欢美丽的服饰叮当作响，而且炫人眼目，喜欢吃美味佳肴。白天想着这些事，晚上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就是想着怎么吃喝玩乐。

古人把人的欲望看得很透彻，把欲望比作深渊。人的欲望如果没有节制，任其发展，最后会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束缚自己的欲望。古人是通过礼法、制度、教育等，严格防患于未然，把人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做到欲而不贪。

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溥）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都会去追求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这并不需要到家里去宣传劝导，而是时势潮流驱使他们这样做，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当时古人就看到了奢靡之风的危害。

此外，还有很多更严重的危害。现在出现的环境问题，能源、资源短缺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过度膨胀的欲望，与地球的有限资源、有限的承载力之间产生的矛盾。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膨胀是无限的，地球有限的资源不能满足人类愈来愈膨胀的欲望，环境问题、

能源资源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要从根本解决环境问题，除了制定一些政策，在经济上进行调节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人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过节俭的生活，知足常乐。富在知足，不在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

不重视农业会导致的第四个问题，就是粮食不足。这个很显然，在古代，因为重视商业，世间奢侈的风气愈来愈严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愈来愈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愈来愈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很微薄，而从事工商业的人生活很安逸，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结果农夫就会放下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会放下织机去学习刺绣。现在的社会也是如此，很多农民都不去种田了，而到城市打工，因为打工挣的钱比种地挣的钱要多得多。如此一来，耕种的人会愈来愈少，从事商业的人愈来愈多。荒地虽然有开垦，但是由于人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所以没有尽心尽力耕种、收割，就不会有丰收的年景。财富都集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如商家，而农民穷困。国家的仓库愈来愈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登，受饥饿、流亡而过世的人就数不胜数。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到互相接济。

最后他还说：“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而人民是以粮食作为根本，没有粮食就会饿死。但是现在没有人去耕种，人民不能够保命，这个根本就削弱了。人民这个根本被削弱了，国家也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古人看问题看得很长远，讲重农抑商是有一定原因的。

现在很多农民都进城打工，不仅仅是粮食没有人生产，粮食不够吃，而且农民进城之后，也容易受到奢靡之风的影响。一旦男子去追求奢侈的生活了，放纵欲望了，家庭就容易破碎；女子贪慕虚荣，家庭也破碎了；儿女没有人教，犯罪率自然就会提升。此外，还有老人没有人赡养。这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提醒世人应重视农业这个根本。

“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教育训导人，是以道德仁义为根本，教导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伦常大道，而不是以巧言善辩为本。但是现在的社会风气却有所不同，看到一个人演讲，口若悬河，辩才无碍，大家都称叹、很羡慕，于是都在枝末上学习，而不去辨别他所讲的内容符不符合道义、符不符合规律。

“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言辞要以诚信顺理为根本，以奇异华丽为枝末。言语要看是不是真诚恳切，看到这个根本，才不会在枝末上做功夫，成为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话讲得很动听，用词用得很华丽，是枝末。

“列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列士”就是指读圣贤书的人。列士应该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而以交友应酬（即搞公共关系）为末。现在人们都讲人际关系法、公共关系法，其实如果连5个基本的人伦关系都处理不好，就谈不上搞人际关系。所以观察一个人，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交朋友，根据是什么？现在人往往凭感觉，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对我好，好像说的话我都爱听，就觉得这个人可交，这是不理智的。中国古人教人观人、交朋友，首先看他是否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看他有没有孝敬之心，而不是看他对我怎么样。一个很会跟人攀谈、应酬的人，可能不是个很实在的人。

《德育故事》中记载了一则汉朝读书人郭林宗的故事。有一天，郭林宗在田园里，正好下雨了，当地的农民都跑到大树下去避雨。在避雨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双手一摊、两脚一跨，显得很放松，在那里休息。只有一个人即使在避雨，其举止也非常端正，没有一丝一毫的放纵。郭林宗感觉这个人很特别，于是他就去问这个人：“我可不可以到你家里住一宿？”这个人名叫茅容，欣然答应带他去家里住。

第二天，郭林宗看到茅容在准备鸡肉，心里就想：“他准备鸡肉应该是招待我这个客人的。”茅容把菜做好后，把肉端去给他的母亲吃，而招

待郭林宗吃青菜，并且跟他一起吃。一个人把好的食物留给母亲吃，假如你是这位客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郭林宗看到这种情况，就起身给茅容行礼，说：“太惭愧了，我比不上你。那些好吃的东西，我都是拿给朋友先吃，不像你这样事事首先想到父母。你这个孝心是真的，而我心里还有一些攀缘的心，还有一种功利的心在与人相交。”

《孝经》中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茅容事事都首先想到父母，说明他有知恩报恩的意识，他是顺着自然亲情来做事的。他能够这样照顾父母，有感恩之心，是以道义与人交往的，这样的朋友才真正可靠，因为“以道相交，天荒地老”。

“孝悌以致养为本，以华观为末。”落实孝悌，重在尽心奉养，这是根本，而表面讲排场，这是枝末。譬如父母生日时，给他们摆一大桌宴席，请很多客人，看似很排场，实际是想向众人表明我很孝顺，但是平时都不陪伴父母，这就是舍本逐末了。现在还有一些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尽心尽力奉养，等父母去世后，丧事却办得很奢华，这也是做给别人看的。

“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为人臣者，以忠诚正直为本，以谄媚讨好为末。忠诚正直是非常重要的美德，也是臣子、下属的本分。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扮演好了属下的角色？我们有多少次敢于向领导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合理的建议？领导者不是圣贤，他所说的话不可能一次错误都没有，为什么自己没有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担心失去什么？我们从所担心失去的东西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欲望在哪里。

一个人的忠正之心提不起来，就是因为有欲望，还有东西没有放下。所以中国古人说“人到无求品自高”“无欲则刚”，就是告诉我们，做属下、臣子的不是以谄媚巴结、阿谀奉承为本，而是以忠正为本。

“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这五点都能够抓住根本，那么仁义之风就会兴起。“离本守末，则道德崩”，如果舍弃根本而守枝末，道德就崩溃了。这段话是说为政要守住根本，而不是追求枝末。

## 礼义存，天下行

夫仁义礼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使民迁善日用而不知也。

——《群书治要》卷五十《袁子正书》

讲述治国要以仁义礼制为根本，因为仁义礼制可以提起人的羞耻心、恭敬心、礼让之心，把人从心上教好，让人从心底里不愿意作恶，这样自然也不会有恶的行为。而法令刑罚是治理的枝末，它只是惩罚人的行为，并没有改变人的内心，甚至有些人想方设法逃避法律的制裁，还认为是自己的聪明智慧。当然，这不意味着法令刑罚就不重要。没有根本，就不能够长久建立。没有枝叶，也不能稳定建设。也就是说，缺少了仁义礼制，道就树立不起来，但是没有法令刑罚的枝末，也是不完美的，有个别屡教不改的人，需要有刑罚的威慑。

怎样实现礼教？“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使民迁善日用而不知也。”要兴起礼义道德的教化，领导者必须率先垂范，要实行仁义，带头做到恭敬谦让，才能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就迁善改过。这同样也是讲领导者率先垂范的重要作用。

现在很多企业推行《弟子规》，学习传统文化，有的学得很成功，有的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本原因在哪里？凡是学得成功的企业，全都是一把手，也就是董事长、总经理率先学习，他们自己先把《弟子规》里

面教导的德行做到了，然后才能上行下效。教育不是光让底下的人去做，领导者和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孔子的教育之所以非常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把自己所说的全都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之中，让人心悦诚服。孔子的3000位弟子，72位贤人始终追随着孔子，不离不弃。孔子没有钱财、没有地位，为什么这些弟子要跟着他？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所说的全都做到了，这是礼仪制度得以有效实行的关键所在。

## 第六十九讲

践行传统，恪守五伦



## 守正固本品自高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反本修迹”在通行本，即《四部丛刊》的《孔子家语》中写为“反本修迹”，“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说：“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立身处世有6个根本，也就是要遵循6项根本原则，然后才能成为君子。“君子”比贤人和圣人修行的层次低一些，还在修道的过程中，没有成圣成贤。但是君子也是很难得的，能够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抓住6个根本，才能够成为君子。

“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立身要合乎仁义道德，遵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为人处世最根本的道义原则。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德行——孝，中国人常说“百善孝为先”，为什么孝是百善之首？一个人在世间，对自己最大的恩德莫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对我们的付出无私无求，对如此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想着去回报的话，还有谁的恩德值得

我们念念不忘？

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那么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就没有树立。道义原则没有树立起来，就会以功利或是利害的原则来处世：这个人对我有好处，这件事对我有利益，我就会全力以赴去争取；当这个人从利变成害了，我可能就会做出忘恩负义或者是见利忘义的事情来。这样人们都是以利害相交往，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事情就屡见不鲜。所以一个人立身处世要以孝为根本。“忠臣孝子人人敬”，为什么对孝子这么尊敬？就是因为孝子知恩报恩。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孝治天下，这个教育制度从汉代开始到清代从来没有改变过，是有道理的。

民国时期，印光大师的弘化社印了一套《道德丛书》。他认为，如果社会不提倡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人就不称其为人了，正如左丘明所说的“人弃常则妖兴”。人们不讲五常，仁义礼智信；不讲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就会出现妖魔鬼怪即各种各样异常的现象。什么叫异常的现象？譬如子杀父，兄弟不和，还有夫妻离婚率愈来愈高，青少年犯罪现象愈来愈严重，等等。这些现象全都是“妖”，“妖怪”就是反常。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教育。

《道德丛书》中的《孝史》专门讲孝道的故事。《孝史》中有一个选自《唐书·刘子元传》“忍痛侍母”的故事。唐朝的刘敦儒，家住在东都。他的母亲得了一种病，疯疯癫癫的，在吃饭的时候要鞭打人，或拿竹板打人，否则她就吃不下饭。左右侍奉的人全都忍受不了，被她打跑了。刘敦儒就整日在母亲旁边侍奉母亲，让她吃饭的时候打自己，他经常被母亲打得身体流血，但只有这样，母亲才能吃得下去饭。一般人可能都忍受不了，但是刘敦儒“怡然不为痛”，他欣然接受，而且不感觉到疼痛难忍，更没有抱怨、怨恨之心。可见，刘敦儒是全心全意投入到侍奉母亲上。

古代孝子孝顺父母的心是全心全意的为父母着想，丝毫没有自己，更不会因为和父母有一些矛盾冲突而产生对立的情绪。现在很多人没有这

种和顺之心，与人有矛盾、逆反，其实都是从家庭和与父母相处中培养出来的。如果在家对父母有逆反，走到社会对领导也会有逆反；对父母不怀怨恨，什么事情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走到社会上，也能够忍受这些侮辱，或者是误解、诽谤。和顺之心确实都是从家庭之中和与父母相处中培养起来的。

刘敦儒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是“毁瘠几死”。他的母亲吃饭时必须打他，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才吃得下饭。但是等母亲过世的时候，他非常哀痛，而且吃不下饭。“毁瘠”指因居丧过哀而极度瘦弱。他极度瘦弱，几致丧命。他这样哀痛是因为再也没有机会侍奉回报父母了。后来他做了起居郎，当时人们把他称为刘孝子。

看了这些历史故事，才体会到什么叫作孝。现在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孝顺，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实际与古人比起来差得太远。现在人的心性修养和古人比起来其实相距甚远。古人遇到事情绝对是反求诸己，都是从我自己身上找问题，对任何人都没有对立、怨恨之心。这种态度就是从家庭之中对待父母的态度培养起来的。所以说，“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

“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丧事要有礼节，但是哀痛是丧事的根本。在《吕氏春秋》中有对丧礼来源的一段阐述：孝子尊重自己的父母，当然也包括父母疼爱子女，这种情义是甚于肌肤之痛。所以当父母或者是儿女过世的时候，即自己所敬重、所疼爱的人死后，如果被抛弃于沟壑，按人的感情而言，是不忍心这样的，所以才有了安葬死者的礼仪。“葬”就是藏的意思，藏起来，这是孝顺父母的儿女所应该慎重的。可见，丧礼出自孝子敬爱父母的一片真诚之心，并不是外在的礼仪强加给我们的，所以应以哀戚为重。

在《论语》中，孔子说：“丧，与其易也，宁戚。”“易”，和易，和顺而有条理，是说在丧礼之时，与其把事情办得很和顺、很有条理，面面俱到，不如哀戚，这才是抓到了根本。父母过世时，自己很哀伤、很怀

念，这时候处事有一些想不周到的地方，也是人之常情。现在都在讲临终关怀，通过一些关怀方式让父母和平、安静地过世，这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这是告诉我们，为父母办丧事不是为了面子，让人夸奖自己很孝敬父母，把丧事办得很排场、很奢华，图得一个孝子的名声。办丧事要抓住根本，也就是要感恩、怀念父母的恩情，用回报的心来安葬死者。

“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作战布阵有行列，但是勇是战阵的根本。岳飞作战百战百胜，经常以寡击众、以少胜多。他以少胜多达到什么程度？他以五百铁骑大破金兀术的十万敌军。五百铁骑，靠的是什么？有人问他治军的方法，他回答说：“要以仁、信、忠、勇、严五字来治理军队，这五个字缺一不可。”所以他军纪严明，做到了“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他也特别注重培养士兵的忠勇献身、保家卫国的精神。所以敌军一听到岳家军的名号都被吓得胆战心惊。“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有人问岳飞，天下什么时候能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作为武将要为国献身的忠勇报国精神，这个才是作战的根本，也是能够取胜的根本。

“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治理国家政事需要处理很多方面的问题，而政治的根本是农业。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发展农业，富民的目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如果人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衣服都穿不暖，国家也就不稳定了，所以古人特别重视粮食的储备。《礼记》中记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就称为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国家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被称为有危机的征兆。“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如果连三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了，这个国家就已经不能称其为国家了。一旦遇上了自然灾害或者是战乱，没有存粮就会有抢水、抢粮食的事件出现，天下自然大乱，这个国家就会非常不稳定，人心惶惶。而且一个国家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你为他讲礼义、讲道德，他也就听不进去了。管子说：“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农业是

治国理政的根本。

我们对富民要做正确的理解，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要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不是一味地去拉动内需来提升GDP的数值。一味以GDP为评价经济增长的指标，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而且还会导致奢靡之风，有很多的危害。如果不讲究伦理道德，同样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而且由于急功近利搞发展，不仅污染了土壤，甚至是地下水、空气也被污染了，这样粮食还能得到安全保障吗？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农药，粮食基本上就没有安全可言了，正像经典中所讲的“饮苦食毒”。

在这种情况下要重视农业，让农民回归土地，就要给他们好的政策，让愿意种田的人愈来愈多，否则粮食储备就会不足。此外，还要正确引导大家回归传统的农耕，回归传统的农业，这样种出来的东西才是健康的，才是真正有利于人民的。其实粮食方面的问题比较多，譬如现在粮食浪费的问题很严重，吃一顿饭食用量大概只有30%，70%的饭菜都浪费掉了。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反对浪费，反对奢靡之风，提倡勤俭节约。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安定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慎选继承人是安国的根本。“嗣”是继承人，中国人特别重视对继承人的培养。事业发展得再辉煌、再成功，但是后继乏人，事业没有人继承下去，那么花费的精力、时间，付出的财力，全都浪费了，前功尽弃，这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所以培养继承人比什么都重要。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后代的继承，事业就不能够代代相传。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这样一种长远的眼光，才使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余年还生生不息、历久弥新。所以我们要感恩祖先、圣贤这种长远的眼光。否则，我们的文化传承几十代、传承几百年就传承不下去了。

培养后继的人才，无论是对一个行业、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要想把传统文化代代承传下

去，就要有杰出的人才能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年轻人要把这一使命承传下去。而且还需要家长有非常长远的眼光，从胎教开始，就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的熏习。如果家长对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也就不可能从胎教就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和熏习。所以父母老师，特别是领导者对传统文化要有正确认识、高度自信，学习并发扬传统文化迫在眉睫。

“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创造财富要有一定的时机，但是付出劳力是致富的根本。大富靠天命，小富靠勤俭。虽然生财要把握好时机，但是如果一个人很懒惰，不愿意付出体力、劳力，那么也不可能真正致富。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我们知道，财富的根本在于财布施。财愈施愈多，拿钱去帮助穷苦人、帮助需要的人，钱从左手出去，又从右手赚回来了。这是外财布施。此外，还有内财布施，即用自己的体力、劳力、智力去帮助他人，这也必须勤俭。这句话主要强调的是不能投机取巧，一定要付出勤劳，这样自己一生的衣食都不愁。如果好吃懒做，指望着父母养活自己，成为啃老族，即使家里有万贯家资，也都会被他败散掉。所以古人说：“至要莫如教子。”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孩子培养好。

“置本不固，无务丰末。”这句话是对前几句话的总结。如果根本都得不到巩固，那么就不要再致力于在枝末上做文章。如果只是使枝末繁茂，枝末就是枝叶花果，就像插在花瓶里的花，没有根，虽然好看一时，但是不能长久。

“亲戚不悦，无务外交。”如果连亲戚之间都不能够团结和睦，就不要致力于跟外人交往。如果连最起码的五伦关系都没有处理好，说明这个人太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慈悲关爱、为人着想的心。连近处的人都不能感化，那怎么能感化远方的人？搞好人际关系，就是从身边的人际关系入手，把五伦关系先处理好。

看到五伦关系，要经常自我反省。如果是做儿女的，让父母感到满意了吗？如果是做父母的，是不是把儿女教导好了，是否起到了君亲师的

作用？如果是做兄长的，对于弟弟、妹妹是不是友爱关心？有没有做到尽心尽力地去帮助？如果是做弟弟、妹妹的，是不是对兄长有必要的恭敬之心？很多身为弟弟、妹妹的人，发了财，有了官位，对身为农民的哥哥、姐姐就不是那么尊重了，因为哥哥、姐姐没有自己地位高、钱多，所以尊重之心就淡化了。作为领导者，是否尽到了作为君亲师的责任？被领导的人，对于领导交给的任务是不是尽心尽力加以完成？朋友之间相交往，是不是做到了诚实守信？夫妻之间，做丈夫的是不是有恩义、道义、情义？做妻子的是不是有良好的德行，而且起到了相夫教子的作用，让全家生活在一个温馨、安稳的家庭中？

学习儒家文化的目的，是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处处力行，处处反省这五伦关系处得如何？如果五伦关系都没有处好，兄弟、父母、夫妻、朋友之间都不能团结、和睦，在外搞外交，也是以功利之心与人交往，不会长久。

“事不终始，无务多业。”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如果做事情有始无终，就不要去从事多种事业，因为做哪一样都做不好。古人说“隔行如隔山”，自己的本行都没有做好，又去换一个工作、行业，面对一个陌生的领域做得会更加不好。就像挖井一样，在一个地方挖井，挖了很久没有水，就换一个地方去挖，刚挖了几下还是没有水，又换一个地方挖，如此，换再多的地方也挖不出水来。如果在一个地方选中了，就在这个地方挖下去，坚持挖到一定深度，肯定能挖到水。这就是说做事情要有始有终，有恒心、有毅力。

## 教之道，贵以专

中国古人特别讲求专一，做学问、修道，也特别讲究专一。《三字经》中说：“教之道，贵以专。”专一就是不杂，而且还能够精进，精一

不杂、专一不杂，就是精进的意思。古人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够专心，一门深入，长时修习。

清朝的刘宝楠父子对《论语》做批注，作《论语正义》。这部书刘宝楠父子历经七十余年才完成；焦循作《孟子正义》，是给《孟子》做批注，也是父子两代人才完成。这两部批注传承久远，非常权威，是后代人研究《论语》《孟子》的必读注释。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成就？原因就是专心。

有些现代人做学问不能成就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不能专一，现代人广学多闻，希望知识广博，这是一种习气。这种好高骛远的做法，不仅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反而会让人偏离了方向。一般人不能专一，就是因为喜欢名利，因为你讲的东西很多，别人提到这一部经你也知道，提到那一部经你也懂得，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名利，想让别人夸赞你，所以才广学多闻。孔子很早就提醒人们：“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做学问、求学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提升自己的修养、境界。所以孔子说，他所担忧的是弟子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他并不担心自己的钱不够多，名声传得不够远，别人对自己不够恭敬。

古人求学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最后就能够明明德。所以他能够体会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而现在人做学问的目的和古人大相径庭，现在人做学问是为人之学。例如，写书为了自己出名，所以写了一部又一部，著作等身，别人一介绍，说你有很多著作，说起来很好听，但是自己并没有明明德。这是因为做学问追求在名利上，没有追求真实的学问、真实的修为，都是没有根的。

中国古人特别强调实修，儒释道三家都是心性之学、都是实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把学儒、学道、学佛，变成了儒学、道学、佛学，可以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自己做不到，和自己的生活、行为毫不相关，所以体会不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喜悦。这种喜悦体会不到，就

会把精力放在追求外在的名利之上了。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就高兴，别人鼓掌我们就开心；别人对我们不尊重、轻视，心里就不舒服，这还是没有内在的自信所致。所以一个真正按照儒释道的学问来修身养性的人，就真的能够体会到《论语》中“君子坦荡荡”的境界。

这也是古代的读书人特别受人尊重的原因，因为读书明理，理得心安。不像有些人，忙忙碌碌地妄求，用不该采取的手段，求得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这种利益即使得到了也必然会失去，昙花一现，不能持久。

通过潜移默化的学习和熏修，会使人心性有所提升。人心清净，自然就会有悟处。而圣贤人的经典是圣人心性的流露，怎么会看不懂？凡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无二无别，只不过前者是被财色名利、自私自利等染污、蒙蔽了。现在的问题是过分追求外在的东西，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在的名利上，把悟门堵住了。

现在人要求广学多闻，虽然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没有智慧德能，遇到问题仍然解决不了。中国古人讲，有知，就会有所不知。无论你的知识如何广博，你总有不知道的。那怎样才能无所不知？就是要求无知。无知起作用的时候才是无所不知。这就像镜子，镜子是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所以“胡来现胡，汉来现汉”，外国人来了，它现外国人的样子，中国人来了，它现中国人的样子。镜子为什么能现？因为它本身清净无染。但如果在镜子上画了一些图画，还给它涂上一些油漆，它就照不出外境了。我们的心照不出外境就是因为心被染污了。我们把这些外在的染污去除，恢复到镜子的本来面目，就能把外物照得清清楚楚，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

古人求学问、求真理的方式，恰恰是要求无知，达到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如果用水来比喻，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像波澜不兴的湖水，连一个小小的波纹都没有，非常平静。水非常平静后，泥沙都沉到水底。外在的

境界，譬如树木花草、山河大地等，都被它映照得如实，清清楚楚；如果湖水起了波纹，它对外界的映照就歪曲了；如果再起大风大浪，又泥沙俱下很浑浊，外界的事物就完全映照不清楚了。这水面正如人心一样，人的心起了大悲、大怒、大喜，就像湖面起了惊涛骇浪一样，使我们对人事物的评价都是歪曲、偏激、不如实的。当心起了一个小波纹，譬如说看谁不顺眼了，或起了一个嫉妒心，虽然不像大风大浪那样歪曲严重，但是也会有些许的歪曲。只有把心变得清净无染的时候，对外界的映照才是真正如实的。当然这里的不起心、不动念，不是我们所说的起了一个念头。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念头，是粗重的念头。而不动念的念头是指非常微细的念头，就是我们一秒钟起心动念是2240兆次的念头，这么微细。我们连意识都意识不到，怎么能断除？修行的目的是要回归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的状态，但是不起心动念确实太难了。不起心动念要先从放下执着入手，凡事都不执着，进而不分别，这样才能慢慢有悟处。

我们要悟，就要先求专一，专一才能够有悟处。怎么样求专一？譬如学《论语》，就要把《论语》一天读诵很多遍，读得愈多愈好，坚持10年，把所有的心力都用在读诵《论语》之上，慢慢地心地就清净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见”也就是见性了，为什么？因为你在一门学问上专注到一定程度，那你就因戒得定，你守住这个方法，就得到了定，因定就开智慧，智慧就自然开显了。

保持心地清净，读诵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在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兴起了儿童诵经工程。很多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知名的专家都不理解，觉得孩子还不理解经典的意思，就那样死记硬背，没有意义。其实他不知道，孩子在背诵经典的时候，会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所背的书上，心无旁骛，心很专一，很多的妄念就被打消了，心地就会愈来愈清净。所以死记硬背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只不过这个目的和一般人所认识的不一样。他能够把书背下来，那是一个副产品，因为小孩的记忆力很好，很多经典念诵

几遍自然就记住了。但是实际上背诵下经典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让他心地清净。心有专一的能力，他才能够有悟处，才能够明心见性。

这一点不难理解，例如，做学问也好，写文章、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必须把心定下来，文章才能写好，才能有水平。为什么古代人写的书可以百读不厌，是因为他们都能专注在做学问上。如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他读书，三年都没有看园子里的花长什么样，这样有定力，写出来的东西才能传承久远。

现在的电视、网络、手机里的一些内容，把人心全都搞乱了。譬如音乐的节奏特别快，使我们的心的不能够安定下来，使人心浮气躁。为什么要发明微信、微博？原因就在于现在的人心浮气躁，文章稍微长一点，他没有耐心读完。看微信订阅号文章也是浏览式的，不是逐字逐句认真读下来，全都是一扫而过。一个人真正想在修学上有成就，愈是不依赖外在的东西，自己内在的潜能才能被开发出来。愈是依赖这些东西，自己内在、本能的东西就会慢慢消失。

古人读诵经典、小孩背诵经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经典全是文言文所写。文言文是中国古人留给后人的一个工具，它可以把中华五千余年的智慧承传下去。中国古人看到，说话的“语”和写文章的“文”，如果不加区分，怎么说就怎么写，随着时间语言发生变化，后人看前人所写的东西，就像读天书一样，完全看不懂。我在国外留学四年半，再回到中国，当时兴起很多网络口头语我就听不明白了。譬如说PK（对决）、粉丝，这些都是外来语，直接音译过来用在口头表达之中，但是不在这个地方生活四五年，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在短暂的四五年之中，口头语言就有一些小变化，再过10年、20年，甚至再过上百年、上千年，口头语言差异之大可想而知。祖先的智慧、文化、经验怎么能够承传给后人，让后人做参考？

中国古圣先贤很智慧，发明了“文言文”这个标准化的书写方式。我们的日常用语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增加、变化，但是一旦要写文章传达思想、传达经验时，都采取统一的、标准化的文言文的格式。这有什么好处？只要后人采取并掌握了文言文的标准化的书写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与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孔子、古圣先贤对话；前人的著述，所积累的人生智慧，后人就可以承传下去，他就不会走很多弯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例如，现在所探讨的很多问题，包括高薪养廉、“三农”问题等，其实在《群书治要》里都讲得清清楚楚，而且把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方法都阐述出来了。所以是否有历史、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历久弥新，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其中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智慧，还有悲心、处处为后人着想的存心在里面，太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了，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一定要生起无比的信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古文明能够一直保存下来，至今还影响着它的后人，影响着这一个民族，至今还为很多的外国人所研究。唯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

总之，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事业，都需要专心，需要有恒心、有耐心。

“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要回到事物的根本，从近处做起，这是君子应该采取的原则和方法。假如本末倒置，不是徒劳无功吗？不仅徒劳无功，还会有很多严重的流弊。现在社会众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没有抓住根本所导致的。所以“务本”，特别重要。

## 公生明，廉生威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义轨，约官职，从权制，

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群书治要》卷二十七《三国志·蜀志》

本句讲诸葛亮做相国时是怎样务本的。诸葛亮做蜀国丞相的时候，“抚百姓”，安抚百姓。三国的时代战乱很多，要让民心安定，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不容易的。诸葛亮确实是为百姓着想。他“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利益后人。“示义轨”，明示礼义规范。古人都要制礼作乐，用礼乐来教化人民。要明确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让人的行为都有遵循之处，知道善、恶，美、丑，是、非，而且要通过教育使礼乐、规范深入人心。

“约官职，从权制”，“约”少、省减，就是要精简官职，采取权宜的法制。官职一多，老百姓的负担就会过重。人浮于事，老百姓又负担过重，就会对官府不满，矛盾就会加深。精简官职，使人当于事，从事耕种的人就愈来愈多，这也是一种务本的做法。一些法制政令已经不符合时势的要求了，就要采取一些权宜的法制，适时调整政策。

“开诚心，布公道”，以真诚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开诚布公。如果处事不公道，就会让人心有不平；不平累积多了，就会有怨；怨再提升，就变成了恨；恨再提升，就会产生矛盾、冲突甚至斗争，社会问题激增便会不稳定，所以为官者、领导者处事公正特别重要。

“尽忠益时者，虽讎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对于竭忠尽智、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触犯法令、玩忽职守的，即使是亲信也必定惩罚。这是诸葛亮处事公道的一个具体表现。赏罚分明，让

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这样就不会因为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很亲密而免于受到惩罚，即使是亲信也不敢去做坏事。

“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认罪悔改的，即使罪行严重，也必定从宽开释；巧言掩饰的，即使罪行轻微，也必定要从严判刑。这说明，诸葛亮执行刑法，是治人心，而不仅仅是管束外在行为。如果这个人确实是发自内心地痛改前非，就给他机会，从轻处罚；如果拒不悔改，还想方设法巧言掩饰自己的过失，那就从重处罚。这样才能引导人们从心底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心底里去悔改。

“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就算是善行再微小，也要赞赏、奖励；恶行再微细，也要指责。这是善恶分明。

“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庶”是各种各样。他精通熟悉各种政事，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物理其本”，凡事都从根本上治理。

“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循”顺着、依照，循着职位来要求实效。“不齿”不允许，不允许弄虚作假。

“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最终结果是在蜀国的境内，人人都敬畏他、爱戴他。因为他处事公正无私，而且赏罚分明，所以人们既敬畏他，又爱戴他，他有道德之威。

《官箴》是古人做官必须坚持的原理原则。书中提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底下的官吏部属，不是害怕我严苛，而是敬畏我廉洁。因为我廉洁无私，所以才能让属下官吏敬畏。“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民不是佩服我有才能、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是佩服我公正无私。公正无私的人，老百姓就会敬重而不敢轻慢；廉洁的人，官吏就敬畏他，不会欺骗他，所以“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可见，公正廉洁是为官者最重要的德行。“公生明”，公正的人就不会被私欲所障碍、所蒙蔽，看事就能够看清楚，判断事情也就能够公道。“廉生威”，人的威信、声望从廉洁

中来。“威”是道德之威，不是因为他容易发脾气，对人很凶，而是因为他的德行让属下佩服、尊重。诸葛亮之所以受到百姓尊重，就是因为他公正廉明。

“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刑罚、政令虽然严厉，人民却毫无怨言，就是因为他处事公平，而且勉励、惩戒都非常明确。“劝”是劝勉人做善事，“戒”是惩戒人做恶事。赏罚分明，而且处事公平，不徇私枉法，这样才受到人们的尊重。

“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识治”，懂得治理的策略方法。诸葛亮称得上是懂得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能够和管仲、萧何相媲美。管仲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帮助齐桓公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萧何是刘邦最著名的大臣。刘邦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萧何既懂得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方法，还能够举荐人才，没有嫉妒之心，全心为国家着想。因此，诸葛亮可以和这两位相提并论。

## 百行孝为先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夫孝，德之本也”，德行的根本是孝。《孝经》告诉我们，孝是德行的根本。因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都是从孝产生出来的。

悌，“兄弟睦，孝在中”，对兄弟的友悌是从对父母的孝生出来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个个都成长发展得很好，如果有一个孩子吃不饱、穿

不暖，他们都会很牵挂，所以兄长能去帮助弟弟妹妹，与弟弟妹妹和睦相处，就是对父母的孝。

忠，“亲所好，力为具”，子女对父母能够有这种忠心，竭尽全力地赡养父母，到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对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也会竭尽全力地去完成。“亲有过，谏使更”。父亲母亲有过失，不是一味地顺从、讨好、谄媚父母，而是要劝谏他们，使他们更改。把这种态度用于对待领导，领导有过失，作为属下，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尽到劝谏的义务，才是尽到忠心。

礼，“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子女对父母都有这种关心，这种礼貌已经养成习惯了，就自然而然地以此来对待师长，对待一切和自己有缘的人，都会讲究礼。

义，“丧三年，常悲咽”，父母过世了，还要想着父母的恩德，常常纪念父母，缅怀父母的德行。这样的行为，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个人有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品格。义，也是从孝顺父母培养起来的。

廉，“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我们对父母，有了什么东西不可以私自藏起来，这种做法形成习惯，当为官的时候，怎么会随便贪占公家的东西？

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如果品德上有损伤，就会令父母跟着蒙羞。如果一个人不想让父母蒙羞，做官时自然不会贪污受贿、违法乱纪。

再看仁爱，“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如果把对待父母亲的孝敬，推而广之对待和父母亲同辈的，或者差不多年龄的长辈，仁爱之心就培养起来了。

和平，“怡吾色，柔吾声”。虽然父母做错了，但是在劝谏的时候，也要保持欢怡的容颜，柔声对他们说。如果父母错了，就对他们俭朴厉气。这种态度一旦养成，以后对老板、对领导说话时，自然也是这种态

度。“号泣随，扞无怨”。即使父母不能接受你的建议，甚至对你有误解，打了你一顿，你也不能有怨言，心里不可与他起对立，不可产生怨恨。产生怨恨是因为自己心里有贪嗔痴，有嗔心没有断掉。所以人从侍奉父母养成了这种习惯，当面对别人的误解、毁谤时，就是平和的态度。

所以说“夫孝，德之本也”，所有的德行都是从孝这个根本产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一些学者在研究，为什么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承传下来绵延至今？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是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结果，特别重视孝道教育的结果。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孝经》中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古圣先王有至高的德行、最简要的道理。这个道理一实行，就可以使上上下下能够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没有怨言，更没有上访的事件。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大道至简。孟子说，道本来就在近处，但是我们非要到远处去求，人人亲其亲，子其子而天下平。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孝敬父母、慈爱儿女、教导儿女，天下就太平了。所以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现在我们都提倡仁慈博爱，这个仁爱之心是从亲亲培养起来的，就是从孝敬父母、亲爱父母培养起来的。把这种亲爱之心推而广之，来关爱人民，再把这种关爱人民的爱心推而广之，扩大到万事万物的身上，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现在大部分的道德教育没有深入人心，没有常态化，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而根本就是孝敬父母。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如果连孝敬这个根本都没有，就像建一个道德“大厦”，我们只希望有第五层、第六层，那这个道德“大厦”不就成为空中楼阁了吗？雷锋精神所代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仁爱精神，是道德“大厦”的第五层，甚至是第六层，结果这个道德“大厦”连孝亲尊师的基础都没有，怎么可能建得这么高？孟子一句话就为我们指出，道德教育不能深入人心，就是

因为没有从孝道做起。所以建造的是空中楼阁，培养了很多伪君子。

“教之所由生也”，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却很重要。所有的教育从哪里生起来的？古人所说的教育就是德行的教育。《礼记·学记》中讲：“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善良之心不断增长，而过失得以挽救。道德的教育、品格的教育是教育的核心和目的。

看到“教之所由生也”，我们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教育没有抓住根本，已经失去了方向，目标搞错了。譬如家庭教育，是不是把长善救失作为最核心的目的和任务？如果是把长善救失作为教育的目的，那么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是送孩子学习《弟子规》，培养他做人的品格，还是送他去学习钢琴、绘画、唱歌跳舞、英语这些技能？学习中国的琴棋书画，还有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定力的作用。至于学技能，与人格培养不相关的东西，并非不重要，但是应该在奠定孩子的德行基础之后才去注重。

自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品格教育、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应该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不能使学校仅仅成为知识技能的传习所。

## 孝悌为仁之本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在通行本的《论语》中，“其仁之本与”中有一个“为”字，“其为仁之本与”，而《群书治要》的版本中没有“为”。

君子为人必须专心致力于根本，“君子务本”，根本建立了，道就会随之产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是仁的根本。

“君子”，在古代原指在上之人、在位之人。后来指有德有位之人，

“有德，堪在位者”，称为君子。这里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是一个求觉悟的人，虽然没有成圣成贤，但是他不迷惑了。“务本”的“务”是专力的意思。看到“务”字，一定就想到要专攻专力，这是修道、修学的关键。

“本”是根的意思，我们经常说根本。对于修学而言，“行”门的根本就是孝悌这两个字，“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孝悌”是为人的根本，在批注中说：“先能事父兄，然后仁可成。”一个人能够先侍奉父母、兄长，然后才能培养起仁德、仁爱之心。“本立而道生”，“道”是仁道。“仁”是一个人德行的总称。“道”，其实是“明明德”的道，通过孝悌可以使本性的明德得以彰显。一个人如果连孝敬父母、尊敬师长都做不到，不用说成圣成贤、明明德，就是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

“孝”，古人解释为“善事父母者”，悌，“善事兄长为悌”。其中关键就在一个“善”字。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善”？回想一下父母怎样对待儿女，就知道什么是善了。父母关爱儿女，全身心都扑在儿女的身上，没有自己。所以儿女能够放下自己，全心全意考虑父母的所思所想、父母的要求，就知道什么是善了。但凡心里还有自我，“善”就很难做圆满。再具体说，把《弟子规》全都做到就是“善”事父母，拿出真诚心就能做到善事父母。《弟子规》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能感人？因为那是一个拥有真诚心的圣人的自然表现，是一个人性德的自然流露。平凡人按照《弟子规》去做，久而久之，也就有圣贤人的气质了。

“悌”的含义是“善事兄长”。在古人看来，兄弟姐妹，骨肉一体，谁也离不开谁，所以相互之间要友爱，做到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帮助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对兄长要恭敬、听从。《弟子规》中有几句话，对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特别合适。譬如：“财物轻，怨何生。”兄弟姐妹之间相处的时候，如果能把钱财看得淡一点，把兄弟骨肉之情看得重一点，怨气又怎么可能产生？又怎么可能因为财产分配不合理吵上法

庭？“言语忍，忿自泯”，兄弟姐妹在相处的时候，在言语上互相忍让一下，少说一句，愤愤不平的心自然就泯灭了。

在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悌”的故事非常感人。《德育古鉴》中有一则“诚感让田”的故事，讲的是施佐和施佑兄弟俩做官之后回到家乡，但是因为田产的问题引起了纷争，互不相让，结果还结了怨仇，亲友们劝解也没有效果。在他们同乡中，有一个叫严凤的人，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而著称。有一天，施佑见到了严凤，把自己和哥哥争田产的事情告诉了他。严凤一听之后，皱眉长叹了一声，说：“可惜我的兄长身体太弱了，如果他能像你的哥哥那样强壮有力，可以尽把我的田产夺去，我还有什么可焦虑的？”严凤说到这里，想起自己的哥哥，不禁哭出声来。施佑被深深感动，他就请严凤一起到他哥哥那里，向哥哥道歉。他一边向哥哥礼拜，一边泣不成声，非常后悔，不该和哥哥争田产。他的哥哥也非常感动，兄弟二人都愿意把田产让给对方，从此以后兄弟俩一直互敬互爱。

严凤自己身行孝道、悌道，正是他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手足、兄长的友爱之情感动了乡人，也感动了施佐、施佑两兄弟，不再为田产而纷争。

现在社会有必要把类似感人的故事搬上银幕。不要总是播放夫妻离异，兄弟争产，儿女不孝敬父母，父母无人赡养被送到火车站等反面故事。如果经常向大众传播这些不良现象，大众会想：现在人都是这样对待父母、兄弟的，我对父母、兄弟已经够好了。其实和古人一比，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宣传要做到隐恶扬善，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朱子治家格言》中说：“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一家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过日子，最忌讳的就是起了争讼，把彼此送上了法庭。即使官司赢了，但是因为你的气量太狭窄，连兄弟姐妹都不能容纳，家道一定会衰落，所以说“讼则终凶”。

仁爱之心的根本在于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友悌。如果一个人连父

母都不孝敬，连兄弟都不能和睦相处，那么他对朋友也不会用真心。所以古人提醒我们择友、择偶的时候，要看对方是不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是从其根本上看。

## 第七十讲

诗书立业，孝悌做人



## 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君子奉事父母能尽孝道，就能够把这种孝敬的心转移去效忠君主；奉事兄长能尽悌道，这种随顺之心就可以移于对待长辈。“顺”是随顺。能尽孝道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心和；而能够修悌道的人，心顺。所以孝敬父母的人，能够培养起心和的品质；友爱兄弟的人，能够培养出随顺的品质。“和顺”这两个字就把孝悌的精神概括出来了。

现在仁爱不兴，五伦关系紊乱的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了孝悌的教育。譬如有些人很有善心，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大学生，但是这些大学生得到了资助，连一封感谢的信、一句感恩的话都没有。很多专家学者写文章议论纷纷，探讨其中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一个人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想着报答，那么对于陌生人的关心，又怎么能够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仁爱之道不兴，都是因为不孝、不悌所产生的，因为孝悌观念沦丧所致。

现在我们国家开放了二孩政策，但是却遇到了挑战。因为第一胎的子女不喜欢要弟弟、妹妹，他们怕弟弟、妹妹和自己分享父母的爱。这种观念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兄友弟恭，兄长照顾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尊敬兄长，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团结互助。

现在孝悌观念淡泊了，世界秩序出现混乱。要拯救世界从哪里做起？就要从提倡孝道、悌道做起，这样才能消灾免难。

怎么样在全国推行孝道？《大学》中有一句话：“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关键在于上位的领导者，在上位的领导者能够尊敬父母，孝顺父母，整个国家的人民才能兴起孝道之风；在上位的领导者能够尊敬尊长、友爱兄弟，整个国家才能兴起友悌的风气；在上位的领导者能够体恤孤儿，照顾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人们才不会产生悖逆之心。这都需要领导者的率先垂范。

中国古人把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推而广之。纵的方面讲对父母的孝，父母的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从横的方面讲兄弟之间的友悌，又把这种友悌之情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要达到对天地万物的仁爱之心，要从孝悌做起。孝悌之心最容易开发人的性德。

“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君子所居则化，所在则治，故可移于官也”。君子“所居则化，所在则治”是因为君子有修身的基础。《大学》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的家庭都是大家族，少的有七八十口人，大的有上百口人，甚至是上千口人，能够把家治理好，就能够治国，所以“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因为齐家和治国所需要的智慧、所需要的仁爱是相通的。

“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所以在家中形成了孝悌和善于理家的品行，在外才能建功立业，而美好的名声自然会显扬于后世。

##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群书治要》卷二十二《后汉书二》

孔子说，侍奉父母做到了孝顺、恭敬，就能够把这种孝敬心转移去效忠君主。所以寻找忠臣，一定要从有孝子的家庭之中选拔。这是因为：

第一，一个人孝敬父母，有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知恩报恩、饮水思源，这样的人不会忘恩负义。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父母，没有恩义的处世原则，取而代之，就会以利害的原则来进行取舍：这件事对其有利、有好处，就会全力以赴；当这件事由利变成害的时候，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对父母能够孝敬，对领导就自然会忠诚，就不会对领导做出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事情。

第二，中国古人所讲的孝，内容非常广泛，不仅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从语法结构上看，后一种解释更可取。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重点强调的是要尊敬父母。而养父母之心，除了尊敬父母之外，还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也就是你的父母仅仅能为你的疾病而担忧，不要让父母为其他事情而担忧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譬如，孩子上小学时贪玩，心思不在学习上，功课不好，父母就担忧，这就是不孝；等到上初中，交了一些不好好学习的朋友，也让父母担忧，是不孝；等到上了高中，学会上网打游戏，还让父母担忧，是不孝；到了大学，心思不在学业上，开始出入一些娱乐场所，心思都用在了娱乐、攀比、追求骄奢淫逸上，荒废了学业，同样会让父母担忧，这也是不孝；等走上了工作岗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让父母战战兢兢

兢，害怕孩子因为贪污受贿锒铛入狱，这仍然是不孝。可见，一个真正能够养父母之心的孝子，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样样都能够让父母放心，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

父母培养儿女都会有所期望，希望儿女能够学有所成，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奉献。所以父母养儿女，并不仅仅是希望儿女在他们面前端茶倒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送儿女上大学？儿女在父母身边陪伴父母不是更好吗？这说明，父母希望儿女成为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孝经》中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孩子能够立身行道，自身修养得很好，处处走在大道之上，能够对国家、对民族有所贡献，甚至可以扬名于后世，使后人提起他，对他都非常尊敬、非常佩服，这样的儿女让父母感到非常安心，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家境虽然非常贫寒，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几个孩子都能去读书、上大学。她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她知道读圣贤书是最好的事情。这种传统的观念一直留在母亲的认知中。所以尽管自己的生活很艰苦，母亲仍然用自己微薄的收入供三个孩子上了大学。我们去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就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每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母亲都会恋恋不舍，但是她仍然很坚强，希望我们上大学，期盼我们能够学有所成，能够立身行道，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

一个人能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道才尽圆满。从这里看到，其实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人尽心尽力地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时，就是在完成父母的期望，就是在养父母之志。

除了养父母之志之外，还要养父母之慧，即养父母的智慧。如父亲母亲年纪大了，一般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对儿女看得比较重，出现患得患失的心态，对钱财看得也比较重。这时候做儿女的要经常劝导父母，“人生七十古来稀”，要那么多钱财有什么意义？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为儿孙过分担忧，

只要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健健康康，就是儿女最大的福分。

养父母之慧还包括儿女对父母的过失要委婉劝谏。《弟子规》中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父母有过失的时候，儿女要和颜悦色地劝谏父母。《弟子规》中还说，“挞无怨”。即使父母鞭答自己，自己仍然没有怨言，找时机再委婉劝谏。“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并不是说父母处处都是对的，事事都考虑得周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有过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儿女，不应该把父母的过放在心上，而要以一颗柔和的心、慈悲的心去善巧方便地劝说。这颗心一定是出于为对方好的心，一定要有耐心，而不是以习气做主，一看劝不动了，脾气就上来了。这就失去了为人子女应尽的本分了。

提升父母的智慧，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先做一个孝子，自己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能够让父母放心，这样你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才能够听得进去。这说明，善事父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一个真正能够善事父母的人，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人了。不仅在德行上没有欠缺，而且在智慧和慈悲上全都达到了完满的程度。

## 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

夫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懂得做一个好儿子，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懂得如何做一个好臣下，然后才能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君主；唯有懂得如何侍奉人，然后才懂得如何任用人？因为一个真正能够侍奉好父母、领导，能够侍奉好他人的人，一定是要放下自己，为对方着想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完全是从对方

的角度着想，才能够真正把父母、君主侍奉好，把领导交给的工作完成好。能够放下自己，你也就能够看到属下的意思，知道儿女的意思，看到他们的需要。你知道他们的内心在想什么，当然能够侍奉好别人，也能够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一个人没有当过属下，他不知道属下的需要，不了解属下的心态，也不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体恤、关爱下属；做领导时就可能颐指气使，从想当然的角度出发，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挑剔对方，关系就很难处理好。

这说明，一个人的经验确实很重要。很多从基层一级一级干上来的领导，他们的情商确实特别高，特别能够善解人意，而且特别了解属下在想什么，知道属下需要赞叹、肯定、体恤、鼓励。但是没有当过属下的人就没有这种换位思考的心。属下付出了很多，领导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作为属下你就应该这样做，这样就很难把团队带好。

人生的经验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重要的是要从经验之中，学到工作的方法，为人处世的态度。当然，这需要有一颗好学的心。

## 丧尽其哀，祭尽其敬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句话的义理非常深刻。对于父母过世的丧葬能够谨慎守礼、竭尽哀思，对于已故的父母及祖先，都能依礼依时恭敬虔诚地追思怀念，不忘根本，则风俗民情必然趋向淳厚善良。

孔安国在批注中说：“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

“慎终者，丧尽其哀”，“慎”是谨慎，“终”是寿终。古人曰：“老死

曰终。”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能活到老，叫夭折，不叫“终”。《礼记》中说：“君子曰终，小人曰死。”一个有德行、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过世才称为“终”。“终”有功德圆满的意思。而小人（德学不具足的人）过世，叫作“死”。

父母寿终时，须依丧礼，谨慎治办丧事。父母之丧，以哀戚为重。故孔安国云：“丧尽其哀。”这里就谈到了父母过世的时候要谨慎地办理丧事。谨慎治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以哀戚为本，就像前面所讲的重本，“丧，与其易也，宁戚”。第二，不可以厚葬。《吕氏春秋》中讲了不可厚葬的道理：“慎终”就是以生者的心去为死者考虑。而用生者的心为死者考虑，没有什么比避免死者被惊动、坟墓被挖掘更重要的了。也就是说，为死者考虑，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死者的墓被人挖掘。而要保证死者不被惊动、其墓不被挖掘，最重要的就是使掘墓者无利可获。下面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有人人在墓前安放上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这墓中珠玉、玩物、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挖，挖了一定大富！”人们一定会讥笑他，觉得他很愚蠢，但是世间的人实行厚葬的做法和这个人的做法是一样的。

从历史上看，灭亡的国家数不胜数，古代的大墓很少没有不被挖掘的。但是世间人还争相营造大墓，岂不是很可悲的事吗？尧舜禹等古圣先贤，都是以节俭的方式被安葬，并不是吝啬费用、厌烦辛劳，而是为死者考虑。古圣先王所憎恶的，就是让死者受辱。而被人挖掘了坟墓，就必定会使死者受辱。如果实行俭葬，他的坟墓才不会被挖掘。所以先王的安葬一定会从俭。口中声称敬爱、怜惜死者的人很多，但是真懂得敬爱、怜惜死者的人却很少。所以宋国还没有灭亡，而宋文公的东冢就已经被盗掘了；齐国还没有灭亡，而庄公的庄公冢也被盗掘了。在国家安宁的时候尚且如此，更何况百世之后国家灭亡了？所以孝子、忠臣，不可不明察此理。爱之，反而害之。欲使其安稳，反而使其危机，这说的不就是厚葬这种行为吗？可见谨慎治丧就不可以厚葬。

为什么世间还有很多人愿意实行厚葬，厚葬之风屡禁不止？《吕氏春秋》中说出了原因：现在世俗大乱，安葬愈来愈奢侈，这不是安葬的本意，不是替死者考虑，而是生者以此相互夸耀。“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辱。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安葬得愈奢华，家人就愈以此为荣，如果安葬得节俭，就会以此为羞耻，不以有利于死者为出发点，而只把他人对生者的非议和赞誉要事，这不是慈亲孝子的心意！这段话说得很好，人本来是要对过世的人表示哀痛、表示纪念，但是反而因为厚葬而侮辱了死者。这就是因为爱他们反而侮辱了他们。历代开明的皇帝，甚至皇后，都熟读历史，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他们将过世的时候，都命令或者立下遗诏要俭葬。

汉文帝就是一个例子。汉文帝在过世前，特意颁发诏书：“我听说，天下万物出生之后，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万物的自然规律。如今世人都喜欢生，而不喜欢死。厚葬以致破产，长期服丧以致伤害身体，我绝不赞成这种做法！我绝不贤德，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百姓的，将来过世了，又让他们长期服丧痛哭，使他们经过几个寒冬酷暑，使百姓父子哀伤，伤害老幼的心灵，减少了饮食，中断了祭祀，从而更加重了我的不德，这样做怎么能对得起天下人？我有幸承继帝业，以渺小之躯依托于天下各诸侯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依赖于天地神灵、社稷的福祉，使得四境之内安定和平，没有战争。我因为不够聪敏，经常战战兢兢，害怕做错事，以致辱没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年长月久之后，害怕不能始终保住帝位。现在竟然有幸尽享天年，又得以被供奉在高庙之中。以我的不圣明，有这样的结果我已经觉得很好了。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因此他命令天下的官吏和百姓，在他去世之后，服丧到第三天，就都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等活动。他还说：“要通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我俭葬的心愿。霸陵的山川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变。而后宫的妃嫔，从夫人以下直到少史，都遣散回家。”汉文帝在世的时候生活简朴，做事恭

敬，到过世之时还特地立下诏书，要实行俭葬，不要劳烦百姓。

唐太宗是一代贤君，他的皇后——长孙皇后是一位贤德的人。长孙皇后在临终的时候，就要求太宗为她俭葬，她说：“妾活着无益于时事，死后不可厚葬多费，而且埋葬就是隐藏，让人看不到。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推崇节俭薄葬，只有无道之士才大建陵墓，劳费天下，被有见识的人所讥笑。只请求能够依靠山势而埋葬，不需要堆起坟头，不需要用棺槨。所必需的器物用具都使用木的、瓦的，节俭、薄葬送终，这就是不忘记妾。”她知道太宗对她一往情深，所以她特意立下这个嘱托，要求太宗要俭葬，这就是对她的爱。

这些圣明的君主、贤德的皇后的做法都是在提醒后人，不要因为面子而把丧事搞得很隆重、奢华，陪葬很多金银珠宝、昂贵的东西，最后导致坟墓被盗掘，使亡者不得安宁。

“追远者，祭尽其敬”，在丧葬之后，要“依时依礼，追念祭祀”。“追远”的“远”有两种含义。第一就是父母过世已经久远，第二就是祖父祖母以至历代祖先距今已远，皆须追祭以时。祭祀的时候必须是“必诚必敬”。因此孔安国注云：“祭尽其敬。”子子孙孙都这样追远祭祀，就是不忘本。

《礼记·祭统》对祭礼的来源做了描述：“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祀并不是外在事物的要求，而是来源于内在。就是由内心发出的对父母、祖先的感念之情，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祭礼。祭礼既是从内心所产生的，就需要有诚敬之心。在这里讲到了要“依礼依时，追念祭祀”。

《礼记·祭义》中对祭祀的频率有明确要求：“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祭祀不可以太频繁。如果频频地祭祀，人们会感到厌烦，失去恭敬之心。同时祭祀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少，就会使人感觉到怠慢，怠慢了就会使人淡忘。中国古人是顺着天时季节的变化来举行祭祀的。春天的时候举行“禘祭”，秋天的时候

以新下来的谷子举行“尝祭”，一年有春秋两次祭祀，都很重要。在秋天的时候，霜雪覆盖了大地，君子踏霜而行，自然有一种悲凉之感。这种悲凉之感不仅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思念着故去的亲人。到春天，雨露滋润大地，这时君子踏露而行，自然有一种被惊醒的感觉，思念着故去的亲人，似乎他们也像春天一样，重新回到了人间。祭祀时，用快乐的心情把亲人迎回来，再用悲伤的心情将他们送走。所以在古代的祭礼中，对如何祭祀、什么时候祭祀、祭祀的次数、频繁程度都有明确的规定。

除了依时依礼之外，祭祀最重要的就是要表示出内心的诚敬之心，也就是“必诚必敬”。《论语》中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祭祀父母祖先的时候，就如同父母祖先在面前一样恭敬。如果祭祀神明，就要像神明在面前一样，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这都是“祭尽其敬”的表现。

在《礼记·祭义》中，对于祭祀之前、之中、之后应该怎样做，也有明确的要求。譬如，在祭祀之前就要进行斋戒，对内要调摄内心，使内心清净，从外物把心收回来；对外要隔绝一切交际娱乐、房事等活动。斋戒的时候要把心思集中在思念死者生前的起居住所、音容笑貌、饮食习惯、志趣爱好。这样专心斋戒三天，就能将要祭祀的先人活现在心中。所以古人看一个人斋戒时恭敬的程度，就知道这个人思念亲人的程度如何。就像看一个人鞠躬，虽然同样是鞠躬，但是也可以从鞠躬中看出一个人内心是不是有恭敬心。

祭祀当天进入宗庙之后，仿佛能从牌位上看到亲人；在牌位前礼拜之后，行步周旋、敬奉贤品；走出门来心中肃然，亲人的音容笑貌好像就在眼前；出门之后，侧耳倾听，仿佛能够听到亲人深深的叹息声。所以先王对亲人的孝敬之情，是亲人的面容不曾离开过眼前，亲人的声音不曾离开过耳边，亲人的心志爱好不曾离开过心间。也就是说，他所思、所想、所听、所看的，全都是先人的音容笑貌、爱好情趣，等等。这样又怎能有

丝毫的不恭敬？

所以君子在父母在世的时候是恭敬的赡养，去世之后是虔诚的祭祀。“追远”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祭祀祖先、祭祀父母。在中国古代每个家族几乎都有祠堂，祠堂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每到春秋祭祀的时候，把全家族的人都召集在祠堂之中，除了这些礼仪之外，最重要的是宣讲祖先的德行，念念不忘祖先、父母的功德。譬如，他们对国家民族有什么贡献，他们有什么德行，后人要学习和效仿。通过这样的思念、追怀，就把家道、家风、家规代代承传下去了。这样的祭祀才能够显示出诚敬之心、思慕之心，也才能体现出它教育的含义。如果对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对家族就生不起恭敬之心，也提不起责任感。如果我们后人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么我们对中华民族也就生不起恭敬之心，也就提不起对民族的责任感。爱国从哪里做起？要从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古圣先贤的德行来做起。

##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除了祭祀之外，“追远”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修家谱。在古代，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而且每一年都要修家谱。譬如，这一年之中，有哪些人过世了，哪些人出生了，这一年之中家族发生了哪些重大的事情，每一年都要整理一次。而一个人一生的行迹，也就是他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贡献，也都以简单的方式记载在家谱之中。所以有了家谱之后，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远祖是从哪里来，他们到这个地方定居的原因及到现在一共传了多少代。历代祖先对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有的贡献及其美好的德行，都可以从家谱之中反映出来，这才称得上“追远”。

修家谱有什么好处？《礼记》中说“不取同姓”，礼要求不娶同姓之人。所以恭修家谱就会发现，父亲一个姓，母亲一个姓，然后再往上去推，他们的父母也不能够娶同姓。以此类推，一代一代推上去之后就发

现，其实所有的姓都是一家人，中华民族确实是一脉相承。而且把家谱推上去之后，最后发现自己不是炎帝的子孙，就是黄帝的子孙，所以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这样，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就有了。修家谱强化了我们的大家庭的观念，也促使我们学习祖宗的德行。在春秋祭祀时，还有在家谱之上记载着祖先的德行，为后人讲解出来的事例。我们一看，自己的家族之中，都是这样一些对国家、人民有贡献的人，那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给祖先抹黑。所以“追远”确实非常重要。

历史上有些皇帝确实身体力行圣贤教诲。譬如，明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明成祖到了南京，退朝之后就召了东宫官杨士奇，问道：“你辅佐太子已经很长时间了，对他了解得应该很清楚了。太子的为人到底如何？”杨士奇回答说：“殿下仁孝恭敬，不是常人可以相比的。”明成祖就问：“你能不能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例说明这一点？”杨士奇回答说：“在每逢祭祀的时候，太子一定会亲自检查所有的祭器，从不把这件事情委托给别人。去年的时候，按照惯例要举行祭祀了，太子却得了痛风病，太医告诉他要服药发汗才可以，但是太子却说如果要吃药发汗，我怎么还能亲自参加祭祀？左右的人说，您可以让别人代替您参加祭祀。殿下说皇上把祭祀的使命交付给我，我又派别人来代替，这不是违背君父的命令吗？所以他就带着病，亲自去参加祭祀。祭祀完，他出了一身的汗，病就痊愈了。再譬如，每一次给皇上您进奉食物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太子一定会亲自检查，然后再亲自把封条封好，才派遣他们出发，不敢轻易的把这件事委托给下人去做。”

明成祖听了之后说：“这些都是为人子应当做的事情。”杨士奇说：“自古以来的大圣大贤都是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到了极致而已。”也就是说圣贤人，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是毕恭毕敬的、认真负责完成了他自己的本分而已。皇帝对于祭祀这样的诚敬，上行下效，整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把祭

祀这件事看作很重要的事情来对待。祭祀教导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提倡孝道，知恩报恩、饮水思源，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邢昺的《论语注疏》中这样解释：“言君能行此慎终追远二者，民化其德，皆归厚矣，言不偷薄也。”意思是，如果君上能够把慎终、追远这两件事情做好了，人们就会被他的德行所感化，民风自然归于淳厚而不刻薄。“偷薄”，“偷”是刻薄、不厚道，“偷薄”两个字加起来也是刻薄、不厚道。

《孝经》中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处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提倡的就是孝道。厚德是从哪里来的？民风淳厚是什么原因？就是由行孝而来。现在的民风之所以不淳厚，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教民众孝道，没有提倡祭祀祖先、祭祀父母。所以要想使民风淳厚，必须从孝道这个根本入手。《礼记》中说：“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君子施教，对外，教他要尊敬君长；对内，教他要孝敬父母。怎样才能教好？《说文解字》中解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身教胜于言教。道德教化不同于知识的传授，一定是身教才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教”是正己化人，把自己端正了，才能够让别人受到感化。要教属下孝道，教学生尊敬老师，如果自己的老师、父母已经过世了，怎么样能够身教？下边就讲到重点了。

“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君子的教化一定要从根本上教起，从孝道来教起。怎么教？“顺之至也，祭其是与”，能够把孝敬之心体现到极致的就是祭礼。为什么要实行祭礼？就是在世上的人能够定时追念他的父母、祖先，恭敬他的老师。虽然父母、老师已经过世了，但还是念念不忘，对他们表示纪念、表示礼敬。他们身边的人、属下就从他身上学到了孝道。所以祭礼可以说把孝心体现到极致。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所以祭礼是教化的根本。“祭而不敬，何以为也”？如果祭祀没有恭敬之心、恭敬之念，为什么还要祭祀呢？这为我们指出了祭祀的重点。即在教

导下属、教导学生前，自己必须有发自内心的感恩和真诚恭敬之心。这个恭敬之心不是装出来的，不是为了教育而表演出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诚敬，这样才能够让人受到感化。所以“上行而下效”，正是通过举行祭祀才教导了人们厚道、不忘本。要想使国家太平、社会和谐，必须从教导道入手，使人心厚道。这就要提倡慎终追远，恢复祠堂，提倡祭祀，提倡修家谱，绍述祖德。这不是迷信的做法，是提倡人们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教导人们不忘本，这是从根本上进行的教育。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确实是累积了五千余年的智慧、五千余年的方法、五千余年的经验，也有五千余年的效果。中国是世界上最懂得教育的国家，它是从根本上来培养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不忘本的意识。人的心念转变了，民风当然就会醇厚。当然在祭祀和修家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讲述祖先的德行，这样后代才会被祖先的德风所感化，民风才会自然归于醇厚。

## 人主贤，则豪杰归之

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

——《群书治要》卷三十九《吕氏春秋》

泉水很深，鱼鳖自然会聚集生存；树木茂盛，飞鸟就会群集筑巢；草丛茂密，禽兽就会依附栖息；君主贤明仁德，各方的豪杰自然会归顺效忠。所以圣明的君主不求各方都来归附，而是尽力创造使人们归附的条件。上位者若想贤德的人来归附，必须从根本做起，就是自己要成为一个贤德的人。

现在招致人才有几种方法：第一，高薪聘请人才。高薪是否能够招

聘到真正的人才？靠薪水来招揽人才的结果是，这些人是因为高薪而来，也会因为高薪而走。有人出了比你更高的薪水，他马上就会跳槽，因为你以历来吸引他，那有更高的利益出现的时候，他就被吸引走了，所以用这种方式招来的人才是不稳定的。

第二，选拔人才的方式是竞争上岗。竞争是不是能够选拔出一等的人才？像诸葛亮、文天祥这样的人才他愿意出来竞争吗？高名厚利打动不了他们，他们愿意来为你出谋划策吗？所谓真正的人才，必须靠仁德的君主才能够招致，这就是《周易》中所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君主要想招致真正的人才，必须自己首先成为一个有德的人。这也是《大学》中所说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有德此有人”，君主、领导者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他所感召的人才也是和他志同道合的、德才兼备的。“有土此有财”，这些人来了之后就有“土”，即农业社会发展生产所依靠的资源，这些人来了，资源就具备了。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能力、公共关系的能力，等等。这些人众志成城，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自然就会创造出财富。“有财此有用”，财富要用在哪里？要用在使自己的“德日进，过日少”上，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按照古圣先贤的教诲领导一个团队、治理一个企业，自然能够平稳地可持续发展，不会出现“富不过三代”的现象。

## 保证官员清廉为政

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七《刘廙政论》

“为政”是治理政事，没有比使官吏清廉更好的了。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展开来也有无穷的义理。问题就在于怎样使官吏清廉？大家都知

道要使官吏清廉，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官吏清廉却未必能够达成一致。

要使官吏清廉，第一就要使他“不必贪”。譬如说给官员的工资、俸禄非常稳定，让他保持有尊严的生活。所以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提倡高薪养廉，前面讲过高薪养廉的必要性，以及高薪养廉的前提。要让为官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可以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非常有必要。这就会使他们没有必要去为了生计、赡养父母、照顾家庭等而贪污受贿。

第二要使其“不能贪”。也就是法制、监督机制很健全，他想贪污受贿，马上就会被发现，使他不能贪腐。

第三要使他“不敢贪”。要让他知道贪污受贿的结果是很严重的。一方面法律很严厉，一旦贪污受贿，就会被抓进监狱；另一方面的不敢贪，就是要教人深信因果，提倡因果的教育。《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富是不正当的收入获得的，也会以不正当的方式败散掉。这些道理需要经常宣讲。

《周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尚书》中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春秋左传》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尚书》中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一个人对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对外喜欢打猎、游玩，没有节制；喜欢饮酒，沉溺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这几件事有一件事做到了，就没有不灭亡的。

《太上感应篇》中有一个比喻：“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如同是吃了有毒的肉、喝了有毒的酒一样，不仅止息不了饥渴，还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太上感应篇》是古代状元、宰相必读之书。如果受到这样的教诲，对于因果的道理就会非常明确，怎么还敢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原因就在于他从小熟读圣贤书，

对于圣贤教诲深信不疑。所以不敢贪，除了不敢触犯法律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人从心里明了因果，惧怕因果报应的事实。

第四是“不愿贪”。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有羞耻心、有气节。《弟子规》中说：“德有伤，贻亲羞。”如果一个人有孝心，念念想到父母，知道一旦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父母会为自己而蒙羞，他怎么还敢去贪污受贿？可见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所以中国古人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为官者一定要清楚做官的目的，如果当官是为了发财，那何必当官，直接去经商就好了。当官的人，要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担当的精神。为官的目的就是把国家治理好，使社会安定和谐，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一个读书人、为官者的使命。为什么古代人对士特别尊重？把读书人摆在第一位？《孟子》中说：“爵一、齿一、德一。”尊重有爵位的人，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尊敬领导者，尊敬有德行的人，尊敬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古人对于领导者这样尊敬？这是因为古人选择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要在这个职业上成圣成贤的。什么是圣贤人？圣贤人念念是为了天下的苍生而着想，他的心中没有自己。所以做官办政治，办的是圣贤政治。圣贤人当官才能够当好官，这是靠教育来成就的，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特别重要。

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使官吏清廉。他不必贪，也不能贪、不敢贪，更不愿贪、不想贪，官吏的清廉就有了保证。

## 取信于民，则民心向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子贡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信于民。”孔子说了三件事：粮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要取信于民。“兵”原来是指武器，打仗的人称为“士”，士执兵，“兵”就是士执的兵器。我们说士兵，就是讲士是执武器的人，兵是兵器。后来把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了。这里所说的兵含有国防、军备的意思。

首先国家必须有充足的粮食，民以食为天。《荀子·富国篇》中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足食是因为国家能够节俭用度，有了多余的粮食就积蓄起来，这样能以备凶荒。

足食之后还必须预备好兵器、武器。足食之后，百姓才能足，百姓就是士。在古代社会，老百姓都要去服兵役，如果老百姓能吃足用足，自然就不缺少作战之士。兵器是军备、国防的意思。

此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要有信用，也就是国家要对百姓讲诚信，老百姓才会对国家产生信心，这样办政治才能成功。

现在还可以说是足兵，但是对于“信”很缺乏。为什么说缺乏？《史记》记载，子贱治理单父，老百姓对他很信任，最后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政府，这个国家就很难有成就，甚至很难建立起来。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用读圣贤书的人来办政治。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圣贤教诲，这样他们办政治能够取信于民，让老百姓对政府、对国家拥有信心，才能够避免政府失信于人的现象。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之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听了之后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项，在剩下的两项之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

为什么是这个次序？在三者之中，首先去掉军备，为什么？没有军备，在逼不得已的时候人们会揭竿而起，他们只能拿石头、木棍做武器。

为什么在剩下两项之中必不得已而去掉一项，要去掉粮食？去掉粮食不是要饿死了吗？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死亡，假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国家的威信就建立不起来。自古皆有死，不足为患，有食物吃，到老的时候也会老死；打仗的时候，有食物吃，也可能在战场上战死；太平的时候，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父不父、子不子，人伦关系紊乱了，虽然有粮食，但是不得而食之，得不到它，都被人抢去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死，再有钱，也不能长生不老，所以死不足为患。但是如果百姓对国家的信任没有了，就会亡国。所以只要人民信赖政府，虽然食不足，但是他可以和国家共患难。如果失去了民信，即使没有外患，也有内乱，国家就不能安立，所以说“民无信不立”。就像一个家，即使家中很有钱，有足够的粮食，但是家中的兄弟姐妹都不和，甚至为了财产还起了争斗，是同一个道理。

## 老子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老子说：“我有三种法宝，要保持而且要永远守住。第一是仁慈，第二是节俭，第三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所忧虑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一般的人都以金银财富为宝，而老子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宝。圣贤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知道只有守住这三宝才可以长存。金银财富都是虚假的，在自然灾害面前，金银财富不能换取食物。有了金银财富，留给子孙，子孙还可能会败家，骄奢淫逸，

没有志气。骄奢淫逸的生活，会损失自己的福报，福报很快用尽了，寿命很快也就没有了。

“一曰慈”，“慈”对于领导者而言，就是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能够以这样一种心来体恤百姓，百姓对他的回报也自然非常丰厚。“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领导者以慈爱之心对待百姓，百姓自然会感恩、回报。

“二曰俭”，“俭以养德”。“赋敛若取之于己”，对从老百姓那里收的税，就像从自己那里收的一样，不能够随意浪费，要非常节俭。《政要论》中就有这样一段阐述“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穿一件丝织品，就要想到织女的辛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进用一粒谷子，也都要体恤农夫劳作的辛苦。这是告诉领导者，虽然身居高位，也要体恤百姓，不能够随意浪费、骄奢淫逸。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要在别人前面倡导新鲜的事物。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什么？古圣先贤是明心见性之人，他们是看到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我们现在站在第二层楼，就看不到第二十层楼的境界，这就不能够随意批判古人，还把古人拉到二层楼，说你们看到的就是我看到境界。我们所认为的很多创新，其实在古书之中都已经论述，而且被证明是不合适的了，结果很多人还拿它当作创新的东西来使用。所以“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谈创新、要倡导一个事物的时候要非常谨慎，自己是不是足够地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历史上这些类似的做法是否有足够的了解。

## 第七十一讲

明察秋毫，任人唯贤



## 知人之法：八观六验，六戚四隐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近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仁，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廊。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以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羨美，无所失矣，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九《吕氏春秋》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大凡衡量一个人，当他显达时，观察他所礼遇的是哪些人，是礼遇有恩于自己的人，还是有道德学问的读书人，还是礼遇达官贵人，在那里攀龙附凤？这就显示出一个人德行的高低。如果在显达的时候，他礼遇的是那些有恩于自己的人、帮助过自己的人，说明这个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是一个有情义、有恩义、有道义的人；如果他礼遇的是那些穷苦的、需要帮助的读书人，那是为国求贤，一片公心。

在《说苑》中记载，周公代理天子之位7年，在这7年之间，他以拜师之礼去求见的人有10个，以朋友之礼去求见的人有12个，那些贫寒之

士中，可以优先见到周公的有49人，周公所举荐的德才兼备的贤才有上百人，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而他给那些来朝拜的人封予官位的，大大小小在上万人。试想，如果周公既骄傲又吝啬，那么天下真正的贤士就很少能够来朝拜了。即使有来的，也一定是贪图财位、尸位素餐之人。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很清高，清高在什么地方？那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到无求品自高，一个人不贪名、不贪利、不贪财，于世无争，与人无求，自然就清高，显得品格高尚。一个人既不为财又不为名利，他为什么还要出来做官，出仕拜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报答知遇之恩，进而能够兼济天下。诸葛亮本来在南阳隐居，“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为什么会出山帮助刘备？就是因为刘备有求贤、礼贤之心，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看到刘备的诚意，看到他那种仁爱天下的存心，所以才出来帮助他。如果在位者没有这样礼贤的恭敬之心，读书人也不愿意出来做官。

在《群书治要·三略》中这样阐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人很清高，志向纯洁，那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获得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很有志向，也不能靠威刑来胁迫他。就像文天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一死，也不接受威刑胁迫。“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看这个人的志向，之后才以适当的方法来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很清高、道德纯洁的士人，领导者必须首先修明自己的礼义，要有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而要想招致那些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就要修明自己的道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真正的贤士才会被招来，自己的名声也才可以保全。

周公所礼敬的是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非常恭敬，甚至还以见师之礼前去求见，这表现了周公一片公心。他礼贤下士，为国家求贤若渴，没有半点私心。

“贵则观其所进”，当他荣贵时，观察他所提拔和举荐的是什么样的人，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如只举荐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或者给自己送礼的人，还有谄媚巴结自己的人，如果他只任人唯亲，很可能会结党营私。在《尚书·舜典》中记载，虞舜是一个非常爱才重贤的人，他显贵之后所提拔和举荐的也都是贤能有才的人，如他命禹做司空，让大禹治水、平水土；命弃为后稷，播种百谷；命契做司徒，即教育部部长，兴起伦理道德的教化；命皋陶做士，即大法官，掌管法律；命伯益做虞官，掌管山泽鸟兽。正是因为舜知人善任，任官得其人，所以能够无为而治。他任用了这么多的贤才，天下人都以他为父母。正是因为他“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对内推荐贤才不避讳自己的亲属，从外面选举贤才也不回避自己的仇人。这说明舜是一个非常贤善的人，对人没有分别心，为国举荐贤才而没有自己的好恶之情，所以人们才对他爱戴不已。

尧帝考察舜，曾经问其治国之道，舜只回答了两个字“事天”，就是按照天地自然的规律去治国。后面举例说，“平地而注水，水流湿”，在平地上浇水，水自然就会朝着低洼潮湿的地方流去。“均薪而施火，火从燥。召之类也”，地上放着很多的柴火，你要去点燃它，火自然会首先烧着那些干燥的柴火。这都是自然感召的结果。所以“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尧凭借着自己美好的德行，感召而来的也都是贤良的臣子，还有人才；而桀的品行败坏，自然招致的也是那些德行缺失、奸诈狡猾的人与他为伍。

“富则观其所养”，当他富有后，观察他所供养、款待的是哪些人。一个人富有之后，供养的是父母和贫苦的读书人，那是贤德之人。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读书人，都有这样的志向，自己一旦富有之后要利益他人、造福国家。譬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心愿，就是希望有很多的房子，让天下有志气、贫穷的读书人都能够接受他的照顾，让他们好好读书，最后成就功名，为国家服务。

再譬如范仲淹，本来他买了苏州的南园想作为自己的住宅，但是听风水家说这个南园的风水非常好，后代会非常发达，他马上就把这个南园捐了出来，作为培养读书人的场所、作为学堂。后来确实培养出很多贤德的读书人，他们最后都得以做官，为国家服务。

在《大学》中说“仁者以财发身”，有仁德之心的人，他有了财富之后，会把财富捐献出来兴办教育，救济穷苦，结果不仅帮助了别人，也为自己赢得了好的名声、好的身份，受到大家的尊重。“不仁者以身发财”，没有仁德之心的人、没有智慧的人恰恰相反，他有了钱之后，就会过上奢侈淫逸的生活，结果不仅很快把钱财败散掉，还给自己招来身体的不健康，甚至身份、名声的败坏。譬如有些官员拿着自己的官位去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结果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败坏了自己的名声，锒铛入狱。这都是不明理的结果。

“听则观其所行”，这一句话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听一个人讲话，要观察他的言行是不是一致。像《论语》中也讲，“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第二种解释是，当他受到君主听信时，观察他的言行是否一致。如领导者很听信下属的话，那就要看看下属有没有得意忘形，有没有借着这个机会谋取自己的名利；还是领导愈是信任他，他愈是抓住这个机会成就领导的德行，推展利益于百姓的政策，后者就是行仁。

“近则观其所好”，这个“近”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你平常接近他，了解他的生活状况，观察他的喜好、嗜好；另一种是，他闲居在家的時候，观察他的嗜好是否正当合法。有些人喜好赌博、喝酒、女色，这样的嗜好迟早给自己招致祸患。在《群书治要·尚书》中就讲到，观察一个人他有没有发展前途，就看几件事情。“内作色荒”，对内兴起了迷恋女色之风；“外作禽荒”，对外喜欢打猎、游戏，没有节制；“甘酒嗜音”，喜好饮酒，沉溺于靡靡之音；“峻宇雕墙”，住的房屋又高又大，墙上还雕刻着花纹，雕梁画栋，可以说是极尽奢侈。“有一于此，未或弗亡”，以上几件事

情，只要有一件事做得太过分了，那就没有不灭亡的。

我们平时跟人聊天，要听一听他聊什么。“言为心声”，他若跟你聊吃喝玩乐，聊名车、名牌这些东西，肯定成不了大器。《论语》中孔子就教导我们，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还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个读书人志向在求道，但是还以自己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为耻，说明没有把心思完全放在求道上，还是很关注世间的名闻利养、吃喝玩乐等，那就不足与他多谈了。

“习则观其所言”。“习”，就是当他能够亲近君主时，观察他的言谈是否与正道相应。如果一个人没有去掉名利心，一旦跟领导者接近，他就会讲好听的、谄媚巴结的话，而不是引导领导者走在正道上。这种习气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出现，但这都是追名逐利的反映。

“穷则观其所不受”，当他困苦时，观察他是否对非分之财有所不受。对不义之财、非分之财，要见利思义。当利益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要想它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给我们也不能接受。在古代，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也知道财富有两种，一种叫吉财，一种叫凶财。吉财，就是我们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财富；而另一种财富，就是通过非法的手段，不道义的、不正当的形式获得的不义之财，它会为我们带来不尽的麻烦，甚至是凶灾。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就是因为他读书明理、深知因果，所以对于不义之财、非分之财都不敢去接受。

“贱则观其所不为”，当他处于卑贱时，观察他是否能对非义之事有所不为。一个人不爱慕虚荣，才能够做到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喜之以验其守”，使他喜悦，考验他能否保持操守。譬如一个人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能否做到如如不动。有好的名声、好的利益、很多的财富会令人高兴，拿这些东西去考验他，就可以看出他有没有操守。其实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自己，譬如，别人突然送给你一份很贵重的礼物，

面对这份礼物，自己是不是产生了欢喜心、贪爱心。如果欢喜心生起来了，就说明自己还有贪爱，操守不够。

“乐之以验其僻”，使他欢乐，也就是让他沉迷于声乐等欢乐的场合，检验他是否有邪念、恶行。在这些欢乐的场所，看看他能否守住自己的节操，不去做邪僻的事情。当然一般人没有定力，往往经受不住这些糖衣炮弹的考验。所以《弟子规》中教导我们说，“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我们知道自己的功夫不够，所以对这些邪僻的、欢乐的场合要懂得远离，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不受诱惑。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还可以让他欢乐，然后检验他。如果遇到欢乐的场合就浸淫里面而不能自拔，那就说明这个人的定力、修养功夫还很差。很多领导干部就是在欢乐场中慢慢地走向了邪僻，养成了一些不良的习气，结果习惯成自然，这些不好的习气一旦沾染，再想改正也就非常困难。

“怒之以验其节”，使他发怒，检验他能否节制心中的怒气。这个“节”也有“性”的意思，也就是让他生气，看看他的性情如何、气度如何。在古代，很多有智慧的老师在考验学生的时候，都会故意用一些不好的态度来对待他，看他能不能忍受。如果他不能忍受离开了，就说明这个人没有悉心栽培的必要，因为气量狭窄的人，前途必定不会远大。

“惧之以验其特”，使他恐惧，观察他如何独自应对而不害怕。这个“特”就是“独”的意思，让他独自去面对，看看他有没有畏惧之心，不够坦荡。

“哀之以验其仁”，使他哀伤，或者告诉他一些哀痛的事情，让他处于哀痛的状态，检验他是否心存仁慈，看看他有没有同情之心、仁爱之心。

在《群书治要·韩子》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孟孙外出打猎，捕到了一只幼鹿，就让秦西巴把它带回去。但是这个幼鹿的母亲一直跟在后面啼叫着，久久不肯离去。秦西巴看了之后不忍心，就把幼鹿还给了这只母鹿。孟孙听说秦西巴居然把他捕到的猎物给放了回去，非常生气，就把他

逐出国。但是没过三个月，孟孙又把他召了回来，让他当自己儿子的师父。孟孙的车夫就问：“您以前怪罪秦西巴，把他驱逐了，现在又让他来担任您儿子的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孟孙说：“秦西巴都不忍心伤害一只幼鹿，又怎么忍心伤害我的儿子？”所以古人都是看一个人的存心，这不仅要就事论事，看他的行为，事情办得怎么样，还要从这件事上观察这个人的存心。

“苦之以验其志”，使他困苦，考验他的意志是否坚强。让他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受磨炼，看看他是否有意志能够坚持，这也能检验一个人的意志够不够坚强。所以修学，特别是提升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能够吃苦才行。如果吃不了苦，就不能够真正提升自己。所以要让自己接受苦难的磨砺，这样才能够磨炼自己的意志。

“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以上这8项观察、6项检验，是贤主用来衡量人才的方法。怎样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人才？怎样考验人才、衡量人才？通过这“八观六验”，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人才了。

“论人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衡量一个人，还要依靠父亲、母亲、兄长、弟弟、妻子、子女这六种非常亲密的亲属关系。也就是说，你要向一个人委以重任的时候，首先要向他的父母了解一下这个儿子对父母够不够孝敬。如果这个儿子在家不能孝敬父母，对父母没有恭敬心，那么在外对领导也肯定不能尽忠，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什么？因为孝子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不会轻易做出忘恩负义、见利忘义的事。其次还要向他的兄弟了解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够尊敬兄长，帮助弟弟、妹妹。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最亲近的兄弟姐妹都不能够给予帮助，他对朋友也好不到哪去。最后还要问一问他最亲近的妻子、儿女，因为他们整日与他生活在一起，对他的生活习惯、毛病习气、缺点是最了解的。我们经常说家人难以感化，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外面可以伪装得很好，但是在家里、在亲近的人面前，这些毛

病习惯会暴露无遗，这些恰恰是家里人最为了解的。所以家人难以感化，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让家人真正地信服，没有做出能够感动他们、令他们佩服的事。

我们经常提到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大舜的故事。大舜的后母、兄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他都没有想着去打击报复，没有任何怨恨之心，反而总是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最后他终于用实际行动感化了他的后母、他的兄弟。我们经常提到大舜，就是要用大舜的例子来对照、反省自己。想一想，我们的身边有没有像大舜后母及兄弟这样三番五次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如果没有，说明我们很幸运，没有遇到这样的恶人。但是如果有，我们就要好好反省自己，倘若我们做好了，却还不能够感化他们，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我们的“德未修，感未至”，自己的德行、修养还不够，不能够感化身边的人，让他们心悦诚服。

从上面讲述中可以看出，古人特别有智慧，知道可以通过这6种最亲密的亲属关系来考察一个人。

“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廊”。“四隐”，就是四种隐恶扬善的、可以信任的关系。第一，“交友”，就是他现在所交的朋友。第二，“故旧”，就是他以前所交的朋友。第三，“邑里”，就是指他的同乡、邻居，等等。第四，“门廊”，也就是他的亲信。显然，这四种人对他的过去、现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

“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以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羨美，无所失矣，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考察一个人，在内就以“六戚四隐”为标准，在外就用“八观六验”的方法，如此一来，这个人的真诚虚伪、贪婪粗鄙、善恶品性，就一览无遗了。“羨美”，批注上说作美恶讲，也就是他的善恶等方面的品性都能够被人一览无遗。这就是古圣先王辨识人才的精辟方法。

##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景公问求贤。晏子对曰：“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以此数物者取人，其可乎！”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通则视其所举”，当一个人通达、得志时，看看他举荐的是什么人，是贤德之人，还是结党营私的人？是任人唯亲，任用自己的亲属，还是任人唯贤，任用有贤能的人？这体现了一个人是公心，还是私心。

“穷则视其所不为”，在一个人穷困潦倒时，看他不去做的事。中国古人常说“人穷志不短”，虽然一个人很贫穷，但是不符合道义的事他仍然不会去做。

“富则视其所分”，当一个人富裕的时候，看他是不是会与人分享，惠施财富。像孔子也说，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华，但是既骄傲又吝啬，其余的方面就不值一提了。一个人富裕了，不仅不吝啬，而且还惠施财富，这就为其可取之处。惠施财富有什么好处？财布施得财富，千金散去还复来，自己的财富不仅不会匮乏，反而会越来越多。《大学》中说“财散则民聚”，你把钱财散出去了，赢得的就是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得道者多助”。赢得民心你就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

“贫则视其所不取”，一个人在很贫穷的时候，看他能否不苟取。范仲淹小的时候家境非常贫寒。他每天煮一锅稀饭，冬天冷的时候，稀饭凝结成块，他把这一锅稀饭划成四个格子，每顿饭只能就着咸菜，吃两格子的稀饭。有一天，他在寺院里读书，偶然发现一坛金子。在常人看来，他生活俭朴、非常贫穷，这坛金子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但是范仲淹看到金子后，知道不属于自己，所以马上又埋了回去。后来他去参加科举，做了宰

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天，寺院的方丈要修建寺院，就来向他化缘，这时范仲淹就告诉方丈：“其实你们寺院里就有足够的财宝。”接着把埋金子的地方告诉了方丈。方丈回来一找，果然找到。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范仲淹虽然家境贫寒，但是他能够做到不苟取、不苟得，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可取之人。

“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我们考察一个人是不是贤德之人，可以从三个等级来看。上等的贤士，不贪图禄位而一心向着道义，既难于出仕，又容易引退。就像诸葛亮一样，如果没有道义的君主去请他，他不会出来做官。如果君主有道义但不以礼敬的态度请他，他也不会出来做官。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想着的是弘扬道义，而不是贪图禄位，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出来做官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所学所能贡献给天下，使社会和谐、人心安定，而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君主不贤明，认识不到他的贤德，他即使出来做官，对君主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他难于出仕，难于进朝为官。纵使被举荐了，他也容易退下来，因为他并不贪图荣华富贵。

次一等的人，“易进而易退也”。次一等的人，他虽然心里想得到禄位，但却不肯弃道德，所以他容易出来做官，但是也容易引退。

最下等的人，“易进而难退也”。下等的人为了禄位，甚至不惜背弃道义，所以他们急于出仕却难以引退。他很容易去进朝为官，但是要让他从位子上退下来可就难了，你要满足他很多条件，因为这种人私心很重。

现在我们选拔人才选用竞争上岗的方式，殊不知这种方式，恰恰会把最上等的人才遗漏掉。最上等的人才，像诸葛亮、颜回等，领导必须有恭敬之心去礼请，他才愿意出来。

“以此数物者取人，其可乎”，如果能用这几种标准去考核选拔人才，应该就可以达到选贤举能的目的了。

## 居视其所亲，达视其所举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  
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群书治要》卷十一《史记上》

这段话出自一个典故。有一次，魏文侯对李克（也有地方叫李悝，他在魏国实行变法，使魏国强大起来）说：“先生曾经教导寡人，家贫就要想得贤妻，国乱就要想得贤相。如今要安排宰相，而宰相的人选不是成子就是翟璜，你看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这几句话“居视其所亲”，平时看他所亲近的是哪些人；“富视其所与”，富裕时看他所交往或施予的是哪些人；“达视其所举”，显达时看他所推举的是哪些人；“穷视其所不为”，穷困时看他不愿做的事情；“贫视其所不取”，贫贱时看他是否不苟取。这五点就足以确定宰相的人选了。魏文侯听了之后就说：“先生请回，宰相人选已经确定好了。”

李克快步走出去，到翟璜家拜访。翟璜就问：“今天听说君主召见先生去选择宰相，结果是谁当宰相？”李克说：“魏成子当宰相了。”翟璜一听就气得变了脸色，他说：“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他还举了几个例子，“西河的守将是我推荐的；君主对内最忧虑的是邺郡，而我又推荐了西门豹；君主要计划攻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国攻灭以后，派不出人去镇守，我又推荐了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师父，我推荐了屈侯鲋。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李克听了之后说：“您向君主推荐我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来谋求做大官吗？君主询问安排宰相时说：‘不是成子就是翟璜，你看这两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这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缘故。平时看他亲近哪些人，显贵时看他推举哪些人，不得志时看他不做哪些事，穷困时看他不愿做哪些事情，贫苦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有这五条

就足以能决定了，何需问我李克？’因此我知道魏成子要做宰相了。魏成子有千钟的俸禄，但是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只有十分之一用在自己家里，他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都把他们奉为老师。而您所推荐的五个人，君主都任他们为臣。您怎么能够和魏成子相比？”翟璜也是一个明理之人，迟疑之后，再拜说：“我翟璜是一个浅薄的人，说话很不得当，我愿意终身做您的弟子。”李克告诉魏文侯这五条标准来确定宰相的人选，确实是不徇私情、以理服人。

“居视其所亲”，平时看他所亲近的人。亲近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对选官这么重要？在《吕氏春秋》中记载，楚国有一个善于看相的人，看了很多人，没有一个看错的。楚庄王就向他请教其中的奥妙。他说：“我并不是会给人看相，只不过是善于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是怎样的。如果这个人是平民百姓，他所结交的朋友都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长辈、醇厚善良、行为谨慎、畏惧法律，这样的人，他的家庭会一天比一天过得好，身心会一天比一天安定，这样的人就被称为吉人。如果这个人是侍奉君主的臣子，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诚实守信、喜好品行和善德的，这样的人，他侍奉君主会一天比一天侍奉得好，官职也会一天比一天高升，这样的臣子就被称为吉臣。如果这个人是君主，他的朝臣都是贤德之士，左右侍奉的人都能够竭忠尽志，他一旦犯有过失，这些群臣都能够犯颜直谏，为他指正，这样的君主，他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安定，他自己会一天比一天受人尊敬，天下的百姓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悦诚服，这样的君主就被称为吉主。

看相的人只是观察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就能够断定出他的前途命运。这说明我们平时和哪些人亲近交往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能不谨慎。

在《群书治要·墨子》中，说明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墨子看了染丝的过程之后，就感叹地说：“洁白的丝，放进青色的颜料里

进行洗染，它就变成青色；放进黄色的染料里洗染，拿出来就变成黄色。如果投入的颜料有变化，洗出来的丝，它的颜色也会跟着变化。白丝放进5种不同颜色的颜料里，它就会变成5种不同的颜色。所以对于所浸染的人事物环境，不能够不谨慎。”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墨子通过看到染丝的过程给予人启示，告诉我们所结交的朋友，还有自己所处的环境，对一个人有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影响，提醒我们要“亲君子，远小人”，要交往那些对自己的德行提升有帮助的朋友。

## 八征观人，辨识贤才

一曰，微察问之以言，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贪。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

“一曰，微察问之以言，观其辞”，向他提出问题，观察他的言辞是否条理分明。就像现在的考试，除了笔试之外还有面试。因为现在笔试作弊的方法有很多，也很隐蔽，但是面试的时候却不能够作弊。你向他提问，就可看出他的回答是否有逻辑性、条理分明、思路清晰，以及他的知识面是否广博、对问题认识得是否透彻等。

“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要向他追问到底，观察他的应变能力如何。有的人可能是就书本上的问题准备得很充分，你问他，他也能够回答得上来，但是他的应变能力可能就比较差。

“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间谍”就是要秘密侦察刺探，也就

是要暗中调查，观察他是否忠贞不二。

“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就明显之事而故意询问，明确直接地提问，看看他的回答是否有隐瞒或者夸张之处，借以观察他的品德如何。

“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贪”，“贪”也作“廉”，就是让他支配财物，观察他是否廉洁，有没有贪心。

“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要用女色来试探他，观察他的节操如何。

可见，古人在任用一个人的时候，考察得非常全面，包括他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能否把持得住自己，都要进行预先的考察，然后才能够委以重任。

“七曰，告之以难，观其勇”，要把危难的情形告诉他，或者告诉他这件事很困难、不容易做成，观察他是否勇敢，是不是有勇气敢于承担。

“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让他喝醉酒，观察他的酒品如何。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平时都是温文尔雅，说话有条不紊，但是喝了几杯酒之后，可能就失去了领导的威仪，有失分寸便会令人对他生不起恭敬之心。所以有人说戒酒最好的办法，就是喝酒的时候自己不要喝醉，在清醒的时候，看看那些喝醉人的丑态，这样就知道自己喝醉酒之后是什么样的了，这样就很容易把酒戒掉。在《群书治要》最后一卷《抱朴子》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讲醉酒的过失，而且讲到为什么人人人都知道喝酒有这么多的过患，但是却不能够戒掉它，分析得非常到位。

“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把这8种检验的方法都用上了，一个人的贤明或者不肖就能够分辨出来了。

##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

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这段话前面还有一些话，“君人者，将和众定民，而殊其善恶，以通天下之志者也，闻言不可不审也。”当国君的人要和睦众人、安定民众，而且要分辨善恶，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所以听到言论，不可以不审慎。“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如果领导者听了他人的言论，没有审慎地去考察，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下结论，并且以此来确定是非善恶美丑，就会导致错误的判断，由此还会导致喜欢说不实言论的风气愈来愈盛行。譬如有的领导者，喜欢听小报告，也不去考虑或者调查这个打小报告的人用心如何，他所说的话对别人的针砭是否与事实相符，就信以为真，而且还用这个结论去确定是非善恶，往往就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冤枉好人，从而也会导致喜欢说不实言论的风气盛行。因为领导者偏听偏信，听信一个人的言语就下结论，而不去考察实情，那么能言善辩、花言巧语的风气就会兴起。“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所以听一个人的言语，不如观察他做事，观察他做事，还不如观察他的行为。

“听言不如观事”，在《群书治要·论语》中有很多关于言语的阐述，譬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人花言巧语，致力于言语的好听，伪装出和善的面孔，一味地去取悦别人，就很少有仁德之心。正是因为一个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要因为一个人说得很好听，就给他委以重任。《论语》中说：“有言者，不必有德。”一个人的言语很好听，但是他不一定有真实的德行。所以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在《群书治要·中论》中也有一段关于言语的精辟阐述：“夫利口者，

心足以见小数，言足以尽巧辞，给足以应切问，难足以断俗疑，然而好说不倦，喋喋如也。”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心智足以洞察到细小的环节；他的言辞非常巧妙，很注重修饰；他伶牙俐齿，足以应对急切的追问；他的反驳足以让世俗人断定疑惑。但是这类人好说不倦，喋喋不休。“夫类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暗不达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在世间，由于能够按类归纳推理、分辨事物的人很少，而愚钝、不通达、被蒙蔽的人却很多，那么谁知道他所说的是非真伪？由于他的口才很好，加之又有一些名声、头衔，一些世俗之人就会非常相信他所讲的话，但是他所讲的可能是有违大道的。“此其所以无用而不见废也，至贱而不见遗也”，这就是他之所以没有什么用处，但又不被废弃；很低贱，却不被遗弃的原因。

《傅子》中还说：“上好德则下修行，上好言则下饰辩。”如果在位的君主喜欢德行，属下就会纷纷去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如果在位的君主喜欢言谈，下边的人就会争相修饰自己的言辞，朝着能言善辩的方向发展。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修行则仁义兴焉，饰辩则大伪起焉”，人人都重视修养品行，天下的仁义之风就会兴起来；而如果人人都去学能言善辩，虚伪的风气就会盛行，这是必然的征兆。

“德者，难成而难见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德行修养很难成就，也很难被发现、被看见，而言语则很容易被撰写，也很容易取悦于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众，故不尚焉”，古圣先王都知道言语说起来很容易，而且爱听好话的人很多，所以并不崇尚言谈。“不尊贤尚德，举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则天下之弃德饰辩以要其上者不斲矣。”如果我们不尊敬贤能的人，不重视有德行的人，不通过引导人们向善来教化百姓，却只以说得好听来取悦人，那么天下背弃道德，追求言辞修饰、追求能言善辩，来要求他们君主给予封赏的人就不会少了。

“德难为而言易饰也”，德行很难修养、很难成就，但是言语却很容易修饰。譬如我们要克服自己的一个习气，可能花上10年、20年的工夫，

还不能完全把它改正。这就说明德行的修养是很难成就的。但是要练就一副好口才，有演讲的能力，却是件容易的事，当然这是相对于德行的修养而言。这告诉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言语说得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这就是所谓的“听言不如观事”，不仅要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的事情到底办得如何，“观事”，就是要看他具体所做的事情。

在《群书治要·新序》中记载了一个“观事”的故事。子路治理蒲县三年，孔子路过这个地方，刚进入蒲县县境，就说：“子路治理得不错，能够恭敬、诚信。”到了城镇，他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他能够尽忠职守，与民讲求信用，而且宽容对待百姓。”到了县衙，就是办公的场所，孔子又说：“子路治理得不错，他能够明察秋毫以审断案件。”子贡听了之后，手扶着马缰就问：“夫子还没有看见子路，就三次称叹子路治理得不错，理由是什么？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孔子说：“我刚进蒲县县境的时候，看到荒地都得以开垦，田野修治得很整齐，沟渠都挖得很深，这是因为他恭敬而诚实，所以民众才愿意尽心尽力地耕种田地。到了城镇，看到房屋的墙都筑得很高大，树木长得很茂盛，这是因为他对待民众忠信而宽厚，所以人民做事就不敢苟且。到了县衙，发现衙门非常清闲，这是因为他平时判案能够明察善断，所以人民就不会轻易来申诉打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通过一个人所做的事，就可以观察出一个人的恭敬心。因为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从中体察到做事者的态度，只要仔细去观察，都可以观察得出来。例如，《弟子规》中说：“字不敬，心先病。”当我们自己的心不恭敬的时候，写字就会潦草。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份清朝状元的考卷，我打开一看，非常惊叹。因为这位状元所写的考卷是一笔一画，全是小楷字，没有丝毫潦草。乍看起来，就像现在字帖上的字一样，大小匀称、整齐，笔画都非常清楚。对比现在人所写的字，就知道现在人心浮气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相比较而言，我们也体会到古人的心确实非常清净。这就是“听言不如观事”。

“观事不如观行”，观察一个人所做的事，不如观察他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品行。

阿谀奉承的臣子的所作所为虽然一时讨君主喜欢，但是却对君主的德行修养没有帮助。而那些常以道义规劝君主的臣子，虽然不讨君主喜欢，但却对君主修身治国很有帮助。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来说，也要和那些能够以道义规劝我们走人之正道的人相处。这就是“观事不如观行”。

“听言必审其本”，听一个人的言论，还要去审察他说话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话用心何在。“观事必校其实”，不仅仅要观察他所做的事情，还要核查它是否符合事实、是否真实可信。“观行必考其迹”，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还要考察他这样做的原因。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参考察，才会避免仅仅凭言语而选人、用人的弊端。

## 虚心下听，因人致人

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过去的君主都知道身处高位选拔人才的困难，所以会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君主知道身处下位的人与一般人来往容易，所以凭借他人来感召人才。

上面这段引文的后面紧接着举了两个例子。“舜之举咎陶难，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汤之举伊尹难，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舜举荐咎陶的时候，要能够发现他，把他举荐出来，这的确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得了咎陶之后，再通过他来招致天下的贤德之士就比较容易了。同样，商汤举荐伊尹，发现这样一个人才也很难。但是得到伊尹之后，通过他来招致更多

的贤士就很容易了。

“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举荐一个人，对他非常信任、言听计从，这是称王天下之道。如果举荐两个人，分别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建议，因为对他们不能够完全信任，还有所怀疑，这只是称霸天下之道。如果举荐了三个人，听取他们各自的意见，最后可能就是三岔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那仅仅是保持自己不灭亡之道。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要对人才委以重任，用而不疑，才能够取得最佳的成就。

## 公生明，偏生暗

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

——《群书治要》卷三十《晋书下》

在了解和推荐人才的过程中，如果听任自己的好恶，就有不能明察人才的弊端，如果仅仅听从接受外来的信息，则容易造成彼此认知上的偏差。对认识的人，以自己印象的好坏，而不能客观公平地对待；对不认识的人，容易因为人情关系而扰乱原有的制度。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的人我们可能一见如故，特别投机。但是愈是这种情况愈是要冷静，因为我们愈不容易看清对方的状况，愈不容易作出客观的判断。有一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人凭着自己的好恶观察一个人，往往都是感情用事，不能作出客观的判断，很容易出错。

《大学》中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为什么“莫知其子之恶”？因为常人往往都特别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怎么看怎么好。又

因为自己每天都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所以即便孩子身上有明显的过恶，做父母的也都看不清楚。为什么不知道自己家的禾苗已经长得很硕大了？因为有贪心。可见，爱心、贪心都会把人的智慧蒙蔽，让人不能作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大学》中又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喜欢一个人，同时能够看到他的缺点、过恶；厌恶一个人，同时能够看到他的优点、特长，这样的人在天下来说都是比较少的。所以你喜欢一个人，你看他能够看得很准吗？你讨厌一个人，你看他能够看得准吗？都不准。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观察一个人，要用一段时间，通过他对父母、家人、同事、领导的态度来观察，看他是不是人前人后，领导前后，都是一样的恭敬、真诚，这样才能看得准。

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投缘的人、不喜欢的人，因为怀有厌恶之心，就往往盯着对方不好的一面，还把这种厌恶，自己眼里的不好又讲给别人听，这就造成了更多的对立和成见，也会给自己的修身、一个团队的和谐带来很大的影响。修行是修正自己的错误言行，而不是抓着别人的不是。所以首先要求自己把对立之心放下，不跟一切人对立，没有成见。

“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培养起这种品质。我们常说“仁者无敌”，并不是说仁者能够战无不胜，而是指真正的仁者能够做到没有一个我恨的人，没有一个我不能原谅的人，甚至没有一个我不爱的人。孔子说“仁者爱人”，一个有仁爱心的，处处都会关爱别人。我们学习经典，也就是要向仁者学习、向圣贤学习，学习他们仁慈博爱的精神。

这里讲“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如果任由感情用事，从自己的喜爱偏好出发来评价人才，那一定就会有一些弊端。“听受则有彼此之偏”，听到并接受了外来的一些说法和信息，可能就会造成彼此认知上的偏差。所以在听受的时候，要保持冷静，观察讲话人的存心和态度，这样才能够客观

评判一个人。“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对所认识的人，往往凭着自己对他的印象、感觉来判断，这样就容易失去公平，有失客观。“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对于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往往会容易因为人情，而扰乱本有的制度。譬如，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来托关系、走后门、讲人情，我们如果听了这些人的介绍，或者是凭着自己和他关系的远近来任用人才，那就会以私废公，这就导致了“以人事乱其度”。所以一个人要保持一颗公心确实很不容易，要把这些人情关系都处理得很适当，既不能以私废公，也不能不符合人情事理，这都需要在具体的事情中灵活把握。

## 第七十二讲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 君子易事而难悦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在通行本的《论语》中，“悦”字写作“说”。“说”字，古注与“悦”相通。所以古代的注解认为，一种含义是喜悦，另外一种含义就是说话的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容易侍奉而难以取悦，因为不合道理的取悦君子，君子是不悦的，所以“难悦”。譬如，你去给君子送礼、行贿，虽然是给他送礼，但是他不会认同此类行为。至于君子用人，则要衡量其能力而使他发挥特长，不求全责备，所以容易侍奉。而小人恰恰相反，容易取悦却难以侍奉，因为取悦小人虽不合道理，但小人会喜悦，所以说是“易悦”。至于小人用人，则是求全责备，因此很难侍奉。

清初文人毛西河认为，汉儒对“说”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言说的说，并且进行了引证。“君子厚重缄默，不轻说人长短。苟于义分不宜说，有相对终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测。而使人平易，绝无苛求。小人相对喋喋然，议论蠹发，非义分所当说亦说之。而一经使人，便苛求不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一般都很厚道、稳重，所以沉默寡言，不轻易说人的长短。像《弟子规》中就说：“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君子不议论别人的是非，所以显得沉默寡言。在《周易》中也有说：“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言语比较少。如果是符合道义不应该说的，他不会讲张家长、李家短，不会说不符合道义的话。他在用人的时候，平易近人，没有苛刻的要求。小人则与此相反，小人经常喋喋不休，发很多议论；不符合道义或者不是他的本分责任所应该说的，他仍然去说、发表议论。一旦当他用人的时候，就求全责备、非常苛刻。这里就把“说”当作言说的意思。

这段话说明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办事容易、不琐碎，办好了，他会夸赞你，即使办不好，他也能够体谅你，所以君子易事，但是难悦，君子说话难，难在何处？如果你说的都是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话，都不可靠，君子虽不爱听、不会高兴，但是可以就事说事，一件事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会一言定终生；也不会随便说人一些不符合道义的零碎小事。在用人的时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能力，君子就让他做什么事，做完就行了。若是下属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不再主动做别的事，君子也不会责备他。这说明君子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是量才使用，而且不求全责备、非常宽容。

“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小人恰恰相反，与他共同办事很难，因为他求全责备，必须寻找全才，可全才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小人很难共事，却易说，见面不是张家长就是李家短，都是说是非，所以不听也罢。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你喜欢听别人说是非，那你就会对那个人抱有成见，往往可能把好人看成了坏人，把坏人看成了好人。而且使用人不可以求全责备，只要他把本分的职务做到应做的，就算是好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近代大德李炳南老先生建议，在讲解此句的时候，这里的“说”字，

可以两种意思并存，但是读的时候要读作“yuè”。

## 自私自利导致患得患失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鄙夫”是既没有知识学问、所见不广，又没有德行、贪图名利、行为卑鄙的人。在这里孔子先提疑问，“鄙夫可与事君也哉？”“事君”，就是指可以出来侍奉君主、侍奉元首，做大官。“也哉？”可以吗？可以出来替国家办事吗？

我们一定要明白读书是为了什么。古人说，读书志在圣贤。在古代，读书的目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社会、国家、人民办事。只要是读过书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不会办事只知道读书，就变成书呆子了。所以读书明理，志在办事。将要走上社会的人都要先问问自己，有德才吗？愿意为人民牺牲一切吗？如果既有德才，又有愿意为天下人服务的精神，那么就可以出来兼济天下。如果只是有钱，或者出来办事只是为了钱、为了一己私利，那就会误尽苍生。

如果当老师的一心只为赚钱，那就不会像以往那么受人尊敬了。在中国传统社会，老师特别受人尊重，因为当他看到学生家境很贫寒，交不起学费，但是非常刻苦，也有服务天下的用心，那么就愿意教导他，甚至不收他的学费，还会贴补他的生活费用。所以老师志在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即使自己没有多少财富，但是仍备受社会大众的尊重。如果当老师是为了谋取财富而去教书，就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然也就不像以往那么受大众尊重了。

与教师相类似的职业，还有医生。古代的医生只要听到有人敲门，即使夜半三更，也会立刻起身，出门看病。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询问这个病人家境如何，也不是有多少钱可以赚，而是不能耽误病人的病情。治疗后，如果得知病人家境贫寒，付不起医药费，他就不仅不会收，甚至还会免费给一些药。正因为医生是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之目的，所以也备受社会大众的尊重。

如果官员、教师、医生出来做事的目的只是为了钱，那么这个社会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孟子》中有一句话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做事情不能唯利是图。

孔子提出“鄙夫可与事君也哉”？这个问题之后就进行了解答，这种人不可以事君。皇侃的注疏说：“凡鄙之人不可与之事君。”意思是说，不可与鄙夫共同事君。这是一种解法。另一种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解释，他把“可与”的“与”字解释为“以”，并且进行了引证。意思就是，没有道德品行的人确实不可以从事政治。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的批注说：“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这种类似的说法，譬如韩愈的“敢将衰朽惜残年”，“敢”是“不敢”的意思。鄙夫为得到名位利禄而做事，尚未得到的时候唯恐得不到，就会为了求得财色名利而不择手段。“既得之，患失之”，得到了名位利禄之后，他又恐怕失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郑康成的批注说：“无所不至者，言其邪媚，无所不为。”患得患失，终日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这种人就是鄙夫，他做事的目的是贪图个人名利，在未得到名利的时候，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只要能有所得，不论来路明与不明，不论手段合不合道义，他都一概不管，甚至杀人放火、奸盗邪淫都可以干。得到了这些财色名利之后，又会想尽方法保证不丢失。试想一下，这种人可以为国家办事吗？有意要从政的人可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从政动机。

“既得之，患失之”，这种患得患失的心为什么会产生？这是因为起

心动念考虑的都是自己的私利，试问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福国利民？所以古人教导人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获得或利益出现在面前的时候，首先要想它符合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那是万万不能得的。

##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服”是信服、佩服的意思。“直”指公平正直的人。“枉”是邪曲不正的人。鲁哀公来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使百姓信服，怎样做才能够让人民对国君心服口服、拥戴国君？鲁哀公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当时的鲁国长期以来由孟孙氏、季孙氏还有叔孙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鲁国的国君实际是名存实亡。这个时候鲁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讲的是“举错之道”。

“举直错诸枉”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东汉包咸的批注，他说：“‘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也就是说，举荐正直之人并且任用他，而舍置邪枉自私之人，人们都能得到利益，这样自然会心悦诚服拥戴国君。相反，如果举用的都是邪曲不正、自私自利之人，而舍置了正直之人，人们深受其害，就会不服。这是一般的解释。这种解释告诉我们要举用正直之人，而不能用自私自利、邪曲不正的人，要彻底把邪曲不正的人废置不用。

另一种解释，这个“错诸”的“诸”是“之于”二字的合音字，“诸”的意思就是“之于”。譬如，我们说“反求诸己”，就是反求之于自己。所以“错诸”就是置之于、放置在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正直之人

举荐出来，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也就是说，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来控制他、引导他、教育他，这样才不会对百姓造成大的危害。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举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认为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这时人民仍然还是心悦诚服的；相反，如果把邪曲不正的人举荐出来，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那么人民就会不服。意思是说，仍然要用小人，但是要把他放置在君子之下，让他受制于在上的君子，不能随意作恶，这样人民不会受到他的伤害，所以也会心悦诚服。这种讲法深得近代宿儒李炳南老先生的认可，他在《论语讲要》中认为，这种讲法与孔子所提出的“尊贤而容众”的意思相合，就是既要尊重推崇贤德的人，同时对于小人也不能够完全舍弃，应该去宽容、引导、教育他。

我们把这句话和《论语·颜渊》篇中“樊迟问仁”这段对话结合起来理解，意思就更加明了了。《论语·颜渊》中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来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了两个字，“爱人”。爱什么人？当然是爱一切人，即使是小人、邪曲不正的人也包括在其中，但是爱的方式不一样，要引导小人、教育小人，也要把他放置在正人君子之下。“问知”，什么是智？孔子也回答了两个字，“知人”。正如《老子》上所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樊迟未达”，樊迟没有明白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孔子就为他进一步解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你把正直的人、正人君子举荐出来，放置在小人之上，使这个小入受制于君子，这个时候小人也会受到君子的教导和影响，潜移默化地逐渐变成君子，这就叫“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说明，也不能完全舍弃小人不用，只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让他接受君子的教诲和引导，仍然是可以教得好的。正如《三字经》开篇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所以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受了圣贤教诲的人，而另一个是没有受到良好的圣贤教诲熏陶的人。没有接受圣贤教诲的人在受到社会不良环境影响时，久而久之就会把自己本有的善性给蒙蔽，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们做学问、提高德行的方法和途径，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是丢失了的心找回来罢了。正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们要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这种信心。

“举直错诸枉”，这句话之所以意义重大，就是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在上位者的德行像风一样，在下位者、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样。“草上之风，必偃”，风向哪边吹，草自然就向哪边倒。所以举直，把公平正直的人举荐出来做领导，这是使国家得以治理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现代社会能够引导国家和社会走向的，不仅有从政的领导者，还包括各种媒体的领导者。特别是现在网络、电视、媒体、广播都非常发达，如果我们的导演、制片人、记者、主持人等都是正直的人，他们制作、播放的内容自然会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主要内容。传播正能量，社会大众也自然会受到好的影响，这个时候社会就会变得风清气正。相反，如果这些导演、制片人、主持人、记者等，都唯利是图，做节目选内容都以收视率的高低为标准、以能赚多少钱为标准，那很可能把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吸引眼球的粗俗内容搬上荧屏，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变得乌烟瘴气。所以媒体行业工作者，特别应该选用那些正直无私的人，这样才能引领社会走向正路。

“直”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正直之人？“直”，首先要以孝、廉为前提。在《论语》中记载，叶公来见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直人，这个直人叫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别人家的羊跑到他们家来，他就把这只羊占为己有了），结果他的儿子，就去作证自己的父亲盗了别人家的羊”。由此叶公认为这个儿子是一个直人，但是孔子

听了之后却说：“我们乡里的直人与此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个直就在父子互为隐瞒之中。”所以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因为父子有亲，是一种自然的亲情，是一种人之常情，父子之伦也被称为天伦，所谓天伦不是人为制定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伦常大道。仁爱之心从哪里培养起来？仁爱之心的原点就是对父母的孝敬，所以仁爱之心是从对父母的爱心培养起来的。正如曾子所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躬去证明自己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这件事情表面看起来是正直的，但是实际上却违背了天伦之理，所以其中必然有诈，实在是不可取。而父子互相隐瞒，这是一种天然的人之常情，出于天然的人伦大道。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看起来好像不正直，但是它的道理却是非常正直的。父子有亲是人的自然天性，只有顺着人的天性去教导，才能够把人教导好，这才是合情合理的教育。

由此可见，古人在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同时考虑三个因素，那就是是否合情、合理、合法，不仅仅要符合法律，还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这样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法律背后的精神应该是天然的人伦之道。也就是说，法律的设置，都应该以帮助人达到父子有亲为目的，而非引导父子反目成仇。所以“直”要以“孝”为前提，如果父子不相隐讳就会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当然，并不是说父亲做这样的事，儿子就可以怂恿、包庇他，而是说父亲做了这样的事，虽然错了，儿子有劝谏的义务，但是去揭发他、指正他的那个人不应该是儿子，因为这有损父子之亲。这就是讲“孝”是“直”的前提。

刚才我们讲到“直”还要以“廉”为前提，这个“廉”就是指廉正、刚直不阿，所以“直”还有刚直的意思。在古代，开明的皇帝都喜欢任用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这样才能够使法律严明，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直”还有忠直的意思，所以能够犯颜直谏的人也被称为直人。在

《吕氏春秋》中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这句话是说贤明的君主最看重的不是金银财富、土地，等等，而是贤士。他之所以看重这些贤德的人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贤才能够犯颜直谏，当他们看到国家或管理团队出问题了，就会及时向上级领导者通报，甚至不惜个人安危。

在《汉书》中就有个直谏君主的故事。周昌，西汉初期大臣，沛县人，和汉高帝刘邦是同乡，汉高帝在位时任御史大夫，周昌为人坚忍而有毅力，敢于直言，即便像萧何、曹参这样的人在这些方面都比不上他。有一次，周昌在汉高帝休息的时候进宫禀报事情，恰逢汉高帝搂着戚夫人，周昌看到之后转身就跑，汉高帝就追过去把他抓住，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昌昂着头说：“陛下是像桀纣一样的君主。”汉高帝笑了，但是从此以后更加畏惧周昌。到了汉高帝想要废掉太子的时候，群臣都来劝谏，汉高帝都没有听从。周昌在朝廷上争辩得最厉害，汉高帝就问：“为什么不能废掉太子？”周昌有口吃的毛病，情急之下就说：“我嘴上说不出来，可是我心里知道这不行，陛下要废除太子，臣肯定是不能听从命令的。”后来这个故事就被称为“周昌期期敢直言”。他的这种表现也让汉高帝欣然而笑，从而打消了废除太子的打算，太子的地位也得以稳固。

所以古代的忠臣为了能够把实情告诉皇帝，使皇帝改变错误的做法，甚至不惜犯颜直谏，他们并非不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是在他们看来，以道事君更重要，这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没有自私自利。这就是忠直之人。

还有一种“直”，是正直。怎样才能做到正直？只有学道才能做到。《吕氏春秋》中说，君主都希望有忠臣，父亲都希望有孝子，作为臣子的也都希望能够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君主得不到忠臣、父亲得不到孝子、臣子得不到高官厚

禄（臣子往往半途而废，锒铛入狱）？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礼义，而不知礼义的原因是没有教导，没有人教导所以才不知道礼义。所以古人特别尊崇讲道之人，重视那些宣讲道德礼义的人，尊师才能重道。

古人重德不重财，现在人重财不重德。如果社会能够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到电视台、广播等媒体，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民众都在学习，整个社会就会兴起尊崇道德之风。历史上新朝创立后，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把社会从乱世变成治世，其原因就在于有礼乐的教育，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我们要善于向古人学习，特别是要懂得利用现代发达的网络、广播、电视、媒体等工具，来宣讲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以上这几个标准都是提醒领导者在选人、用人的时候，应该怎样去选人，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人。

虽然“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道理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上行而下效。但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举直”却这么难？为什么正直的人往往不受重用？“难”，究竟难在何处？

第一个原因，领导者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没有知人之明，他很可能被那些看似善良、看似有德、看似忠正的人被蒙蔽了。因为有些人很会说话，话说得很好听，但是做起事来却和他说的不一致，这就是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其实很多特别能干事的人，往往并不怎么能说，也没有什么口才。如果领导者缺乏知人之明，只看这个人怎么说，那就会把真正的人才遗漏了。

第二个原因，领导者自己不是一个贤德之人。因为如果领导者自己私心、贪欲很重，小人就会利用领导者的贪欲来满足自己的私心。若这些小人受宠了，就不可能把真正正直的人再举荐出来。《弟子规》里讲，“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所以领导者必须做到公正无私，不可因私举荐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那些送礼的人或者满足自己私欲的人，这样才能让民众心悦诚服，不能因为私心而放弃了公义。

《群书治要》中说：“仁者在位，而仁人来，义者在朝，而义士至。”这个“仁者”就是有仁德之心的人。仁者在领导的位置上，自然会感召有仁爱之心的人前来辅佐。讲道义的人在朝中为官，也自自然然会感召道义之人前来相助，与你齐心协力把事业办好。这就是《周易》中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总之，“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道理很简单，但是难就难在领导者自己能不能够克服私心，如果克服不了，是不能够做到举直错诸枉的。《大学》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顺序不能颠倒。“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从格物，克服、克除自己的私欲做起，如果克服不了自己的私欲，就不可能真正举用正直公正的人。

## 端心向公，苟利国家者用

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惠，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

——《群书治要》卷二十二《后汉书二》

天下最重要的职位在于尚书，尚书的选拔岂能不重视？然而现任尚书大多是从郎官提升上来的，尽管他们通晓文法、善于应对，但这只是小聪明，大多没有办大事的能力。因此应当选拔那些做过州官，而且素有名声的人来任职，他们应对虽然迟缓，有时甚至比不上别人，但他们一心向着国家，忠于职守而且办事周密。

“天下枢要，在于尚书”，“枢要”就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位置。“尚书”，用现在话说就是部长级的干部。“尚书之选，岂可不重”，所以

尚书的选拔怎么可以不慎重？譬如，民政部要管理整个国家的民间社会事务，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用错了人，那将影响千千万万的人民正常生活。再譬如教育部，如果用错了人，制定了不合时宜的教育政策，那甚至会影响整个民族的素质。然而选拔尚书，往往比较多的情况是“从郎官，超升此位”，这个“郎官”就是副部长，通常都是把副部长提升上来当部长。这有什么弊端？郎官虽然“晓习文法”，他虽然很通晓这个部门的事务，譬如起草一个文件报告，撰写一个领导的发言稿，甚至答记者问等，他都能应对自如。“然察察小惠，类无大能”，但这些都是小才小能，没有办大事的能力。也就是说，做副职的人往往能很好地配合部长工作，部长安排他去做一件事，他能尽心尽力完成，部长使用得很顺心，在这个时候，部长可能就会比较喜欢这个副部长，等他推荐候选人或后继人的时候，可能就会推荐这个跟他配合得很好的人，但是这是出于情感的考虑。这个副部长配合得好，很可能只适合于辅助性的工作，假如要推荐他做部长，就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亲自决断，所以就要考虑他做事有没有魄力，有没有领导的素质和决断的能力。由于每个人的才智都不一样，所以推荐正职领导不能够仅凭情感去判断，还要理性、慎重地去评估。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担任尚书？这里说，“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这个“简”就是挑选、拣选的意思。因为尚书是一国某个行政领域内的最高长官，所以要找那些当过州宰，也就是当过地方最高长官，而且颇有政绩和口碑的人来担任。因为这些人有真正治理一个大省的经验，让他来负责全国性的事情，比较有把握。“虽进退舒迟，时有不逮”，虽然他可能在应对进退的过程中，反应不是那么快，或者口才、礼节都没有那么到位，有时会有一些疏漏，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然端心向公”，但他都是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做事。他不但要为百姓利益着想，而且还因确有政绩、造福一方而享有盛名，所

以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戴，这都是真正做出来的。“奉职周密”，他做事很冷静、考虑问题很周全。身处这么高的位置，必须有足够的定力，而且位置愈高，需要的定力愈强，要能够做到处变不惊，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所以选择尚书这么重要的官员，首先要看什么？古人告诉我们，“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首先要看他的胸怀、气度是胸怀天下、心系苍生，还是目光短浅，总想着个人、家庭的私事。然而气度不是那么容易培养出来的，一般而言，看得到的东西好培养，譬如说口才、专业素质、演讲能力，等等；但是看不到的地方就很难培养了，譬如一个人的胸怀、气度、人格特质，这些都看不到，但是这些恰恰是选拔人才时最应该先考虑的因素。作为尚书，如果没有胸怀天下的心，没有独自决断、治理众多百姓、处理纷繁复杂政事的历练，那将何以担任尚书的职位？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这里讲的重点是，选择主管一国事务的官员，要选择那种有胸怀、有气度，而且有治理大省经验、享有盛名的州宰，这样比较有把握。

## 任人之长，不强其短

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逾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贤明的君主用人时，谄媚阿谀的人不会放在身边，结党营私的人不得治理政事；用人要发挥他的优点，不强求他的不足；任用他的专长，不强求他的短处。这就是用人的基本原则。

在《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向晏子请教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如何任用贤德之士时，晏子回答说：“这就像土地的类型有很多差别，适宜种植的

作物也各不相同。如果各种土地不同，却只种同一种作物，还希望它都能够长得好，这是不可能的。同理，人的才能也是不一样的，让他们都去做同一件事，那就不可能都做得好、不可能都有所成就。如果对人才求全责备，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够完全胜任。如果贪求的心没有厌倦、没有止境，即使是天地自然，也有不能够满足的时候。”接下来，晏子就说了上面这些话。“故明王之任人，谄谀不迩乎左右，阿党不治乎本朝。”所以明智的君主在任用人才的时候，都会本着这样一个原则，那就是谄媚阿谀的人不放在身边，结党营私的人不得治理朝政。

譬如隋朝，仅存三十余年就灭亡了，这和开国皇帝隋文帝有很大的关系。隋朝刚建国的时候，他还做得不错，但是后来因为喜欢听好听的话，任用了佞臣，结果愈走愈偏，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更是变本加厉，所以隋朝很快就败亡了。隋文帝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占卜，喜欢知道事情的吉凶祸福。一个名叫萧吉的官员知道文帝的这种嗜好，就故意说，“占卜的天象说皇帝和皇后有圣德”，这句话谄媚巴结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皇上头上多长出来的这块肉，是很特殊的相貌，是真龙天子的面相。”他这样称赞皇帝、皇后，隋文帝当然很高兴，就赐给他500段布匹。结果这样的奖励一颁布，下面就有人跟进，谄媚巴结的话愈来愈多。一有人夸赞他，他一高兴就给那个人封官赏赐。比如，有一个臣子叫王劼，他也是称赞隋文帝相貌不凡，说皇上头上突出来的肉就像角一样，这不是一般人的相貌，隋文帝听着很高兴，就封他做了著作郎。王劼做了著作郎之后，就去搜集天下一一些瑞相来歌颂隋文帝，说正因为隋文帝有圣德，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所以国家才出现了这么多瑞相。隋文帝下令把它编成了一本书，还带头阅读，这本书叫《皇隋灵感志》，有30卷。后来谄媚巴结的人愈来愈多，隋文帝也就愈来愈自视清高、傲慢，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结果也就为隋朝很快灭亡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所以明智的君主任用人才，不会把阿谀奉承的人放在身边，也不会任用结党营私的人治理朝政，因为结党营私的人会排除异己，真正德才兼备的人会因为他们的嫉妒之心而被弃不用。

这句话后面接着说到“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用人要发挥他的优点，不强求他的不足；要任用他的专长，不强求他的短处。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只要一个人在大的方面是好的，他的本质、主流价值观是不错的，就可以委以重任。在《文子》中记载：“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贤之道也。”现在的君主评论臣子的时候，不在意他大的功劳和贡献，而在他细小的行为上做文章，责备他小的不善、小的错误，这是失去贤士的原因。

孔子的孙子子思在卫国的时候发现苟变是一个人才。有一天，子思就向卫侯推荐说：“苟变这个人可以担任统率500辆战车的将领，不知主公是否了解他？”结果卫侯说：“我知道他可以担任将军，但苟变过去在担任官吏的时候，曾经偷过人家两个鸡蛋，所以我不能够任用他。”听到苟变偷过人家的两个鸡蛋，就被卫侯废弃不用后，子思对卫侯说：“圣人在用人的时候，就像匠人选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所以杞树、梓树连抱那么粗，即使有几尺的朽烂，好的木匠也不会丢弃它。如今君王处在战事连绵的时代，选用作为爪牙的武士，却为两个鸡蛋就舍弃可以攻城略地的将军，这种事情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卫侯听了之后一再拜谢说：“我诚恳接受你的教诲。”苟变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结果卫侯就废弃他可以带领500辆战车的军事才干不用，这是因小失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哪有不犯错的时候，因为一个小错误，就把一个将才闲置不用，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愈是高位的人愈要严格，但是这个严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要能够宽容属下的不足。为什么他是你的属下，他不是你的领导？如果他又有德行、又有才能，做事能力很强，那他应该是你的领导了。他之所以是你的属下，定然

有很多不如你的地方，在德才上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对属上要宽容。宽容属下的愚钝、拘泥、放肆，等等。看到属下的不足，还要想着怎样尽到君亲师的责任，帮助他去改善提升，而不是一直盯着属下的缺点看。否则自己烦恼，也会让下属不愉快。

## 选人应秉持四慎、九虑

故选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进不可以不礼，退之不可以权辱。

——《群书治要》卷四十八《典语》

选拔大臣，不能不精确恰当；任命大臣，不能不信任；进用为官，不能不以礼相待；辞退官职，也不能使他们受到屈辱。这也是用人的四条基本原则。

“选不可以不精”，选人不能不精确恰当，选人的前提是要充分地知人，知人才能善任。《群书治要》中有很多知人、观人的方法，用以确保所选之人是合适之人。譬如《群书治要·管子》中提出了“四慎”，也就是君主选拔官员的时候，要秉持四种谨慎的原则。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大德不至仁”，虽然他崇尚道德、标榜道德，但是却没有仁爱、同情、恻隐之心，那么不可轻易把管理国家的权柄交给这样的人。因为如果他握有生杀大权，却没有仁爱之心，可能就会非常苛刻、暴虐，会导致民心背离、怨恨。这句话对国家选拔任用人才非常有帮助。因为很多人才就是因为没有仁德之心，却处在一个很高、很重要的位置，结果他就用这个位置来暴虐地对待人民，做出很多违背人权的事。

“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看到有贤德的人，甚至比他更好的人，他不能把这个位置推让给别人，不能让贤，说明这个人存有私心，甚至私心很重，这样的人就不可以把高位授予给他。

“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亲属和权贵违反法纪，不能给以刑罚的处分，这叫“罚避亲贵”。当进行处罚的时候，如果这个人和他有亲属关系，和他的关系很密切，或者这个人权贵之人，他就法外开恩，这样的人不可以当将军。为什么？因为他有偏私之心，偏私就会引起属下的不平，不平积累多了就会产生怨气，也就不能服众，将士不能够同心协力，就很难打胜仗。

“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其实包括现代都应该以农业为本，因为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人重视农业生产，不重视有利的土地条件，而轻易地去征收赋敛，不可以让这样的人做治理都邑的地方官。这四种考虑是安危的根本，所以称为“四慎”。

在《群书治要·政要论》中还提出“九虑”，就是选拔官员时，要从九个方面来观察他、考察他。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臣下，有的在小事上忠诚，为的是实现在大事上的不忠诚；有的在小事上诚信，为的是成就在大事上的不诚信。怎能不考虑这是欺诈？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臣下，有的外表刚强，但内心其实很软弱；有的外表看起来很仁爱，但实际行为却和它相违背。怎能不考虑这是虚伪？

所以观察人不能只凭自己的感受，而要很客观地看他怎样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在《五种遗规》的《从政遗规》中说：“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谦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谄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我们观察这个人君子还是小人，从他对上、对下的态度中就可

以看出来。君子对领导者很忠诚、也很恭敬，对下属很谦虚、和睦、爱护，这是君子；小人对上面的人是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对底下的人却很严苛。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他对我好不好，就断言这个人的德行如何，那这个判断一定是出于人情，可能就是错误的。我们关键要看他怎样对底下的人，甚至对那些微不足道、默默无闻的人，是不是也能尊重对方、感恩对方，这才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从内心有仁爱心和恭敬心。

“臣有害同僚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臣下，有的会伤害同僚来独揽大权，闭塞下情来蒙蔽君上，怎能不考虑这是嫉妒？很多人嫉妒心很重，所以欺上瞒下，做领导的对此要有警觉之心。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奸乎？”臣下，还有的进献邪说来混淆是非，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伤害贤德之人，怎能不考虑这是奸猾？

“臣有因赏以恩，因罚以佐威，可不虑之以奸乎？”臣下，也有的靠行赏来推展自己的私恩，靠实施刑罚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怎能不考虑这是营私？我们观察这个人，他给别人东西，都是挑选那个和他关系比较好的或者能对他提供帮助的，这就说明他有所图谋，想要经营自己的关系网。而他在对别人进行处罚的时候，可能非常严厉，好像要刻意营造出一种气势，这是要树立他的权威。可见，这种要做大他自己势力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君主不可以不明察。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臣下，有的表面上互相推荐，其实暗地里钩心斗角，假借为公办事之名，实际上挟持私心，怎能不考虑这是欺诈？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臣下，有的通过讨好君主左右的人来求取晋身之阶，依靠攀附权贵以寻求重用，怎能不考虑这是欺伪？

“臣有和同以取谐，苟合以求荐，可不虑之以祸乎？”臣下，有的为

了一味地与人和谐相处，而苟且认同别人，一味地迎合长官的意思来求取被推荐，这样的人怎能不考虑是祸害？

“臣有悦君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臣下，有的投合君主的意思来求得亲附，投合君主的言语来让自己苟且容身，怎能不考虑这是奸佞？

以上九个方面君主、领导者不可以不审慎，确实对属下考察清楚了，才能防止被恶人、奸人蒙骗，也才能保证选人精确恰当。

“任之不可以不信”，考察清楚了，你任用了他，就要充分信任他，不可以再怀疑，要用之不疑。《袁子正书》中还说：“故凡用人者，不求备于一人。桓公之于宁戚也，知之矣。”凡是君主用人、领导用人，都不能够求全责备。齐桓公与宁戚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宁戚，卫国人，出身微贱，想去齐桓公那里求取一个禄位，侍奉齐桓公，但是他穷困潦倒，没有办法举荐自己。于是他就跟着那些流动做生意的人，给他们驾车，来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外。有一次，齐桓公到郊外去迎接客人，晚上开了城门，让赶车的人都回避。宁戚正好在车下喂牛，他看到齐桓公，就赶紧敲击牛角，唱起了凄厉的商歌。齐桓公听到歌声，就说：“这个唱歌的人可不是一个平凡之人。”于是就命后面的车把宁戚载进城。齐桓公返回国内，宁戚求见，劝说桓公统一整个国家。第二天宁戚又来求见，劝说桓公称霸天下。齐桓公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想任命宁戚做官，委以重任。但是群臣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宁戚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也不远，不如派人去打问一下，如果他确实是一个贤才、一个有德行的人，再任用他也不迟。桓公说：“你讲得不对！如果派人去打听，恐怕他会有小的过恶。因为小的过恶，就忘记他大的善处，这是君主之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而且人本来就难以用尺度去衡量，他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只要用他最擅长的地方就可以了。”最后，桓公也没有派人去打听宁戚的为人，就对他委以了重任，授之为卿。事实证明，宁戚的确在齐桓公称霸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齐桓公用人不疑，这个举动很得当，所以得到了贤士，也才能够称霸天下。

“进不可以不礼”，当领导的进荐或晋升提拔一个官员后，一定要礼遇他。为什么？《孟子》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如果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手足一样关爱、重视，那么被领导者就会对领导者加倍回馈，把领导者当成是自己的腹心一样更加重视，这就说明君臣原本就是一体的关系。而要保持这种一体的关系，那就需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要有礼遇之心，以礼相待。《群书治要·中论》中也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不仅仅是得到他的身体，而且还得到他的忠心。如果你只是得到了他的身，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对你也不会有太多的帮助。所以对待下属，最关键的是做到用真诚恭敬心和礼遇的态度来感动，这样才能君臣一心，上下一体。对于这一点，《尸子》中还列举了周文王和齐桓公的例子。周文王去求见姜太公的时候，一天五次往返，最终得以感动姜太公，把他请出山。齐桓公对待管仲也是极为慷慨，不仅拜管仲为相，称其为仲父，而且还赐予他数座城池作为封赏。由此不难看出，周文王之所以能够得人心，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都是因为他们能够任用并且礼遇贤才，而这些贤才为了回报知遇之恩，就会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帮助君主治国理政，弥补君主自身的不足，所以能够受到天下的尊重和认可。

“退之不可以权辱”，当你真的要辞退他们，免去他们官职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权力、身处高位而侮辱他们，要能够好聚好散，善始善终，不仅不能与人结怨，还要以感恩的心，感谢他们曾经的付出和贡献。《弟子规》中教导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俗话也常说“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冤家宜解不宜结”，如果别人曾经帮助过我们，对我们有恩惠，我们一有机会就要想着去报答，这样人生才会越走越宽；但是如果别人伤害了我们，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或者彼此之间

有仇怨，我们也不要老是耿耿于怀，更不能时刻想着打击报复，这样只会使人生越走越窄，不仅于人于己都不好，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甚至可能把矛盾激化，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所以不论是这个人不合适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做下去了，还是因为有了更适合的人选而要罢退他、辞退他，都不能与人家结怨，要好聚好散，善始善终，仍然以感恩的心来感谢他的付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 第七十三讲

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



## 养廉的智慧：重其禄，少其吏，尽其力

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

——《群书治要》卷四十七《刘廙政论》

这段话实际上讲的是高薪养廉的必要性及其前提问题。意思是说，如果知道提倡清廉，而不懂得增加官员的俸禄，官员就会形成欺诈和贪污腐败的风气；如果懂得增加俸禄，而不知道怎样减少官吏，财力就会空虚不足；如果知道减少官吏，而不懂得如何使他们发挥能力，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

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大家一直在热议一个话题，那就是高薪对于养廉是否必要。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对于真正的人才，除了要提供给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他们的能力之外，使他们富裕起来、受到尊重，并且给予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群书治要·墨子》中说，治理国家的人，都想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以“尚贤使能”为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会愈淳厚的道理。所以领导者办理政事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

才。但是怎样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就像要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让这些入富裕起来、受到尊重，并且得到很好的声誉一样，想要获得贤才，那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到人们的尊重爱戴，让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受到赞誉。这样，崇尚道德的风气就会兴起，国家的贤德之士也就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国家都奉行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之人，不接近不义之人。

关于有没有必要给官员很高的俸禄这一点，《群书治要·傅子》中 also 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凡是想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员个个廉洁？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廉洁，而一味地要求官吏廉洁，这就好比是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后面还做了一个比喻：即使举用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够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也必然会违反禁制，以公权谋取私利。从孝道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他们还要赡养父母、妻子、儿女。但是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若以公权营取私利则触犯刑法，要受到处罚，这样就会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产生，仁义的正理也就隐匿不彰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对这种情况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微薄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让饥渴的马去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去看护肥肉，想让它们不越雷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世间有一身傲骨、两袖清风、品格高尚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圣王明白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使所有的官员都洁身自好，所以会给予官员丰厚的俸禄，以防止其产生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譬如，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子，在做宰相的时候，其俸禄足够养活500家的人口。也就是说，在俸禄丰厚的条件下，

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因为他连自己的俸禄都花费不了，又怎会为贪取更多的钱财而甘冒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国君想让官员竭忠尽力、心无旁骛，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也提到，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了。“无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对人民无所求，作奸犯科的事情就不会产生。而且在生活条件优渥的情况下，官员一旦贪污受贿，就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不仅会失去高官厚禄、尊严脸面甚至还会锒铛入狱，性命不保，利弊权衡，得不偿失，所以官员也就不会轻易地以权谋私、去搞权钱交易了。所以说“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

下面接着讲道：“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如果仅仅懂得增加官员的俸禄，但是却不知道精减官员的数量，那么就会使国家财政的负担过重，导致入不敷出、国库空虚。所以还必须“少其吏”，也就是精减官员的数量。因为如果官员的人数太多，很多官员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提高他们的俸禄，人民的负担就会加重，自然也就会对高薪养廉的措施产生不满。所以要增加官员的俸禄的前提必须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使官员与职位相称。

即便如此，还是不行，后面又讲道：“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如果仅仅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也知道精减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却不懂得如何使官员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也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官员的数量减少了、待遇提高了，但如果不能竭尽全力、竭忠尽智，那就会显得事情繁多而职位短缺。所以在提高待遇、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要让他们“尽其力”，竭尽全力、负责尽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才不至于显得事情繁多而人手短缺。

由此可见，古人思考问题非常缜密。在古人看来，提高官员的俸禄对于保证官员廉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高薪并不必然导致养廉的效果，如

果没有道德的教育，甚至还可能走向骄奢淫逸的反面。譬如，在《群书治要·文子》中就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所以在提高官员俸禄的基础上，还必须加强对官员的道德教育。虽然官员的数量减少了、待遇提高了，但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如果官员贪心很重，不知道节省物力财力、不知道勤俭持家、勤俭治国，那么即使百姓竭尽全力，也无法供养做官的人，结果仍然会为国家、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与负担，当然也会为官员自身招致灾祸。所以要实现高薪养廉，既要精减职位，还要重视官德教育，使官员明白怎样才能长久保持富贵的道理。

《周易》中说：“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这就告诫我们，君子以培养俭德躲避灾难，不可以拥有高官厚禄为荣耀，因为欲壑难填，欲是深渊，人的欲望一旦打开，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就会永无止境，自己想控制都控制不了，最终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所以为官者不能贪得无厌，不能过骄奢淫逸的生活。

《孝经》中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为官者处在万民之上，但是没有骄满的表现，这样即便身处高位，也不会有被颠覆的危险；虽然自己很富裕，但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法度，谨小慎微，这样也不会有入不敷出的危险。一个人身处高位，而没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样就能长久地保持高贵的地位；一个人虽然很富裕，但是还能勤俭持家，这样才能长久地守住富贵。

《群书治要·中论》中说：“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这个“机”“杼”都是古代人织布的工具，意思是说，职位和权势，不应该成为贪图享乐、以权谋私、骄奢淫逸的资本，而应该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这样才能避免身败名裂，或者避免富不超过三代的悲剧。

以上说明，高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即使实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一定必然实现廉洁的效果，还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除了前面讲到的，要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之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条件。譬如，君主、上位者必须修明道义、尊贤使能。如果只是让手下的官员、臣子接受道德教育，而高高在上的君主可以不去奉行，这是不可能收到效果的。真正的贤德之人是不会徒慕高名厚禄而来的。要招致这样的贤者，用人之君就必须首先有道德、讲礼义，这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只有自己首先是个有德行的人，才能感召志同道合的人来到身边，共同治理国家。

在《群书治要·三略》中也有这样的阐述：“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禄得；有守节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胁。”如果这个人志向高洁，就不能够用高官厚禄来得到他；如果这个人坚守节操，就不能够靠威刑来胁迫他。“故明君求臣，必视其所以为人者而致焉”，所以明智的君主求取臣子，一定要首先看清楚这个人的志向，然后再采用适当的方式来招致他。“致清白之士，修其礼”，对于那些很清高、道德很纯洁的士人，领导者要讲究礼法，遵循礼仪制度，表现出礼敬之心。“致守节之士，修其道”，若要招致那些坚守节操的人，领导者就要修明道义。“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这样，贤士才能够被招来，自己的名声也才可以保全。这就是《周易》中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是有同样气质的人，自然会感召到一起，成为君臣、朋友，等等。

然而除此之外，要想达到清廉的目的，还要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选人标准，以此来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傅子》中说：“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其实，中国古人设立这些制度，都特别符合人情。人情是什么？在《论语》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

情，但是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地追求富贵，则是国家治理者必须考虑的事情。《傅子》中这段话正回答了这个问题，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富贵的正路，不能不加以重视。那么，应该以什么原则来确定爵禄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爵禄授予是否公平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念引导的问题。

对此，《傅子》里讲，应该做到不授予无德的人爵位，不给无功的人俸禄。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没有德行，就不能给他重要的领导位置；如果对国家、对单位没有任何贡献，就不能给他工资、奖金。这两条规矩确定了，贤良之士尚且不敢以微薄的德行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也不敢以微小的功绩接受厚重的俸禄，更何况是无德无功的人，这些人自然不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授予爵禄的原则既已确立，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之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授予高官厚禄；德行浅薄、功劳小的人，给予小官微薪。这样的人才选拔标准一旦确立，不仅能保证有德有才的人居于领导的位置，具有可观的收入和尊贵的地位，而且更能推动崇尚道德、才尽其用良好社会风气的树立。

此外，为了确保把有德有才的人选拔出来，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这种机制要求地方官负责把地方上具有孝廉品质的士子举荐出来，作为官吏的后补，由国家来培养。之所以确立这种选拔机制，是因为明智的君王都明白一个人如果能够孝敬父母，那么他就会忠于领导、忠于国家；一个人如果廉洁自好，没有贪心，就不敢妄取钱财、以权谋私。所以这两条是选拔官员最起码、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准。为了进一步引导地方官举荐公正，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质的士子举荐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向他行贿的人举荐出来，还需要一个制度加以保证，那就是《傅子》中所说的“进贤者为上赏，蔽贤者为上戮”。如果官员举荐的人才为国家建立了功业，那么君主就一定要给这个举荐者以最高的赏赐；相反，如果官员手下有人才，却因为上级嫉贤妒能而把这个

人才埋没了，那么一经发现，君主就要给这个官员以最高的惩罚。当然，如果官员所举荐的人做了祸国殃民的事，这个举荐者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连带受到相应的处罚。只有实行了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出现在领导位置上。

可见古人对一件事情的考虑是非常缜密的，而非以偏概全。譬如，高薪养廉是不是必要？古人告诉你必要，但它还有一些前提条件，不是只要实行了高薪，就一定能够达到养廉的目的，还必须具备其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这些制度紧密配合，最后才能共同起到反腐倡廉的效果。

## 人尽其用，岗尽其能

夫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  
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  
当今之所宜也。

——《群书治要》卷二十五《魏志上》

这个“浮食”就是不作而食，“常式”就是常规、法式。这句话和上面所讲的高薪养廉的问题密切相关。意思是说，要撤除无事可干的职位，减省不急需的俸禄，停发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薪资，撤并无事可做的官员，使每位官员都有一定的职责，每个职责均需承担一定的事务，尽好分内之事就必然领受一定的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的收入，这是古代的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

假如官员的数量太多，就会给国家造成沉重的负担。而官员数量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结果导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可是，面对庞大的官员基数，即便行政开支已然入不敷出，每位官员得到的俸禄还是很微薄，不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体面的生活。官员对自

己的收入不满意，认为还不能够养家糊口，就可能会出现贪污受贿、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精减官员，使人当于事、俸禄充足，这样官员就不必与民争利。而且，在生活开支充裕的情况下，官员一旦腐败，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出于保全自己的考虑，他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位，并且廉洁奉公，如此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说，明智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一方面，人和事相称，官吏的数目就会减少，人民就会众多；人民多了，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就多了，物质基础就会丰厚。另一方面，官吏的数目减少，即使提高官员的收入水平，但整体所需的俸禄相对还是减少了，这样才不至于给国家造成过重的负担。

## 知人善用，德行配位

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矣；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

——《群书治要》卷三十二《管子》

德行厚实的人屈居下位，这被称为（任人的）过错；德行浅薄的人地位尊贵，这被称为（任人的）失误。宁可犯下委屈君子的过错，也不能犯下任用小人的失误。委屈了君子，他的抱怨不深；若误用了小人，他引发的祸患则很深远。

“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一个人的道德、德行很崇高，但是官位却很低，这说明君主对德行不重视、对贤才不恭敬，这是君主用人上的过错；“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一个人德行浅薄，但是位置却很尊贵，这说明君主可能偏爱亲近的人、喜欢阿谀的人，这是君主用人上的失误。

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厚德才能载物，没有深厚的德行作为基础，身居高位，不仅会给自己招致灾难，而且对整个国家、整个团队也会产生严重的危害。为什么？下面接着分析到，“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宁可犯下不尊重君子的过错，也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很深厚，但是君主给他的位置却很低，这对君子来说是种委屈、是种不尊重，可是宁可犯这种委屈君子的过错，也不要犯那种误用小人的过失。

“过于君子，其为怨浅矣”，君子有德行，却屈居卑位，虽然受了委屈，但因为他是君子，他有修养，所以即便有所怨言，也仍然不会改变对君主、对国家的忠心，就像历史上许多遭到罢黜或流放的忠臣，如范仲淹，虽然多次被贬，但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君主仍然很赤诚，甚至对于陷害他的官员，他都可以没有埋怨。由此可见，得罪君子问题不大，君子不会挟私报复，也不会心生怨气而危害国家，但是君子不在朝，对国家治理来说，终是很大的损失。

“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假如这个人德行浅薄，但是却给了他一个尊贵的位置，这就是误用了小人，以此而引起的祸患就会非常深远。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论语》中有很多阐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一心为公，没有自己的私利，小人则恰恰相反，他无时无刻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这种自私自利的心一旦扩展，最后就会危及整个团队的利益。孟子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把没有德行的小人选拔在领导位置上，就等于把他的过恶播撒给广大的民众，而这种过恶一旦传播出去，就会形成不好的社会风气。譬如，清朝乾隆皇帝，由于中后期重用了贪得无厌的和珅，结果贪污腐败蔚然成风，并且逐渐成为沉疴，一时难以扭转，以至于清朝从乾隆以后就慢慢垮了下来。历史上奸臣当宰相、受重用导致误国误民的例子不胜枚举，确实证明了“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这句话的真理性。

一个人职位愈高，但是傲慢、强势、贪得无厌，结果就会上行下效，形成一种不好的社会风气，而这个风气一旦形成，想要再扭转过来就非常困难。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中国古人懂得防患于未然、懂得防微杜渐、懂得慎于始，在征兆出现之前就会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

## 知人者智，用人不疑

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智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奸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让贤能的人为政，却让不贤的人去规正；让有智慧的人谋划政事，却让愚昧的人去评论；让品德良好的人施行政令，却让奸邪的人去质疑。人君虽然想获得成功，但又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特别是对于贤德之人，更应该用而不疑。如果产生了疑虑之心，那么就会使得这些贤德之人的才华不能够得以完全施展，办事也就很难办成。《刘廙政论》中说道：“自古人君，莫不愿得忠贤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访之于众人也。忠于君者，岂能必利于人？苟无利于人，又何能保誉于人哉？”自古以来，当君主、当领导的人，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他们的。有了忠贤之士的辅佐，自己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也就会容易得多。然而得到这些忠贤之士以后，却又对他们产生疑心，不免向众人去调查，问问这些忠贤之士到底如何。但是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做到事事都有利于他人？譬如，他要奉公守法，可能就会触及某些人的私利，得罪某些人，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给人带来利益，这些人可能就会怀恨在心，四处诋毁，那又怎么能让众人都称赞他、使他在众人中有好的名声呢？

所以为人君主、为人领导者，如果自己不够贤明，不能辨别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贤之士，那么即使得到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已经来到身边辅佐，也仍然会怀着猜疑之心，去向众人调查。而被访问的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的人，不一定都没有嫉贤妒能之心，如果被访问者看到这个贤德的人有德行、有能力、才华出众而心生嫉妒的话，不免就会对这个贤德之士有一些偏颇的言语和评论。再如果君主缺乏辨别能力，听信了这种偏颇的言语，那就可能会加重对忠贤之士的怀疑，从而最终可能不予重用或弃之不用。所以君主贤明与否，用人是否得当，能否做到用人不疑，对于事情的成败至关重要。

在《群书治要·新序》中也讲到，贤明的人之所以不被重用，是有原因的，即是因为“不肖嫉贤，愚者妒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岁不合者也”。不贤德的人会嫉妒贤德的人，愚钝的人会嫉妒有智慧的人，这样，贤明的人就会被阻隔，不能被君主所用，以至于君主千载也难以碰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贤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贤德之士，但不能持久；有的是用了很久，但不能善始善终；还有的是不肖的继任者把父亲的贤明忠臣给废弃了，所有这些现象不一而足，因此所导致的灾祸和败亡难以一一记录。

其实追根溯源，关键还是在于君主自己不够明智，不能分清贤德与不肖，所以只能人云亦云，一味听从众人的评议。群臣认为一个人好，他就认为这个人好；群臣如果对一个人毁谤，他就认为这个人不行。所以这句话后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潜诉不行，斯为明矣。”“潜”就是诬陷的话，“诉”就是诽谤的话。如果诬陷、诽谤的话都不能够通行、都不能不起作用，君主能够自己判断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这才叫真正的明智。由此可见，古人把贤德之人不被重用的原因分析得一清二楚，确实值得现在人参考。

## 天下治道，莫大乎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大家所共有、是大家所共同享有的。这个“公”就是“共”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当时，享有权力、拥有权力的人，其存心不是拿着这个权位来自己享受，而是借着这个权位去爱护、照顾人民，他是以公心来行使权力的，天子是这样的存心，他手下的官员也是这样的存心，整个社会都会以怀有私心而感到羞耻、以怀有公心而感到合乎道德，这样的治理自然就会使天下太平。实际上，在这里，孔子并不是构想所谓的理想社会，而是描述了上古尧舜时期社会治理的真实状况，那时的圣君贤臣时刻以天下福祉为念，不以天下为私物。

在《群书治要·六韬》中就有一段话体现了圣贤之人的公心，说：“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政治公平合理，官吏不苛虐，赋税有节制，君主自己的俸禄、用度都非常微薄，不会因为自私自利而损害国家的法律。赏赐不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施于无罪之人。不会因为自己高兴就给别人以封赏，也不会因为自己不高兴、发怒就滥杀无辜。对危害百姓的人，一定会判以刑罚、给以定罪；能够为国家推荐贤良的人，一定会给予封赏。这样，官员之中就没有腐败蛀虫之类的人藏身，国家之中也就没有流离失

所、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百姓。这就是圣贤政治的特征，也是圣人治理国家所达到的效果。为什么能达到这种效果？就是因为为君者认为天下是大众共有的天下，他处在天子之位，是为了爱护照顾天下的百姓，而不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正是出于这份存心，他才能处事公正，量刑公平，提拔官员没有私心。可以看出，如果将这种“天下为公”的态度用在治国上，确实会收获大治的效果。

那这种态度是从哪里培养起来的？是从哪里扎的根呢？是从家庭。在中国古代，人们所生活的家庭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有二三口人或者四五口人的小家庭，而是一个大家族，少则七八十口人，多则二三百口人，甚至上千口人都有。每个人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之中，从出生开始，他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片公心，以家族为先，谁也没有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念头，言行举止无不是为别人服务，关心别人，为维护和促进整个家族的长远利益而付出。在这种氛围中，他潜移默化地被影响着，长大后自然而然也就学会了起心动念为父母着想、为长者着想、为整个家族的延续繁荣着想。试问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到哪里去学习自私自利？他甚至可能连自私自利这个词都不懂，这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

就像《三字经》中所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其实每个人都有纯净纯善的本性，但是为什么后天差得那么远？就是因为人们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不同，所以习性就不一样了。“苟不教，性乃迁”，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纯净纯善的本性就会受到污染，发生改变，就像水晶灯泡，它本来是光芒四射、晶莹剔透的，但如果把它挂在厨房，久而久之，灯泡表面就会沾满油垢，掩盖它本有的光亮。而后天的教育就好比清洁布，就是要把遮蔽人之纯净纯善本性的层层油污给擦掉，使它本有的光亮显现出来，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它首先肯定了每个人都有纯净纯善的本性，即明德，教育的目的、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习性回归到本性，这就叫明明德，

因为只有按着本性生活，人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快乐。

后天习染之中，以自私自利为最重。“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修身应从起心动念处着手。面对一件事，我们考虑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做，第一个念头想到的是对我有什么利益、对我有什么好处，还是想到对大众、对国家、对社会有什么利益，这第一个念头就是一闪念，不仅细微难察，而且特别地重要，因为它能真实反映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情况，会对人的行为产生潜在影响，几乎大部分人的一闪念都是自私自利，第二念才可能是为大众着想，但这个已经是第二念了。

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教导我们要有公心，不要有自私自利之心。譬如，《了凡四训》中讲，一个人应该“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人就应该存这样的心。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是好书？怎样才是善于读书？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和我们自己纯净纯善的本性相应的，才叫好书，读这样的书有助于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回归纯净纯善的本性，善于读书就是要善于把经典中的教诲落实到生活中去，知行合一才叫善于读书。《了凡四训》就是这样一部好书，因为它教我们要“远思扬祖宗之德”，要把祖先的德风、道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近思盖父母之愆”，如果父母犯了过失，为人子女者就要想办法帮助弥补，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我们、我们的父母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可能也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已经断了好几代，所以犯过失也情有可原，关键要想着怎样弥补；“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没有国，哪有家。这就教导我们首先要有爱国的情感，知道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就要懂得去报答国家的培育之恩。

此外，要把家族的道统、家风都振兴起来；“外思济人之急”，帮助别人要对症下药、帮到点子上，才能起到好的作用。现在人最急需什么？物质财富吗？需要但并不迫切。就目前而言，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然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和提升，与此相对，精神上的空虚、道德上的不足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要济人之急，就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思想、理论、方法宣讲出来，帮助开启大众的智慧，让人们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内思闲己之邪”，要时刻懂得反躬自省，克制自己自私自利的念头，保持一种为他人着想、为团队着想、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的仁爱之心，时时处处表现出温良恭俭让，这才是“天下为公”的公心。

“选贤与能”，这个“与”字，通举荐的“举”，意思是要选拔贤德之人为天下人服务，也就是要做到孟子所说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样，人就能不仅仅亲爱自己的父母双亲、不仅仅慈爱自己的子女，还能够亲爱别人的父母、慈爱别人的子女，这就是孝慈之道的推广延伸。当然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核心、基础、原点还是在于孝敬自己的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进而才能把这种孝亲慈爱之心推而广之，才能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双亲，却对领导者很恭敬、对领导者的父母很恭敬，那一定是虚假的、有所图谋的，因为这不合人的本性，正如《孝经》中所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所以人一定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做起，然后推而广之，才能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使老年人都能得到很好的赡养，安度晚年，临终时能够得到关怀，使所有的孩童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鳏”是老而无妻的人，“寡”是老而无夫的人，“孤”是幼而无父的人，“独”是老而无子的人，“废疾”是身体或精神有残缺而不能做事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些人都属于弱势群体，要使所有的鳏夫、寡妇、孤儿、无后嗣的老人以及身残和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和赡养。我们现在倡导构建福利社会，关心弱势群体，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如此，都以推行仁政作为治理国家的上善之法，而推行仁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能够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使这些弱势群体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这样一来，奸邪之谋就会杜绝，盗窃作乱、危害社会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这就是所谓的大同社会，也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应有的状态。

如此美好的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呢？这就需要依靠教育的力量，是推行道德教化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孟子》中记载，舜王在位的时候，就非常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他使契做司徒，教导民众以五伦之道，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舜王是从哪里学的？他也只不过是沿袭了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而已。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从上至下，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圣贤教诲、都能明理，都在追求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而只有这种生活才能使人生获得幸福美满。

幸福，从古至今就是思想家们探讨的重要话题。对此，中外学者沿着各自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不懈地追寻着。从古希腊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们就开始研究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几千年来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思想流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们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实现天地万物和谐共生、人类获得真正幸福的途径，后世思想家、国家治理者特别注重遵循古圣先王之道，也特别强调文化的传承性。

历史与实践双双证明，落实圣贤教诲确实是实现人类幸福、万物和谐共生的光明道路，这是经得起考验的。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圣贤经典告诉我们，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即使得到，也都是虚假的、暂时的、不踏实的，而只有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为民族着想，使自身价值在奉献和付出中得以展现和升华，才能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中国人历来讲究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人明理，理得心安，这

才是获得幸福的真正方法。所以“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人们如果不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这些道理，想要成功追求到幸福，那是不可能的，甚至还可能把自己带上不归之路。所以学习传统文化特别重要，因为它告诉我们怎样做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个人幸福。

## 与天下同利者得天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

“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擅”就是专有、独揽的意思。就是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共享利益的人，可以得到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人，最后会失去天下。

“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管子》中有段话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说：“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君主能够让人民安定，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就会侍奉君主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所以君主有忧困时，人民会为他担忧；国君有危难时，人民会为他拼死效力。反之，“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相反，如果君主把人民看得如同泥土、草芥一样低贱不值钱，那么人民也就不会为君主所使用。君主有忧困时，人民不会为他忧困、不会为他感到忧心；君主有急难时，人民也不会为他去赴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如果君主不能使人民安乐，那么人民也不会为君主悲哀；君主有了困难的时候，人民也不会为其分忧；如果君主不能让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也不会为他拼死效力。可见，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君主必须能安其民。怎样才能安其民？那就是要与天下人共享利益。

相反，“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如果君主想要独占天下的利益，最终反而只会失去天下，这点已经得到了历史的充分验证。譬如《汉书》中记载，过去在周朝的时候，大概有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国君役使民众都非常轻微，每一年百姓服徭役不超过三天，即便如此，国君还有很多的财富用之不尽，国库还非常充实。但是到了秦始皇统一之后，他让这一千八百多个国家的人民来奉养自己，即使人民筋疲力尽了，还有服不完的劳役；财富用尽了，还供不上他的需求。为了供养他一个人的享用，天下的人都很辛苦，可还是不能让他满足。使得“劳疲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无辜死刑者无所告诉”，疲劳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无辜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地方去上告。结果人人与他结怨，家家与他结仇，天下就这样败掉了。所以秦始皇之所以失去天下，正是因为他“擅天下之利”，想独占天下的利益，让天下人都服务自己，不懂得与天下人共享利益。

《群书治要·吕氏春秋》中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明白：“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古圣先王之所以能够留名青史，是因为他治理天下，首先必然具备公心。“公则天下平”，正因为他有公心，处事公正无私，大家都会很佩服他，没有愤愤不平的心，天下才能太平安和。“尝观于上志”。《吕氏春秋》的作者曾经阅览以往的经典和古籍。“上志”就是古代留存下来的经典。“有得天下者众矣”，得到天下的人很多。“其得之必以公”，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天下，关键在于有公心，一定是因为有公心才得到天下的。“其失之必以偏”，后来之所以失去天下也一定是因为偏私。不管是同一个皇帝，从得天下到失天下，还是同一个朝代，他的后代子孙失去天下，无不因为一个私字。所以为公还是偏私，是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所在。观察历史，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企业，它的兴衰成败都必然符合这个规律。“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设立君主的目的，就是因为要公正。“故洪范

曰”，所以在《尚书·洪范》中说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个“偏”就是偏袒的意思，“党”就是偏私的意思。“王道荡荡”，就是行王道的道路非常平坦、宽阔。一个人如果没有偏袒、没有偏私的心，他治理天下就会愈来愈顺畅、道路会愈走愈宽广，政通人和。为什么？因为他的存心对了。

如何存心才能使王道荡荡、政通人和？那就是要符合天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具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然天道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私。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日、月所表现出来的都是无私之德。譬如，太阳和月亮，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恶人，而不去照耀他；不会因为这个地方很肮脏，就不去照耀它。天地化育万物，也没有因为这个物种我不喜欢，就不去化育，而是对一切万物都平等无私。

《吕氏春秋》后面接着说道：“阴阳之和，不长一类。”阴阳之气化育万物，它不是只对某一个物种特别偏私，而是平等地化育，这就叫“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甜美的露水、应时的雨水，也都是平等地滋润万物，不会偏私某一个物种。使用这两句比喻是为了引出下面这一句重点：“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作为万民之主的天子、君王，或者说，作为一个团队的最高领导者，也应该要公正无私，具有天下为公的精神，不能偏私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

对此，后面举了齐桓公的例子来说明，“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刚开始的时候，齐桓公具有造福天下的公心，他连仇敌都能包容，重用了管仲，所以才能团结天下，成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都是因为他有公心才做到的。但后来桓公的存心变了，“行私阿所爱，用竖刁而虫出于户”，后来他有了私欲，任用了自己所宠爱的人，如易牙、竖刁、开方等这样的小人，导致后期处境凄惨。齐桓公一生前后截然相反的结局，都是因为他的存心不同所导致的。

所以最后得出结论：“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

而用公。”一个人在年少的时候，特别是在孩童的时候，比较纯洁、天真无邪，比较憨直，这个“愚”就是憨厚正直的意思，想法也很单纯。但是长大之后，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慢慢就学会耍小聪明了，所以说“其长也智”。如果把这种小聪明用于谋取私利上，结果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不如保持自己的纯朴、善良、憨直，处处公心，为人着想，这样事业反而能得以长远。

我们看现在的商人头脑很灵活、很聪明，比起古人来，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企业的寿命却愈来愈短，即便世界500强的企业平均寿命也不过40年到50年，可以说是说垮就垮。再看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老字号，少则上百年，多则上千年，经久不衰。相比之下，到底哪一代人更聪明？中国有句话说得特别有味道：“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把小聪明用于谋取私利、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上，结果就会贻误大事，误人误己，害人害己。所以要经常聆听古圣先贤的教诲，而且可以将之比照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案例，就知道古圣先贤的确所言不虚，这些都是能够经得起历史验证的。

## 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  
忌心。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能通达天下人心意的，最重要的在于大公无私。而能做到大公无私，最重要的是没有猜忌之心，时刻想着利益天下人民。

“能通天下之志者”，这个“志”就是心之所志，也就是心里的愿望、心意。天下人的心愿是什么？那就是希求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国君有公

心，能够感知老百姓的人生、家庭的需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也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办理政治。“莫大乎至公”，“至公”就是极其公平。能够极其公平，就能够和天下人同心。而能做到极其公平，这里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关键，“要”就是重点、关键的意思。这个重点、关键就是自身没有猜忌的心、没有嫉妒之心。国君治理天下，不可能一个人治理，一定要任用一些干部、臣子，所以怎样领导整个朝廷的臣子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国君有嫉妒心，就不可能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有猜忌心，臣子也不敢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要有公心，要想利益天下，还要从君主自身的修身做起、从格物做起，否则的话，国君的嫉妒心、猜忌心一旦生起来，天下就不可能治理得好，自然也不可能感召到志士仁人来效忠辅佐。唐太宗为什么能够成就“贞观之治”一代盛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赏识、重用、信任魏徵等大臣，这些大臣虽然德才、能力都超过唐太宗，但是唐太宗能够知人善任、用之不疑。与唐太宗这样的贤明君主相比，历史上的昏君暗主，对待像范仲淹这样的圣哲人，不是弃之不用，就是贬到他方，甚至有的还会被诛杀赐死，这都是因为君王有猜忌之心、忌妒之心。

“唯至公，故近者安焉，远者归焉”，只有君主没有私心，念念想着有利于天下的苍生，身边的人才会安定，因为他们知道君主不会嫉妒、猜疑自己，甚至还会重用自己，听从自己的谏言；远方的人也才会归附，因为君主能够任用公正的人。“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是非曲直都有正确的标准，所以能够赢得天下人的信任。“唯无忌心，故进者自尽，而退不怀疑，其道泰然，浸润之潜，不敢干也”，君主唯有做到没有嫉妒心、猜忌之心，才能使得进谏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用害怕因为自己的言语过于耿直而被降罪。进谏完离开后，也不用害怕别人背后说坏话。这样一来，小人不敢进谗言，君主治国的大道就能安定。“浸润之潜，不敢干也”，就是谗言、流言蜚语都不能够冒犯。

《虞书》中讲道，“辟四门，则天下之人辐凑其庭矣”，这是说古圣先王主政的时候，能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天下之人就会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为君主治国提建议。“明四目，则天下之人乐为之视矣；达四聪，则天下之人乐为之听矣”。因为君主能够广泛接纳众人的意见，所以众人很乐意将所看的、所听的上报给君主，君主虚心接受，进而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样就能够实现政通人和，下情而上达。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江海之所以能够汇聚各种各样的河流，就是因为它能够低下、谦卑。君王善于听取众人的意见，这样很多重要的情况、好的谏言就能够被接受，就好像河流能够汇入江海，不会被截断。“苟有所逆，众流之不至者多矣”，假如河道阻塞，不流入江海的河流就会增多。同样，如果君主有猜疑之心，不好纳谏，那么很多好的建议也就不能够被接受。“众流不至者多，则无以成其深矣”，很多的河流都不汇入江海，就不能够成就江海的深广。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假如国君有为公的心，那么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制定出来的政策制度，一定也是符合公平、公道。下面举了一些例子，“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尧舜黜之”，丹朱是尧帝的儿子，商均是舜王的儿子，因为他们不够贤德，所以尧舜没有选择他们接替自己的位置，而是选了贤德之人：尧推选了舜，舜选用了禹，让天下之人得到明君。这都是出于公心做出的举动。“管叔、蔡叔，弟也，为恶，周公诛之”，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弟弟，作乱为恶，对天下安危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出于公心，就把二人诛杀了。

“苟不善，虽子弟不赦”，如果真的做了不善的事情，即使是自己的至亲，也不能用私心去纵容、赦免他们。“则于天下无所私矣”，这样治理天下就不会偏私。“鲧乱政，舜殛之”，大禹的父亲鲧，因为败乱国事，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所以被舜王杀死了。“禹圣明，举用之”，但是鲧的儿子大禹却很会治理朝政，非常圣明，曾经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舜王

对他不但没有嫌隙，反而仍然重用他。“戮其父而授其子，则于天下无所忌矣”。舜王出于公心，虽然杀死了大禹的父亲，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弃用贤明的大禹，仍然将天下之主的位置传给了他，此举使得天下的百姓无所猜忌。正因为尧舜周公出于公心，做出公正的行为，天下的人才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所以君王不怀疑大臣，臣子和老百姓也不怀疑君王，整个天下人与人之间非常信任，没有猜忌之心，这时候天下就能治理好，人民也会非常和乐。

## 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明分职，序事业，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悦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为人君者，爱护人民就可以使人心安定，喜好亲近贤士就能使国家兴盛，这两者一项都没有就会败亡。明确各部门掌管的职务，依据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选拔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为官，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那么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会畅通，而行私请托的门径就会被杜绝；为公正道义的风气能彰显，而为个人牟私的事就能止息。这样一来，品德醇厚的人会得到任用，奸佞谄媚的人会受到遏止；贪图利益的人会被辞退，廉洁奉公的人会受到起用。

这段话出自《群书治要·孙卿子》，也就是《荀子》。做君主的人一定要把两件事做好，第一就是“爱民”，第二就是“好士”。“爱民”就是要将人民当作是国家的根本。“好士”就是喜欢德才兼备的人，作为一国

之君，因为爱民而安定，因为喜欢德才兼备的人而荣耀。如果这两者一个都不具备，那么国家就会灭亡。下面讲了具体应该怎样做。

“明分职”，“分职”就是分掌的职务，也就是要讲求分工，把各个职位的职责都明确下来，让官员能够分治其事，明确各部门掌管的职务。

“序事业”，就是把事情的轻重缓急排一个次序，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不能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后面，而把不重要的事情摆在前面，这样就会本末倒置。

“拔材官能”，就是要选拔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为官。而要做到“拔材官能”，君主、领导者必须没有猜忌之心，要能做到用人不疑。

“莫不治理”，就是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没有得不到治理的。

“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这样一来，为公家效忠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而行私请托的门径就会被杜绝。

“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公正道义的风气就会彰显，而个人牟私的事情就会止息。

“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悦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这样做了之后，品德醇厚的人就能得到重用，而谄媚奸佞的人就会受到遏止；贪图利益的人能够被辞退，廉洁奉公的人能够受到起用。这都是喜好贤士的结果。

真正爱民如子，就应该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来做官，这样，百姓才能够真正得到长寿、富裕和尊贵。所以爱民而安，好士而荣，是治国最根本的两个原则。真正爱民，就必然会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来做官，这样才能给百姓带来真实的利益；而德才兼备的人出来做官，他也必然会提醒、劝告君主，要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实施那些有利于百姓的政策。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密切相关的。

## 第七十四讲

修身为本，教学为先



## 位也者，立德之机也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

——《群书治要》卷十七《汉书五》

臣听说尧帝接受天命成为天子，就为如何治理天下而感到忧虑，却没有听说因为坐上了天子的位置而感到高兴。

所谓“慕贤当慕其心”，圣贤人和凡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存心不同。尧受命成为天子，并没有以此为乐，而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他唯恐自己无法恪尽帝王的职责、唯恐不能治理好天下，不能解除百姓的忧患。可见，圣贤人所存之心，纯是利人、爱人之心，完全是想为天下人谋福利、为天下人解除困苦，没有自私自利。而且尧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当前的工作做好，还花了28年的时间寻找好的继承人，最终找到了舜，且经过一番调查考验后，才放心把位置交给他。舜继位后，也同尧帝一样，以天下为忧，恪尽职守之余，也为国家寻访到了德才皆善的后任者——大禹，之后也把天子的位子放下，就好像把一个已经坏掉的鞋子丢掉一样，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如孟子所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这是因为他把治理天下这个重担已经扛了很久，再找到合适的继承者后，终于可以卸下来松一口气了。

圣贤人为什么能以天下人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为什么心存爱人、

利人之心？这是因为圣贤人是真正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万物与我一体，我和众生、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你我的区别，就像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宋代张载也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以爱众生就是爱自己，利益众生才是真正利益自己；相反，损害众生，实际上是真正损害自己。“仁者无敌”，并不是说仁者很强大，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是因为仁者、圣贤人明白上面的道理，所以他们能够做到心中没有敌人，对任何人都不存怨恨之心，真正做到天下没有一个我恨的人、没有一个我不能原谅的人、没有一个我不爱的人，而且还能做到爱人如己。普通人之所以有喜爱和憎恶之心，喜欢这个，厌恶那个，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思想上还有分别、有对立、有执着。就像大海里有很多水泡，每一个水泡都执着于这个水泡是我，于是就和别的水泡起了对立、起了矛盾、起了纷争。真正明心见性的人，就是水泡破了，回归到了大海，知道原来整个大海才是自己的人。这就是凡圣存心的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不同。一般的人，智慧都比较浅薄，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就会迷失本来的那个自己，比如，有些领导干部，从政目的不纯洁，私心作祟，升官是为了发财，同时升官也滋长了他自己各种不善的情绪和欲望，逐渐变得傲慢、易怒、霸道、强势，控制欲、权力欲也会随之增长，这样就泥足深陷，大错特错了。

身居官位的人如果把权位变成指使他人的工具，这种态度就错了。《群书治要·中论》里有句话，“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就是说，职位和权势都是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颐指气使、炫耀自己的资本，更不是损人利己、骄奢淫逸的条件。《群书治要·商君子》中说，“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意思是，乱世的君臣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洋洋得意地想怎样才能专有一国的利益，想方设法获得更重要的

官位以方便谋取私利，这是国家危亡的重要原因。所以观察一个国家是兴盛还是衰败，是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首先就要看一看这个国家的领导干部的所思所想，是想着如何把自己的位置承担好，利国利民，还是想着如何用自己的官位谋取私利、升官发财。

在《论语》中，孔子教导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一个人，特别是读书人，正确的心态应该是，不担心没有一个好的位置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应该担心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德行，立德、立功、立言于社会；不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不担心大家都不知道我，不应该追求外在的虚名，而应该追求获得可以为天下人所知道的，甚至可以为后世所知道的，为后世产生影响的那种德行和能力。这句教诲是让我们立身处世回到根本，要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德行和能力，这样一旦自己有了机会，才能抓得住。抓住这个机会干什么？不是以权谋私，不是升官发财，不是扩大自己的影响、赢取虚名，而是要为国家、为民族来贡献自己的能力。

##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

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

——《群书治要》卷十六《汉书四》

“贾曰”，就是汉代陆贾所言，他说：“天下安定时，要注意选好宰相（也就是最高的行政首长）；动乱的时候，就要注意选好将领。将相能够和睦相处，贤士就乐于归附；贤士归附，天下即使有变化，权力也不会分散。”

“相”是宰相，在古代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所有重要的决策

都要通过他去制定、去执行。天下安定的时候，就要注意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宰相，宰相需要既有智慧、有能力，又有德行修养，特别是要有度量。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说明什么？说明宰相的心量必须大，量大福大。他的度量大，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不嫉贤妒能，能够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发挥特长，所以他还要有知人善任的能力。综观历朝历代，只要有好的宰相在任，天下就会安定。譬如宋朝的王旦，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度量就很大，寇准批评他，他不但不记恨，还为寇准美言，说其是为国家着想，所以他当宰相的时间也最长。在历史上，那些能当宰相的人，并不是必须最有能力的人，而是最有德行、最能够知人善任、最不嫉贤妒能的人。这样的人当宰相，才能使有德行、有能力的人出任在合适的位置上，把国家政事治理好。

将军，最重要的德行品质就是要忠诚。因为他手握兵权，外出率兵打仗，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如果他没有忠诚的德行，一旦心生谋逆叛乱，那就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灾祸。所以《孔子家语》中说，“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迓也”。弓要调整好了之后，才能期求它有力量；马驯服了之后，才能期求它成为良马；士人必须在考察德行的基础上，再去期求他有智慧和才能。一个人如果不忠诚，但是却很有能力，那就会像豺狼一样，是不能接近的。试想如果接近了有虎狼之心的人，会是什么结果？那一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将军是武将之首，手握兵权，如果有能力、有兵权，却没有忠诚、没有德行，那将是很危险的事。

“将相和，则士豫附”。“将”就是武官的首领，“相”就是文官的首领。文官、武将的最高领导人都能非常和睦，那么上行下效，下面的人也能够和睦相处。“士豫附”，这个“士”指读书人，也指贤德之人，“豫”就是非常欢喜，“附”就是归附。贤德之人看到文官、武将的最高领导者都能做出和睦的榜样，那么他们也会非常佩服、非常欢喜，乐于归附，为

国效力，来造福国家、人民。

“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读书人和贤者都归附了，天下形势即使有所变化，譬如最高的权位突然发生了变动，或者是发生了战争，有外敌入侵，那么由于将相团结，文官、武将都能同心，就能稳定整个国家的局面、稳定人心，权力也不会分崩离析。如果将相不和，一旦最高权位有所变动，每个官员都打自己的小算盘，想着拥立哪个人做领导者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私心作祟，不为大局着想，那么最后导致可能有很多人去争夺权位，这时天下就有危险了。从历史上看，皇位继承人有变动时，必然是最容易出现动乱的时期。动乱之后，就会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使人民遭受战乱的苦难。如果将相协和，那么即使有这些变动，权力也不会分散，国家的整个大局也能够保持稳定。

## 先公家之急，而后私讎也

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先公家之急，而后私讎也。

——《群书治要》卷十二《史记下》

这段话是战国时期赵国上卿蔺相如所言。在《史记》70篇列传中，有一篇为《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着赵国将军廉颇和上卿蔺相如的故事，它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启发。

廉颇是赵国赫赫有名的一员良将，建立了不少的战功。蔺相如也是赵国人，但是他出身比较低微，原先只是赵国宦官之长（就是宦官的总首领）缪贤的家臣。赵惠文王在位的时候，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后来秦昭王知道了，就派人给赵王写了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交换这块

宝玉。赵王收到信之后，就和大将军廉颇及大臣们商量，认为如果把宝玉给秦国，秦国的城池恐怕也不可能得到，只能白白的上当受骗；如果不给，秦军可能借此马上前来攻打。一时间，群臣都没有想出妥善的应对之策。于是赵王想找一个人出使秦国，回复秦王，但是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这时，宦者令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完成使命？”缪贤说：“为臣曾经犯罪，私下打算逃亡到燕国去，但是臣的门客蔺相如阻止了臣，问臣怎么能了解燕王。臣对他说臣曾经随从大王在国境上与燕王会见，燕王私下握住臣的手，表示愿意结交。因此臣了解，所以想投奔于他。蔺相如对臣说当时赵国强、燕国弱，而臣受宠于赵王，所以燕王才想要和臣结交。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臣是逃出赵国奔往燕国，燕国害怕赵国，在这种形势下燕王必定不敢收留臣，甚至还可能把臣捆绑起来再送回赵国，所以臣这样去投奔他是不妥当的。他劝臣不如自己脱掉上衣，露出肩背，主动伏在斧刃之下请求治罪，这样也许能侥幸被赦免。臣听从了他的建议，大王果然也开恩赦免了臣。所以为臣认为这个人是有智有谋的勇士，派他出使会非常适宜。”

听了缪贤的推荐，赵王就决定召见蔺相如。赵王问蔺相如：“秦王要用15座城池请求交换我们的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回答说：“秦国强大，赵国弱小，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但是如果秦王得了宝璧，却不给城池，那应该怎么办？”蔺相如说：“秦国请求用城池来交换和氏璧，赵国如果不答应，这是赵国理亏；赵国如果给了秦王和氏璧，但是秦国不给赵国城池，这是秦国理亏。两种对策衡量一下，我们宁可答应他，让秦国来承担理亏的责任。”赵王再问：“那谁可以出使？派谁做使臣？”蔺相如说：“大王如果确实无人可派，臣愿意捧护宝璧出使秦国。如果秦王愿意把城池给赵国，那么臣就把宝璧给秦王；如果秦王不能把城池给赵国，那臣就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蔺相如对赵王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可见对自己信心十足。于是赵王就派他带着和氏璧，西行入秦，出使秦国。

到了秦国，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了蔺相如。章台宫只是秦王宫里一座很普通的宫殿。蔺相如把宝璧献给秦王后，秦王大喜，就把宝璧给左右的侍从还有妻妾们传看，结果左右看了之后都高呼万岁，谄媚巴结的声音一片。过了许久，蔺相如看出秦王并没有想给赵国城池的意思，于是就走上前去，说：“这块和氏璧有一个小小的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一听和氏璧还有瑕疵，就把璧交给了蔺相如。和氏璧回到蔺相如手中后，蔺相如捧着和氏璧退后几步站定，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宝璧，派人送信给赵王。我们赵王召集了全体大臣商议到底应不应该把宝璧送给秦王，结果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倚仗着自己的强大，想用空话得到宝璧，补偿给我们的城池恐怕是得不到的，所以打算不把宝璧送给秦国。我认为一般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不应互相欺骗，更何况是大国之间的交往。况且，为了一块玉璧，就使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也是不应该的。于是赵王斋戒了五天，才派我捧着宝璧，在殿堂上恭敬地行过叩拜礼，亲自拜送了国书。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为的是尊重大国的威望，以示敬意。可是如今我来到了贵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台宫接见我，礼节非常傲慢。接到宝璧之后，就传给姬妾们观看，这样来戏弄我。我观察大王并没有给赵王15座城池的诚意，所以我又把这个宝璧收了回来。大王如果一定要逼迫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宝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

说完之后，蔺相如手持宝璧，斜视庭柱，眼看着就要向庭柱上撞去。秦王怕他真的把宝璧撞碎，便赶紧向他道歉，坚决请求他不要这样做，并且召来主管的官员，说察看一下地图，把从某地到某地的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其实这都是在装模作样。蔺相如也看出秦王只不过是用手段假装给赵国城池，实际上赵国不可能得到，于是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惧怕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沐浴了五天，如今大王您也应该斋戒五天，而且要在殿堂上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璧。”秦王估量此事，毕竟不可强力夺取，于是就答应

斋戒五天，让蔺相如住在广成宾舍。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是必定会背弃信义，不会把城池给赵国，于是他就派随从穿上粗布衣服，怀中藏好宝璧，从小路逃出，把宝璧送回赵国。

秦王斋戒沐浴五天之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宴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秦王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个是能坚守盟约的。我实在是怕受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就派人带着宝璧回去，已经从小路回到赵国了。况且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您只要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会立即把宝璧送来。如今凭您秦国的强大，不如先把15座城池割让给赵国，赵国又怎敢留下宝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之罪应该被处死，情愿接受油锅烹杀之刑，只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能够仔细考虑此事。”秦王和群臣面面相觑，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之声。侍从中有人要把蔺相如拉下去处治，秦王就说：“如今即便杀了蔺相如，终归还是得不到宝璧，反而会破坏了秦赵两国的交情，不如趁此好好款待他，把他放回赵国。赵王难道会为了一块玉璧而欺骗秦国吗？”所以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了蔺相如，完成了大礼，就让他回国去了。

蔺相如回到赵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一位贤能的大夫，身为使臣能不受诸侯的欺辱，于是就封他为上大夫。此后，秦国没有给赵国城池，赵国也始终没有把和氏璧给秦国。

后来，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了石城。第二年，秦国再次攻打赵国，还杀死了两万人。秦王派遣使者通告赵王，想在西河外的滹池与赵王进行一次友好会见。赵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廉颇、蔺相如商议说：“大王如果不去，就会显得赵国既软弱又胆小。”于是赵王前往赴会，蔺相如随行。廉颇护送到边境，和赵王诀别时，说道：“大王此行，算上路程和会见礼仪结束，再加上返回的时间，不会超过30天。如果30天您还没有回来，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的妄想。”赵王同意了这

见，便去滈池与秦王相见。

在会见的过程中，秦王饮到酒兴正浓时，就说：“寡人私下里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为我弹瑟吧。”赵王没办法，就鼓起瑟来。这个时候秦国的史官上前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一起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一看，上前说：“赵王私下里也听说秦王擅长秦地的土乐，请让我为秦王捧上盆缶，以便互相娱乐。”秦王发怒，不答应。蔺相如就向前递上瓦缶，并且跪下来请秦王演奏。秦王不肯击缶，蔺相如就说：“在这五步之内，我蔺相如要把脖颈里的血溅在大王身上了。”秦王的侍从们想要杀蔺相如，蔺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侍从们就都吓得退了下去。当时秦王不大高兴，但是也只好击了一下缶。于是蔺相如也回过头招呼赵国的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缶。秦国的大臣们又说：“请你们用赵国的十五座城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也不客气，回答说：“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直到酒宴结束，秦王始终未能压倒赵王。由于赵国也部署了大批的军队来防备秦国，所以秦国也不敢有什么举动。

滈池会结束后，赵王回到都城，考虑到蔺相如此行功劳很大，于是就封其为上卿，位置在廉颇之上。对此，廉颇有点不高兴，就说：“我是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是靠能说会道立了点功，但是地位却居于我之上，况且蔺相如本来是卑贱之人，现如今他在我之上，这让我感觉到羞耻，难以忍受。”并且扬言：“假如我遇见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闻，便不肯与廉颇会面，每遇上朝，常常推说自己有病，不愿意去和廉颇争位次的先后。没过多久，有一次外出，蔺相如远远看到廉颇，就立刻掉转车子回避。蔺相如的门客看到后，心里不平，就一起直言进谏，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侍奉您，就是仰慕您的高尚节义。如今您与廉颇官位相同，廉老先生口出恶言，您却害怕到躲避他，您怕得也太过分了。平庸的人尚且感到羞耻，更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我们这些人没出息，请让我们告辞吧。”蔺相如坚决挽留他们，说：

“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厉害？”大家都回答说：“廉将军当然比不上秦王。”蔺相如说：“以秦王的威势，我都敢在朝堂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怕廉将军吗？”

下面就是开头所节选的蔺相如说的话，“顾吾念之”，“顾”就是一个转折，但是我想到，“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一文一武，一将一相。“今两虎斗，其势不俱生”，如今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吾所以为此”，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忍让，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先公家之急，而后私讎也”，就是为了先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从这段回答可以看出，蔺相如的存心确实是事事都以国家大局为重，为了国家的急难，为了国家的利益，甚至不惜自己受到羞辱。

“廉颇闻之”，廉颇听了这些话，“肉袒负荆”，他就脱去了上衣，露出上身，而且背着荆条，“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廉颇也很了不起，他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去赎罪，而且还由这些宾客带领着，来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他说：“我是一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将军您是如此宽厚！”“卒相与欢”，二人终于相互交欢和好，“为刎颈之交”，成了生死与共的好友。

从完璧归赵以及负荆请罪两个著名的历史典故可以看出，蔺相如思考问题，确实都是为国家着想、为大局着想，心中完全没有个人的得失。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完璧归赵，在一般人看来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蔺相如却不觉得难；他总是回避、躲着廉颇，一般人觉得是一件很羞耻的事，但是蔺相如却不觉得羞耻，为什么？就是一般人私心太重，把“我”看得太重，而蔺相如却完全是一片至公之心，能念念为国家、为大局着想，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包括生命、面子，所以对他来说，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事情在他那里也就不难了。

太史公评论说，知道将死而不害怕，必定是拥有很大的勇气。死并非难事，可怎样对待死才是难事。当蔺相如手举宝璧斜视庭柱及呵斥秦王侍从的时候，就当时形势来说，结局最多不过是被杀，然而一般士人却往往因为胆小懦弱而不敢如此表现。蔺相如一旦振奋起自己的勇气，其威力伸张出来足以压倒强大的秦国；他的那种正气，足以让手握兵器的侍从、侍卫都感到害怕，不敢向前。后来他又能对廉颇谦逊退让，以至他的声誉比泰山还重。他处事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可以说是兼而有之。所以说蔺相如确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片公心，能为国着想，没有私心，所以才能表现出这种大智大勇。

## 贵其所尚，抑其所贪

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贪荣而重利，故贵其所尚，而抑其所贪。贵其所尚，故礼让兴；抑其所贪，故廉耻存。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古圣先王知道人的本性一方面喜好善良、崇尚美德，另一方面又羡慕荣誉、看重财利，所以就重视其所崇尚的，而抑制其所贪求的。重视其所崇尚的，礼让之风就会兴起；抑制其所贪求的，廉耻之心就能保全。

《礼记·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而这里所说的“贵其所尚”就是长善、“抑其所贪”就是救失。那古圣先王依靠什么来抑制人们所贪求的、重视人们所崇尚的？就是依靠教育。在中国古代，所有制度都是围绕着把人教导成为一个好人而设计的，这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合力才能完成，然后再通过严谨的选拔制度，把这个好人选拔在领导位置上，这样，就能达到礼让之风兴起、廉耻之心保全的效果。

譬如，古代的教育制度，在乡间要设立庠序，在国家层面要设立太

学，这些机构都是教导人们仁义礼智的道理。所以人们从小就有正确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总结。《四库全书》的核心内容，概括言之，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如果社会大众都有明确的是非、善恶、美丑观点，就会以礼让为荣，而以贪求为耻。

再譬如，中国的选拔制度，在汉朝的时候实行了“举孝廉”的选拔制度，要求从社会上把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选拔出来，交由国家来培养，并作为官吏的后补，这也是让人去崇尚美德而抑制贪求。“廉”就是不贪，有贪心就会以权谋私、贪财好利，也就很难能把官职做好。古代的激励机制，也是要从社会上把那些喜好礼让、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还有关心老人、扶危济困的人选出来，由皇帝下诏书给予褒奖，而一旦接受了皇帝的褒奖，就可以成为“命民”或者“命妇”，也就可以乘坐装饰得很好的两匹马拉的车子出行，其他人看到这种架势，就知道坐车的人是受到了皇帝的褒奖，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德行，就会对他生起恭敬之心。因为一般人即使再有钱，假如没有“命民”的称号，也不能坐这样的车子出行。可见，这些制度都是为了要激励人们培养美德、崇尚善良，而不是崇尚金钱、崇尚奢侈。

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选拔制度、激励机制等，都是为了能够把这些有德行的人推举出来，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德能兼备的人处在领导的位置上，上行而下效，这样一来，社会道德风气就会非常淳厚。

## 治民之道，务笃于教

治民之道，务笃于教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二《盐铁论》

治理百姓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心一意致力于推动教化。

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中国人解决问题讲究治本之策，社会诸多问题，譬如食品安全、贪污腐败、不诚信、欺诈甚至恐怖现象等问题的产生，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人心浮躁。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要改变人心，光靠两条法律制度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靠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才能有效果。

《孔子家语》中说：“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全军溃败，不可以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以处置惩罚百姓。为什么？因为“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这是因为上面的教化没有施行或施行不得力，所以罪责不在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谨诛，贼也”，法令非常不严谨，诛杀却非常急迫，这是残害百姓。“征敛无时，暴也”，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不适时，这叫暴政。“不诫责成，虐也”，不事先警诫，或者没有事先给百姓良好的教育，却苛求他们能够做到，这叫虐政。“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办理政事如果杜绝了以上三个方面，才可以用刑。

因此给人们以良好的道德教化，也是有步骤的。孔子说，“既陈道德以先服之”，就是说，首先要给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让大家明白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让大家顺服，这样人们才不会轻易作恶。

在古代，孩子从童蒙教育开始，就开始学习《弟子规》《童蒙养正》，学习怎样做才是孝顺父母，如“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

宣讲了伦理道德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则尚贤以劝之”，就要崇尚那些有德行的人，劝勉百姓向善。现在的社会尽管评出了很多的道德模范，但是仅仅评选出来还不够，不能只在颁奖晚会上宣讲一下就草草了事，还要给他们以很高的荣誉、特殊的待遇，要经常宣讲他们的先进

事迹。好的故事、好的素材可以拍成电影、连续剧进行宣传教育。然而，当前这些工作需进一步完善。在古代，很多的妇女虽然没有读过圣贤书，但是她做人知道忠孝节义、知道孝敬公婆、尊敬丈夫、教育好儿女。她们从哪里学来的这些？都是从民间的文艺作品中学来的。戏剧在古代是重要的价值观传播媒介，它以劝人为善作为教育目的。我们去考察祠堂时发现，祠堂的对面总有一个重要的建筑物——戏台。为什么在祠堂的对面设置戏台？那是古人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表现，古人希望通过文艺的形式给以人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劝导，使其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道德教化。

“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如果还是不行，就要把那些不能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废弃、贬退，让人生起畏惧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全都做到了，百姓的言行自然也就端正了。“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倘若还有一些顽固不化的奸邪之徒，最后才给以他们刑罚的制裁，这样民众就能明理而知耻，羞于犯罪了。“是以威力而诫，刑措而不用也”，因此不需用严厉、苛责的政令就能起到教诫作用，而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今世不然”，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人民又怎么可能不逾越？所以孔子这段话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民众以道德的教化。如果人们没有接受教育，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么也应该给予宽恕。宽恕之后，还是要给以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做人的根本。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以讲授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讲堂参观，有个接受了七天课程学习的学员跟我们分享心得，他说自己是正在服刑的人，而且是“三进宫”，本来是母亲让他来学习的，他一开始很不情愿，但是听了课之后，内心非常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接受这样好的教育，

白白让父母为自己担忧，很不孝。其实这不是个例，大量的事实证明，学习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确可以把一个坏人从根本上转变成为一个好人。这也说明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只是以往没有用心去教，或者教的内容方法不对，更重要的是对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没有生起信心。

古人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正是因为道德教育有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时至今日，世界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就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而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所致。所以要解决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首先必须恢复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由国家选拔、培养真正通达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而且德行兼优的老师，在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媒体，宣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讲解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以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还要配以因果的教育，让人不敢作恶。

第二，要真正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也就是说，领导者的选拔、干部的任用甚至中共党员的吸收，都必须首先具备孝、廉的品质。

第三，党校教育、国民教育，要以“五伦”“八德”作为主修课或者必修课，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领导干部要率先参加，并且身体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上行下效，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第四，创办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验点。譬如，可以先在一个小区、一所学校、一个村镇、一家企业，甚至一所监狱落实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再把成功的经验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推广，请世界各地的人前去参观。这样能让人们重新拾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安徽庐江汤池镇就已经率先行动，成了弘扬和践行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榜样示范，很多人前去参观后，觉得它的成功确实能够帮助实现和谐社会乃至通向大同世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后，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处处看到对方的需要、为他人着想，总是想着多付出、少索取，大家都这样做，就会感觉到生活在这里很温暖、很和谐、很幸福。每一个来到这里学习参观的人也都深受感染，知道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都愿意去效仿。再比如，十几年前，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就把《弟子规》等传统文化课程落实到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中，结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中央电视台制作为《迟来的爱》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成功的案例，能够让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更加生起信心，让我们坚信唯有恢复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才能够解决当今各种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

所以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必须从各个方面深化改革，但是改革的重点绝对不是盲目推行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政治，而应是通过政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恢复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着重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文化断层等问题，因为唯有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才能拯救人民的心灵，也才能化解冲突灾难，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效果。

《群书治要·新语》中讲，“君子见恶于外，则知变于内矣”，君子看到外面出现了各种各样恶的行为，就应该知道要在内兴起变革了。“今之为君者则不然，治不以五帝之术，则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现在有的领导者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用五帝的治国方略治理国家，还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不能用道德治理；“为臣者不师稷契，则曰今之民不可以仁义正也”，“契”是舜在位时的司徒，当时他用五伦大道来教导人们，现在做臣子的不能效仿后稷和契，自己不能首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还说现在的人民不能用仁义来教正；“为子者不执曾闵之质，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现在做儿女的，也不能仿效曾子、闵子骞那

样从早到晚孝顺父母，还说家人不能和睦，甚至与父母有代沟；“学者不操回赐之精，昼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现在做学问的人，也没有像颜回、子贡那样昼夜不懈、精进不息的精神，还说在这个世间，大道行不通。

“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周文王的朝廷里多是有道德、有智慧的人，而秦始皇的朝廷里多是不祥之人。这是什么原因？“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恶者必有所因而来。夫善恶不空作，祸福不滥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善人之所以能够被感召而来，是因为上位者心存善念、常做善行；作恶的人之所以被感召，也是因为在上位者的恶心恶行。可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只要领导者真心实意希望治理好国家、希望社会道德风气变好，而且能够从自身做起，落实伦理道德规范，兴起伦理道德教化，就能感召到贤德的人前来辅佐，大家同心协力，国家就一定能够治理得好，社会风气也一定可以扭转，所以关键在于领导者自己是否真心向善。

## 上行下效，知行合一

上为下效，然后谓之教。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崔寔政论》

上位者怎么做，下位者就会起而效法，跟着怎么做，这就称为教化。这是告诉我们怎样去教，才能使道德教育起到作用，深入人心。

《说文解字》对“教”下了一个定义，“上所施，下所效也”，这句话把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揭示出来了。“教”，在古代的写法是：左边的上面是一个“丩”，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丩”，再下面是一个儿子的

“子”，右边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左边上面这个“父”，是父母、老师、领导所化，下面一个一模一样的“子”，是儿女、学生、下属所化，这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是身教胜于言教；而右边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是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耳提面命、经常提醒的过程。

所以身教加耐心，就是把人教好的秘诀所在。一个人习气的养成不是一天两天的结果，所以也不能指望他学了一两天或者一两周、一两个月、一两年的《弟子规》，就能够把行为扭转，而是需要长期熏修，而且更重要的是做父母的要给儿女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首先都要符合《弟子规》的要求。道德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授不同，它不是靠言语的说教，而是靠教育者的身教来带动的。

所以孔子强调“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有何难处？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端正别人？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打铁必须自身硬”。这句话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为政之要，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不应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除了下属、子女、普通百姓需要教育，领导者、教育者更需要受教育，因为他们的道德应当更高尚。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领导者、教育者如果只是用言语来教导，自己却做不到，对方就会起争执，甚至有逆反，说“你都做不到，有什么资格说我”，即便屡次下命令，他也不会服从。反之，如果领导者、教育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无须言语，下属百姓也会自然跟从、受教。

《中庸》中说，做学问，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还有一个“笃行之”。如果没有“笃行之”，做不到知行合一，圣学也很难入门。所以如果在我们面前放着一个天平，一边放上《弟子规》，另一边放上《四库全书》，两边的分量其实是相等的，因为《四库全书》代

表的是知，而《弟子规》代表的是行，即便我们读得懂《四库全书》，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如果连《弟子规》里的教诲都做不到，那也不是真知，只是自以为知，还不如老老实实将《弟子规》里的教诲落实到生活中，对我们做人更管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知行合一，并不是谈玄说妙。

## 正己化人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以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古代有德行的人，都能推己及人，为天下人民着想，他们推行自己所崇尚的美德来教导天下，则人民没有不崇尚美德的；以自己所憎恶的丑行来告诫天下，则人民没有不知道羞耻的。下半句和上半句意思相通，是告诉我们：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得力，就在于领导者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己做到后再要求别人，别人也就很容易受教；而自己所憎恶的坚决不做，并且以此来告诫天下，那么要求别人不去做也就很容易。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居安思危、崇尚节俭，创立了大宋的基业。有一次，他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由翠鸟羽毛做装饰的短上衣入宫，赵匡胤看到之后十分气愤，就对长公主说：“你把这件衣服给我，从今以后不要用翠鸟羽毛做装饰了。”长公主听了之后不以为然，还笑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也用不了几根羽毛。”赵匡胤正色说道：“你说得不对。你穿这样的衣服，宫中其他人看到就会纷纷效仿，这样一来，京城翠鸟羽毛价格便会上涨。商人看到有利可图，就会从四处辗转贩运翠鸟，这要杀伤多少鸟儿？你千万不能开此奢华之端。”长公主听了赵匡胤的话，连忙

叩谢父皇的教诲。

可见，上位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给全国做出示范。如果要求全国人民以骄奢淫逸为耻，结果自己却专门穿那些奢侈品，还想让全国人民不去追求，怎么可能做到？当前，国家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自己能够率先垂范，严格要求自己勤俭节约，结果上行下效。所以道德教育是有规律的，那就是领导者和教育者要先受教育、要以身作则。

## 第七十五讲

修从政之德，怀律己之心



## 孝悌亲仁，立身之本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弟子规》也是以这六句话为纲展开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身为弟子，在家要孝敬父母，出外要恭敬长辈和上司，做事要谨慎小心，说话要言而有信，要博爱众人，亲近有仁德的人。做好了这六件事以外，再学习古圣先贤的典籍。

“弟子”，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释为，“对兄父之称，谓人幼少为弟子时也”，也就是说，对父称子，对兄称弟，“弟子”主要是指人幼少作弟作子的时候。当然还有一种意思，“弟子”是就学生而言。

“入则孝”，在家庭必须孝养父母，使父母身心俱安。“出则悌”，《弟子规》中“悌”也写作“弟”，二者实际上相通，是说出外求学或者做其他的事要行悌道。“悌”，皇侃的注释中说，“善兄为悌”，善事兄长就是悌，邢昺的注释中说，“弟，顺也”。如果一个人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必然也就能敬顺兄长、善事兄长，因为这也是父母所希望的。在家如果能孝养父母、敬顺兄长，那么外出求学、工作的时候，把这种善事兄长的敬顺之心推而广之，也就能够对待比自己年长的人都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敬顺，

这就叫“悌”。

“谨而信”，《周易·乾·文言》中讲：“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庸”是日常生活中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言语要讲信，行为要讲谨。“谨”是对行为而言，“信”则是对言语的要求。

“泛爱众”，就是博爱众人。这是说，在与众人交往的时候，要注重博爱，这也是培养一个人的平等之心及宽容众人的德行。只有做到广泛的博爱众人，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亲仁”，就是“择仁者而亲近之”。上一句“泛爱众”，是从心里要求平等爱护一切人，没有讲要有所选择，但是如果学习，就必须得跟从仁者，这必须有所选择，要看跟随的这个人是否有仁德。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行”，就是实践了、做好了上面所讲的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这些都叫作“行”。把这些事做好之外，就是“余力”。弟子求学，应当以践行以上六件事为根本，应该先学“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些是学习的根本。为什么？因为“无本之文不可取”，如果没有做好这些事，就去专学一些古代经典，是不可取的。“学文”，马融的批注说，“文者，古之遗文”，“文”就是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经典。邢昺的注疏进一步明确说，“注言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他把“文”，“古之遗文”具体化为六经。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刚才讲求学之人被称为弟子，他所求之学必须有先后次序。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教导学生，首重德行，说明什么？说明要“先正其心，后为文学，游于艺也”。这个教学的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我们求学的次序如此，教育的次序也是如此。教育的次序一定是《三字经》中所说的“首孝悌，次见闻”，也就是说，首先要培养起一个人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尊师重道的德行，在其有了谦恭有礼的处世态度后，再让其去学习知识技能。一个人如果没有首先培养起

谦虚有礼的处世态度，就学了很多的知识技能，那就会学得愈多，愈傲慢；学得愈多，愈不把父母、老师放在眼里。

孩子对长辈没有礼貌的现象，在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教育的次序颠倒了，孩子从小没有从《弟子规》《童蒙养正》学起，没有培养起谦恭有礼、孝敬父母、尊师重道的态度，就学了很多知识技能，无形之中傲慢之心也就滋长得愈来愈严重。

很多孩子在上大学之前还知道孝敬父母，但是上了大学、硕士乃至博士之后，学历愈来愈高后，就变得愈来愈看不起父母。比如，孩子在和父母交流的时候，经常会说“你不懂”“你懂什么”“你不明白”，这些都是一个人傲慢之心的流露。中国古代的圣贤人，包括开明的皇帝，教导百姓都是依据正确的顺序来进行。像康熙皇帝，为了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他特意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敦孝弟以重人伦”，而且在这条前言中写道：“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盖父母生我，有罔极之恩。兄长先我而生，有同气之谊。”意思是说，善待父母叫作孝，善待兄长叫作悌。父母生养子女，有罔极之恩。《诗经·蓼莪》中也说，父母生育的恩德像天一样高，无穷无尽，子女想报答都报答不了，所以叫“罔极之恩”。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如前所言，“弟子”还有“学生”的意思，若指学生，那是指谁的学生？我们学习圣贤经典，当然是圣贤人的学生。如果我们学习《论语》，那我们就是孔子的学生。孔子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否学得和他们相像？这是我们要对照和反省的。譬如，《弟子规》中“入则孝”开头有四句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就是为人子女者所应尽孝的重点。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这是让子女从对待父母的态度上逐渐把“我”放下，学习关爱他人。懂得反省自身，以一颗仁爱之心、感恩之心去感化父母，要学会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从对待父母的态度上，从不忤逆父

母，子女就能够培养起一种不和任何人为敌、不和任何人起对立的心。

古人说“仁者无敌”，并不是说仁者能打败天下无敌手，而是说仁者是一个真正有仁爱心的人，他能够从心底不和任何人起对立，这是因为他懂得自己与他人是一体的关系。《论语》中讲到，“恕”是行仁之方。所谓的恕道，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说推己及人是行仁的方法，那这还只是接近于仁，还没有达到仁，因为以自己的心将心比心，和真正的“仁”还是有所不同。一个真正有仁心的人，他确实能做到自己与他人一体，就像大舜、闵子骞那样，能够化敌为友。可见，化敌为友是靠仁爱之心的感化、靠真诚之心的感化，至诚感通。这样的人做事才没有不良的后果、没有后遗症。中国古人把对待父母的孝心扩而广之，就会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一切动物甚至天地万物，等等。庄子有句话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就说明我们自己 and 他人，乃至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什么是一体的关系？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用这种心去处理问题，就会处理得很圆满，而且不留后遗症。

譬如，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当出现病虫害的时候，西方人的方法是喷杀虫剂，把害虫杀死。这实际上是种对立的方法，为什么称其为害虫？因为它危害了“我”的利益，这是以自我为中心思维方式的体现。但是这样做只会导致杀虫剂愈用愈多，为什么？因为虫子有了抗药性，仅仅使用一种杀虫剂，已经很难把虫子灭掉了，所以要几种混合在一起用，而且药性愈来愈厉害。试想一下，这些杀虫剂能够把虫子杀死，难道对我们人身就没有危害吗？西方人卡逊有本书叫《寂静的春天》，之所以取名如此，就是提醒我们，现代农业生产中杀虫剂、化肥、农药的普遍使用，已经不仅仅对自然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且对人类自身的健康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春天来了，田野里也听不到虫鸟的鸣叫声了。

再看中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仁德之心的人，会尊重虫子也是一条生命，所以不称其为害虫，在考虑到它们之所以吃农作物，也

是为了生存下去，才不得不觅食之后，会在菜地旁边专门开辟一块菜地，“邀请”小虫子去吃。尽管很多人听说之后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已经有很多有德之士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此言非虚。比如，有次我们去广东潮州一家传统文化机构参观，当到他们的农业基地考察时，就发现专门为虫子开辟的菜地里蔬菜被咬得千疮百孔，来吃菜的虫子很多；而旁边为人们食用的菜地里，却很少有虫子来吃，对比非常明显。这就说明人类如果以仁爱之心对待虫鸟，它们确实能够感应到，也会配合。可见，真诚之心不仅能够感动人，也能够感动天地万物。而这种仁爱之心，才是真正解决虫害问题的根本方法。

其实，这种仁爱之心也是西方人所说的博爱，每一个人都具有，也希望人人具有。但是为什么一般人培养不出这种仁爱之心呢？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人与万物一体的真谛。没有认识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关系，就会用对立的思维解决问题，这样会产生很多后遗症，最后还会危及人类自身。同时，如果没有生起对父母孝敬的心这个根本，仁爱之心也会无法长养起来，因为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友悌，是仁爱之心的原点。换句话说，博爱之美德，是从对待自己最亲近的人、对待与自己恩德最大的人的态度中培养起来的。在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中就这样写道：“人诚能孝悌，则本源之地已裕矣。”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孝悌，对父母尽好孝道，对兄弟行好悌道，“则本源之地已裕矣”。“本源之地”就是我们的心地，像六祖惠能大师曾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还有“福田靠心耕”。“本源之地”就是指心地。“本源之地已裕矣”，“裕”就是富裕的裕，西汉贾谊说“包众容物谓之裕”，能够包容众人、宽容万物，才能够称为“裕”。“由斯以往，自然和于妻子、信于朋友、尽忠于朝廷。如水之有源，源远流则流长；如木之有根，根深则叶茂。”可见，孝悌之心是仁爱之心、信义之心的渊源根本。

现在国家大力倡导建设和谐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呢？就是要从劝勉

孝悌做起。一个人能够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悌，如果向上提升，将此孝悌之心扩而广之，就是互爱；如果再把这种互爱之心向上提升，就可以达到互助、互相帮助，也就是说，关爱不仅仅停留在言语上，而且还能落实在行动上，当别人有困难时，能够及时伸出援手给以帮助，这就是《孟子》中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把互助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就可以实现古人所说的大同世界，也就如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

可见，要促进社会和谐其实并不难，最重要的就是要唤起民众的孝悌之心，而这首先应该从领导者、教育者做起。领导者如果能够做出孝悌的好榜样，上行下效，大众看到后也会受教，那么在社会上弘扬孝道就比较容易了，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反观当今，社会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小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缺乏亲爱互助、礼敬谦让，大到国与国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冲突不断、矛盾升级，究其根源，就在于家庭内部关系如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一个人如果在家的時候，对父母忤逆、顶撞；对兄弟姐妹不能够关心照顾，甚至可能因为一点点钱财就吵上法庭；夫妻之间也不能信任，同床异梦，试问他走上社会，能与他人和睦相处吗？能值得他人信任吗？显然不能。一个人从小没有在家庭之中培养起诚敬谦和、和顺恭敬的态度，走上社会后，必然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

在“出则悌”方面，《弟子规》中有两句话最为根本，即“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意思是，我们对待年长者，要像对待自己的兄长那样恭敬；对待他人的父母，能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孝顺。这样一来，就把孝悌之心扩展开来了，但是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能够真正把孝悌之心推而广之，平等无私地对待一切人、对待一切众生，那就

达到圣人的境界了。总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解决现在的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从根本上抓起，也就是要从培养人的孝悌之心来做起。

“谨而信”，“谨”就是行为要严谨，“信”就是言语要诚信。在中国古代，人们很重视行为的严谨性，譬如从早晨起床、盥洗到穿衣、吃饭，乃至行、立、坐、卧都有严谨的要求，《弟子规》“谨”篇中载有详细说明，像“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就是一个对待作息的严谨态度，告诉人们要早睡早起、珍惜时间。当然这个“夜眠迟”，对于现在人来说，要做正确的理解。

古代因为没有像现代这样发达的科学技术，所以古人一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迟”，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晚上八九点钟，但对于现在喜欢夜生活的人来说，这个时间其实还很早，他们一般不到深夜不会睡。当然，古人制定严谨的作息安排，除了科技不发达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遵循自然规律即按照“道”去生活。

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弟子规》，很多人对此很不理解，不明白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不明白为什么要按照《弟子规》中的内容来要求自己的行为，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活得挺好、挺自在的却要遵守这些清规戒律，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生活态度，不明白究竟怎样生活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往往任由习性、偏见等出现了问题，可能还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而圣贤经典告诉我们，只有按照“道”、遵循自然规律去生活，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按照“道”去生活，会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不按照“道”去做，可能会每天烦恼重重，压力不断，甚至身体出现问题，患上忧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弟子规》所载，即是圣人在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全是教导人们应如何顺道而行。所以学习《弟子规》就是向圣贤人学习，这才是真正获得幸福的途径。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就是要在生活中去练习、去落实。体现在哪里？就是体现在把《弟子规》全都做到。古人按照“道”去生活，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说人生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看到这些描述，确实能够感受到古人按照“道”去生活所获得的那种喜悦。

古人如此，今人亦是如此，只要按照“道”去生活，按照自然节律去饮食起居、安排自己的生活，就能体会到“君子坦荡荡”的感觉。反观现在人之所以压力重重、烦恼不断，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活方式背离了“道”，没有学做君子、更没有想学做圣贤的觉悟和志向，认为学做圣贤，与自己无关，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其实，圣贤人的生活就是一个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他们遵循“道”，按照自然节律来饮食起居，自然而然能够活得坦坦荡荡。

当然，按照“道”生活并不容易，必须行为谨慎。在古人那里，行、住、坐、卧都不能不谨慎，穿衣吃饭也都有严格要求。清代所编童蒙教材《五种遗规》中有一部《养正遗规》，就详细记载了从孩童时期开始人应当怎样穿衣吃饭、行住坐卧。譬如，其中一篇朱子《童蒙须知》对于怎么穿衣就有具体规定，做人要从整齐端正身体来做起。古人常说男子要三紧，即头紧、腰紧、脚紧。头紧，就是古代男子都留长发，所以要挽一个髻，这个髻要用头巾扎紧；腰紧，就是要用腰带把腰束紧；脚紧，就是穿鞋袜要系紧。这三处如果不紧束，很散乱，就会使身体散漫、不端庄，会被别人轻视。

军人一看都很有威仪，军姿很好，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军队生活，使他们养成了严谨的作风，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很有威仪的外表。反之，如果一个人经常穿着随便，

给人的感觉就不会很好，很难让人生出恭敬之心。如果这种习惯成了自然，轻浮散漫的态度一旦养成，表现在外，就会显得不端庄、不庄重，也会被人所轻视。

可见，古人穿衣很有讲究。不仅如此，连脱衣也大有学问。古人凡是白天所穿的衣服，夜里睡觉时都要更换下来，脱衣的时候，一定会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箱子里，不会散乱放置。这样做，不仅能防止被尘土弄脏、被虫鼠咬噬，也方便穿衣时容易找到，不至于丢失。而且衣服穿久后不免有污垢、破损，一定会勤洗晾晒、缝补破处，不会在意衣服多么奢华贵重，只要完整洁净就好。这也是《弟子规》中所说的“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如果能够这样效仿，不但可以树立威仪，而且还能节约资源、不浪费衣服。晏子有一袭裘皮大衣，穿了三十多年，虽然其意在以俭朴感化世俗，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他爱护衣物有道。可以看出，古人对穿衣服的确有很多具体的要求，怎样穿、怎样脱、怎样放、怎样在洗脸吃饭的时候去爱护它，都讲得非常具体。孩子从小学习这种谨慎的行为态度，一生都会受益无穷。

对于行住坐卧，《养正遗规·真西山教子斋规》中也有一些很具体的规定。譬如，坐的时候要“定身端坐，齐脚敛手，毋得伏框靠背，偃仰倾侧”，要稳住上身，端身正坐，两脚并拢，两手收敛，不能扶着椅框，不能靠着椅背，也不能俯仰、侧伏，这都会给人一种散漫、不严谨的印象。所谓“坐如钟，站如松”，坐有坐相，站也要有站相，要“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古人见面的时候，要拱手表示恭敬，两手相合以示敬意。所以站立的时候，要两手相合，身体正直，不得歪斜不正。不仅坐、站有要求，走路也有要求，即“笼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由于古人衣服的袖子都很长，所以走路的时候两手要相对伸入两袖之中，这叫“笼袖”，“徐行”就是慢慢地走。如果我们留心观看，就会发现那些稳重的人，特别是身居高位的人，走路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缓慢，像大象一样，显得非常

稳重而不是急匆匆的。走路时不能甩臂跳跃，也就是不能甩着胳膊，大步流星，然后又蹦蹦跳跳的，这都给人一种不庄重的感觉。当然，作为蒙学经典，《弟子规》里对于如何行住坐卧也有详细说明，像“步从容，立端正”“勿践阼，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一个孩子如果从小能够接受这样的教诲，久而久之，他的行为自然能够习以成性，行住坐卧就会变得非常庄重严谨。

除此之外，对行为谨慎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如“缓揭帘，勿有声”，虽然现在家居鲜少有门帘，但是开门、关门同样要注意别人的感受，要轻轻开关，尽量不要发出声响，以免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或学习。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态度推而广之，就能做到对任何事都小心谨慎。再比如“宽转弯，勿触棱”，曾经有位男士学了《弟子规》中这句话之后特别感触地说：“我以前走路经常碰到桌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学了这句话之后，才知道原来要宽转弯。”再比如“执虚器，如执盈”，这是说，即便端着一个空的容器，像空的盆子、空的碗，也要像盛满了水那样小心翼翼，一定要用双手捧着。这些都是“谨”的表现。

“信”，就是言语要诚信。《弟子规》中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这就是说，说话一定要讲诚信，言出必行，不要有意无意地欺骗别人。但在现在社会，不诚信的现象多到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譬如，我们上市场去买菜，想要货比三家，逛了第一家可能感觉还不错，但又想看看其他家是不是更好，于是可能就会跟第一家店主说待会儿来买，结果由于别人家的菜更好更便宜，就买了别人家的菜回家了，而没有再回第一家买，无形之中，这也是失信于人。

其实，做人如果言而有信，在社会上处事就会节约很多成本，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中国古代，人们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能够普遍以诚信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规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会办好，根本不用订立合同，人与人

之间完全信任。关于诚信，《弟子规》里还讲“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就是说，在承诺别人之前，首先还要考虑条件允不允许、自己能不能办到。如果自己能力有限，或者条件不允许，就不要轻易答应，否则会进退两难。

当然言语上除了要做到诚实守信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要求。比如，《养正遗规》中说：“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这就是说，凡是作为小辈或学生的人，说话要做到态度谦恭、语气和缓，不能高声喧闹，也不能玩笑嬉闹，对于父兄师长的教导，应该低头听受，不可妄加议论。即便师长的教诲错了，也不可马上辩解，而要暂且缄默不言，这是为人弟子、做学生应有的态度。尊师，才能重道。然而现在却不是这样，当老师、长辈为学生、晚辈指明错误的时候，学生、晚辈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反省检讨、虚心接受，而是矢口否认，并找借口为自己极力辩解。即便老师、长辈有所误解或说错了，也不能马上辩解、出言顶撞，而要过段时间，慢慢细心地分条陈述，将自己的本意或师长的不当之处委婉道出，这样才不会忤逆师长，事理也可以自然明了。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师生、长辈和晚辈间，而且在朋友间的言谈中也应如此。

看到经典里的这些论述，再看《弟子规》也会更加珍惜，因为这部著作是李毓秀从众多童蒙养正的教诲之中，把人们从早到晚行住坐卧、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方面面的规范要求，以极其简洁明了的语言概括出来的。可以说，它是完善道德修养的根本、是实现人生幸福的保证。体会到了这点，体会到了李毓秀的用心，我们再学习《弟子规》，就更能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恭敬的心，也会感觉到很亲切，愿意受教，愿意力行了。

“泛爱众，而亲仁”，“泛爱众”就是广泛地博爱众人。从哪里做起？前面说过，要从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做起，把这种孝悌之心推而广之，才

可能有博爱、泛爱的结果。“而亲仁”，这个“仁”就是有仁德的人。“泛爱众”是让我们博爱一切人，没有选择。但是要选择向哪些人学习？要向有仁德之心的人学习，甚至和谁交朋友、和谁交往，也要选择有仁德的人，孔子说过“以友辅仁”“无友不如己者”，这都说明了择友的重要性。亲近仁德之人非常重要，荀子做了一个比喻：“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蓬草本来很柔软、弯弯曲曲，但是如果让它生长在笔直的麻中，那么即使不去扶它，它也会自然向上生长。古人也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这就是说，与善良的人交朋友，就像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自己的衣服，但自己也能时时蒙受他德风的滋润，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品行也会提升。亲近仁者，可以“德日进，过日少”，对增长德行、成就道业都非常有益。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末高僧蕅益大师在《论语点睛》中对这一句话这样理解：“养蒙莫若学问，学问，不过求放心。”童蒙养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做学问。学问从哪里做起？做学问没有什么奥妙，就是要从“求放心”做起。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是“求放心”？“放”就是放任、失去，“放心”就是失去的本心、放任的本心，“求放心”就是把失去的本心找回来。人心本来是纯净纯善的，但是如果不致力于提升道德、保护本心，而是追求财色名利的享受，那心就会变得不清净、有染污，会放逸出去，这就叫“放心”，但如果能把这个放逸的心再收回来、找回来，就叫作学问。从哪里做起呢？蕅益大师接着说：“求放心，莫若格物致知。”

也就是说，学问要从格物、致知做起，“格物”就是格除物欲，如果我们能在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时不为所动，甚至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能克服住自己的妄念和欲望，久而久之，就能达到致知的结果。知，是智慧的意思。智慧是我们本性自有的，只要把心从财色名利上收回来，就能打开。为什么？有句话说“利令智昏、情令智迷”。一个

人如果在利益诱惑面前把持不住自己，就会昏头昏脑，做出糊涂事；如果过分贪恋情欲，也会蒙住心眼、迷失智慧。比如，现在有些贪腐官员之所以落马，究其原因不是贪财就是贪色，不是贪名就是贪利，都是因为抵挡不住诱惑，才迷惑了理性。

由此不难看出，童蒙养正的教育，养的是纯善的心性和行为。所以做学问，不是一个往上增加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减损的过程。如老子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求学和求道有什么不同？求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求知，它的方法是学得愈多愈好，以追求知识广博、博闻强记为目的，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甚至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有所知，就会有所不知，无论见闻多么广博，即使知道得再多，总会有不知道的东西。所谓学海无涯，庄子也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不仅疲惫，而且也难以达到目的。所以老子说为道的方法和为学的方法不一样，为道是一天一天地减损，减损自己的欲望，减损自己的念头，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也就得道了。

其实，儒家童蒙养正的教育也是要求根本智，而它的方法和我们现在学校所教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是什么样的方法？藕益大师在《论语点睛》中讲道：“直教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文行合一而修”就是告诉我们不是先行后文，也就是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不是从次序上讲的。如果有人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从次序上来讲的，那就错了。不从次序上讲，那从什么上面讲？从主次、本末的关系上来讲。“文行合一而修”，就是说“文”和“行”要同时修，但一个是主修、一个是助修，不能主次颠倒、本末倒置，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知行合一。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不是说先行后文，而是在“一切时文行合一而修”的意思，且“行”“文”要有主次之分，换言之，“修”是同时修，“学”是同时学，但是“用”却有先后次序，如先用在孝敬父母、

尊敬长辈；到学校要先尊敬老师，再尊敬同学。蕩益大师后面接着说：“盖文，是道统所寄。孝弟忠信等，即是文之实处。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若仅作六艺释之，陋矣。”这就是讲，我们所读的经典、文献，等等，都表达着“道”是道统所寄，所谓“文以载道”，就是这个意思。“孝弟忠信等，即是文之实处”，也就是说，圣贤的行持落实在文字上，就是经典。

所以我们诵读经典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向圣贤学习，更好地来修学孝悌忠信这些教诲。如果把这个“文”仅仅作作为六艺来解释的话，那就显得浅陋了。“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周文王虽然不在了，难道这个“文”也不存在了吗？当然不是。它依然存在、依然还有，但需要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表现出来。这个“文”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所以读书的目的是什么？读书不是为了谈玄说妙，不是为了助长自己的浮华之心、增长自己的知识面，而应该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增进自己的修养，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盖文，是道统所寄”的意思。

在《颜氏家训》中有一段关于读书的教诲。它说，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是“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就是为了开发人的心智、利于人德行的提高。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体察父母的心意、按照父母的意愿办事，如何轻言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谈话，如何不怕劳苦地去为父母找到美味可口的食物，让他们感到惶恐惭愧，进而愿意去效法；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侍奉国君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奉公守法、不侵袭犯上，在危急的关头，不惜献出生命，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忘自己忠心劝谏的职责，使他们痛心地对照自己，进而想去仿效；对于那些平时骄横奢侈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恭谨简朴、节约费用，如何谦卑自守，如何以礼让为正教之本、以恭敬为立身之根，让他们感到震惊变色，自感若有所失，从而收敛起骄横之态，抑

制住骄奢的心性；对于那些向来浅薄吝啬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如何体恤救济穷人，让他们脸红，产生懊悔羞耻之心，从而做到既能积财又能散财；对于那些平时暴虐凶悍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小心恭谨、自我约束，懂得牙齿因为坚硬而早脱、舌头因为柔软而得以久存的道理，如何宽仁大度、尊重贤士、容纳众人，使他们气焰顿消，显出谦恭退让的样子来；而对于那些平时胆小懦弱的人，就让他们看一看古人如何无牵无碍、顺应天道，如何强毅正直、言而有信，如何祈求福运、不违祖道，使他们能够奋发振作、无所畏惧。由此类推，各方面的品性都可以通过读书的方法来加以培养。

所以为什么读书？怎样读书？就是要能够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真正的含义。

## 圣贤教育感化民心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古圣先王明白顺从人性的教育可以感化人民。可见古圣先贤对于教育非常有信心，认为人是可以教育得好的，也认为社会和谐不是理想，而是可以达到的，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的盛世，就是由于推行圣贤教育所成就的。那么圣贤教育所达成的结果，古代可以，当今是否同样可以？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教。后面说“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这就是说，领导者要率先实行博

爱，人民受到影响，就不会发生遗弃自己亲人的事情，所以上行下效非常重要。

隋朝有名官员叫辛公义，他曾在岷州做刺史。发现当地人都害怕病人，假如有人患了病，大家都会躲避他，因为害怕被传染。即使是父子、夫妻、兄弟等骨肉至亲也不例外，生了病同样会被遗弃。在这种风俗影响下，患病的人因为不能受到照顾，被抛弃而死掉，久而久之，此地忠孝仁义之道也就丧失了。辛公义到任后，对此很担忧，他想改变这个习俗，于是就派遣官员到处巡视，观察各地，凡是患了病的人，都用床运回来，运到他处理政事的大厅里，给以医治。夏天流行瘟疫的时候，病人甚至多达几百人，放满了大厅内外。而辛公义就在大厅亲自摆放一榻，独自坐在里面，从白天到黑夜，面对着这些病人处理政事。他所得的俸禄，全部用来买药，还请来医生为这些病人治病，并亲自劝他们进食。经过妥善的照顾，这些病人最后全都被治愈了。

之后，辛公义就把他们的亲人叫来，对他们说：“死亡是由上天决定的，不会相互传染。过去你们抛弃他们，那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现在我将这些患病的人聚集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办事、睡觉，假如真会被传染，我哪还能够安然无恙？你们看，现在你们的亲人不都又恢复健康了吗？所以大家不要再相信传染这件事了。”那些病者的亲人都非常惭愧，拜谢后就离开了。

再后来，一有人患病，人们就争相送到辛公义那里；假若病人家里没有亲人，辛公义就将其留在自己家中照料。辛公义身先示范，爱民如子，所以全境内的人都称呼他为“慈母”，因为他有一颗慈母般善良的心，能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儿女来关爱。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当地人也开始关爱生病的人了，遗弃病人的风俗也逐渐得到了改变。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得知，作为地方官，辛公义能“先之以博爱”，他首先能做到广泛爱护百姓，用仁爱之心去救治病人，结果上行下效，至诚感通，老百姓才

起而效法，最后也得以改变风俗，使风俗变得有仁爱、讲孝悌。

“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向人民宣讲仁义道德，人民受到感化，就会起而效法实行。这就是说，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德义”，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荣、什么是耻。加注中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也”，上面的领导者如果都喜欢德义，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不服从效法的。

《礼记》中也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下级听从上级，并不是看他所下达的命令，而是看他的行动。上面的人如果喜欢某一个东西，那么下面的人只会比他（上面的人）更加喜欢。所以上级领导所喜好或所厌恶的事物就不可以不谨慎，因为他们是人民的表率。可见，领导者如果真的希望社会风气好转，真的希望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地提升，那就应该自己率先垂范，自己首先接受伦理道德教育、学习传统文化，然后把学习听课、身体力行的音像通过广播、电视大加宣扬，大众看到后才会起而效仿，整个社会也才会真正形成重视伦理道德、重视传统文化的风气。

“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领导者如果自己能先做到敬让，那么老百姓也就不好意思彼此去争夺、争讼。“若文王敬让于朝，虞、芮推畔于野。上行之，则下效法之”。在历史上，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畔的界限争执不决。他们听说西伯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于是就想让西伯昌来为他们裁定。但是他们来到周地后，看到周人在耕田的时候互相推让边界、走路的时候互相让路；到了周的都邑，看到男女各走各的路，老人不用自己背着东西在路上行走，旁边有年轻人帮忙照顾；到了周的朝廷，看到文武官员个个彬彬有礼，士让大夫，大夫让卿，彼此都互相谦让、有礼有节。看到这些，两国的国君非常惭愧，也不好意思再找西伯昌评理，就惭愧地回去了。周文王自己首先是个仁人君子，能够做到谦恭敬让，上行下效，结果才不仅仅感化了自己的百姓，还让虞、

芮的国君受到了感化。

“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在中国古代，明君贤王都是以礼乐来治国，像《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因为礼乐对于平衡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以及以此来达到社会和谐秩序至关重要。而礼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们源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与秩序，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模仿天地自然秩序而来的。天上的日月星辰运转不悖，地上的山海平原高下相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循环不息，这是天地自然的秩序，也是“礼”的来源。“礼”模仿天地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秩序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在这五伦之中，有两伦（即父子、长幼）是天伦，即天然的伦理关系。这些秩序都是出于自然，不能悖乱。所以圣人制礼，目的就是维持五伦关系，保持人的尊严，进而作为修道的基礎。

《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学习儒学就是要以修道为主，修道必须修定，也就是要保持定力；而要修定，就必须首先使行为有秩序，不仅五伦关系处理不能紊乱，甚至面对一切事物都不能够错乱，即使摆放书籍、文具、日常用品，也都要放置在固定的地方，这样在需要使用的时候才可以随手拿取。修道人，就是要能够养成不乱的习惯，渐渐地能够做到心里归于纯一，久而久之，定功、道力自然就有了，如此，就算遇到大事，也能够镇定处理，即使到了生死关头，也不至于手忙脚乱。

儒家的礼教、“礼”的教育，无论上智、中人、下愚哪一等人，都能学，也都必须学。学到一分便有一分的受用，学到十分便有十分的受用，学到圆满就能成就大道、成为圣人。正因为“礼”对于做人至关重要，所以孔子特别注重礼教。但由于某些原因，过去有些人以小疵而妨大美，批

评礼教、反对礼教，说礼教如何不好，甚至还阻止一般人学礼，结果有不少人受到影响，对礼教产生了误解偏见，其实那些人并不懂礼、不理解礼的深义、更不知道礼的用处，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所以有志学儒的人，不应该人云亦云、听歪理邪说，而应该以圣贤为师、以经典为师，接受圣人的教化，树立正确的知见，不仅自己学，还要劝人学，成己成物，这样才能够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献一份力量。

“乐者，天地之和也”，这就是说，真正伟大的音乐能够成功地仿真自然的和谐，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有意义、可取的，所以作乐应该以追求和谐为目的。而且中国古人认为，音乐不仅能够反映人的情绪、情感，还能够塑造人的性格，原因就在于它能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对人的心性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上可见，“礼”规定了明确的秩序和规则，而“乐”则能普遍地在人们中间建立一种平和的气氛，所以古代的礼乐教育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

“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崇尚什么、喜好什么、厌恶什么、反对什么，而且国家对崇尚的要加以鼓励、加以激励，对于反对的、禁止的要加以惩罚，这样，老百姓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就不会也不敢去违犯禁令了。

## 礼者，敬而已矣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孔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导百姓相亲相爱，没有什么比从孝道入手更好、更有效的了。孔子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孝是仁爱之心的原点。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莫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如果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都不能想着去报答，试问还有谁的恩德值得我们念念不忘去报答？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父母，那就不能树立起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即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这种处世原则如果没有树立，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世方式，即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全力以赴。

当这件事或者这个人由利变成害的时候，那对不起，我就会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当一个人以功利之心处事待人接物时，就会见利忘义、忘恩负义。为什么？因为父母对我们恩德这么大，对我们无私无求，我们对他们尚且没有亲爱之心、不能够回馈，那又怎么可能去爱国家、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一个人如果对他人、对人民很冷漠、漠不关心，归根结底就在于对自己的父母冷漠、不能体贴父母的需要。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是因为孝子有恩义、有情义、有道义，在家对父母尽孝，出外自然能对国家尽忠，不会做出忘恩负义、见利忘义的事来。所以孝是仁爱之心的原点，而仁爱之心正是从孝敬父母的情感培养起来的。

“教民礼顺，莫善于悌”。教导百姓遵循礼节、顺从长上，没有什么比弘扬悌道更好的了。一个人如果从小就能养成对长者的这种态度，且在每一个处事待人接物过程中，时时提起这份恭敬心，久而久之，他就会习以成性，长大之后自然谦恭有礼，不会轻视、傲慢他人。

领导者如果非常重视孝悌的教化，那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培养塑造就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在北齐的时候，有名官员叫苏琼。他在担任清河太守期间，有一个百姓叫乙普明，他和兄弟为了争夺田地，分了家，还打了多年官司，始终没有结果，他们各自提供的证人就有一百多人。苏琼

听说后，就召集乙普明两兄弟及众人，对他们说：“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意思是，天下最难得的就是成为兄弟，而最容易得到的是田地，因为兄弟有同气之谊，且年龄相仿，相处的时间最久，相伴很长时间甚至一生都有可能，田地作为身外之物只要通过辛勤努力就可以得到。假如得到了田地，却失去了兄弟的骨肉之情、手足之情，这不是人生很遗憾的事情吗？说到这里，苏琼自己掉下了眼泪，众人听后也无不哭泣，乙普明两兄弟叩头请求到外面再去考虑考虑。后来，两兄弟分居十多年后，又重新住到了一起，也不再为田产之事争执了。这就是“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的效果。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改善社会的风气习俗，没有什么比用良善的音乐去陶冶感化更好的了。就像孔子，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先问这个地方政事办理得如何，而是首先听一听当地流行什么样的音乐，以此知彼，不仅能够了解当地官员政事办理的优劣，而且还能了解这个地方的民风，这是因为音乐对移风易俗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和效果。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安稳君上，治理人民，使上下各守本分，没有什么比用礼更好的了。而礼的本质、礼的意义，归根结底就在于一个“敬”字。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关于礼的论述非常多，比如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如何“克己复礼”？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

“礼”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那它对于人、对于事、对于修道究竟有什么用处？其最大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树立起恭敬的处世态度，比如，《礼记·曲礼》开头就说“毋不敬”，郑康成解释为“礼主于敬”；《孝经》中也说“礼者，敬而已矣”。其实“敬”的意思非常广博，这里只从敬人、敬事两层要义来阐述。敬人，就是由衷地尊敬人。为什么由衷？因为人人都有可尊敬之处，就像《曲礼》中所说的，即

便是以苦力谋生或以小贩赚钱的人，都有令人尊敬的一面，更何况是那些有道德的人更令人尊敬。

我们尊敬他人，他人也就能尊敬我们，因为“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敬人人、人人敬我，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有礼有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然不可能有烧杀抢掠的事情发生，生存在这里，人的身心也能得到安乐，这就是礼的好处。再说敬事，不论是自己办事，还是为他人办事，都要尽心尽力办得彻底。假如一件事要办到十分才算圆满，那就必须办到十分，如果只办到九分九，虽然只差了一点点，但仍不算敬事。凡是做事能够有恭敬心的人，他必然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办事也一定容易获得成功。

“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因此，如果能够尊敬别人的父亲，那么做儿子的就会高兴；如果能够尊敬别人的兄长，那么做弟弟的就会高兴；如果能够尊敬别人的君王，那么臣子就会高兴。被尊敬的人虽然是少数，但为其感到高兴的人却是多数，这就是把推行孝道称为“要道”的意义！由此推而广之，则有助于实现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

## 第七十六讲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 以德感人，以礼教人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群书治要》卷十二《史记下》

“导之以政”，“导”，皇侃的注疏解释为“诱引也”，即引导、诱导。刘宝楠先生在《论语正义》中，依《礼记·缁衣篇》，将“导”解释为“教”。“政”，孔安国说：“政谓法教也。”皇侃疏说：“政谓法制也。”“导之以政”，就是用政治领导人民，为政者制定施政条文，让人民来遵守。如果有民众不遵守，就“齐之以刑”。“齐”是“整”的意思，就是用刑罚来整饬之。这样做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免”，孔安国批注为“苟免”。

《广雅·释诂》将“免”解释为“脱”。民众为苟免刑罚才服从政令，但并不是心服，所以当刑罚稍有松弛时，人民就会犯法，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为“无耻”。所以古人特别强调“耻”字，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耻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人拥有羞耻心，做错事能够忏悔，就能改过自新，进而成为圣人、贤人。但是如果人做错了事不知羞耻、不知忏悔，就会一错再错，甚至堕落到与禽兽无异。

所以在《管子·牧民篇》中说，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四

个重要纲常。雪庐老人在《论语讲要》中也说，“国民无耻，亡国之日，不问可知”，如果国民都没有羞耻之心，国家灭亡之日，不用问也自然就知道了。意思是说，灭亡是必然的事，甚至近在眼前。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德”，包咸的批注是道德。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来整饬管理民众，这样做的结果是人民“有耻且格”。“格”，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郑玄的批注：“格，来也”，民心来归。人民以犯罪为耻，并且诚心来归，拥护政府；第二种解释是何晏的批注：“格，正也。”人们有羞耻心，而且能够改过向善，归于正。

## 亲仁爱民，民不忍欺

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群书治要》卷十二《史记下》

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谁最贤明？善于明察且懂得治理的人，应当能够分辨。

这是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子产担任郑国的宰相时，将法律监督机制设计得非常严密、合理，即使人们想欺骗他，也无法做到，所以他达到了“不能欺”的境界。西门豹在治理邺县时，将法律设计得非常严苛，如果有人犯罪就给予严惩。所以百姓无人敢欺骗他，因此他实现了“不敢欺”。但是孔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时，把孔子所主张的仁义忠恕的理念落实在治理之中，同时自己作为长官，也起到君亲师的作用，所以他实现了“不忍欺”，达到了百姓不忍心欺骗他的境界。

有智慧的人当然能够分辨，“不忍欺”是这三个境界中最高的层次。

子贱有一个同学叫巫马期，很想知道子贱治理的单父到底有多好，于是他趁着夜色到单父微服私访。他来到单父，看到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奇怪的是，他捕上来很多鱼，只是看一看，就又把把这些鱼放回到河里。巫马期感到奇怪，于是上前询问：“您为什么把捕上来的鱼，又放回到河里去呢？”这个人说：“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所捕上来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所以我就把它们放回去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环境的理念，所以现代很多环境伦理学家呼吁人们，要到中国传统儒释道的文化中去寻找解决现代环境危机的出路。这确实不是偶然，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当鱼没有生长到一定的尺寸，是不可以捕捞的。

巫马期听到这番话非常感慨，回去后向孔子禀告：“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即使无人看管，也像有严刑峻法在身边一样，非常小心谨慎，达到了慎独的境界。不知道子贱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孔子说：“我曾经问过子贱治理的方法。他说，一个人对身边的人事物有精诚之心，这个影响自然就会传播到远方，在百姓之中自然就会产生影响。我想他一定是把这种理念运用到了治理之中。”子贱作为地方官，有精诚的仁爱之心，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制定的每一项制度和政策都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完全没有自私自利，这种精诚之心，自然能够被百姓感受到。就如同这位捕鱼的人，他可能并没有见过他的长官子贱，但却能够感受到子贱的精诚之心。所以子贱制定的每一个制度和政策，百姓都愿意发自内心地配合。正是如此，他才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要治理好一方百姓，首先要让人民信任政府。人民信任政府，政府所颁布的每一项制度、政策，人民就愿意全心全力地配合，这样才能使政令畅通，领导者发布的政令，人民立即就配合执行。如果百姓总是怀疑在位者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是以权谋私、别有企

图，就不会愿意配合，甚至出现逆反，乃至于上访、告状的情况发生。

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不忍欺，他是否做得很辛苦呢？在《说苑》中记载，有一次孔子问子贱：“你治理单父，人们都感到很高兴、很满意。你能否告诉我，是怎样做到的？”子贱回答说：“我对待百姓的父亲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对待百姓的儿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我还体恤那些孤儿，当百姓有丧事时，我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到哀痛。”孔子说：“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这还不够。”子贱就又接着说：“我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我所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孔子听后又说：“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的人有三个，就可以教导百姓孝道；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的人有五个，就可以教导百姓悌道；你所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个，就可以教导百姓好学。但是这些都属于中等的善事，中等的人会归附，这还不够。”子贱听后又说：“在百姓之中，比我贤德的人有五个，我对他们非常恭敬，他们教导我使国家、人民得到治理的方法。”孔子说：“想成就大事，秘诀就在于此。从前尧舜都是非常谦恭地对待臣下，才招致贤德之士，帮助他们治理国家。所以能够举荐贤德之人，才是百福的根本、神明的关键。可惜你所治理的地方太小，如果你的治理范围更大，你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与尧舜相继了。”

要真正使百姓满意，真正将国家治理好，至关重要的是能够礼贤下士、尊敬贤才。这样才不至于每件事都事必躬亲，治理起来政事繁多，感到很辛苦。

巫马期则不然，他损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苦地亲自去教导百姓，虽然也使单父得到治理，但是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无为而治。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呢？第一，领导者自己要公正无私、要有德行；第二，就是领导者不能嫉贤妒能，要对贤才谦恭有礼，才能感召贤德之士前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如此一来，就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从不敢欺、不能欺、不忍欺，就可以领会到中国历史上所追求的管

理境界，就是不忍欺。

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这里提到治理的几个境界。道德对于治理国家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礼，再次才是法。道德和礼都能够起到引导和教化人民的作用。

在远古时期，领导者重视对百姓的道德教育，使百姓每一天都向善良的方向转变，却不知道为何会如此，这是潜移默化的、最高层次的治理。怎样进行道德教化？“教”是“上所施，下所效也”，在上位者能够顺道而为，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在下位者自然而然就会按照他的做法去效仿，天下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得到治理。次一等的治理，就是使人民交相礼让，即使身处劳苦也没有怨言。最次等的治理，就是运用法律来端正，使人们因为喜欢赏赐、获得利益而欢喜为善，因为畏惧刑罚而不敢作恶。为什么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呢？因为这是利用了人们求名好利的心去鼓励人们向善。

就如同当今社会，诱导人们做事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名和利，如果没有名和利的吸引，人们就不愿意去做事。所以很多地方都以名利作为激励的手段，驱动人们去做事。在古人看来，这是最低层次的治理方式。因为这是诱导人们追名逐利，当没有名利的诱导时，人们就不愿去做事，没有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中国古代的圣贤人，不求名、不求利，为什么还是非常用心地读书、工作、治国、平天下呢？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心中没有自己，但是仍然很努力地工作，他为的是百姓的利益，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他有更高的理想。古圣先贤所追求的政治叫圣贤政治，圣贤人办理的政治，这是最高层次的治理，而不是现在西方人所说

的民主政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果我们连自己五千余年的文化都不能理解，都不愿意去深入，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所以要将这些经典、好的中国式治理的方式讲解出来，让人们去认识、去理解，这项任务迫在眉睫。

## 道德教化，人能圣贤

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墨作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一《淮南子》

人们不懂得礼义，国家即使有法律也无法实行。法律虽然能够将不孝之人处死，却不能使人效法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虽然能够对盗窃之人处以刑罚，却不能使人像伯夷那样清正廉洁。孔子培养的弟子有3000人，他们都能做到在家恪尽孝道，出外恭敬长上，出言能够成为人们依循的规则，行为能够成为人们效法的表率，这些都是教化的结果。

现在的人们强调要健全法治，完善监督机制，这很有必要。但是人们也要认识到，“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如果不懂得礼义，即使国家拥有健全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也无法有效地实行。为什么呢？

从实施者的角度而言，法律、监督机制都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所以如果人“不知礼义”，也就是制定和实施法治的人没有公正的美德，就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法律。即使能够制定出公平合理的法律，如果

执法者没有公正的美德，也不可能将合理的制度实施到位。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勒纳德·汉德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告诫人们，这样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丧失了公平正义的美德，法官因为一方的贿赂，就偏袒于他；因为一个人是权贵，就减轻他的刑罚，甚至免除刑罚，就会导致即使社会拥有公平完善的制度，也只能成为一些人更加隐蔽地腐败、受贿的保护伞。

所以在《群书治要·傅子》中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应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但并不是拥有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还必须有“良佐”，就是好的辅佐大臣，要有能够推行好的制度的圣贤君子。这句话虽然很简单，却透彻地指出此二者之间的关系。要实现社会的治理，拥有好的制度很重要，必须顺应好的制度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但仅有好的制度尚且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有圣贤君子来推行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社会大治。如果制定法律、制度的人，仅仅是为了小部门的利益，有出于私心的考量，就不可能制定出真正公平合理的制度。即使真正公平合理的制度能够被设计出来，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求推行之人有公正的美德。

另外，从被实施者即广大民众的角度来看，如果民众不知礼义，实施法律也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就是这句话中所说的，法律可以杀掉不孝之人，却培养不出一个像孔子、曾子那样有高尚行为的人。古代的法律是与道德教育相配合的。中国古人认为孝道最重要，所以法律鼓励人们尽孝，而惩罚那些不孝的人，所以《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古代的法律中，对于不孝父母，譬如打骂父母、打骂祖父

母的人，按律都当斩。虽然通过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杀掉，但是怎能培养出像孔子、曾子那样有高尚德行的人呢？

学习圣贤教诲，就要学做圣贤人，成为圣贤人的弟子。孔子的弟子是怎样行孝的？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路，子路好勇。子路来见孔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从前我侍奉父母时，自己吃的是豆叶等非常简单的食物，但要到百里之外背米给父母吃”。虽然子路家境贫寒，但他是一个孝子，不忍心让父母和自己吃一样简单的食物，所以即使自己吃豆叶这样简单的食物，也要到百里之外背米回来给父母吃，不论严寒酷暑都是如此。

子路的父母过世后，他做了官，到楚国出游，跟随的车子有上百辆，随从也很多，享受的俸禄也很厚重，吃的是山珍海味，但他却说：“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宁愿像从前那样吃豆叶，到百里之外为父母背米，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他吃到山珍海味时，并没有感到享受，而是想到父母都已经过世，感到很遗憾。孔子听了这番话，说道：“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子路侍奉父母，可以说做到了父母在时尽心尽力地供养，父母过世后，竭尽自己的哀思，念念不忘父母的恩德。这是子路的孝。闵子骞、曾子的孝亲故事也很感人。所以法律能杀掉不孝的人，却培养不出像孔子还有孔子的这些弟子这样德行高尚的人。

法律能将窃盗之人处以刑罚，却培养不出像伯夷那样廉洁的人。伯夷、叔齐都是商朝的百姓，后来武王伐纣，取得天下，他们两人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双双饿死于首阳山，这是一种清廉的作风。法律确实可以惩罚窃盗者，却无法使人们像伯夷、叔齐这样清廉。所以如果想要使百姓拥有“孔墨（墨作曾）之行”“伯夷之廉”，必须依靠道德的教化。

孔子的弟子接受的是孔子君子圣贤的教育，所以他们自然而然成为君子圣贤。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小偷的团队中，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小偷；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恐怖分子的团队中，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恐

怖分子。所以教化环境特别重要。

孔子的弟子言为世则，行为世法，就像《中庸》中所说的，“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孔子的弟子能做到这一点，是孔子教化的成就。而这些贤才又分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对整个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很大的教化作用。读书志在圣贤，人们今天有幸接触到圣贤教诲，也要期许自己言为世则，行为仪表，为社会大众做出好的表率。

圣贤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圣贤其实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显发出来，就是圣贤人的样子，圣贤是人们本性本有的。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如果连成圣成贤的志向都不敢确立，那么成圣成贤确实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如果立志成圣成贤，而圣贤又是人们本性本有的特点，那么“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即使一个人的习气再重，但习气都不是本性本有的，终究可以克服。圣贤是人们的本性本有的，只要想成圣成贤，最终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所以不能自暴自弃。

## 德仁义礼，圣人所重

文子问德仁义礼。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贵也，仁者人之所怀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圣人之所以御万物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五《文子》

文子向老子请教什么是德、仁、义、礼。老子说：“德是百姓所崇尚珍重的，仁是百姓所仰慕向往的，义是百姓所崇敬佩服的，礼是百姓所恭敬端肃的。这四个方面是圣人用来统领万物的道德规范。”

“德者民之所贵也”，德是百姓所崇尚、尊重的。“民之所贵”，说明

人民非常崇尚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会为有德行的人建立祠堂或庙来纪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起心动念都是为国家、为人民着想，他治下的百姓，为他立祠祭祀，这是“德者民之所贵也”，人们崇尚德行、崇尚道德。而且当时的人民，每天都关注范公的教诲及举止，争相效法。后世建立祠堂纪念祖先，最重要的就是宣讲祖先的德行，使后世学习效法。这都说明“德者民之所贵也”。

“仁者人之所怀也”，仁是百姓所仰慕向往的，如果地方的领导很仁慈，就会吸引很多人来到这里。《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朝的先祖古公亶父，继承了后稷、公刘的事业，积德行义，得到民众的爱戴。当时熏育和戎狄要进攻周族夺取财物，亶父就赠给他们财物。后来他们又来进攻，想要周族的土地和人口。这时民众都非常愤怒，想要抵抗。古公却说：“民众拥立君主，是期待君主为民众谋利。如今戎狄来进攻，是为了我的土地和臣民，而臣民归我还是归他，又有何区别？你们为我而战，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父亲、儿子会被杀掉，通过这种方法使我成为国君，我实在不忍心。”于是亶父就带着家人和亲随离开了所居住的豳地，翻山渡水，到岐山安顿下来。但没想到，百姓扶老携幼，全都跟随亶父搬到岐山。在他的领导之下，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歌颂他的功德。其他国家的人听说亶父这样仁慈，也都纷纷前来归附。这说明领导者有仁爱之心，人民都愿意归附于他，这就是“仁者人之所怀也”。

“义者民之所畏也”，百姓最佩服、最尊重有道义的人、有道义的地方。关公忠义，使得各地人民修建关公庙，纪念他的忠义之心。稻盛和夫在短短一年内就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是因为他一心想帮助日航，自己不拿一分钱。他的举动感动了日航的每一位员工，凝聚了人心，没有人不从心底佩服他、尊敬他。这就是“义者民之所畏也”，人民都非常敬畏。正是这种道义凝聚了人心，使人们众志成城，在一年内，使日本航空公司成为全世界效益最好的航空公司。

“礼者民之所敬也”，礼是百姓所恭敬的。齐桓公时，山戎作乱，桓公派兵讨伐。在齐桓公经过燕国时，燕国的国君亲自出来迎接他。国君出来迎接他的时候，走出了燕国的边界，走到了齐国。齐桓公就问：“一个国君走出他的国度来迎接，是迎接谁的礼仪？”他的大臣说：“这是迎接天子的礼。”齐桓公认为，不能让燕国的国君违礼。燕国国君如此尊重齐桓公，走出燕国的国境来迎接，但是他这样做违背了礼。齐桓公感受到燕国国君对他的尊重，又不愿意看到燕国国君违背礼，所以他就把燕国国君所走过的地方赠予燕国，这样就使他没有违背礼。齐桓公的修养特别可贵。因为他如此守礼，所以不仅百姓尊重他，连诸侯都表达对他的敬意。所以齐桓公能够成为五霸之首，九合诸侯，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他有守礼之心。

## 举善而教，仲尼所美

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

——《群书治要》卷二十六《魏志下》

表彰贤德的人，是圣明的帝王所重视的；推举善人，使大家见贤思齐，是孔子所称道的。古代的圣王、开明的君主治理天下特别重视表彰贤德的人，推举善人，从而使大家都愿意为善。

“举善而教”，举用善者，将品德好的人举用出来，让百姓看到能够效法。“举善而教”，教哪些人？《论语》中说，“举善而教不能”，教的是不善者，对于不善的人，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教导他，人们就会相观而善。一方面举用善人，另一方面教导不善之人，人们就会劝勉为善。所以对于不善之人，不能抛弃他。很多大学，学生出现了问题，就将他开除。《礼记·学记》中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校教育要

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学生有过失就将其开除，当他走上社会，谁还会教导他呢？之所以教，就是教不好的人，不能嫌弃他们、放弃他们，要耐心教导。

“举善而教”，举用善人是教育成功的先决条件。“举善”，首先要知道善的标准是什么。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好人，这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定的。善的标准就在《弟子规》等经典中，如果打开经典对照自己，就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满足善人的标准。这些经典就像一面镜子，能够把自己的善恶照得清清楚楚。

怎样的人才能称为善人？“善”首先就要公正无私。明代时，有一个人叫郑濂，郑濂家里七世同堂，近千口人生活在一起，但是相处得非常和乐。当时的太祖朱元璋看到后，就向他请教，是用什么方法将这些人管理得井井有条？郑濂回答了一句话：“不听妇言。”这句话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理解。当时女子很少读圣贤书，并且女子有一个特点，喜欢以私情来处事。譬如，偏爱自己的儿子，照顾与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冷漠甚至排斥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这是有私。有私就会导致不平，不平积累久了就会有怨，怨再加深就变成恨，就会产生冲突矛盾。

善的第二个标准就是不嫉贤妒能。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现在的臣子之中，谁可以称为最贤德？”孔子说：“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称为贤臣。”子贡听后感到奇怪，齐国有管仲做宰相，使齐桓公成为霸主；郑国有子产做宰相，使郑国很强盛。他认为管仲和子产才是贤臣，于是问道：“难道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孔子回答说：“子贡啊，你觉得出力的人是贤德之人，还是能够举荐贤才的人是贤德之人呢？”子贡一听就明白了：“当然是进荐贤才的人才是贤德之人。”孔子说：“对，我听说鲍叔牙举荐了管仲，使管仲显达；子皮举荐了子产，使子产显达，但是却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举荐了比他们更贤德的人。”所以孔子认为鲍叔牙和子皮才称得上是

贤才。因为他们没有私心，所以才能够举荐更加贤德的人为国效力。如果一个人总是考虑自己的位置、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受到侵犯，就不可能将贤德之人举荐给国君。鲍叔牙不嫉贤妒能，能够让位于贤人，把宰相的位置让给管仲，所以他们家世代子孙在齐国都非常显达，都是贤大夫，这也是他累积阴德所成。

善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隐恶扬善。《群书治要·体论》中说：“君子揜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这句话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揭示出来。君子往往掩盖别人的过恶，长养了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恰恰相反，经常毁谤别人，自以为功，标榜自己的功劳。言为心声，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观察他的言语就可以知道。《格言联璧》中说：“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这句话告诉人们，隐恶扬善才能长养人的厚道。

古人还说，“激之可以使君子为小人”，一个人本来是君子人，但是被激怒后，也会变成小人。“愧之可以使小人为君子”，一个人即使是小人，当他有问题或有过错时，人们能够宽容他，他就会想：我做错了，但别人还如此宽容我，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如此一来，就能使他生起惭愧心，就能改过迁善成为君子。现在社会更多的是使用愧之的方法，还是激之的方法？这值得人们认真反思。懂得隐恶扬善的人才是善人，因为他有仁厚之心。

善人的第四个特点就是能容人之过。因为他宽容、宽厚，所以能容人之过，这也是善的一个标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当人们指责别人、侮辱别人的时候，首先要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一点过失都没有的圣贤人？自己如果还会犯各种各样的过失，就不能挑剔别人的过失，应该学会宽容别人。人的厚道就是看这些方面。

《论语》中记载：“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重贤德

之人，同时又能宽容不能之人，对于不够贤德的人、做得不够好的人能够宽容。对于社会大众，并不是每个人都修学得很好，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所以要做到“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对于善行要褒奖、鼓励、宣扬，但是对于不能之人，要怀有同情之心，这就是能够容人之过，是一种宽厚的表现。

古人举善，首先是举善人为官。从汉代开始，就实行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机制，把具有孝廉品质的孩子举荐出来，由国家培养，作为官吏的候补。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孝心，对国家就会有忠心；廉洁，就没有贪心，具备这两个品德，做官就不会出大格。“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把正直的人举荐出来，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就能够使邪曲不正的人也变得正直。在舜拥有天下之时，从众人之中选取了皋陶为士，掌管司法，因为皋陶公正无私，所以不仁之人都远离了恶行。在汤拥有天下之时，从众人之中选拔伊尹为相，他做宰相后，不仁之人都远离了恶行。这说明，举善人为官有很好的教育效果，能够起到教不能的作用。

其次是举善人为师，把有德有能的、能够言传身教的人举荐出来作为国师。因为他们能够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能够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

历史上，特别是在康乾盛世之时，儒释道三家的大德都会被选为国师，皇帝带领文武百官敬其以尊师之礼。这些儒释道的大德到宫廷里讲经，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所以从上至下思想高度一致，人们都有公心，没有自私自利，并以自私自利为耻，所以那个时候国家强盛。直到慈禧太后之时，宫廷中还有讲经的传统，慈禧太后也去听讲经，但是她每次去听讲经，感到这些大德是在批评她，她愈听愈不高兴，最后一怒之下，就废弃了宫廷中讲经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经废弃，仁义慈悌的道理没有人讲，五伦八德没有人教，结果人们都生起了自私自利的心。这时，外国人看到有机可乘，所以导致八国联军入侵，鸦片战争的失败。“人必自

侮，然后人侮之”，一个人一定是首先侮辱了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侮辱。“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一个家庭一定是内部不和谐，夫妻之间有了猜疑、纷争，才会使别人有机可乘，出现了第三者插足，将这个家毁掉。“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个国家一定是君臣上下不和谐、不统一，别的国家才会前来侵犯。

所以清朝的没落并不是讲传统文化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丢失了传统文化所导致的。若使社会风气变善，也必须礼请儒释道的有德行、能够身体力行的老师出来讲座。

还要举善人为范，即举善人作为模范、榜样，把普通百姓中做得好的人举荐出来作为道德模范，给予特别的尊重和奖励。使人们看到，有道德的人会受到鼓励，而不是有钱人会受到尊重，就能够起到教化的作用。古时候都有“命民”“命妇”，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重长辈，而且谦恭有礼、好让，有德行，皇帝就下诏书将这个人封为“命民”。当他得到“命民”的称号，就可以坐着两匹马并排拉着，并且装饰得很好的车子出行，人们看到这个场景，就知道他是受皇帝诏封的“命民”，就知道他有德行，会对他表示尊敬。其他的人即使再富有，如果没有“命民”的封号，也不可以乘坐这样的车子出行。如此就会使人们尊重德行，而非尊重金钱，使有德的人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而不是使有钱的人受到尊敬。

古人认为道德对于社会风气最为重要，所以有道德的人要受到褒奖，使人们向有道德的人学习，使有道德的人受到尊重，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转。

“举善而教”，是教谁呢？孔子说“教不能”，对不能之人要教导、要有耐心，而不是舍弃。《格言联璧》中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天下没有不可教化的人，只是担心自己的诚心没有达到，如果自己的心达到至诚，就会感通。舜王的后母、弟弟三番五次要置舜

于死地，他都没有怀恨在心，没有想要打击报复，仍是一心反省自己的孝道没有做好，最后感化了他的后母，感化了他的弟弟，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

大舜的故事发人深省，自己的身边没有像大舜的后母和弟弟那样三番五次地置自己于死地的人？但是自己对他们仍然不能感化，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就是“德未修，感未至”，自己的德行修养不够，所以没有能够至诚感通。所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一定要相信圣贤教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既然在人之初，都有本性本善的明德，通过教育也能够恢复明德，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

##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一年之计，莫如树穀；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群书治要》卷三十二《管子》

做一年的规划、打算，没有比种五谷更重要的，因为民以食为天；做十年的规划，没有比种树木更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代，很多地方因为乱砍滥伐，导致了土地沙化、风灾、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所以种树对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空气净化，进而对人的健康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句话是重点，要做好终身的打算，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做父母的如果不能将孩子教导好，家道、家风、家业就难以承传下去，老年不仅晚景凄凉、没有人赡养，还可能为儿女操心，为儿女处理很多问题。所以古人说“至要莫如教子”。对于家庭而言，“树

人”很重要，“莫如树人”，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也是如此。所以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文化需要靠老师来承传，要为民族、国家培养好下一代，国家和民族才有未来。所以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要体会到树人的重要性，这样才会有使命感，坚持走教学之路。

## 第七十七讲

不学礼，无以立



## 君子有三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孔子说：“君子有三项应当敬畏的事情：敬畏因果报应的事实，敬畏有德及有地位的人，敬畏圣人的教诲。小人不知道因果报应而肆无忌惮，轻佻地对待高居上位之人，侮辱圣人的教诲。”

“君子有三畏”，“君子”指在位以及求学之人，无论是在位者或是不在位者，只要求学就称为君子。君子有三条恐惧的事。“畏”是恐惧而不敢违背。

首先“畏天命”。古代的批注把“天命”解释为善恶报应。何晏的《论语集解》，认为“天命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所以可畏”。皇侃的疏举《尚书·伊训》解释“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此来解释天命。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举《周易·坤·文言》中的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解释都是以善恶报应为天命，这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语篇》所讲的吉凶祸福大意是相通的，所以在这里就把天命解释为因果报应的真相。

“畏大人”，“大人”指在位的人。郑康成注：“大人，谓天子诸侯为

政教者。”天子治理天下、诸侯治理一个诸侯国，这些人就被称为大人。为什么要对在位的人恐惧？有批注认为，诸侯治国、天子治天下，各有权力维护朝野安定，不能干犯，所以可畏。这是说，在位的人有权威，得罪了他们就会为自己招致灾祸，这种说法不够全面。另有批注说：“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故须畏之。”这个讲法就比较圆满，如果是对于有地位、有权位的大人，自然就令人畏惧，孔子也不需要特意提畏惧了。

“畏圣人之言”，皇侃疏：“圣人之言，谓五经典籍圣人遗文也，其理深远，故君子畏之也。”“圣人之言”，是指五经之中记载的圣人所遗留下来的文字。“五经”是指“六经”中除遗失的《乐经》外的“五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这些道理记载在经典之中，目的是警示后人，违背了它就会有灾祸。所以“经者，常也”，“经”是恒常不变的常。它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所以违背了它就会有灾祸，君子畏之而不敢违背。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依据老子的《道德经》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解释小人不知不畏的原因。他说，国法如网，虽然严密，但是犯法的人还有可能幸免；但是天命如网，恢恢疏远，作恶之人没有一个能够逃避天罚。但这个道理只有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才能够明了。小人没有道德学问，不论是在位或不在位，对于天命不懂得，不知道因果报应的事实，不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恐惧，就会胡作妄为。因为不知，所以无知无识，什么坏事都敢做，这就是“无知者无畏”。如果一个人真正知道、相信因果报应的事实，即使让他去做坏事，他都不敢去做。

“狎大人”，是小人对在位者的态度，“狎”是一切不在乎、不放在心上，没有礼貌、很随便、很亲密。如果是对总统、首相、尊长，就不能显得亲密而随便，即使对方是自己的朋友、同学，也要体现出庄严、恭敬。

如果懂得天命的学问，就懂得祸福的道理，其他一切学问也都会懂

得。而一切学问不外乎“博之以文，约之以礼”，见大人有大人之礼。礼很重要，“不学礼，无以立”，所以学习《弟子规》《常礼举要》就非常必要。有德有学的君子能知天命，所以他也懂礼，也能够礼敬大人。而小人恰恰相反，他不知道天命，也不知道礼，所以轻视大人。

“侮圣人之言”，“侮”是侮慢、看不起。小人无德无学，不知道圣人所说的话是真理，所以会侮慢圣人之言，甚至批判、诽谤圣人。自民国以来，很多文人提倡的废弃经书、废弃汉字文言文的行为，就是“侮圣人之言”。“侮圣人之言”的后果可能是五伦关系没有人讲，伦理关系混乱，社会不和谐，出现很多乱象，这值得后人引以为戒、引以为鉴。

这一段话前半部分描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句话各有一个“畏”字；后半段描述小人，句法则有变化，仅仅说不知天命而无畏，然后说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为什么畏天命就会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反之，为什么不畏天命，就会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什么要将天命、大人、圣人之言三者联系在一起？古代帝王都是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大人与圣人之言都出自天命。古代称在位者为天子，天之子是替天行道，所以他所说的话都符合天命。天子的诏书开头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为古代人认为皇帝是上天赋予他的地位，是通过他来赏善罚恶，所以天子所制定的制度、所颁布的诏书，甚至所说的话，都不能够违背天理。“圣人”解释为得道之人，就是明白天道、天理的人。所以他所说的话，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则，圣人一言而为万世法。

中国古来有很多圣人，《论语》中讲：“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众生有福之时，圣人就出来教化天下。不听圣人之言，甚至取消圣人之言，这都是侮。小人既然对天命不知不畏，所以对大人和圣人之言也是不知不畏。现在有人对圣人之言有所批判，认为是废话，置之不理。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是孔子导致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认为听了圣人的话，

在这个社会不仅行不通，还会吃亏，更不必谈升官发财，这些都是短见、都是误解。

圣人的话符合天命、符合天道、符合天理，按照圣人的话去生活，才能够真正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如果违背了圣人的话，也许可以得意一时，但是从长远看必败无疑。所以圣人的话不是给后人的约束、束缚，而恰恰是希望后人能够过上真正长久美满的人生，并给以必要指导。如果明白这一点，再看圣人的话，就会生起感恩、恭敬之心。

##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群书治要》卷十四《汉书二》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说明儒家流派的源头来自于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司徒是掌管教化，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在中国古代，教育是核心，其他所有的部门都为教育服务，所以司徒很重要。它的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阐明教化。他们涵泳于“六经”的教诲之中，存其心意于仁义之间。这是儒家流派的来源、宗旨，及以何种经典作为自己修学的依据。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什么是仁？就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去关爱、帮助一切人，这就叫仁。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不符合于礼的要求，都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甚至不能起心动念，能够使自己回归到礼的要

求上，这样就可以慢慢地达到仁了。子张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即把“恭、宽、信、敏、惠”这五者推行于天下就称为仁了。《论语》中还讲了为仁之方，就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过忠恕之道就能够体会到仁心，渐渐离仁心愈来愈近。“孟曰取义”，讲舍生取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儒家是“祖述尧舜”，“祖”是始，“述”是修，以尧舜为始祖，并且遵修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孟子说“孝弟而已矣”“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孝悌，并把孝悌之心推而广之，关爱、照顾一切和自己有缘的人，就是尧舜之道。

“宪章文武”，“宪”是法的意思，效法；“章”是明。“宪章文武”就是以文王和武王为明法。

“宗师仲尼”，“宗”是尊，“宗师仲尼”是师尊仲尼之道。师尊仲尼之道，向孔子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他说自己没有发明创造，所讲述的都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道理。为什么孔子不讲创新、不讲发明创造？因为圣人之言，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所说的，即是真理，不能在真理上添一点，也不能在真理上减一点。而且真理一定是一而不是二。圣人是明心见性之人，他的心性是一不是二，所以你也不可能在圣人之言上增一点，在圣人之言上减一点。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

明白这一点，才知道为什么孔子采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做法。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认为中国古人不讲创新，没有创新精神。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中“易”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变易、变化的意思。什么是变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的现象是变化莫测、变化无穷的，所以你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礼是有损益的，夏商周都是在前代的礼上有所损益的。

“易”的第二个含义是不易，不变的意思。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谈创

新？只有掌握了不易的、不变的规律的人才有资格谈创新。创新不是喊口号。

“易”的第三个含义是简易、简单。告诉人们创新的结果，圣人所理解的宇宙人生的真相，都是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表达出来的。大道至简，它不崇尚谈玄说妙，要以人们能够理解的话来表述。因为它很容易记、很容易理解，才能够社会上推行。《四库全书》近8万卷的内容概括一下，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12个字就把整个《四库全书》的内容涵盖其中了。而这12个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因为它概括简单，每一个价值观只有一个字，所以它容易记忆，容易理解，也容易在社会上普遍推行，成为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以重其言”，要显明其言论的重要性。

“于道最为高”，它在各种学问中最受崇尚。春秋战国时有诸子百家，儒家后来在各种学问中最受推崇，从汉代到清代一直都是以儒家的礼义文化来治理天下。“于道最为高”，也有解释说，它以道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汉代扬雄《法言篇》中，给“儒”下了一个定义：“通天、地、人曰儒。”学习儒家的人，对于天地自然的规律、社会人伦关系的道理都通达无碍，了解得很透彻。儒字，是“亻”加“需”字，告诉人们，学儒的人是人之所需、是社会大众所急需的。

因为当五伦关系被颠覆、破坏，人活得就不像人了。学儒的人为大众讲解五伦大道，使大众依教奉行，使人伦关系和谐，这是社会所急需的。

在《周礼·天官》中对“儒”下了一个定义，“四曰儒，以道得民”。儒讲述的是“道”，所以深得民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的接受和拥护。所以古代的道德教育并不像现在的道德教育，是逼迫人们，勉强人们去参加

的。儒家的道德教育能够深入人心，并且深得民心，是人们发自内心想要参加的。

## 道家：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群书治要》卷十四《汉书二》

道家这一流派，大概是出于史官。依次记载古今成败存亡祸福的规律。由于道家出于史官，史官记载历史的事件、各个朝代兴衰成败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之中，就总结了成败存亡祸福的规律。学习《群书治要》，考察其中的历史，也可以发现一些盛衰、存亡、祸福的规律。

盛世之主与民同乐，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而衰世之主残害其民，以民为土芥，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甚至践踏人民的利益；盛世之主考察历史，以史为鉴，而衰世之主自骄自智，自以为聪明；盛世之主任用忠贤，忠贤之人能犯颜直谏，帮助君主改正问题、纠正错误，能够使国家兴盛，而衰世之主听信奸佞，喜欢谄媚巴结、阿谀奉承之人，所以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盛世之主乐闻其过，衰世之主乐闻其誉；盛世之主反求诸己，衰世之主怪罪他人、推卸责任；盛世之主抑损情欲，衰世之主纵欲享乐，成由勤俭败由奢；盛世之主以天下为公，衰世之主以天下为私。这都是总结历史得出的兴衰成败、存亡祸福的规律。

所以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开头就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告诫人们，祸福都是由自己招感，作善就有善报，作恶就有恶报，就像影子跟随身体一样，报应非常迅速。所以“命

由我作，福自己求”“一切福田，不离方寸”，都要向自己的内心中去求。《老子》中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也是总结历史规律得出的道理。

“秉要执本”，能够掌握要领和根本。“清虚以自守”，“清虚”是清静虚无，内心没有贪嗔痴慢疑，清净不染，空无一物。为什么孩子的记忆力好？因为孩子天真无邪，心里没有装着杂乱的事，古人讲“空灵”，因为内心清静、空虚，所以反应灵敏，记忆力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把愈来愈多不该记的事情都记在心里，心被填满，所以反应就不灵敏，记忆力也变得迟钝。

《弟子规》教导，“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告诉人们不要把自己的心变成承载别人过失的垃圾桶。心本是干净、空虚的，就像刚刚买来的垃圾桶，它和其他桶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很干净，但因为经常把脏东西、垃圾往里面扔，最后垃圾桶就变得污秽不堪，让人不喜欢。我们的心本来也是纯净纯善的，没有贪嗔痴慢疑，但如果总是把别人的过恶放在心上，就是把自己的心变成了承载别人过失的垃圾桶，首先受到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要做到“清虚以自守”，“自守”，以清静无为作为自己的操守，守住自己的本性、本分，表现出的外在行为，就是温良恭俭让。内心没有贪嗔痴慢疑，外在表现出温良恭俭让，这就是“清虚以自守”。与人无争、于世无求，随缘而不攀缘。

“卑弱以自持”，自身保持卑弱的姿态。《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把最高的德行比作水。水有卑弱的特点，“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总是利益万物、滋养万物、给予万物，却从来不争，能处在众人所厌恶的环境中。众人所厌恶的就是卑下，但是水却乐于处在卑下的地位。因为它处在卑下的地位，就接近于道的境界。海纳百川，正是因为大海处在低下的地位，所以所有的河流都汇向大海，都归于大海。“夫唯不争，故无尤”，一个人正是因为不刻意地和别人争权争利、争功夺名，所以内心没有忧虑，也没有来自外界的怨咎。不和别人争，别人就不

会把自己当成障碍，所以不会想方设法对付自己，不会故意陷害自己。

水有很多的特点，它本身无色无味，纯净纯善，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无所滞，能够随方就圆，随缘而没有执着。面对高山，它就会绕着流过去，说明它不与他人对立，它能够想办法绕行，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它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存在于自然界，对于自然的规律从不违背，都是随顺。但是水又很坚毅，滴水穿石，看起来它至柔至弱，但是它的作用却很刚强。所以老子经常用水来比喻一个人最高的德行。

“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态度，是统治人民、面南称王者的策略。为什么面南称王者（君主）需要这样的德行？因为君主，不是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治理好国家，还必须能够任用贤才。怎样才能够使德才兼备的人来到自己身边呢？君主就必须采取“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态度。

《说苑》中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君主要想平治天下，而且使自己名垂不朽，必须任用贤德之人，礼敬读书人、士大夫。所以《周易·益卦》中说：“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一个人身处上位，而能够以礼敬的态度对待下位者，前途就会一片光明。

《周易·屯卦》说：“以贵下贱，大得民。”虽然身处高位，处于君主之位，但是能够谦恭尊敬地位卑微的人，一定能够大得民心。“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将怀远而致近也。”如果明智的君王能够布施恩德，而且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地位卑微的人，就能够安抚远方的人，而使近处的人亲附。“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如果朝中没有贤德的人，君主就不能感召德才兼备的人前来辅助，就像鸿鹄没有翅膀一样，虽然想翱翔千里，但最终也不能实现预期的目的。“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所以想横渡江海的人必须依靠舟船；想走远路的人必须依靠马车；想称霸天下、兴起王业的人，必须依靠贤德的人。“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

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如果所任用的不是合宜、适当的人，却想成就功业，这就如同是在夏至当天期望夜晚更长，向天射箭却希求能射到鱼一样，是不可能的。“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这样的事对于虞舜、大禹这样的圣人都难以达到，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可见，要想成就功业，君主必须依托贤明的人。

《体论》中说，人没有不想安存而厌恶危亡的，没有不想得到荣耀、安乐而厌恶劳苦、受辱的，但是很多人都不能得到荣耀，又免不了经常受苦、受辱，这是因为没有按照规律行事。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宫室建得又高大又华丽，一定会悬重赏求得良匠，将宫室建好，对内不会因为他是亲戚就任用，对外也不会因为他和自己的关系远而不任用，必须得到合适的人选，才放心地把这份工作交给他。这样，建造的宫室就又华丽又高大，住在里边很安逸、快乐。但是在求取辅佐之臣时，却不能像求取建造宫室的人这样有公心，所求的都是谄媚巴结的人，和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图国不如图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为国谋事、治理国家，还比不上谋划如何建造宫室那样用心，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

领导者必须谦虚处下，才能够感召德才兼备的人前来辅佐。《韩诗外传》中把辅佐之人分为几个层次：一个人的智慧像有源头的活水一样源源不断，他的行为可以做大众的表率，这样的人被誉为“人师”，人的老师；一个人的智慧可以砥砺磨炼人，行为可以辅正人，这样的人被称为“人友”，人的朋友；一个人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来行事，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不敢做错事，也不敢为非作歹，这样的人可以被称为“人吏”，人的官吏；一个人在他人面前一味地讨好对方，使对方高兴，人家一呼喊他，他就连声答应，这样的人被称为“人隶”，人的奴隶。上等的君主是以师为辅佐，中等的君主是以友为辅佐，下等的君主是以吏（官吏）为辅佐，使国家危亡的君主是以隶（奴隶）为辅佐。所以观察一个君主所用之人，就可以知道他的兴衰成败。

“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一个人快要灭亡，一定是由于他所任用的属下。有同样敏锐眼光的人，才能够互相发现；有同样聪慧听力的人，才能够互相倾听；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够互相跟从。所以他得出结论说，“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不是贤德的人就不可能任用贤人，第一，他发现不了贤人；第二，他有嫉贤妒能之心，即使贤德的人就在身边，他还会因为怀疑，不敢任用。所以君主任用的辅佐之臣，关系到君主存亡的征兆、得失的关键，怎么能够不谨慎呢？这说明，任用怎样的人，对于领导者、君主事业的兴衰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

《后汉书》中说：“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谀口。”秦朝将要灭亡的时候，能够谏诤的人、犯颜直谏的人被诛杀，阿谀奉承的人受到赏赐，善言凝结于忠臣的口中说不出来，国家的命令都出于谀邪之口，这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君主所用之人，关系到自己的兴衰成败。贤君能够虚心处下，尊敬贤者、任人唯贤，才能够感召德才兼备的人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

反之，如果用人不当，也必然招致败亡。《昌言》中有一段话：“君主所任用的不是自己的亲属，就是自己所宠幸的人；所爱的不是美女，就是谄媚巴结的人。以和自己的观点相同与否作为评判好人、坏人的标志，根据自己的喜怒来行赏行罚。”自己一高兴就赏赐，一生气，不该处罚的人也处罚。“喜欢美女就会忽视朝政，不理国家大事，黎民就会被冤枉、被残害。虽然对待各方祭祀都非常恭敬，毫不违背四时之礼”，都是按照四时的礼制来进行祭祀。“审判案件，都是严格地在冬日行刑”。这也是按照自然规律治国，冬天主肃杀，所以古人行刑都安排在冬天进行。“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堆积于庙门之中”。喜欢占卜，了解事情发展的趋势，所以用于占卜的蓍草和龟甲很多，都堆积于庙门之中。“用以祭祀的纯色的牲畜，成群成对地系在竖石之上”。祭祀很恭敬，所以准备了很多的纯

色的牲口。

“占星的人，坐在占星台上不下来，祝史跪在祭坛旁不离去。纵使做到了所有这些，也无益于挽救他的败亡。这样说来，人事是根本，天道是末节，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此确信自己做事正确，不依靠天道，是最好的；担心自己做事尚未尽善，希望借助天道来帮助自己，是第二等的；不求之于自己，却只祈求上天佑助的，是最下等的昏君。假使君主能够诚心诚意反省自己，全心全意考虑治国之道，反省自己的行为有没有过错，治国的方法正确与否，那么祥瑞的事情自然会出现，吉祥之物自然会来到。这就如同从井里能够汲出水来，从灶炉里能够烧火一样自然，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因此喜欢上天的感应，喜欢珍奇的吉兆，这都是愚蠢者的心理，不是最上等之人的公德。”

这一段话值得人们特别警惕，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本，不在于找人算卦、看风水，甚至认为听信于鬼神就可以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慈禧误国就是不听信圣贤之言而听信鬼神的缘故。即使算卦的人、看风水的人、通灵的人能够看出灾祸所在，但是避免灾祸，还是要靠自己的善心善行，要靠积功累德来实现。

所以治国之本在于任用贤德之人来实施正确的纲领。怎样感召德才兼备之人的帮助呢？这需要在上位者必须做到谦虚、恭敬、礼贤下士，这样真正有才德的人才会到来，协助君主治理国家，国家长治久安才能有所保证。

所以清静无为以自守，自己保持卑弱的姿态，这是君人南面者必须采取的治国方法。

后面又说，“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尚书》中说：“尧，允恭克让。”“允”是信；“恭”是恭敬；“克让”是能让。尧帝信恭能让。“《易》之谦谦”，《周易》中的谦卦，地山谦。平时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但是在谦卦之中，高山是居于平地之下。看到谦卦的卦象就提醒人们，一

个人有权有势、身处高位，但仍然能够谦卑自守，才能无所不吉。一个人如果身处高位，但是傲慢无礼，最后就会招来嫉妒怨恨。所以古人说“谦卦六爻皆吉”。在《周易》之中有64卦，但是在所有64卦之中，只有谦卦是六爻皆吉的。

“一谦而四益”，一个谦德就能够使人得到天道、地道、鬼神和人造中亏损盈满而利益谦让的好处。《周易》中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天道亏盈而益谦”，就如月亮，满月就开始减损。所以观察天道自然的规律会发现，盈满之后就会亏损。所以对于满要亏，对于谦要助长。“地道变盈而流谦”，一个地方水盈满了，自然就会流向低洼的地方，流向虚空的地方，这就是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鬼神看到骄傲的人、傲慢的人，都会很生气，甚至谋害他，但会降福给谦卑的人，帮助谦卑的人。所以一个人谦虚，连天地鬼神都会护佑。“人道恶盈而好谦”，人都是厌恶骄满之人。就像曾国藩先生说，“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人都喜欢与谦虚的人共事、交朋友，是人自然的规律。这是道家的长处，这句话阐述了道家流派的起源。

## 人贵有礼

夫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是因为人能奉行礼义。

《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嗜好饮酒，有一次接连饮酒好几天。在酒酣之时，喝得兴起，他竟然脱衣摘帽，亲自敲击瓦盆奏乐，并且问身边的近臣说：“仁德之人也喜好以此为乐吗？”一个谏臣梁丘据就回答说：“仁德

之人的耳朵和眼睛也和别人一样，为什么不喜好以此为乐呢？”景公一听，就派人驾车去请晏子，晏子身穿朝服而来。景公说：“我今天很高兴，愿意与先生您共同饮酒作乐，请您免去君臣之礼。”晏子回答说：“假如群臣都想免去礼节来侍奉您，恐怕君主您就不愿意了。现在齐国的孩童，凡身高中等以上的，力气都超过我，也胜过您，然而却不敢作乱，就是因为惧怕礼义。如果君主不讲礼义，就无法役使下属；如果下属不讲礼义，就无法侍奉君主，人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就是因为有礼义。我听说，君主如果不遵循礼义，就无法正常地治理国家；大夫如果不遵循礼义，底下的官吏就会不恭不敬；父子之间如果没有礼义，家庭就必会招致灾殃。《诗经》中有一句话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人如果不遵循礼义，为什么不赶快去死？可见礼义不可以免除。”

景公听后很难得，马上接受了劝谏。“我自己不够聪明，又没有好的近臣，加之他们迷惑引诱我，以至于如此，请处死他们。”景公要把身边的近臣杀掉。晏子听后又连忙劝谏，“身边的近臣没有罪。如果君主不讲礼义，那么讲究礼义之人便会悄然离去，不讲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如果君主讲究礼义，讲究礼义之人就会纷至沓来，不讲礼义之人就会悄然离去”。景公听后说：“先生说得好！”于是他让人换了衣冠，令人洒扫庭院，更换坐席，然后重新请晏子。晏子进入宫门，经过三次谦让，才登上台阶，采用“三献之礼”。随即，晏子再行拜别之礼，准备离去。景公也是以礼拜别，然后命令下人撤掉酒宴，停止音乐，并且对身边的臣子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显扬晏子的教诲。”

在这段对话中，晏子对景公提出，“夫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体现出礼特别重要，无论是对于治国、扭转社会风气，还是对于个人的修身都极其重要。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区别“几希”。“几希”就是很小一点点。只不过人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而禽兽把它丧失了。这一点就是人懂得礼、懂得义，能够用礼义来节制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所

以人如果不能接受礼义的教诲、伦理道德的教育，就会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

这就是《礼记》中所说的：“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鸚鵡能够学舌，能够学人讲话，但是它不过是一只飞鸟而已；猩猩有时智力很高，也会学人讲话，但是它也不离禽兽之身。现在的人不懂得用礼来节度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虽然能够讲话，不也变得与禽兽之心没有区别甚至成为会讲话的禽兽了吗？这就是强调人和禽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懂得礼、懂得义，懂得用礼义来节度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

## 礼之教化，正邪于未形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正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礼所起的教化作用是很微妙的，潜移默化，能够防范邪恶于未形成之时，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天天向善德靠近，而远离罪恶，所以先王都崇尚礼的教化作用。礼，禁于将然之前，是防患于未然，所以说是“正邪于未形”。

礼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可以与中医类比。中医也是防病于未然，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所以按照自然节律来饮食起居，自然就会远离疾病，但是在这种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的过程中，使自己远离了疾病却不知不觉。同样的道理，按照礼的教化来做，自然就会远离邪恶，并且不知不觉。《周易》中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君子都是重视事物的开

始，在开始时若有一丝一毫的偏差，结果就会造成千里之远的错误。

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记载，商纣王刚刚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的时候，他的叔父箕子就能够预测到商纣王会亡国。箕子推论：他用象牙做的筷子，一定会搭配玉石做的酒杯；用了玉石做的酒杯，他就会想把全国各地的珍宝都据为己有，奢侈的车马宫殿也会渐渐由此兴起，到时就无法挽救了。所以箕子屡次进谏，但纣王根本不听，还逼走了微子、剖杀了比干。最后果然如箕子所料，纣王骄奢淫逸、积重难返，最后被天下人唾弃，遭到武王的讨伐，最后赴火而亡。

唐太宗说：“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就像树木刚刚开始生长时，只需除根就可以拔掉，但是等到树木长成参天大树后，就很难砍掉了。火焰刚刚点燃时，很容易扑灭，但是等到火势变大后，就很难扑灭了。这都是提醒人们，在事物有不良开端、刚露出苗头之时，就要加以制止，防微杜渐。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通过礼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通过对一切人事物，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培养起恭敬的态度，达到“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的作用，在小事上培养起恭敬之心，在恶尚未萌发之时就加以杜绝。这就是“正邪于未形”，在人邪恶、邪思、邪行没有产生，或没有形成时，就将其端正，这样就使人“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不知不觉地向着善德去前进，而远离了罪恶。这是礼的作用。

## 第七十八讲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 以礼治国，天下归心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道德仁义”，不借助礼就不能实现。在这里，道德是体，仁义是用。无论是体是用，都非常抽象。简单地讲，怎样能够体现出道德仁义？那必须借助于礼。譬如，就仁义而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仁是为人的根本，是人心自然而然的一种体现。仁是从哪里做起的？从“亲亲”做起，也就是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来培养起一个人的仁爱之心。

仁者无敌。仁爱之心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按照礼的要求悉心照顾父母，当父母训斥自己的时候按照礼去应对，父母有过失的时候按照礼去劝谏，正是在这些符合礼义规定的行为中逐渐培养起了仁爱之心。所以这里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义是适宜的意思。怎样做是适宜？就是要

符合礼的规定。

对于治国而言，尊敬贤人最重要。如何尊敬贤人，体现对贤人的道义呢？也必须通过礼来体现。《礼记·曲礼》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很多人用这句话批判古人的等级观念。认为大夫（即领导者）犯了罪可以不受处罚，而一般老百姓却要依法惩办，这就体现了不平等。实际上，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理解所导致的误解。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冉有去请教孔子：“从前的君王制定法律，规定‘刑不上大夫’，刑罚不施加于处在上层的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仪不涉及在下层的百姓、平民。如果是这样，大夫犯罪就能够不施用刑罚，普通人办事就可以不讲究礼仪了吗？”可见，这句话古人早有疑惑，而孔子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解答。孔子说：“不是这样。大凡整治君子，都要用礼义来引导他的心志，这是用廉洁知耻的节操来勉励他们。”所以为什么有礼制？因为治理国家不能仅仅惩罚人的行为，还要引导人的心志，让人有廉耻之心，根本不想去触犯礼法。

所以古代的大夫，如果犯贪污受贿罪而被罢免流放，不会直接说他犯了贪污受贿罪，而是会为他避讳，很隐讳地称为“簠簋不饰”，这是为了维持他的羞耻之心。如果犯淫乱、男女不别之罪，就隐讳地称为“帷薄不修”；如果犯欺骗君主、不忠诚之罪，就隐讳地称为“臣节未著”。如果犯软弱无能、不胜任工作之罪，就隐讳地称为“下官不职”。如果犯了冒犯国家纲纪之罪，就隐讳地称为“行事不请”。这五个方面，对大夫都有确定的罪名，但仍然不忍心以斥责的语气直呼其罪名，而且为他们避讳，这就是为了使他对此感到羞愧和耻辱。

所以如果士大夫犯下五刑之内的罪行，在受到责罚通知后，他就会戴上白色的帽子并系上牛毛绳，用盘盛盥洗之水，并架上一把剑，自行前往宫廷请罪。国君不派执法人员前去捆绑捉拿他，是为了保留士大夫的自尊心，是一种尊敬贤人的体现。如果士大夫犯有重大罪行，他听到命令

后，就会面向北方跪拜两次，然后跪地自杀。

可见，士大夫都很有羞耻之心，当犯下重大罪行时，自己就会感到惭愧和忏悔，会面朝君主的方位跪拜两次自裁。国君不会派人押送、斩杀他，而是对他说：“您是自取其罪，我对你已经有礼了。”因此即使刑罚不施加于处于上层的大夫，大夫也不会逃避其应有的惩罚，这是教育的结果。所以道德的教化，可以使士大夫产生很强烈的羞耻之心。他们的罪行败露之后，国家不需要去捆绑、捉拿、押解，他们自己就会因惭愧而自裁，所以说“刑不上大夫”。

为什么“礼不下庶人”？普通的平民经常需要忙碌地做事，忙于生计，不能完满地实行礼仪，所以就不能责求他们完全按照礼仪行事。这是一种宽厚之心。

所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真实的含义是古人对于士大夫有良好的礼义道德的教化，所以士大夫都有强烈的羞耻之心，不需要缉拿、押解、捆绑，他们就知道错了，并且主动责罚自己。所以道德仁义，不借助礼在细微曲折之间体现出的等级秩序及具体的行为规范，就不能实现。

“教训正俗，非礼不备”，“教”，“率之以身而使效之谓教”，就是率先垂范的身教。“训”，“谕之以言而使循之谓训”，就是言教。“教训正俗”就是通过言传身教来端正民俗，使邪曲不正的社会风气导归于正，不以礼作为标准，就不免缺失简略而无法周到完备。

“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分争曲直，辨讼是非，如果不以礼作为准绳，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如果没有礼的标准，就会出现《墨子》中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一个人，就有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两个人就有两种，十个人就有十种，到底谁的标准是正确的，就很难判断。现在西方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西方的思潮流派很多，如有功利主义、伦理利己主义、康德的道义论、社会契约论，还有罗尔斯的正义论，等等。他们都从不同的概念出发，得出了关于正

义、合理性的不同标准。当人们具体面对一件事时，应该按照怎样的标准去判断是非善恶美丑，就出现了纷争，因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论假设和标准，都能自圆其说。所以西方社会就出现了“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的现象。倡导的自由也导致了任性随意，这就是没有礼的结果。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上”是指公卿大夫，“下”是指士。公卿大夫列位于上，士列位于下。对于国家而言，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比上下之间的伦理关系更重要；对于家庭而言，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比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更重要。各种伦理关系有情分、有道义、有恩情，但其中的厚薄不同，所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没有礼就无法确定其名分和本分。

中国古人以礼治国，君主对于臣子也是以礼相待。在《体论》中就记载了古代的圣王对于臣子关心爱护的情形：当臣子生病时，君主要多次探望；当臣子过世时，他会亲临大敛、小敛这样的丧礼，并且在丧葬期间，君主会减衣缩食，不奏琴瑟。这种礼就表现出君主对于大臣过世的哀思之情，也是对大臣的尊重和感念。

在《礼记》中记载，晋国的大夫知悼子去世后，尚未下葬，晋平公就喝起酒来，师旷、李调作陪，并且敲钟奏乐，这都不符合礼。杜蕢从外面进来，经过台阶进入厅堂，他倒了一杯酒给师旷说：“旷，喝了这杯酒。”这是罚师旷喝酒。接着他又倒了一杯酒说：“调，喝了这杯酒。”这是罚李调喝酒。然后他再倒上一杯酒，坐到堂中面北，就是面朝君主的方向，将酒一饮而尽。然后走下台阶，快步走了出去。平公看到他的举动，不甚理解。于是命他进来，并问道：“你为什么要罚师旷喝酒？”杜蕢回答说：“甲子、乙卯是忌日，不能奏乐（商纣王在甲子日死去，夏桀王在乙卯日灭亡，所以君王把这两天称为疾日，不可以奏乐，目的是引以为戒）。知悼子的灵柩在堂，尚未出葬，这比甲子、乙卯这两日重大得多。师旷是掌乐的太师，不把这些道理告诉您，所以罚他喝酒。”平公又问：

“你为什么罚李调喝酒？”杜蕢回答说：“李调是您的近臣，为了一点吃喝，却忘记君主的禁忌，所以罚他喝酒。”平公又问：“那你为什么自己饮酒？”杜蕢回答说：“我只不过是一个负责膳食的家臣而已，明知这不是供给刀匕之类的分内事，却敢提醒二位应该知道禁戒，这是超出了我的本分，所以也自罚一杯。”平公听后说道：“这样看来，我自己也犯有过失，请倒酒，也罚我饮一杯。”杜蕢洗过酒杯，将酒杯高举。平公对待者说：“即使将来我死了，也不可以丢弃这个杯子。”直到今天，人们敬酒后都要高举酒杯，这个动作叫作“杜举”，就是来自于杜蕢。可见，古代的君主对于臣子也是以礼相待。所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宦”是学习仕宦之学，学习怎样做官，提高领导能力。“学”是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无论是学习从政，还是学习其他的东西，不根据礼，师生之间就不能产生亲近之情。礼可以使教者认真负责、竭尽全力，使学者恭敬专心、一丝不苟。譬如古代的拜师礼，孩子跟着父亲拜见老师的时候，父亲带着孩子先向至圣先师孔子像，行三跪九叩首的礼。然后请老师上座，当老师坐定之后，父亲带着孩子再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三跪九叩首的礼是古时的最重礼，表明了古人对尊师的重视。

对于古代的孩子而言，他心目中最尊重、最畏惧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他看到父亲对老师如此敬重，他对老师的教诲怎敢不听从呢？老师教导的内容是什么？老师首先会教他孝敬父母。当孩子有恭敬心，对于老师的教导，他就容易学会。而老师坐在上座，接受学生的父亲和学生的最重礼，是怎样的感受呢？他不会因为自己是老师，看见学生的父亲和学生向他行跪拜礼，就得意扬扬。反而是战战兢兢，因为学生的父亲对自己如此敬重、如此信任，能够将孩子的一生都托付给自己。“师哉！师哉！童子之命也”，想到学生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老师怎能不竭尽全力、认真负责地将学生教好呢？所以举行拜师之礼，能够使生生起恭敬

心，使老师也生起责任感。所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而且师徒如父子，通过这些礼，可以使学生对老师又恭敬又亲爱。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班”是次，次序。“朝”是朝廷。“班朝”，就是在朝廷中按照职位品级，以定位次的仪式。“治军”，就是治理军队。古代人军队建制，以5人为1伍，5伍（25人）为1两，4两（100人）为1卒，5卒（500人）为1旅，5旅（2500人）为1师，5师（12500人）为1军。国家根据这一建制“以起军旅”（即征兵）。军队的治理也都必须依靠礼，如军队要出征，首先要有祭礼，还有誓师之礼，打仗凯旋之后还有凯旋礼，等等。整个军队的治理如果没有礼的话，就不能彰显威严。

“莅官行法”，“莅”是临，“莅官”是就职、到任。“行法”，指司寇、士师明刑法也。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部长，士师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就是颁布还有执行法令，如果没有礼，也会没有威严。所以朝廷班次的整肃、军队的治理、官员的就职、法令的颁布执行，没有礼就会上慢下怠，不能彰显威严。

在汉朝建立初期，国家没有确定礼制，很多大臣因为出身草莽，有时喝醉了酒，就在皇帝面前争功，甚至大喊大叫，拔剑破坏了宫殿的建筑，这不仅使皇帝的威严扫地，官员之间的凝聚力也大打折扣。于是叔孙通就建议汉高祖制定礼仪制度，并在整个朝廷加以推行，以正君臣之位，让大臣们知道作为臣子应守怎样的礼。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这些王公大臣都学会了朝堂之礼，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松散邈邈。汉高祖非常高兴，就赞叹说：“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我今天才知道了当天子的尊贵。所以如果朝廷整肃班次、治理国家没有礼，臣子就会懈怠，皇帝也会没有威严，导致政令很难实行，没有执行力。

“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祷”，《周礼注》云：“求福曰祷。”“祀”，是为了求得一个事情进行的仪式。祠，“得求曰祠”，是

得到了所求之后的酬谢之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还愿。吴澄曰：“祷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祷祠”是因为国家有某个特定的大事而举行的礼，“祭祀”是每年定时祭祀天地神明、祖先而举行的礼，是有区别的。简单来说，祷就是有所祈求的祭祀，祠就是酬谢神恩的祭祀，而祭祀是指一般意义上祭祀天地、神明、祖先的泛称。总之，祈祷求福、酬谢神灵，祭祀天地神明、供养祖先，没有礼就不能体现出诚敬庄严。

在唐代，唐太宗被誉为“天可汗”，是天底下公认的领导者。这是因为邻邦的使者到中国来拜访，看到中国以礼治国，人与人之间相处和睦、彬彬有礼。他们非常向往，回去便向自己的国君禀告。国君听后也很羡慕，就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天下的共主。希望能够效法学习唐朝的礼义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所以在以礼治国的情形下，如周朝的成康盛世，刑措不用，囹圄空虚，刑罚虽然很完备，但是都搁置不用，就是因为有礼义道德的教化，使人人都知耻，没有人去犯罪，所以监狱空虚。

在明朝时，王阳明有一次和一群盗贼对话。盗贼知道他是王阳明，就问道：“你说‘致良知’，人人都有良知，那你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良知吗？”王阳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有。”这群盗贼说：“你光说有也不行，得证明给我们看，我们才相信。”王阳明说：“好啊，你按着我说的去做，我就可以证明给你们看。”于是他就让这些盗贼一层一层把自己的衣服脱掉，直到脱得只剩最后一条内裤时，王阳明说：“继续脱。”这群盗贼却说：“不行，这个不能再脱了。”王阳明说：“这知耻就是你的良心，就是你的良知、良能。”

## 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礼的作用，是用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断定疑难事情的恰当做法，分别尊卑地位的同异，明辨是非对错。这是礼的四个主要功用。

礼的第一个功用是“定亲疏”。礼的功用之一，就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丧礼中的五服制度。五服，就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依据人们穿着的丧服不同，就可以判断出他和亡者的亲疏程度，这就叫五服制。跟亲人关系最近的直系亲属，穿的衣服最粗。最粗代表这个时候他的悲思是毫不修饰以尽哀痛。跟亡者的关系愈远，穿的衣服会愈细。这就是根据五服的礼制，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在《贞观政要·论礼乐》中说，礼“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这句话是说，礼的来源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出来，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来制定的。而人道最首要的就是使九族亲睦。九族和睦，要从孝敬父母开始，由近及远。亲属之间有亲疏的差别，所以丧礼也有隆重和简省的差别，都是依据恩情的厚薄不同，合乎人情来确定的标准。就是礼的第一个功能，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

礼的第二个功用是“决嫌疑”。就是一件事情合乎礼才可以避嫌，不引起误会。譬如，“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为什么礼有这样的规定？因为古庙里有很多珍贵的器物，如果一个人进入古庙，一旦庙中的器物毁损或者遗失，那么这个人的嫌疑最大，而且没有人为他作证。所以为避嫌疑，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因为深井很危险，两个人一起看深井，万一其中一人失足掉下去，别人会误以为是另一个人把他推下去的，那么就算费尽口舌也解释不清，因为只有两个人在场，所以要避免两个人一起看深井，这也是避嫌疑。

再譬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到了瓜田不要去系鞋带，因

为当一个人在瓜田系鞋带，别人会误以为他是在偷瓜。到了李树下面，也包括一切果树下面，不要整理帽子，因为这时候这个人一抬手，别人会误以为他是在偷果子。这都是为了避免误解。所以礼的这些规定是为了避免嫌疑。

礼在处理人伦关系时，也有很多避免嫌疑的规定。譬如，媳妇可以到公公的房间问疾，公公生病媳妇可以去伺候。但是公公不可以到媳妇的房间探望。子长，母可以抱；女长，父不可以抱。女儿长大一些，父亲不能抱；儿子长大一点，母亲可以抱。还有，幼弟可以到姐姐的房间，弟弟去给姐姐问安，但是哥哥不能到妹妹的房间。这些礼的规定非常明确具体，都起到避免嫌疑的作用。这在《曲礼》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为什么叫曲礼？就是曲曲折折，细微曲折之处都考虑得很周到，规定得很具体。如果能做到这些礼，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避免嫌疑。所以人们学习这些规定，就会很清楚怎样的处境应该避免，在怎样的环境应该怎样做，就不会让别人因为自己的行为而生起嫌疑。

礼的第三个功用就是“别同异”。“别同异”就是礼也有分别地位的同异作用。譬如我们说师徒如父子，师徒如父子，但是终究不是父子，这就是有同有异。所以父母过世要守丧三年，要穿孝服；老师过世，也要守心丧三年，就是说要在心里常常思念老师，能够感念老师的恩德，不忘记老师的教诲，但是不需要穿孝服，这就是礼“别同异”的效果。

礼的第四个功用就是“明是非”。一件事究竟是对还是错？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都要通过礼来明确。譬如，父子有亲，父子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才叫作亲？是否父子就应该像朋友一样直呼其名才显得亲近？父亲怎样在家庭中保持应有的尊严？“圣人因严以教敬”，这在礼上也有规定。譬如，祖可以弄孙，但父不可以弄子。爷爷可以让孙子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乐，可以和孙子玩耍，但是父亲跟儿子就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父亲在家庭里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所以要时刻表现出一种威严，如果父

亲失去这种威严，孩子就会对他很轻慢，对他的话不放在心上，就会很造次，作为父亲就无法教育他。如果人们不懂得这些道理，等到孩子长大，教育出问题，再后悔也是悔之晚矣。

明白这些礼，对于现在世间一些流行的说法、做法，人们就能知道它是对还是错，是应该还是不应该。不仅父子之间如此，君臣之间、师生之间也是如此。如果不懂礼，领导没有领导者的威仪，老师没有老师的尊严，结果下属不尊敬领导，学生不尊敬老师，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以有礼，这个社会才有秩序，人们才有规矩；如果没有礼，社会就会出现礼崩乐坏、人伦关系混乱的状况。

## 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

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君子做到以礼治身，便能与一切人事物和谐共处，而内心平和毫无怨恨。因为礼的本质是敬，一个人对人对事都有恭敬之心，与人相处能够恭敬他人，做事能够敬事敬业，自然能与人相处和睦，人伦关系能够处理好。所以“外谐”，就是对外能与人事物和谐共处。

“内无怨”。礼最大的特点和表现，就是让，所以人们常说礼让。古代的读书人从小就学习忍让、谦让、礼让，做到与人无争、于世无求，处处都让。“以食让幼”，把好的食物让给幼者，所以孔融四岁能让梨；“以安让长”，把安稳的条件或是环境让给长辈；“以位让贤”，把位置让给贤德的人或者更适合的人；“以功让众”，把功劳让给众人，不能自己独揽；“以名让上”，把好的名声让给领导、让给君王，所以是一让到底。

人生最重要的学问，就是能够处处为对方着想，能够看到对方的利

益，看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义。这样的读书人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内心坦荡，没有患得患失，没有丝毫的怨恨。当一个人在抱怨时，都是在抱怨什么呢？都是在抱怨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没有最大化。这其实都是自私自利的反映。

《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虽然他有德行、有能力、有方法、有策略能够将国家治理好，使社会和谐。但是这些国君或者认识不到孔子学说的深刻，或者嫉贤妒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孔子却表现出“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别人不知道、不了解我，甚至误解我，没有任何愠怒的表现。为什么孔子能够没有愠怒的表现呢？因为他周游列国去推广仁义学说，目的不是升官发财、自私自利，谋取个人的私利；而是希望自己的学说能够为国君所采纳，能够为国家、社会、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既然这些国君没有智慧，时节因缘还不具足，他就退而著书立说，没有表现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这就是一个有礼的君子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态度。所以君子有礼，能够做到“君子坦荡荡”，没有礼就会“小人长戚戚”。

中国古人的价值观，是以孝悌为核心，对父母孝，对兄弟友悌，将孝悌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爱，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互助，不仅对别人有关爱的情感，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付出行动，给以切实的帮助。所以互爱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互助、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在和谐世界里，人们都是“讲信修睦”，人与人之间讲求信用，相亲相爱，睦邻友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们不是仅仅关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壮年人能够为社会所用，幼年人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些弱势群体、老弱病残幼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和赡养。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一个人有了困难，就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们不会感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所以没有过多的忧虑和担心。但是现在人们都讲个人主义、个人本位，每个人都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所以即使一个人有很多财富，但是仍没有安全感，遇到事情，仍然会感到无助、孤独，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所以自然会出现焦虑、忧郁、恐惧的情况。所以如果人们放弃了传统礼仪道德的教育，而盲目向西方学习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是一个非常可悲的选择。

## 富贵贫贱皆须知礼

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富贵的人如果乐于学礼守礼，就能够做到不傲慢、不放纵；贫贱的人如果乐于学礼守礼，就能够做到在任何场合都不迷惑、不怯懦畏惧。

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的人容易傲慢、放纵、骄奢淫逸，所以古人特别制定了让富贵之人遵守的礼。当有钱有势的人接受了礼的教导，就可以避免富不过三代的悲剧发生。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我听说有一个人特别健忘，他搬家时居然把自己的妻子忘记了，真是太健忘了。”孔子听后说道：“这还不算最健忘的，最健忘的人，就是把自己都忘记的人。”鲁哀公听后很好奇：“真的吗？还有把自己都忘记的人，请说给我听一听。”孔子就说：“夏桀王就是这样的人。夏桀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是他不懂礼，不行仁政，最后荒淫无度、胡作非为，结果被商汤流放。”一个人有地位、有财富，但是不遵守礼义的教化，最后就会导致自身的败亡。在《贞观政要·论礼乐》中记载，礼部尚书王珪，掌管礼的教化。他有一

个儿子叫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就说：“在礼上有规定，儿媳要拜见公公、婆婆。但是在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其实是为了国家的美名，希望礼义道德的教化在全国都能够普遍地推行。”于是王珪和妻子就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座，让公主亲自拿着手帕，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了这件事，非常赞成，而且规定，从此以后，凡是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即使是公主下嫁到臣子之家，也要给公婆行洗手进食之礼，就是拜舅姑之礼。所以《论语》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在上位的人都能按照礼仪的规定来做，人民就没有人敢违背礼，都能培养起恭敬之心。所以“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

“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贫贱的人学了礼，知道如何进退，在怎样的场合应该做什么事，就不会感到迷惑，也不会感到怯懦畏惧。《论语》中记载，孔子称赞弟子子路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穿着破丝棉做的袍子，和穿着狐皮大衣、貂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惭愧的，只有子路能做到！为什么子路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懂礼，而且他有一种内在的修养，他不是靠外在的衣饰来提升自己的自信。他的自信心源自内心，因为他有道德、有学问、懂礼义，所以能做到“则志不慑”。

## 婚礼的教育意义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婚礼是缔结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交好，对上来说，可以奉事宗庙祭祀祖先；对下来说，可以传宗接代、承继香火，所以君子十分重视婚礼。男女各有分工且各尽其责，夫妇之间才有道义；建立起夫妇之间的道义，为后代做榜样，然后父子之间才能亲爱和睦；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才能各正本位。因此说，婚礼是礼的根本。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古人非常重视“婚礼”。结婚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而是“将合二姓之好”。因为古礼规定同姓不婚，所以凡是结婚，一定是两个姓氏，所以是“将合二姓之好”。

所以婚姻之礼，古代有很多步骤，目的是提起夫妻之间的责任感。譬如，娶妻前三天，男方三日不奏乐，女方三日不熄灯。为什么有这样的礼仪？因为再过三天女儿就要出嫁，儿子就要成家了，需要趁结婚之前，特别是女儿还在娘家时，抓紧时间教导儿女去如何为人妻、为人夫，以后如何为人母、为人父，怎样承担起家庭的职责。父母平时在家里夫唱妇随、夫义妇德，对孩子已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在结婚前三天，还要抓紧时间耳提面命，进行集中教导。

在迎娶之日，新郎要去娶妻之前，首先要祭拜天地。因为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私事，不仅关系到两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天下的太平，所以礼节要非常慎重，要表达把家庭维持好、把儿女教导好，要使社会和谐的存在心。儿子在去娶妻之前，要接受父亲的敬酒，父亲是代替祖宗向儿子敬酒，儿子不用回礼。意思是说，从此以后，祭祀祖先的责任、家庭的德风就要由你来承担了。中国人平时都讲长幼有序，儿子都是毕恭毕敬地向父亲敬酒，但是这一次这个次序却改变了，变成父亲亲自向儿子敬酒。那么儿子一定会感到，今天这件事与以往不同，所以就会提起他的恭敬心和责任感。

到了女方的家庭，女方的父母亲手把女儿交到新郎手上，意思是说，

从此以后我女儿终身的幸福就托付给你了，你要对她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新郎也能体会到岳父岳母的心情，嫁女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同时也会有很多担忧，担心女儿到了夫家是不是能承担好责任？女婿对女儿如何？会不会欺负女儿？等等。所以新郎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情，他接过新娘后，会带着新娘一起跪拜岳父岳母，感恩岳父岳母为自己培养了一位贤内助，同时也希望岳父岳母放心，自己会善待他们的女儿。

新娘坐上花轿后，她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香扇从轿子的窗口扔出去。意思是说，女儿在家的时候是千金小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父母的关爱，所以小姐的脾气、习气有很多，如当天气稍微有点热，她就要拿着扇子扇一扇，说：“天气好热啊。”娇里娇气的小姐习气很严重。但是现在她要为人妻、为人母了，就需要把这些娇里娇气的小姐习气、坏脾气随着这把香扇全都抛掉，抛得一干二净。这样才能被接到丈夫家里。

到了丈夫的家里，公公婆婆就从主人的位置上退下来，把儿媳妇从主人的位置迎上来，公公婆婆退到客人的位置上。这代表从此以后，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妇，责任非常重大，要上孝公婆，中和妯娌、辅助丈夫，下教育好儿女，甚至家道的兴衰都是由你来承担。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娶一个好的妻子可以兴三代”。在古代，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子的德行。

《周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告诉人们，女子要效仿大地的德行。大地有怎样的德行？它非常厚重、安稳，不能经常地震。所以“安”字，写作一个女字，上面是一个宝盖，代表家的意思。女子在家才会使人安心，家才能够安定。所以女子不能经常往外跑，男主外女主内，她要厚重，还要安稳、安静。同时大地还有一个特点，“地之秽者多生物”。大地污秽、肮脏的地方往往长出很多植物。说明女子愈有德行、愈能忍辱负重，家庭幸福才愈有保证。这都是教导女德对于家庭和谐的重要性。

夫妇喝的交杯酒也非常有深意，它是将一个葫芦瓜一切两半，一人一半。葫芦瓜的丝是苦的，酒是甜的，两个人把交杯酒喝下去，就代表从此以后，夫妻两人要同甘共苦、彼此扶持、白头偕老、共度一生。“夫妇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夫妻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分彼此，所以不能经常计较，“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在喝完葫芦瓜的酒后，还要用绳子将两个葫芦瓜系在一起挂在墙上。以后看到这个葫芦瓜，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在以后的家庭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绊绊，但是看到这个葫芦瓜就能想起两个人结合时最初的发心，希望白头偕老、同甘共苦的愿望。

所以婚礼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提起一个人对于婚姻的责任感，都是提起一个人的正知正念。婚姻之礼做好了，可以使丈夫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而使妻子有德行。但是很遗憾，这些礼节没有保持到现在，反而被人们当作封建糟粕批判和废弃。所以后人并没有理解和承传古圣先贤的良苦用心。不仅没有理解、没有承传，反而对它妄加批判。其实现在人是坐在大树下面好乘凉，这棵大树已经5000多年了，枝繁叶茂，后代子孙坐在树下乘凉，却不仅不知道感念祖先的恩德，还想用斧子把这棵大树砍倒，这是非常折福的行为。所以现在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是人们不懂得感念祖先的恩德，抛弃了优秀传统所致。

“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古代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负担着家庭的经济收入，要养家糊口，使家人衣食无忧；而女子在家照顾公公婆婆、教育儿女，把家庭所有的事务都管理好，使丈夫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他们能够互相感恩，彼此之间才有情义。现在社会，男子出去赚钱，女子也出去赚钱，责任上没有分别，所以夫妇之间的情义就差了很多。因为女子会想：你能赚钱，我也能赚钱，你没有什么了不起。

“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男女之间，男子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有责任感，女子在家相夫教子，有德行，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潜移默化地就受到影响，所以父子之间就有亲情。

“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父子之间有亲爱，儿子能够对父母有孝顺之心，走上工作岗位，就会对领导也有恭敬之心。这就是“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领导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也能处理好。

“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所以婚礼是礼的根本，所有的礼都是从婚姻之礼中得以演发出来的，婚姻之礼做好了，一切伦理关系才能顺理成章地处理好。

## 以礼治国，防患未然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防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斗争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之败起矣。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朝觐之礼”是古代诸侯谒见天子之礼。设朝觐之礼，是用来表明君臣之间的道义。

“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聘问之礼”是古代诸侯之间，互相派使者做友好访问的礼节。设聘问之礼，是为了使诸侯之间互相尊敬、友好往来、互通有无。

“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君主、父母过世，臣子、儿子都要为父母或者君主守丧，并且要定时祭祀。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生事之以

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设丧祭之礼，是用以表达为臣、为子的感恩之情。

“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乡饮酒之礼”是乡州邻里之间定期地聚会宴饮。它是以敬老尊贤为主要内容，由最高层的乡大夫（如同现在的乡长），来宴请贡于朝廷的贤良之士；较低层的是乡人邻里之间的欢聚。乡饮酒礼主要是按照乡人邻里年纪大小来排定位次，即所谓的“序齿”。聚会之前要先祭祀鬼神，然后按照仪式宴饮。通过乡饮酒礼体现的是尊老敬贤的态度，可以培养起一个人谦和庄敬的人生态度。所以乡饮酒之礼，是用以明确长辈和晚辈间的秩序。

“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婚姻之礼”，是用以辨明男子和女子在家中的职责分工。

“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礼”可以禁止混乱发生的根源。“乱之所由生”是指动乱从何处产生。就是礼可以从根源上禁止动乱的发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就像堤防能够阻止洪水泛滥一样。

“故以旧防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所以认为旧的堤坝没有用处而把它破坏掉，一定会遭受水灾；当洪水来临之时，没有堤防，一定会带来灾患。

“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认为古老的礼仪没有用而废弃，也一定会有祸乱发生。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苦”通“鹽”，是不坚牢的意思。批注中解释，“苦，谓不至不答之属”。不至，谓夫亲迎而女不至；不答，谓夫不答耦于妇。婚姻之礼被废除，夫妇应尽的道义衰微，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不稳固，行为不符合礼，淫乱的罪行便会增多。“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斗争之狱繁矣”，把乡饮酒之礼废弃了，尊卑无序，争斗之狱就会繁多。因为乡州邻里之间的饮酒之礼是明确上下长幼之间的次序，让彼此之间互相尊敬、互相礼让。当把乡饮酒之

礼废弃后，长幼尊卑的次序就会模糊、丧失，争斗的刑事案件就会频繁发生，对老人以强凌弱等争斗的现象就会发生。

“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丧祭之礼被废弃了，为人臣、为人子者的恩义淡薄，悖逆祖先、不忠不孝的人就会增多。为什么要提倡祭祀？一个人连祖先都能够祭祀，能够念念不忘，对于眼前的父母怎么会有不照顾的道理呢？一个人不可能一边去祭祀祖先，一边还打爹骂娘，这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把丧祭之礼废弃了，人们就会失去感恩报恩之心和饮水思源的意识，那么不忠不孝的事情就会愈来愈多。

“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之败起矣”。聘问之礼和朝觐之礼被废弃，诸侯不来朝见天子，诸侯之间也没有友好往来，就会使君和臣失去各自应有的身份和地位，那么反叛君主、侵袭邻国的祸乱就会随之发生。这些都说明，礼确实有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让那些问题通过礼仪的教化杜绝在萌芽状态。

## 祭礼的文化内涵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祭祀不可以太频繁，太频繁就会使人产生厌烦情绪，产生厌烦情绪就会不恭敬。祭祀也不可以太稀疏，太稀疏就会使人怠慢，怠慢就会逐渐忘却祖先。为什么要举行祭礼？为什么祭祀很重要呢？

在《礼记·祭统》中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治人、治理国家的措施之中，没有比礼更重要、更急迫的了。礼有五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礼。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祭礼属于吉礼，在五种礼中最重要的就是吉礼。为什么祭礼如此

重要呢？我们可以从国家和个人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祭礼是教育之本，文化之根。我们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哪里入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恢复祭礼，因为祭礼是教育的根本。在《荀子·礼论》中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万物生长的根本；“先祖者，类之本也”，先祖是人类的根本；“君师者，治之本也”，如果没有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怎么会有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老师的辛勤教导，人们怎么能够明白做人的道理？这是治理的根本。所以中国古人祭祀“天地君亲师”，都是有经典为依据。

祭祀之所以受人重视，就是因为它的宗旨在于不忘本，使人们能够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祭祀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可以改善社会风气。祭祀可以培养起人们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一个人如果连祖先都能定时祭祀，不可能不孝敬父母。所以提倡祭祀，就培养起人们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

中国古人是顺应天时季节的变化来举行祭祀的。春天时举行“禘祭”，秋天时以新下来的谷子举行“尝祭”，所以一年有两次春秋祭祀。到了秋天，霜露覆盖大地，君子踏霜而行，自然有一种悲凉之感，这种悲凉之感并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思念故去的亲人。到了春天雨露滋润大地之时，君子踏露而行，自然会有一种惊醒的感觉，思念故去的亲人，似乎他们也像春天一样，重新回到人间。在祭祀之时，用快乐的心情把亲人迎回来，再用悲伤的心情将他们送走。所以中国古人确实非常有智慧，对祭祀的时间、频率，以及怎样祭祀，都有详细的规定。

第二，就是要昭述祖德。祖宗的德行庇荫子孙繁衍绵盛。所以祭祀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将祖宗的德行详细宣讲出来，使后代子孙效法。

第三，祭祖时还要宣讲家规，传承家文化。百善孝为先，孝道是道

德教化的根本。但是如果父母已经过世，怎么教儿女孝道呢？就是通过祭礼来教导儿女孝道。所以《祭统》中说：“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把孝顺之心表达至极致的就是祭礼。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祭祖可以改善社会风气，昭述祖德，并且弘扬传承家文化。

从个人修身的角度，祭祖是一个人的修身之机、入道之门。在一篇关于祭祖意义的文章中，一位老教授写道：“古礼首重祭礼，诚属心性极则之理。而表现于吾人日常生活中者也。真一切行门之大根大本也。”什么是“心性极则之理”？心性极则之理其实就是孝道。

所以“孝”就代表了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竖穷三际、横遍十方。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心性，这就是心性极则之理。所以“无量光、无量寿”，其实都能用一个孝字代表。

通过祭祖，可以把人们的一体之心引发出来。我们不仅与祖先是一体，与后代子孙是一体；不仅与人是一体，与自然万物都是一体的。这个心就叫仁心。所以古人说“一体之仁”，如果有两个的概念，仁心就不存在了。所以通过祭祖，可以把这种一体的仁爱之心开发出来。如果我们还会看别人不顺眼，还有不能包容的人，还会与他人过不去，就是没有一体之仁。

所以中国人的祖先无比慈悲，通过祭礼的设计，提供给人们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教育人们培养起一体的仁爱之心、恭敬之心、感恩之心。所以人们能够把祭礼之中的恭敬之心、仁爱之心保存下来，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时体现出这种仁爱之心、一体之心，这就是祭祖真正的意义。为什么孔子说“祭则受福”？因为他“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祭祀的时候就如同神明、祖先在面前一样恭敬、感恩，这种恭敬心和感恩心是使他得福的根本。

所以祭祖要重实质而不重形式，参加祭祖的仪式不是图热闹，而是为了培养起这种一体的仁爱之心，人们能够把仁爱之心时刻保存在日常生活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中，这才是祭祖真正的意义。

## 第七十九讲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 曲高则和寡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孔子对于音乐教育十分看重。因为音乐是感人最深的一种艺术，对此，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有共同的认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认为，音乐教育对心灵会产生深刻影响。

传统文化认为，人性本自清静，但是因为受到财色名食睡的染污，就会迷失本性，丧失了本有的清静。甚至还会被习气控制，被欲望牵引，而不能自己，这时人就堕落了，继而不成其为人，这就会毁掉人的整个生命，所以必须进行教育。这就是《中庸》开篇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以后天的教育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是“曲高则和寡”，为什么能够欣赏高雅音乐的人比较少？因为大众不习惯于清静和平，而是喜欢浮躁不安。由此也可以体会到，为什么自古圣贤多寂寞。圣贤人都是比较理智的，本自清静，不需要外在的刺激使他们感到快乐。这种境界，不是能被常人所体会的。孟子曾说：“游于圣

人之门者难为言。”在圣人门前学习过的弟子，就如见过大世面的人，再听到怎样的言论，就会感到没有味道。但是圣人懂得和光同尘。这也是圣人和贤人的区别。

孔子的弟子们有一次遇到一位穿绿袍的老人，这位老人向他们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答对了，老人就会向他们顶礼。这些弟子就问是什么问题，老人就说，一年到底有几个季节？这些弟子说一年一定是有四季，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老人却说，你们回答错了，一年只有三个季节。这些弟子很不服气，双方争执不下。于是老人说，不信就去问问你们老师，如果他说一年有四个季节，我就向你们顶礼；如果他说一年有三个季节，你们就向我顶礼。这些弟子同意了，于是就带着他去向孔子请教。

这位老人见到孔子，就问，一年到底有几个季节？孔子看了看他，就说，一年有三个季节。弟子们一听，不知道为什么一年明明有四个季节，老师却说有三个季节。老人听了很高兴，就说你们老师都说是三个季节，你们应该向我顶礼。弟子们很无奈，就向这位老人顶礼，老人很高兴地走了。老人走后，弟子们就请教老师，明明一年有四个季节，您为什么说有三个季节？孔子就说，因为刚才的老人是一个蚂蚱精，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三个季节，冬天他就死了，他没有经历过四个季节。对于这样的人，你们只能说一年有三个季节，他才能够理解；你对他说有四个季节，他就不能理解。这就是圣人与贤人的区别，贤人会执着于自己的见解是对的，但是圣人是能够看到对方的水平、对方的境界，为对方讲他能够接受的道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的口特别强调，音乐教育之所以比其他的教育重要得多，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有着最强烈的力量，能够浸入心灵最深处。一个孩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就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地生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者自然物的

缺点也最为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加以谴责；而对于优美的东西就会非常赞赏，感受到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一个人对于美丑有正确的好恶，虽然尚且年幼，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当他长大后，理智来临，就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理智，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会使他同气相求。

真正受过音乐教育的人，在心灵里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的美，表现在有形的体态举止上，也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调和的美。在社会交往之中，由于心灵的统一作用，他对同道中人，必然会气味相投，一见如故；而对于内心不和谐的人，他唯恐避之不及。而正确的爱是对美的、有秩序的事物，有节制的、和谐的爱。它与纵情任性泾渭分明。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达到对美（包括真善美）的爱。柏拉图的这段论述，把音乐教育对心灵成长为何至关重要，阐述得非常清楚。

其实，不仅音乐教育是为了达到对美的爱，一切好的艺术熏陶，人们所说的素质教育，其实都是为了达到对美的爱。

宋代皇帝溥仪和王国维是朋友。有一次王国维请溥仪到家里做客，把家里所收藏的书画等艺术品都拿出来向溥仪展示，并且让他辨别这些作品的真伪。结果溥仪在几分钟之内就告诉他，哪一些艺术品是假的。王国维一开始不太相信，就去找人鉴定，发现溥仪说的那几幅，果然就是赝品。于是他问溥仪，为什么你能辨认出哪些是赝品？溥仪说，因为它和我看过的有些不同。由于溥仪从小生长在皇宫之中，所见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品，所以他看真品看得多了，一看到假的，就有辨别能力。人们修身也是如此，要能够达到以身观身的境界。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修身有没有功夫，从自己能否辨别人、认识人，就能够有体会。当自己的修身达到一定程度，对于同道中人就能够有识别的能力，对于道不同的人也能够避而远之。

儒家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孔子以“六经”教导学生，其中之一就是《乐经》。孔子也最了解音乐的特性，严于善恶之辨，所以他主张放郑声，用韶舞，“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秦汉之后，《乐经》失传，但是在《书经》《礼记》《史记·乐书》中，还保留有重要的乐理，可以奉为“乐经”。

例如，在《书经·虞书》中记载，舜帝命夔典乐，以“教胥子”。舜帝命夔这个人主管音乐，来教导这些嫡长子，使其“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经过音乐的教育，使人的性格可以变得“直而温”，即正直而又温和。有人确实很正直，但觉得自己很有理，所以会理直气壮，往往就失去了温和的态度。“宽而栗”，为人宽和而恭谨。人如果随和，往往会流于随意而失去恭敬心。但是礼乐的教化，可以让人既保持宽和又有威仪，保持庄严恭敬。“刚而无虐”，刚强而不暴虐。刚有刚正、刚直、刚强的意思，如《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人有刚强的品质，但是没有残暴、暴虐。“简而无傲”，简约但没有傲慢。这都是乐教的结果。

在《书经·虞书》中还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群书治要·毛诗》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表现的是人的志向、志愿。当志向还在内心，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把它称为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为诗了；“歌永言”，用歌把语言，就是把诗延长咏吟出来，永言，永就是延长，用歌把诗延长咏吟出来，所以人们经常说诗歌。“声依永”，声是指宫商角徵羽五声，五声的高低和延长的吟咏相配合；“律和声”，再用音律来调和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八音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是指八种不同材料做成的乐器，这八种乐器能够和谐，不要相互之间失去伦次。夔在回答舜帝的时候说，在他击石拊石的时候，能使百兽都跟着他起舞。这段文字把音乐教育的目的，制作乐词、乐谱、乐器的原理方法，及其感化的效果，阐述得

非常清楚。

关于乐理的另外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礼记·乐记》，它把音乐的起源、作乐的方法以及音乐的功效，也讲述得非常详细。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所有的音都产生于人心。那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情”是感情。《荀子·正名》篇上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情动于中”，“中”指内心，如《史记·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张守节《史记正义》上说，“中，犹心也”。所以“情动于中”的“中”指内心。就是，感情萌动于内心，所以流露于声。“声”，在古代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

“声成文，谓之音”，文是曲调。五声按照高低长短强弱的乐音，组成一定的旋律、曲调，就称为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世是太平盛世，治世与乱世的区别何在？可以从多方面去区别。在《荀子·大略》中说，“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能够做到以义为上，使义战胜利，这时就称为治世；反之，见利忘义，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不顾礼义廉耻，这时就称为乱世。“其政乖”，“乖”是反常谬误。“哀以思”是悲伤而哀愁。所以太平盛世的乐曲安详而喜乐，可以感受到政治的和谐；乱世的乐曲怨恨而愤怒，可以感受到政治的混乱反常；亡国之音悲伤而哀愁，可以感受到民众的困苦。

可见，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提倡德音雅乐，会使人心情平和，自然社会和谐，对政治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古代的艺人，包括剧作家等都是社会教育工作者，他们对社会和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明白了声音的道理，就可通过声音知道政治的得失。孔子到某地，先不问这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而是首先听一听这个地方流行的音乐，就能知道这个地方民风如何。

不仅如此，如果把古圣先王的乐理，研究清楚透彻，就能够通过闻其乐而知其政，甚至预知其未来的效果。《左传》中记载，春秋时期的吴国公子季札特别精通音乐，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去访问鲁国。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受封之地，保存着完备的先王礼乐，还有各国的国风，所以季札到鲁国后就要求观乐。当他听到郑风时，认为郑国的音乐过于细弱，没有远虑持久之风，所以他说郑国未来亡国会比别的国家早。后来郑国灭于韩，果然比宋国灭于齐早了89年，比鲁国灭于楚早了119年。季札通过观乐，就能够知晓甚至预测国家的治乱兴亡，由此可见他对音乐的精通，以及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道理。

## 音乐之道，与政相通

音声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怠懣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音声之道，与政通矣”，音声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宫为君”，宫是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它的声音极低极长。传说伏羲氏制五弦之琴，五弦以丝多声重者为尊，宫弦最大，是81丝，所以尊宫为君，是其他四声的统帅。古人通过闻听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预测他的命运，这也有其中的道理。“商为臣”，商弦72丝，它的声音低长仅次于宫，就如同臣的地位仅次于君。“角为民”，角弦64丝，它的声音半清半浊，在高下清浊之间，因此比之以民。“徵为

事”，徵是五声音阶的第四音级，徵弦54丝，其声清澈，事在人为，故比之以事，列于民后。“羽为物”，羽声是商声的子音，羽弦48丝，其音最清，比之以物。物就是财，列于五声最末，这是教人必须先尽职责而后求财利。宫商角徵羽五声，在政则比之为君臣民事财五事，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角声代表民众，徵声代表事，羽声代表财物。

“五者不乱，则无怠沏之音矣”，为什么用五声？因为五在数字之中，能致中和。“怠沏”应该是怙沏，孔颖达的《疏》说“怙，敝也；沏，败也；敝败，不和之貌也”，怙沏就是音调不和谐。五声若是有序而不乱，就不会产生不和谐的音调。

“宫乱则荒，其君骄”，“荒”是荒废，弃置。宫为主声，如果宫乱，那么五声皆废，骄是骄傲、骄纵。若是宫调混乱，则五声皆随之荒废，从中可以看出君主的骄傲放纵。在《史记·乐书》中说，凡人都有血气心智等天性，却没有不变的喜怒哀乐等常情，人心受外物的感应产生波动，然后心术的邪正就显现出来了。人君若心志细小而笃好繁文缛节，促迫而气韵微弱的乐声就产生，百姓多悲思忧愁；人君若舒缓大度，不拘细行，简易而有节制的乐声就产生，百姓也必享安乐；人君若粗疏刚猛，亢奋急疾而博大的乐声就产生，百姓表现出来的就是刚毅；人君若廉正不阿，庄重诚挚的乐声就产生，百姓整肃而且相互礼敬；人君若宽裕厚重，谐和顺畅的乐声就产生，百姓多慈爱亲睦；人君若放纵淫邪不正派，猥滥琐屑，不能永久的乐声就产生，百姓也多淫乱。

“商乱则陂，其臣坏”，“陂”是偏颇，邪僻不正。商为配声，如果商乱，则曲调邪僻不正，臣泛指各级官吏，坏是变质腐败。若商调混乱，曲音邪僻不正，从中可以看出各级官员的昏庸腐败。

“角乱则忧，其民怨”，“忧”是忧愁。角声在高下清浊之间，如果角乱，它的声音低沉，忧虑愁苦，怨是怨恨。角声比民，民众为什么会产生怨恨？一定是上失其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若角调混乱，曲音忧虑愁

苦，可以从中看出民众因不能安业而心生怨恨。

“徵乱则哀，其事勤”，“哀”是哀苦。徵声次高次清，若徵乱则其音变浊，哀伤痛苦。“勤”是劳倦辛苦。徵声比事，闻到徵声哀苦，就知道一定是为政者一再施劳于民所导致的。若是徵调混乱，曲音哀伤痛苦，可以从中看出为政者必是一再施劳于民，致使民众辛苦劳倦。

“羽乱则危，其财匱”，“危”是不安。羽声极高极清，若羽乱则其音危惧不安，匱是空乏。羽声比物，闻到羽声危惧不安，就知道，是上下都不知节用而导致财物匱乏。

“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迭相陵”是互相侵扰，“谓之慢”，慢是无礼，没有节制。若五声不和，互相侵扰，就称为慢，慢是滥无节制。“无日”是为时不久，旦夕可俟。如果五声都出现混乱，互相侵袭，名之为慢，当慢乐出现，亡国的日子就快到了。春秋时期的郑卫之音都很乱，都是接近于慢，让人听后，有五行相克、五脏违和之感，特别是郑音尤其淫乱，所以孔子要“放郑声”。

在《史记·乐书》中记载，晋平公听师涓弹奏濮上之音，还没有听完就被师旷制止了，师旷说这是亡国之音，不可听完。但是晋平公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还是坚持继续听完。然后问师旷，还有比这更悲的音乐吗？师旷说，有，从前黄帝用以大合鬼神的音乐，现在君主的德义浅薄，不足以听这样的音乐，听了就会败落。晋平公说，寡人老了，所喜好的就是音乐，我还是愿意听一听。师旷不得已，就援琴而鼓之。结果刚弹第一下，便有白云从西北方兴起。再弹一下，就刮起大风，接着暴雨随之而来，廊瓦被吹得到处乱飞，左右之人被吓得惊慌逃跑，平公也非常恐惧，吓得趴在廊屋之间。结果“晋国大旱，赤地三年”，晋国发生了旱灾，三年都没有下雨。

在《太平御览》中，记载着谈论音乐的两则故事，证明音乐之道并非普通艺术。一个故事发生在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皇太子李

贤使乐工在东宫新作了一曲宝庆曲，命乐工在太清观演奏。始平县的县令李嗣真听后，便对两位道士说，此乐宫商不和，是君臣相阻之征。角徵失位，是父子不协之兆。杀声既多，哀调又苦，如果国家无事，太子将受其咎。意思是这个乐曲宫商不和谐，这是君臣互相障碍的征兆；而角声和徵声失位，是父子不和谐的征兆。而且杀伐之声过多，哀愁的调子特别悲苦，如果国家不发生什么事情，太子就会受到罪责。结果第二年八月，太子得罪了天后武则天，高宗都爱莫能助，于是太子被废为庶人。

唐朝开元末年（公元741年），凉州进奉新曲，唐玄宗招待诸王在便殿欣赏。乐曲终了，诸王都来称贺万岁，赞叹这首乐曲，只有唐玄宗的大哥宁王李宪默然不语，玄宗就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也不赞叹？李宪说，我听这首曲子宫声离散而缺少徵声，商声混乱而又有残暴之音。“夫宫者君也，商者臣也，宫不胜，则君体卑，商有余，则臣事僭，臣恐异日臣下有悖乱之事，陛下有流离之祸，莫不兆于斯曲也”。李宪说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宫的力量不够，说明君的地位卑微卑下，不够受尊重。商声过重有余，说明臣有僭越的行为。恐怕日后会有臣下悖逆叛乱之事，陛下会有流离之祸，这都可以从这首乐曲中看到征兆。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这时才知道宁王所料不虚。

所以国乐的原理与诸经相同，都不能违背，违背就是离经叛道，必然会严重伤害人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样的乐曲，就能够推知将会有不好的结局。历史记载的此类事证有很多，这里所举的两个故事，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例子。

## 音乐呵护心灵

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  
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

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  
则亦失乐之情矣。

——《群书治要》卷三十九《吕氏春秋》

八音，是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料制作的乐器。金是以金属制作乐器，如编钟。石是以石头，如汉白玉等，制成磬一类的乐器。磬的大小厚薄不同，发音也不同，通常使用牛角和木棒来敲击磬，声音清脆悦耳。匏是葫芦一类的植物果实，用来做笙的底座，除了笙还有竽。

丝是指琴瑟上的弦。瑟很长很宽，体积较大。古代人过世后亲人给其办理丧事，为了腾出空间，要先除瑟，把瑟先搬出去。古人说，士无故，不撤琴瑟。古人感慨琴瑟是圣贤之乐，能够动天地而感鬼神。琴瑟在北方由梧桐木制成，在南方由杉木制成。在《白虎通》中对琴有这样的定义，“琴者，禁也。所以禁淫邪，正人心也”。这句话概括了圣人制琴的深意。传说在上古时期，伏羲氏看到凤凰落在梧桐木上，于是采用梧桐木做琴的面板，创制了古琴。桐木的木材非常轻，属阳，象征着天，古人讲天圆地方，面板是弧形的。用梓木做琴的底板，梓木的木质比较重，属阴，象征着地，底板是平的。木头砍下来，晒在屋檐下，要经过父、子、孙三代，木头才能晒干晒透，音质才能好。琴瑟做成之后，弹100年左右，木板上会出现裂纹，这个裂纹的间隙比较宽，叫作蛇腹断；再弹100年，裂纹就比较密了，叫作牛毛断；弹到300年的时候，木板上会出现一朵一朵类似梅花的图案，叫作梅花断。

竹是竹管，横吹称为笛，竖吹称为箫。箫又称为尺八，因为它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制作尺八，一段一尺八寸的竹管，需要十目九节，每节开两孔。

土是用泥土烧制成的埙。革是兽皮，用来做鼓面。木是一种雕刻成老虎形状，背上有齿的木制乐器，用于乐章演奏的结尾，用竹子一扫，表示结束的乐器祝。

上面那段引文的意思是，乱世的音乐，演奏木制革制乐器的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金属石制乐器的声音就像霹雳，演奏丝竹乐器的歌舞之声，就像大嚷大叫。用这样的声音来扰人精神，震动耳目，放荡性情，倒是可以做到。但是用来作为音乐演奏，就不可能给人带来和乐。所以音乐愈奢华放纵，人们愈抑郁，国家愈混乱，君主的地位就愈卑下，这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意义。

柏拉图也特别强调，音乐的节奏要务求简洁、凝练，因为音乐刺激感官与情绪最剧烈，无论对于艺人还是观众，都应该格外讲求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寻求一个恰如其分的节度，不能流于狂易。柏拉图在谈到对城邦护卫者的音乐教育时指出，过度的快感会扰乱心智，容易与骄纵淫荡兼容。艺术表现出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而来。

倘若庸俗、漫无法纪的革新，弥漫于艺人的队伍之中，他们如醉如痴，听从毫无节制的狂欢支配，还狂妄无知地说，音乐中没有真理，是好是坏，只能任凭听者的快感来判定。他们创造出一些淫靡的作品，又加之一些淫靡的歌词，就会在群众中养成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使听众自认为有能力去评判音乐和歌曲的好坏。而一旦对音乐普遍的妄想风行，自由就接踵而来，人们都自以为知道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就不再有任何恐惧，恐惧就是敬畏，随着恐惧的消失，无耻也就会随之而来。

柏拉图的这段言语，对于生活在所谓现代音乐世界的人们，无疑是一种警醒，他告诫人们，音乐教育对于心灵的呵护至关重要。所谓的音乐创新、与时俱进，需要非常谨慎。

##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大乐”是典雅庄重的音乐，用于帝王祭祀、朝贺、宴飨等典礼。“易”是平易，大乐必然平和简易。这告诉人们，音乐的节奏不应该追求繁复，必须找到可以表现人们聪慧、勇敢的生活节奏。找到之后，能够使音节和乐调配合歌词，来表现这种生活。为什么柏拉图特别强调节奏要务求简洁和凝练？他说复杂的音乐能产生放纵，朴质的音乐，则能产生心灵的节制。

歌词，就是文辞的风格，与心灵的精神状态相一致，好的文辞、乐调、节奏，都来自于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用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品格高的人的，也就是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是强调，乐是从内心产生，礼敬则表现在外貌。所以典雅庄重的音乐必然平和而简易，庄严隆重的典礼必定简单而朴素。

如祭祀中使用的玄酒、腥鱼，玄酒是古代祭礼中使用的清水，因为礼重根本，酒是由水制成，水是酒的根本，所以祭祀时供酒只是供水。《礼记·礼运》中说，“故玄酒在室”，孔颖达疏，“玄酒，谓水也，以其色黑，谓之玄，而太古无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所以祭祀时用清水代酒，非常简易。腥鱼是没有煮熟的生鱼，主要是表达内心的恭敬。这都是大礼必简的例子。

## 第八十讲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能利益天下的人，天下人也会利益他；危害天下的人，天下人也会危害他。有仁德的人在位，天下人都依附他，没有其他原因，只因为他善于为天下人谋求福利。仁人之所以天下归心，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能够利益天下人。

《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拥有一个国家，但是不能够爱民，不能够利民，还期求人民亲爱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人民不亲服、不爱戴，而期求人民为自己所使用，为自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人民不能为自己所使用，也不会为自己效死，而期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也是不可能的。“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兵力不强劲，城池

不坚固，而期求敌人不来侵犯，也是不可能的。外敌入侵，都是看到这个国家的守备空虚，有机可乘，才会发起战争。“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敌兵来临，而期求没有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也是不可能的。“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所以人君要想使国家富强，稳固安乐，就不如首先反省自己对于人民的态度。“欲附下壹民，则莫若反之政”，如果想使下属都钦佩，人民都团结一致，就不如反省自己的政事办得如何。作为国家的君王，只有爱民利民，才能够使国家得以安定。“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如果想修明政治，使国家美善，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求德才兼备的人来辅佐自己。

由此荀子得出结论：“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作为国君，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是爱民，古代人常说“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爱民才能够深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因爱民而安定。第二是尊贤，因为好士而荣，因喜爱德才兼备的贤人而荣耀，因为贤德之人辅助君王治理国家，人民才能更加归附。如果两者缺失一个，国家就会灭亡。这一段话论述逻辑清晰，得出的结论是，人君（领导者）一定要爱民而安，好士而荣。

当然为天下兴利，为天下人谋福利，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重视发展经济，使人民有物质的保证，衣食无忧，还必须重视教育，使人民身心安乐。孔子到卫国去考察，弟子冉有为他驾车，冉有就请教孔子，这个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了，人口已经很稠密后应该怎样做？孔子回答了两个字，“富之”，即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之后又应该怎样做呢？孔子又回答了两个字，“教之”，使人民得到伦理道德的教育，深信因果，这样才不会去作恶，身心安乐。所以做好富之教之这四个字，人们才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 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

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

所谓天子，就是对天下人如同子女一样去爱护，而天下人对她如同父亲一样敬爱，这才称为天子。

“天子者”，是合天子之义。什么是天？在《说文解字》上解释，“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至高无上叫天。在《礼记·表记》中也说道：“惟天子受命于天，故曰天子。”天子的称呼如何得来？古人认为，王者受天命，替天行道，所以帝王为天之子，称为天子。从这也可以体会到，天子之所以至高无上，为人景仰，不是为了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发号施令，显示自己的权威，而是要效法天的德行。

《典语》中说“王者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君王之所以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办理政事，要遵循天道而行。天道有什么特点？天道好生而恶杀，有仁爱之心，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是这个意思。

《政要论》也说，天是万物的保护伞，君主是万民的保护伞。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不被雨露所润泽，天就会认为这是有负于万物。一国的人民，如果不能沾濡到君主的恩泽，君主也会以此为羞耻。这是告诉人们，只要天下之中还有一个老百姓没有得到君主的恩泽，君主就应认为，这是自己的政事没有办好，自己的仁爱之心没有普及。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君主要效仿天这种平等无私的精神。因此，天子之所以被称为天子，就是因为他顺应天道而行事，他作为人民的父母才能够名副其实，所以爱民是君主应尽的本分。

在《晋书》中也说：“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因为圣王对待天下的人，都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爱护，所以皇天也会保佑

他，就像保佑自己的儿子一样，非常体恤、照顾。为什么历史记载古代帝王祈雨时，能够有求必应？就是因为他不是自私自利，他想到的是天下百姓。当他生起恭敬心、真诚心，感应也随之而来，非常迅速。

在《群书治要·汉书二》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天子是人民的父母，所以才能够称王天下，圣人通过比喻的方式来正名，把君王比喻为父母，这显示出仁爱德让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为什么天子能够得到天命？《尚书》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都是通过人民的耳朵去听，通过人民的眼睛去看，所以民心所向才是得到天下的根本，能够得民心者才能得到天下。如果失去民心，也将失去天下。

## 圣人养贤，恩泽万民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天地养育万物，使万物都生长茂盛。而圣人颐养贤能之士，使他们为人民谋福利，将福泽推及至万民。为什么圣人重视颐养贤人？因为圣主明王即使再能干、再圣明，但国事日理万机，他不能事必躬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所以必须通过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才能真正惠及百姓，使百姓得到真实利益。

在《说苑》中记载，齐宣王到社山打猎，老百姓听说后，都赶来慰劳他。齐宣王很高兴，于是赐令百姓父老，可以免收租税。百姓们听后很欢喜，纷纷拜谢。只有一位老人闾丘先生，没有拜谢。齐宣王看到后说道：“可能是我的封赏不够丰厚，百姓嫌我封赐得太少。”于是再赐令百姓父老不用服徭役。百姓听后更加欢喜，又纷纷拜谢大王的恩典。但是闾

丘先生仍然没有拜谢。

齐宣王就问：“先生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过失，所以两次封赐都没有拜谢？”闻丘先生回答说：“我听说大王到此地游猎，所以特地来拜见大王，希望从大王那里得到长寿，得到富裕，还希望得到尊贵。”齐宣王听后说道：“人的生死自有定数，天道会定时夺去人的寿命，我没有办法给你长寿；虽然我的仓廩府库很充实，但那是用来防备不时之需，我没有办法给你富裕；我们大的官职没有缺额，小的官位又太卑贱，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你尊贵。”

闻丘先生听后，知道宣王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于是说，愿大王选“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寿焉”。我希望大王能够选拔有德行的人来做官，使得法律制度公平合理，这样，我就不会无缘无故被判刑，就可以稍微得到长寿。“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赈济百姓要适时，百姓一旦有了灾荒，能够适时地给予赈济，不要随意地烦扰百姓，这样，我就可以少许地得到富裕。“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还希望大王发布命令，命令年少的人尊敬年老的人，广布教化，兴起孝悌之风，这样作为老者的我，就可以稍微得到尊贵了。最后闻丘先生又说：“您让我们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看似是对我们很好，我们好像是从这里得到了实惠。但其后果是仓廩必然会空虚，国家也没有可指使的人，这本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位闻丘先生十分难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局限于眼前的私利，而是想到整个国家怎样能够治理好，怎样使人们真正得到长寿、尊贵和富裕。齐宣王听后非常赞叹，称许说：“您说得太好了！”

这个故事说明，圣人爱民如子，就必然颐养贤人，使德才兼备的贤德之人出任一定的官职，通过他们来管理教化百姓。这样就能上传下达，泽及万民，使百姓得到长寿、富裕和尊贵等真实的利益。

在《潜夫论》中提到，国家为何会混乱？怎样判断国家将要混乱？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重视贤德之人。当然，要重视贤德之人，首先要有识人之慧，能够识别谁是贤德之人。为什么有的国君重视贤德之人，有的国君不重视贤德之人？不重视贤德之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君喜欢财货，他没有放下自私自利。只要国君有所贪爱，如房屋、金钱、美色等，别人就会投其所好。所以只要有一个喜好没有放下，就容易被他人控制利用。

《六韬》中说，如果在上位的国君喜欢货财，群臣也都会喜欢获得利益。贤德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因为他没有这些欲望，所以欲望对他不起作用。贤德之人一旦不被国君重用，就会隐居起来。国家就会因为没有兴起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没有好的榜样，而生起自私自利的心，上行而下效，国家的祸乱也就会到来。只有圣人才能够认识到贤德的人，并且委以重任。

## 圣人爱民如子

故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

“御”是治理、统治。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管理老百姓，就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如同兄长爱护弟弟。见到百姓饥寒，就为之哀痛；见到百姓劳苦，就为之悲伤。这是君主对待百姓应有的态度。

父母是怎样爱儿女的呢？父母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儿女身上。即使家里很贫穷，冬天盖不暖，吃饭吃不饱，父母宁愿自己挨冻挨饿，也要让儿女吃饱穿暖，这就是父母爱儿女的心。君主爱百姓，也应该以这样的心对待百姓。现在人们常说有的老板没有执行力。为什么老板没有执行力？因

为老板没有像对待儿女一样对待属下、对待员工。

现在很多父母对儿女非常关爱，但是对儿女却叫不动，没有执行力。《弟子规》中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但是现在父母叫孩子时，孩子仍然是听如未听，闻如未闻，这是因为父母没有完全起到君亲师的作用。他们只起到了亲的作用，亲爱还变成了溺爱，结果是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父母除了是儿女的亲人，还要做儿女的领导和老师，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教最重要的是身教胜于言教，就是把正确的行为做出来，让儿女去效仿。

要言传身教，不仅要把身教做出来，也需要去说明，否则好的行为也会被人误解。有句话是，自古圣贤多寂寞。为什么多寂寞？因为圣贤的心不为人所知，他们的行为往往会被人误解。因为普通人看待别人时，已经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圣人的所作所为是对的，由于普通人的思想框架是错的，也会被他看成是别人错了。圣贤人的存心，并不表露在外，如果自己的心不清净，也就很难感受到。

在《孔子家语》中记载，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政治最急迫的事，没有比使人们富裕、长寿更重要的了。哀公就问：“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孔子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征徭役不要太多，收税不要太重，这样民众就会富裕。重视礼乐教化，使人民远离疾病和犯罪，这样人民就可以长寿。鲁哀公听后说道：“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如果我真的按照您的话来做，征收很少的徭役，减轻税敛，我们国家不就很贫穷了吗？孔子说：“您不知道《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仁德君子执政，是百姓的父母，既然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子女富裕而父母贫穷的道理呢？”国君是百姓的父母，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就如同儿女富裕起来，做国君的怎会贫穷呢？真正爱民如子的君主，确实把百姓和自己看作一体，谁也离不开谁，

不是对立的关系。君主既要让人民过上温饱、富裕的生活，同时也要兴起道德教育，让百姓追求更高的目标，能够得到灵性的提升。

##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

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群书治要》卷六《春秋左氏传下》

“土芥”就是泥土草芥，比喻非常微贱的东西，无足轻重。臣听说国家之所以兴盛，是因为把人民视作受伤的病人一样倍加体恤，这是国家的福祉。国家之所以衰亡，是因为把人民视作泥土小草一样轻贱糟蹋，这就是国家的祸患。这句话揭示出了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在于国君对待人民的态度。

在《晏子》中记载，齐景公到麦丘去游猎，见到一个当地人，就问：“您高寿？”这个人回答：“我已经85岁了。”齐景公听后就说：“您真是长寿！为我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就说：“祝君长寿，祝您的寿命比国家还长。”齐景公听后说：“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这个人就说：“祝君主的后代子孙都长寿，都能像我这样长寿。”齐景公又说：“说得很好，再说一句祝福的话吧。”结果这个人就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愿我们的国君不要得罪于民众百姓。齐景公听后感到奇怪，便问道：“确实有下民得罪于君主的情况，怎么还有国君得罪于百姓的情况呢？”晏子在旁边听到后，不失时机地说：“您说错了，请问像夏桀王、商纣王这样的暴君，是君主诛杀人民，还是人民诛杀他们呢？”晏子的这句话非常契合时机。齐景公一听就明白了，他说：“寡人过矣。”是我错了。于是他就把麦丘赐给这位年长之人作为食邑。这些教诲都是提醒国君，对待百姓

要有慈爱的态度。“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主对待百姓要有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态度。

在《管子》中也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那么人民侍奉他们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如果君主有忧困，人民就会为他感觉到忧伤；国君有危难，人民也会为他誓死效力。“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反之，君主把人民看成如同泥土草芥一样低贱，人民反过来就不会为君主所使用，君主有忧困时，人民不会为他感觉到忧心，君主有难，人民也不会为他赴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如果君主不能使人民安乐，人民也不会为他感觉到悲哀，君主有困难时，人民也不会为君主分忧；如果君主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也不会拼死为君主效力。可见，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百姓的拥护，君主必须能够安其民，所作所为都是为百姓的利益着想。

## 先恕而后教

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罹”是遭遇，“不遂”，是不能顺利达成，不能如愿。尧帝对天下百姓都心存关怀，尤其对穷苦人民更加关爱，心痛百姓遭受罪罚，担忧众人不能顺心如意。只要有一人挨饿，就说这是我使他感到饥饿；有一人受

冻，就说这是我使他感到寒冷；有一人犯罪，就说这是我造成他的犯罪。尧帝的仁慈彰显，百姓就讲道义，尧帝恩德广博，百姓就得到感化。所以不需要奖赏，人民就能互相规劝，不需要刑罚，人民就能安分守己。先宽恕体谅，然后再教育他们，这是尧帝治理天下的方法。

“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百姓犯了错误，是因为没有人教，或者是教错了，没有把正确的演示出来，大家也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所以要先宽恕体谅，然后再教育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如果没有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当百姓做错事时就给予刑罚的处罚，这是虐政。《论语》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没有事先教导百姓伦理道德因果，百姓不知道正确的做法、正确的规则，但做错事就给予刑罚的处罚，甚至把他们杀掉，这是虐政。人们做错事是正常现象，如果人们做得都对，社会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了。但是宽恕之后还是要教育百姓，否则百姓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是尧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值得现代人效法。

## 为仁之道：恭、宽、信、敏、惠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子张向孔子请教为仁之道。孔子说，能实行五种品德于天下，便算是仁了。子张问是哪五种，孔子说，恭、宽、信、敏、惠。然后分别解释了恭、宽、信、敏、惠的含义。

“恭则不侮”，“不侮”，孔安国注，“不见侮慢”。恭敬人，就不会被人侮慢。邢昺疏，“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见侮慢”。自己

恭敬地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恭敬地对待自己，所以不会被人侮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恭发自内心，对他人不可以心存侮慢，这是人们必须学习的。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一个人为什么会受到侮辱？一定是自己先侮辱了自己，自己先对别人不恭敬，别人才会对自己不恭敬。自己没有了恭敬心，生起傲慢之心，需要克服慢心，才能自卑而尊人。所以《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对一切人事物都要平等地恭敬，才是真恭敬，否则恭敬就是假的。所谓的假，就是会变的，唯有真的才恒常不变。

“宽则得众”，宽厚待人，百姓就会对自己有感情，就会心悦诚服，就能得到众人的支持。在《群书治要》中记载，梁国曾经有一件难以判别的案件，群臣之中有一半人认为有罪，另外一半人坚持认为无罪，梁王不知道该如何判决。这时梁王说，陶朱公虽然是一个普通百姓，但是富可敌国，他的财富与整个国家的财富相比，相差无几，此人一定有非凡的智慧。于是就派人向陶朱公请教这件事该如何处理。陶朱公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不懂得判决案件。尽管如此，我家中有两块白色的玉璧，这两块玉璧色彩一样，尺寸一样，色泽也一样，但是这两块玉璧的价格悬殊，一块价值千金，另一块却仅值500金。梁王听后感到奇怪，便问道：“既然两块玉璧尺寸、色泽、大小完全相同，为什么一块值千金，另外一块却只值500金呢？”陶朱公回答说：“因为从侧面看，一块比另一块要厚一倍，所以价值千金。”梁王很有悟性，他立刻便明白，于是说：“说得好。”从此梁王判案，凡是罪证不足而有疑问的，就免去处罚；凡是立功证据不足，行赏有疑的，仍然给予奖励，结果梁国的百姓大为欢喜。从这里可以体会到：正如墙壁太薄就会毁坏，丝绸太薄就会破裂，器物太薄就容易打碎，酒味太薄就容易发酸一样，凡是刻薄却能旷日持久的，大概从来没有过。所以国家要养活百姓，实行政教，只要宽厚就可以了。宽厚能够得到众人的支持，得到人心。可见，任何事情都有因果在其中。这就是“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言而有信，就能够得人信任。古人说，君无戏言，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一旦说话，史官就会记录下来，还要用礼仪来完成它，用乐章来歌唱。虽然这是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但是对普通百姓而言，也要信守承诺，不能言而无信，否则人民也会不知所从。《弟子规》中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人言为信，人所说的话必须守信用，不能话刚出口，又将其推翻，久而久之就会失信于民。

“敏则有功”，“敏”是应事疾，做事敏捷，就能有所成就。做事不能拖拉，今天可以做好的事，就要今天把它做好，不能拖到明日。今日事今日毕，这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否则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所以有效率的人就是手边不留工作，事情传达下去，立刻就会有回馈，事情接到后，立刻就能将它完成。

“惠则足以使人”，予人恩惠，人必感恩图报，能够深得人心，所以足以使用人。如周文王的恩惠泽及枯骨，所以天下归心。反之，不能予人恩惠，使人也就无从谈起。当然这个惠不是仅仅满足人欲望的小恩小惠，而是能够帮助人提升道德学问、为人处世的能力，甚至提升灵性、明明德的大恩惠。而要得到这些大恩惠，恰恰需要将欲望、利益这些东西放下。放下得愈多，得到的恩惠愈大，这也体现了教学的重要性。

## 安政养国，民自归附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群出治要》卷九《论语》

“来”也念“lài”。“丘”是孔子的自称，孔子名丘，字仲尼，但是为了表示对圣人的恭敬，要避讳，就念作“某”（mǒu）。“盖”是承接上文，表示原因或理由，“来”是招致招徕。“既”是已经。孔子说，我曾经听说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心土地人民寡少，而担心财富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上下不能安定。因为平均就能致富而没有贫穷，和谐就能感召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人民就不会寡少。百姓安定就不会招致外患，而有倾覆的危险。诚能如此，远方的人如果不归附，我们就修养文化道德来感召他们，等到他们归附以后，就使他们的生活安定。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春秋繁露》中这样引用，“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所以这里的寡作贫的意思。在俞樾的《古书疑义》上也举例认为，寡和贫两个字，在传写的过程中互换了，可以根据《春秋繁露》，把这句话订正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曾经听说，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心贫穷，而担忧不平均。不忧患国家贫，而担心上下不能安定。为什么不忧患国家贫？因为有缺乏不要紧，只要人民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仍然可以脱贫致富。如古代的大家庭，是恩义情义道义的结合，每个人都为家族工作、付出，老的时候由家族来赡养，所以每个人都有安全感。即使自己的小家境遇不好，但是养老育幼的事情不用担心，有大家族做后盾。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能身心安稳。

为什么在古代一家的兄弟姐妹，住在一起能够和睦相处，但是现代就行不通了呢？因为古代有伦理道德的教育，讲究兄友弟恭，所以五伦关系处理得很好，人们相互谦让、相互关心、相互照顾都来不及，怎么会因为一点点财产、一点点小事而起争执呢？现在传统文化已经有几代没有人教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不知道伦理道德的教育，不知道长幼有叙，兄友弟恭，所以很多家庭问题就出现了。家族能够和谐相处的关键不是因为它有血缘的纽带，是血缘的结合，而是因为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是恩义道义

情义的结合，这才是关键。

要忧什么？要忧不平均。如果贫富差距很大，又没有好的措施和教育，就会导致不平。古时候也有贫富差距，为什么没有不平？因为古代有因果教育。富人知道自己富的原因，所以他更加欢喜去布施，结果愈施愈多。穷人知道自己贫穷下贱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慳贪，所以他也懂得用自己的内财去布施，就是用自己的身体精力学识，等等，去帮助别人，而不是怨天尤人。而现在既没有好的措施，也没有好的教育，贫富差距加大之后就会导致不平，不平就生嫉，也就是怨，怨气产生了，再向上提升就是恨。所以政治上要讲究平等，经济上也不能不平均，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不安定。

“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担心人民数量少，而担心上下都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人们所得都平均，都一样，就没有所谓的贫。“和无寡”，即使自己的国家人少，和气也能把远方的人招来。所以只要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也就会相安无事。“安无倾”，相安就不会招致外患，国家不至倾危，只要安稳，国家就能够保存住。如果内有苛政，外有外患，便不能安定。当然这并不是说内部安容易，外部安难，其实只要内部和谐，上下一体，就能安定。如果上下不一心，打仗时枪往里打，这叫倒戈。如果上下一心，宁死也要保国，即使是再强大的敌人也能够抵御。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懂得亲上事长，肯一心拼命，任何事都能够办成，内外皆安，国家也能得以保全。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诚能做到以上这些，远方的人还不来归顺，那我们就要修养文化道德，使他们来归；他们既然来归，就要使他们能够生活安定。柔远人，就是治理国家，搞外交，都能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别的国家不但不来攻伐，而且因为自己做到了厚往薄来，待人宽厚，即使别人薄待自己，自己也要对他厚重。讲信修睦，不动干戈，用文化的方法招来，国家自然就安定。这个“安”，是内外都安。所以孔子说要先安内，再柔远安外。

## 第八十一讲

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



## 圣人之教，非仁则义

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

——《群书治要》卷四十二《盐铁论》

“文察”是深文苛察，在写文书时非常苛刻，将百姓的罪证列举得非常全面深刻，所以立刻就会判以严苛的处罚。这句话的意思是，所谓好的官吏，动用严苛的刑罚来祸害百姓，使用暴力强权来残害属下，忘记了法律所赖以产生的根本，专凭自己残酷的心意行事。

这句话的关键是“不本法之所由生”，就是忘记了法律所赖以产生的根本。法律产生的根本是什么？法律背后的精神是道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简单地说就是仁义。

《群书治要》讲求国家治理，有理论上的渊源和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被后世奉为百代常行之法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就是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用圣人之道治国，就能够达到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圣人之治，人们把它称为圣贤政治。圣人之道是恒常不变的，是可供今人借鉴的治国理念。

圣人之道其实并不玄秘莫测，圣人之道就是人之道，用孟子的话说，“亦有仁义而已矣”，也就是仁义；用《周易》中的话说，“立人之道曰仁

与义”。之所以依托于圣人，称之为圣人之道，是因为唯有圣人才能够体悟天地之道，体悟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并且圣人浑然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所以能够“曲尽其情理”。曲就是能够洞察到细微之处，并通过自身的表演，将天地之道委曲婉转地（即费尽周折地）表演出来。这种表演就成为典则，可以教化当世，并且为后世所效法。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参”也念作“sān”，天地人谓之三才。为什么人并立于天地之间，可以和天地参？就是因为人能够辅助天地，能够化育万物。

墨子认为，圣人是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所致力对象，是人世间的事务，他是为教育人而来。《礼记》中说：“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古人所说的天地与人事，这四者是圣人所凭借依托的东西。“圣人之所乘”是圣人借由天地人事四事，而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目标。圣人既然以治天下为事，那么圣人之道也自然是治理天下之道。圣人之道不仅仅源于天地，也是效法天地，就像《管子》中所说的，“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所以圣人之道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其实圣人之道就在人们的日用云为之间，但是百姓却不知不觉，所以圣人之道显诸仁，藏诸用。他向天下显示的是仁道，衣被万物，天无私覆，仁覆万物，而潜藏功用，不使物知，这就叫“显诸仁，藏诸用”，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天地之道有“恒久而不已”的特点，只有坚持长久，不停止、不放弃，才能产生效果。所以唯有各得所恒，才可皆长久。就是要长时熏修，效果才能够显现，从量变达到质变。故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圣人之道需要长久奉行不怠，只有这样，才能止于至善，臻于治世。这种带有法度意义的圣人之道，具有历久弥新而恒常不变的价值。

“圣人之道”，不仅是《群书治要》的指导思想，也是后世治国理政者

必须奉之不移的价值理念。这也是《群书治要》不仅在古代适用，在今天适用，再过几百年、几千年也依然适用的原因，它本于天地之道，本于人性。

圣人之道既然是仁义，那么在治国理政之中，也必须推行仁政，讲求仁义。《列子》中说，“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仁义是圣人设道设教的根本宗旨，能行仁义则能够王天下。《吕氏春秋》中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古人把仁义作为治理国家、领导百姓的准绳和原则，这是人道的必然之理。后人说，“唯仁与义尽人之道”，人道其实就是仁义，就是从仁、义两个方面对人道进行了规定。推行仁义，就需要在位者能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种与民共之的仁义情怀，是达到君民各安其位，天下大治的根本。

仁义既然是在位者治国理政应当奉行的准则，故而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也要体现出仁义的精神，所以仁义是“法之所由生”。仁义是治国之本，无本不立。就像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序》中所说的，“仁义是道之所立”，道立在哪里？其实就是立于仁义之道。唯有立于仁义之本，治国才能不用刑罚就能够使民迁善，弃恶从善，转恶为善。所以制定和实施法律的目的，是维护良好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以惩罚为目的。如果忘记了制定法律背后的仁义实质，而以残酷之心行事，就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

《盐铁论》中还说，“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矣”。古代的君王治理国家首先要完善礼义，昭明教化，让百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礼义完备，教化昭明，还有不服从的人，才按照其违法犯罪的程度，给以不同的刑罚。刑罚得当，百姓就没有怨言。“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教化，人们不知道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因为无知而犯法，再用礼法去苛责，就是残害百姓。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判案和其他法官

的相同之处都是依据案情定罪。但是他和其他法官的不同之处在于，要想方设法杜绝争讼。人们为什么不去争讼？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人都被教成好人，都明白自己的本分，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

《老子》中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存心。圣人没有不变的意志，常以百姓的心为自己的心，以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他们遵循自然之道，顺势教化百姓。百姓从善，圣人与之为善；百姓不善，圣人教化使之为善，并没有和他对立，也没有把他放弃，而是教育他，使他转恶为善。百姓讲信，圣人与之讲信；百姓不讲信，圣人教化使之讲信，这样人人都能向善，都能守信，大同世界、和谐社会才能够实现。所以古人对待百姓，用的是教化感化，而不是刑罚，更不是与人对立。

《晏子》中记载，齐景公问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的君主是怎样来教导人民的？晏子回答说，“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首先要使教育、法令明确，告诉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君主要率先垂范，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对待人民不是苛虐，而是用刑罚防止他们作奸犯科。“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要求臣民做到的，在上位的人必须首先做到，禁止人民不做的，自己也一定不去违犯，这样属下才能够服从领导者的教诲。“称事以任民，中听以禁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法，下以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违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任用民众，司法公正，这样才能够禁止邪恶。不让民众非常劳苦，也不能用刑罚来残害百姓。上面的人以爱民为原则，下面的人就会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是圣明的君主教导民众的方法。

领导者要有爱民之心，即使百姓犯了错误，也要教育他回头，不能把法律作为惩罚百姓的工具，不能以惩罚百姓为乐事。

## 民有七亡，又有七死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讎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群书治要》卷十九《汉书七》

“凡民有七亡”，“亡”是流亡、逃亡。造成百姓流亡的原因有七种。

“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造成百姓流亡的第一种原因是天灾人祸，阴阳不和所导致的水灾、旱灾等。这些自然灾害不纯粹是自然的，它反映了政治的得失，官员的道德，社会的民风。

“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地方官员加重责任，加重索取，增加赋税是造成百姓流亡的第二种原因。

“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贪官污吏假公济私，借着公家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收受贿赂不断，此其三。说明官员的贪心更加直接了，打着公家的名义明目张胆地不断收取贿赂。

“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有权势的富家侵占百姓的财物，贪得无厌，这是第四种原因。一个人的财富是结果，原因是财布施，不是从盘剥百姓而来。所以财布施得财富，愈施愈多，愈多愈施。如果有钱却不知道布施，反而更加贪得无厌，会愈来愈贫穷。《大学》中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义之财终究是会败散掉的。

“苛吏繇役，失农桑时，五亡也”，“繇役”也写作“徭役”，是古代官府指派成年男子义务性的劳役，包括修城铺路、防卫乡里等工作。残酷苛刻的官吏征招劳役，贻误农时，这是第五种百姓流亡的原因。

“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遮列”是列队遮拦。乡间村落里常常响起警报声，全村男女都要出动防卫，这是第六种导致百姓流亡的原因。社会治安不好，所以会经常响起警报，百姓生活不安定，民不聊生，身心不安。

“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盗贼肆虐，抢夺百姓的财物，这是第七种导致百姓流亡的原因。盗贼之所以偷盗，也是因为不明因果，不知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即使自己能够抢来钱财，也是命中注定的，否则无法抢到。一个人命里有的，想舍也舍不走。但是因为不明理，所以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反而使自己命里的财富打了折扣，自己却不知道，还以为这是自己通过打家劫舍所赚得的，这就叫“小人冤枉做小人”。所以人如果明白因果的道理，就会身心轻安，不会患得患失。

“七亡尚可，又有七死”，这七种流亡的情况还不算厉害，还有七种逼死百姓的情况。“酷吏毆杀，一死也”，残酷的官吏殴打杀害百姓，这是其一。“治狱深刻，二死也”，审理案件太苛刻，此其二。“冤陷无辜，三死也”，冤枉陷害无辜的百姓，此其三。“盗贼横发，四死也”，盗贼遍地，这是其四。“怨讎相残，五死也”，冤家仇人之间相互残杀，这是其五。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分，人不会聚在一起。怨仇碰到一起怎么办？如果以怨报怨，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要化敌为友。怎样才能够化敌为友？要从心念上转变。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同样的道理，“恨出者恨返，祸往者祸来”。与别人对立，其实就是怨恨别人的心，反过来别人也会与我们对立，得来的是仇恨。如此怨会愈结愈深，没有解开之日。所以要能够从心念上改变这个因果。

最初我们对人好的时候，别人仍然会误解，会怀疑，但是要有耐心。就像刚把一块木头从海里捞起来，立刻就想把它点着，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把它捞起来后将表面的水抖干，再放在太阳下晾上几日，甚至几个月，最后才能把这块木头点着。所以要懂得转境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靠什么转境界？靠自己心念的改变，这就是境随心转。一定要明了这个因果关系。

“岁恶饥饿，六死也”，年景不好，收成极坏，百姓忍饥挨饿，这是第六种导致民众死亡的原因。“时气疾疫，七死也”，一时传染病流行，百姓感染发病，此其七。

“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得，欲望刑措诚难。”百姓有七种流亡的原因，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要想使国家安定，实在太难了。百姓有七种丧命的情况，却没有丝毫生存的机会，要想废弃刑罚，让百姓安稳生活，实在太难了。

这一段论述放在爱民，首先提醒为官者、领导者要能体会到底层百姓的不容易，不能高高在上，做事全凭想当然，拍着脑袋做决策，要深入基层，全面了解基层的状况，否则就不能体恤百姓的疾苦。《周易》中说，“天地不交，否”，天在上，地在下，天气是轻，地气是重而浊，所以天气愈来愈往上升，地气愈来愈往下沉，天地之气不能相交，这是否。下情不能够上达，上面的决策就会有失误，这就叫否。

其次，做官的目的和办事的出发点，是更好地服务百姓，而不是自己升官发财，不能过度役使百姓，过度扰民，劳民伤财，也会导致民愤人怨。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缺少因果教育。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加强为官者的因果教育。古代的地方官常用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小民可侮，上天难欺。”时时提起自己的敬畏之心。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为人民服务。权利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把握不好方向，不是服务于民，而是祸害百姓，需要承担的后果就会非常严重。所以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不畏他知畏己知”的敬畏之心，才能不犯事，不惹事。

## 第八十二讲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 富国八政，民生为本

富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时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常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货均财；七曰，抑谈说之士；八曰，塞朋党之门。夫俭则能广，时则农业修，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一，有度则不散，货布则并兼塞，抑谈说之士则百姓不淫，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

——《群书治要》卷五十《袁子正书》

“富国有八政”，使国家富强的政策有八条。

“一曰，俭以足用”，一是要节俭，使人民生活富裕充足。为什么要提倡节俭？生活简单，就容易满足。《礼记》中说，“欲不可从”，欲是深渊，人的欲望一旦打开，就会没有底极，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俭朴的生活有助于保持一个人心地清静，专心办道，一生不求人。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古代的隐士确实做到了无求品自高。人只要有所求，人格就会降低，就清高不起来。所以想成为一个清高的人，也并非易事。

还有一种人，自己确实全都放下，做到了一无所求。但是为了救度众人，常常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价，常作众生不请之友，去帮助众人而不求

任何回报，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人得离苦。即使遭受众人的误解，诽谤、中伤，仍然不改初心，这种人的境界就更高了。

中国古人说，“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为什么大隐隐于朝？一个人在朝为官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利益众人。人世出世看的都是缘分。有缘分，就要尽心尽力去做，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甚至要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至于结果如何，就要看各种因缘是否具备，“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生活节俭很重要，能够满足，万事就不求人。《论语》中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个读书人有志于求道，还以自己的衣服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羞耻，就不值一提了。所以学者要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不以奢华为荣。

“二曰，时以生利”，第二就是要掌握农时，使人民收获丰盈。古人安排农业生产是顺应天时，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规律安排农业生产，就能收获丰盈。其实不仅仅收获丰盈，而且健康环保。现在科技发展了，有些地方可以种反季的蔬菜，结果生了很多的虫。这些虫害就需要用杀虫剂解决，而这些药物对人的身体健康、对土地都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这就是不健康的农耕方式，不可能给人带来真实利益。地方官员使用民力要在农闲时节，做到不违农时，使民以时，不在农忙时期役使民众。推而广之，办学也是一个道理，不要在学生课业很忙的时候，安排很多活动，提出很多要求，如此他们才能专心向学，学有所获，这同样也是使民以时。

“三曰，贵农贱商”，“贵农贱商”就是重农轻商。为什么古人重农轻商？首先要从古代商人的职业特点进行分析。

《汉书》中讲：“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商人的职业特点是什么？大的商人囤

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他们用特殊的手段获得利益，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市面急需货物的时候，把所卖物品的价格成倍抬高。所以古代的“商人”和现在的“企业家”不同。现在的企业家直接参与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但是古代的商人并不从事生产，只是通过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通过赚取差价的方式盈利。这种性质类似于现在的中间商，商人的作用仅限于流通领域。而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生产，拉动生产的是消费，流通只是调节生产和消费关系的中间环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是起到了辅助协调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发挥生产主导作用的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被称为“本业”，商业被称为“末作”。由于古代商业本身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居于次要的地位，所以商人职业在士农工商之中排序在最后也是自然的。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轻商也是源于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是人之至宝，是最大的利。如果一个人连生命尚且可以舍弃，身外之物就不足论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弃仁义而求私利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小人”。小人未必是奸邪之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小人是只顾一己之私的小心量之人。

中国文化重视道德仁义，以德行的厚薄作为判断一个人社会价值高低的标准，而非地位或者财富，于是就产生了“位以德尊”的政治观念和“德本财末”的财富观念。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人重义轻利，堪为大众师表，能够带动社会崇尚伦理道德的正气。清寒之士虽然没有权力、没有财富，但是能行圣贤之道、传圣贤之教，反而成为社会人群最受尊重的对象。

在中国文化中，师道与孝道同等重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师道比孝道更加重要。父母给人们的是身命，老师给人们的是慧命，所以中华民

族有孝亲尊师、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士人受到尊重，也是因为尊师重道、重义轻利的文化。商人与士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商人以逐利为目的，在有利可图之时甚至见利忘义。在以仁义道德作为价值标准的中国，自私自利的商人群体自然不会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

下面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重农抑商的原因。《孔子家语·六本》中指出：“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简单地讲，就是农业夯实国本。在古代，农业与农桑基本上是相互通用的概念。农桑是立国之本，因为农桑供给了民生最基本的需求，即粮食和衣服。对于人类而言，衣食是生存底线的保障，衣食无忧，才能从事其他的社会活动。《群书治要·三国志》中说：“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唯农是务。”又说：“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储”是指储粮。国家粮食储备不足，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会处于隐患之中。如果再加上水旱天灾、外敌入侵，国家就很容易土崩瓦解。所以中国古人重农，是因为看到农业是立国之本。

虽然重农无可厚非，但为什么要抑商？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涉及劳动力资源分配的问题。《崔寔政论》中说：“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众。”因为农业生产非常勤苦，但是收入微薄；工商业非常安逸，但是收入丰厚。所以农夫就放下了锄头等去学习雕花刻镂，织女也停下织布的梭子而去学习刺绣文采。亲自参与耕作的人少了，而从事商业的人就多了。这说明虽然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不可动摇，必须大力发展，但是从个人盈利的角度看，制作精巧器物的工匠和善于倒买倒卖的商人付出的劳动少但是获利多。这就导致很多农民放弃农业而转向工商业谋生。如果农业劳动力流失，就会导致粮食、布帛减产，进而引发全社会的衣食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骤降。

《汉书》中说：“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有民哉！”衣食难继就使人民都成为难民，为了维系生存，有的人卖妻鬻子，有的人揭竿而起，社会秩序必然混乱。商业妨害农业，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国家随之就会很危险，人民随之也会贫苦。《管子·治国》中指出：“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什么是兴利除害？就是把利益农事的事情兴起，把有害于农业的事情禁止。简单地说，古人选择“重农抑商”，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是固定的，就像一个固定大小的蛋糕，从事商业的劳动力多了，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会减少。所以在上位者自然会优先考虑作为“本业”的农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首先，重商政策容易引发经济秩序的混乱。这首先是因为，活跃在流通领域的商人，经常扮演着投机倒把的角色。《汉书》中记载，因为年景不好粮食歉收，或年景大好而粮价下跌，商人经常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囤积居奇的方法牟取暴利，而农民却只能任其宰割。《傅子》中记载，秦朝的重商政策导致了“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的局面，商贾的垄断行为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在《六韬》中指出：“君无以三宝借人。”“以三宝借人，则君将失其威。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完则国安。”

如果商人控制了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就可能兴风作浪，引发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商人富裕之后，还会向急需用钱的穷苦百姓发放高利贷，这样就更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商人群体如果不受限制地恣意妄为，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中国古代把治国之权交予士人而不是交给商人，就是看到商人以利害关系、以私害公的行为的危害性。

其次，是商贾易于缺乏诚信操守。《傅子》中指出商人的职业有一个特点，“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商人每天面对的都是金钱利益的诱惑，心术一旦偏邪，就会走向奸诈虚伪。中国有一句俗语

叫“无商不奸”，就是根据商人的职业特点总结出来的。如果奸商横行，轻者骗取人财，重者谋财害命。现在社会出现的劣质产品、有毒食品，都是商人见利忘义的结果。

再次，是商贾会加剧政治腐败。商人不仅有可能直接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还会间接通过勾结官员而影响政治。在《汉书》中就指出了商人攀附权贵的情况：“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商人凭借自己丰厚的财富，交结王侯，势力甚至超过官吏。他们权钱交易，千里之间，四处游荡，一路上的冠盖相望不绝。商人靠手中的财富贿赂官员，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商人提供便利。如果官商勾结，必然狼狈为奸，造成政治的腐败和市场的不公平竞争。

从重商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来看，商贾容易带动奢靡之风。在古代，商人普遍读书较少，伦理道德的观念相对淡薄。《汉书》中描述商人的生活作风：“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商人没有受到劳作之苦，但是生活奢靡。一旦发达容易放纵耳目口腹之欲，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即便是白手起家的商人也常常不免于此。而不知创业维艰的富家子弟，更容易骄奢放纵、为所欲为，甚至成为地方恶霸，为害一方，对社会风气造成恶劣的影响。商业对社会风俗的影响，还表现在带动全社会的功利之风。秦朝曾奉行重商轻农的经济政策，但却导致了整个国家伦理道德的沦丧。

《傅子》中记载：“秦乱四民而废常职，竞逐末利而弃本业，苟合壹切之风起矣。于是士树奸于朝，贾穷伪于市。臣挟邪以罔其君，子怀利以诈其父。”秦朝扰乱了士农工商四民的秩序，废弃常业，竞相追求商业之利，而放弃作为本业的农业，苟且逐利之风兴起。于是，官吏在朝廷行奸，商人在市场弄虚作假，大臣用邪伪欺骗国君，儿子为私利欺诈父亲。在秦朝重商态度的影响下，人人逐利而忘义，父子无亲，君臣相欺，官员腐败，商贾欺诈，整个社会的风气败坏殆尽。中国自古讲求以伦理道德

立国，如果伦理道德关系为利益关系所取代，结果就是《孟子》中所说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当然，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商业也是国家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傅子》中认为，商贾“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虽然商人见利忘义的行为确实为人所轻贱，但是商人在促进财货流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功不可没。在合理经营的情况下，商贾会带动财货的流通，持续调节着供需的平衡，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利的辅助作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都是以商旅为主体来促成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而在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商旅所付出的努力常常会超越农夫，这种吃苦耐劳、敢于探险的精神值得尊敬。

后来，商人的职业性质、社会形象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明清的徽商、晋商，到现代的粤商、浙商，都是获得了良好口碑的商人群体。这是因为他们从事生产，并且重要的是以德立身，秉持了诚信、和气、低调、共赢、慈善的经营理念。他们的社会身份也逐渐得到了认同。这种认同，从根本上而言，是由于商人群体从轻德到重德的变化，由见利忘义到重义轻利的转型。以上从几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古代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的原因，而且这种政策至今还有它的意义。

“四曰，常民之业”，四是使人们都有固定的职业。人有固定的职业就会心思专一，不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五曰，出入有度”，就是量入为出，开支有节制才不会有入不敷出的危险。古人说“成由俭，破由奢”，一个人生活绝对不能奢侈，把钱财浪费在贪图享受上。

“六曰，以货均财”，六是以正确的货币政策调节财富，财货遍布就能使财富均衡，抑制兼并和垄断的发生。

“七曰，抑谈说之士”，七是抑制高谈阔论的人。谈说之士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很有口才，世智辩聪，演讲能力好，但是所讲的内容有违大道。因为他的口才很好，致使社会大众很难辨别他所讲的是否与道相符。如同少正卯，口才奇好，连孔子的弟子都被吸引而去。要想辨别善恶谈何容易？《弟子规》中讲：“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为什么仁者能够做到“言不讳，色不媚”？因为他没有私心，一心为公，言语不需要谄媚巴结，所以令人生畏。又因仁者无所贪求，也不知道别人有类似的贪求，更不会满足他人的欲望。即使观察别人，也是为了看到他人的需要，进而去帮助成就他人。这样的仁者往往不能为社会大众所认识。

另外一种谈说之士就是能说不行的人，《荀子》中讲：“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此处讲的是能够讲道而不能行道的人，是国妖。为什么被称为国妖？因为会让社会大众丧失对道的信心。

“八曰，塞朋党之门”，就是要杜绝结党营私的门路。“党”在古代是一个贬义词，通常和结党营私连在一起使用。《荀子·强国篇》有一句话说：“不比周，不朋党。”党，助也。“相助匿非曰党”，相互帮助隐匿过恶叫党。《论语》说：“君子不党。”党，偏也。党就是偏私。欧阳修的《朋党论》中说道：“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我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君子和小人怎样区分？古人看问题是一语中的，他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大凡君子，就是所有的君子，都是因为志趣一致而结为朋友，是因为志同道合。而小人则是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友，这是自然规律。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但是臣以为其实小人并没有朋友，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

贪者货财也。”小人所爱的是薪俸利益，所贪的是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地结党以为朋友，但那是虚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等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薄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所以臣认为小人并没有朋友，他们暂时结为朋友也是虚假的，经不起考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坚守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君子之朋来提高自身修养，志趣一致就会相互补益，相互提升。用他们来为国家做事，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能不离不弃，这才是君子之朋。“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君主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天下就能得以安定。

《朋党论》这篇文章是说何谓朋党。《论语》中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和“比”有不同的讲法：一说是“周”为公，“比”为私，这是就公私来解释“周比”；另一说“周”是普遍，“比”是偏党，这是就普遍和偏党而言。君子办事是为公而不为私，而小人则恰恰相反，办事是为私而不为公。君子平时的修养是“去其私心，存其公心”，这就是“周而不比”，而小人心里所思所想都是自私自利，这就是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

《后汉书》中记载着第五伦的故事，这个故事让人们反省自己的心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第五伦，在建武年间被举孝廉，出来做官。当时在位的是光武帝。有一次，光武帝向他询问政事，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了晚上，光武帝问他：“听说你在做小官吏的时候，曾经用竹板打过你的岳父，而且还不到你的堂兄家去吃饭，难道真有

这些事吗？”在古代，一个人非常忠正廉洁，又很能干，别人想在业务上找他的毛病都找不到的时候，就难免会找一些诽谤的话来中伤他，造谣生事。而有德行的人又不愿意去辩护，所以谣言四起，没有智慧的人可能就会信以为真。皇帝听了这些谣言，就问第五伦这两个问题。第五伦回答说：“臣娶过三房妻子都没有父母。”可见说他曾经拿竹板打过岳父的事情是谣言。他还说：“臣年轻时曾遭遇饥荒，确实不敢随便到别人家去吃饭。”他很风趣、很幽默，化解了诽谤。皇帝一听就大笑，把他任为太守。

在任太守期间，第五伦奉公尽节，说话做事从来不为私情所左右。有人问他：“你也有私心吗？”他说，有一个人曾经送了我一匹千里马，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每到三公选拔推荐官员的时候，我心中总是对这个人念念不忘，当然到底也是没有任用他。还有一件事说明我有私心：我哥哥的孩子生病了，我一个晚上去探望了10次，但是我回来之后就安稳地睡着了；而我自己的儿子生病时，我一次都没有去探望，但是我整夜都睡不着觉，非常担心。你看我还有这样的行为，难道能说我没有私心吗？从中可见，古人反省自己多么深刻，自己有一点点私心、不平等的心，都能反省出来。按理说，关爱别人的孩子比关爱自己的孩子少，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这是凡人的常情，对于那些想成圣成贤的君子来说，他就认为这是有私心的表现。

“夫俭则能广，时则农业修；贵农则谷重，贱商则货轻；有常则民一，有度则不散；货布则并兼塞；抑谈说之士则百姓不淫；塞朋党之门，则天下归本。”这是告诉人们，将以上八个方面做到，能够得到的利益、好处。节俭，资源财富就能运用久远；按照时节劳作，就能保证收成；重视农业，粮食价格就会高；抑制商业，货物价格就会低；如此社会才易稳定。职业固定，百姓就会工作专一；开支有度，就会使财富不散；财货均衡遍布各处，就可以抑制兼并产生；摒弃空谈的人，就会使百姓不迷惑混乱；堵塞朋党之门，天下就会归顺君主。懂得这八者，国家虽小，必定能

称王。不懂得这八者，国家虽大，最后必定灭亡。

## 准平调控，稳定粮价

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群书治要》卷十四《汉书二》

“大贾”，大商人，“蓄家”，蓄藏财货颇多之家。这句话讲民众有剩余（粮食）时，物价（粮价）就比较低，君主就低价收购。民众不够用时，粮价升高，君主就抛售。如果收购与抛售能合于时机且掌握恰当，粮食供求就能平衡，物价就能稳定。那些囤积财货的商人和富家，就不能仗势强夺百姓的利益。

这段话强调，通过粮食价格的调控可以达到重视农业、保护百姓利益的目的。年景有好有坏，年景好的时候，粮食丰收，粮价自然就低。而年景不好时，粮食歉收，粮价就会高。如果仅凭市场调控就会带有盲目性，就给商人以可乘之机。如果国家不加以整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加以宏观调控，就会导致虽然国内有粮食，但是粮食都聚积在商人手中。这些商人平时囤积大量粮食，待粮价上涨时，他们就卖出；待粮价降低时，他们就收购。囤积居奇的商人活动于市场，趁人民一时粮食供给不足贱买贵卖，获得的利益有上百倍之多。但是百姓因为粮价过高，买不起粮食，就有饿死冻死之人。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即使是人民忍饥挨饿，商贾也不会出手相救。商人的目的是盈利，以赚取利益为目的，如果没有仁爱心，即使看到百姓饿死，也不会拿出粮食去救济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不加以干预，百姓的利益就会被商贾肆意侵夺。

汉朝时推行“常平仓”，还有准平法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家行为，在粮食价格高的时候，卖出粮食；在粮食价格低的时候，买进粮食，目的就是稳定粮价，打击商人的投机行为，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 学古人官，议事以制

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弗迷。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学古入官”，学习古训才可做官理政。古训记载着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古人说：“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可以总结古人的经验教训，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唐太宗为人们做出了一个能够考察历史、以古鉴今的榜样。通过读《群书治要》，“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盛世“贞观之治”。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休斯校长读了《群书治要》这部书之后，非常感叹地说：“如果每一位领导者都读这部书，确实可以化解冲突，可以达到世界和平。”每当他遇到问题得不到答案时，就会翻开《群书治要》（英文版），从中找到答案。所以“学古入官”做官时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议事以制”，议论事情是否合理，要根据古代的成法、固定的礼仪法度。最简单的礼仪法度就是五伦八德。

为什么要“议事以制”？如果没有成法、固定的礼仪法度，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意思，两个人就有两个人的意思，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对，就会失去评判标准。这也是提倡“扎根”的重要原因。

现在的学生确实没有“扎根”的教育，连《弟子规》中“入则孝”

的前四句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都没有做到。这几句话看似是对父母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领导、对老师的态度。现在的学生，哪里有“老师呼，应勿缓”的态度呢？

《弟子规》中还说到“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父母、爷爷奶奶既要做饭、打扫卫生，又要洗衣服，已经忙了一天，而孩子对家庭的贡献最小，付出最少。长辈还没有吃饭，孩子就先开始吃，这难道合乎礼节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孩子的感恩之心、恭敬之心。现在很多孩子，虽然学了《弟子规》，但是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按照《弟子规》的要求去做，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很忙。其实想想，孩子再忙能有父母忙、老师忙领导忙吗？自己究竟是念念为他人着想，还是念念以自我为中心呢？

《弟子规》中还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长者还没有坐，自己已经大模大样地坐下并且开始吃了，这哪里符合礼？这样做就说明，自己德行的根并没有真正扎下去，并没有在生活中落实。

“议事以制”，评价某一事情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是经典，不是某个人的言论，这是依法不依人。

《孔子家语》中说：“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明亮的镜子是用来照察人的形体的，古代的历史是用来启发今人的。如果君主不重视因循前朝之所以安存的经验、轨迹，又忽视了前朝之所以危亡的教训，这就等同于向后退步行走，却希望追上前人，这不是很糊涂吗？这句话告诉人们，历史上大凡有成就的领导者，都是能够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能够虚心从经典之中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

“议事以制”，包括现在的学校教育，也应该根据古来的制度，效法

太学的办学方式来建设。古代的太学设有“太保、太傅、太师”。“保，保其身体”，给学生以养生的教育，让他们身心安乐。当然养身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身心和乐，按照四时节律饮食起居。“傅，傅之德义”，太傅主管学生的德行教育。德行上有偏失，学生的行为不妥当，就是太傅的责任。“师，导之教训”，教导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是太师的责任。这三个职位一设立，整个学校主要的事务就一目了然。从这几个方面教导出来的学生就能身心健康、德才兼备。“政乃弗迷”，这样我们的政治才不会迷惑、错误。

## 成由勤俭破由奢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群书治要》卷十一《史记上》

“野谚”，俗语。“前事之不忘”，即不忘前事，此为倒装句，能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后事之师”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衰的规律，审慎权衡与之相适应的形势，取舍有条理并顺应时代制定相应策略，因此历时长久而国家安定。

这句话告诉人们，既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还要用当代的事情做印证，把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运用在当代的企业管理、政事管理之中，观察它是否依旧有效。例如，古人所说的君仁、臣忠，被很多企业家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创下了“中国式管理”的成功案例。此外，还要审时度势，根据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比如，古代最重的礼是三跪九叩首

礼，现在如果行三跪九叩首礼，就会被人认为是封建，就不能够接受。因此现代的最重礼，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就改为三鞠躬礼。这也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

在《崔寔政论》中，总结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原因，发现都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君主或领导者继承太平的日子太久，社会风俗逐渐变坏也不觉悟，政治逐渐衰落也不更改，而且习惯于这种乱象，安于逸乐而看不到危机。

“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是“有的人”。有的领导者过分沉溺于欲望的满足和享乐。不恤万机，不理国家大事。

“或耳蔽箴海，厌伪忽真”。有的人听不进劝告和教诲的箴言，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

“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有的人像在十字路口一样不知道何去何从。

“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见”是被的意思，被相信的辅佐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俸禄闭口不言。“括囊”是把口袋扎起来，用来比喻闭口不言。为什么闭口不言，明知道错了却不去劝谏？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俸禄而不敢去得罪人，不敢触怒君主的龙颜。

“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有的人因为是被疏远的臣子，地位低贱，他的言语也不被采用。

“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因此国家的法制纲常松弛于上，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于下，真是可悲啊！

这段话描述了国家由盛转衰的一个普遍规律，用古人所总结的一句话就是，“成由勤俭破由奢”。如果领导者都只为自保，并且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自私自利，国家就会逐渐衰败。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也就可以从中找到当代国家之所以兴衰成败的原因。

## 君为政，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尧之居民上，振振如临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恐不满日；汤之居民上，战战恐不见旦。”王曰：“寡人今新并殷居民上，翼翼惧不敢怠。”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阴谋》

周武王问姜太公，古代帝王的自我警戒可以告诉我吗？尚父说：“黄帝时的警戒是：我领导人民忧虑不安，唯恐傍晚到不了明天早晨。尧帝领导人民战战兢兢，好像走在很深的大川边；舜帝领导人民小心谨慎，好像走在薄冰上；禹王领导人民战战栗栗，唯恐治理过不了今天；汤王领导人民敬慎畏惧，唯恐见不到天亮。武王说：我现在刚兼并了殷国，处于民众之上，对他们恭敬谨慎，戒惧而不敢怠慢。”

周武王很受教，听姜太公讲古圣先王的行迹，深受其益，警励自己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可以作威作福。

《群书治要·汉书五》中说：“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闻以位为乐也。”臣听说尧帝接受天命成为天子，他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却没有听说是因为坐上了天子的位置而高兴的。这两句话可以互参。

人们学习圣贤，“慕贤当慕其心”。圣贤人和凡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存心不同。尧受命成为天子，他不是以拥有这个位置为乐，不是以通过这个位置作威作福来控制、占有，而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自己不能尽职尽责，不能解除百姓的忧患。圣贤人的存心是利人爱人之心，完全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解除困苦，没有丝毫自私自利。

尧帝不仅担任好自己的天子之责，并且用28年的时间找到并培养了好的继承人。他找到大舜，并认真地考察大舜，觉得他的德行能力足以担当此重任，才放心地把位置传给他。

孟子说，像尧舜这些圣王，放下天子的位置，就如同放下破掉的鞋子一样，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因为他承担这个任务太久，终于可以卸下来松一口气了。而他担当天子之位，是因为没有人做，所以不得不去做。如果能够找到更合适的人选，能把这个责任承担得更好，他一定是欢喜退让，让更合适的人来担当。这就是圣贤人的存心。

古人说“官门好积德”，为官者出台一个好政策，制定一个好制度，利国利民，无形之中能够为自己积功累德。同时，“官门好造罪”，如果身处一个重要的职位，却不能利国利民、与人方便，反而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这就是误国误民，无形之中也给自己平添很多罪业。而且喜欢给别人设置障碍的人，当自己做事时，也会有人障碍自己。而如果一个人经常与人方便，当他自己做事时，别人也会主动前来帮助他、成全他，所以做事也特别容易。

《群书治要·商君子》中说：“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国之所以危也。”乱世的君臣有什么特点？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扬扬得意地想着专有一国的利益，想方设法地选择更重要的官位，更方便谋取私利的官位，这是国家危亡的重要原因。观察一个国家是在走上坡路还是在走下坡路，是在兴盛还是在衰败，就看这个国家的领导干部的所思所想。他们想的是把自己的位置承担好，把自己的责任本分尽到，利国利民，还是想用自己的官位谋取私利、升官发财、结党营私。圣贤人身居民众之上的存心，就是一种临深履薄的意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 伦常道德，诚以行之

天下之达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天下之达道”，天下古今人与人相处的常道，就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这里把君臣有义放在前面，主要是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说。

天下所共同遵循的伦常大道有五种，而用以实践的功夫则有三种。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姐妹、朋友之间的关系，这五种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循的伦常大道，就是五伦关系。现在人没有接受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才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很多人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看作是封建礼教的代表，经常从负面角度进行批判，认为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值得批判之处，它告诉人们领导者要有领导者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大家各尽职责，关系才能够处理好。

首先看君臣关系，君臣有义。“义者循理”，“义者，宜也。”君臣之间怎样做才是合宜，才是循理呢？古人说：“君仁，臣忠。”领导者要有仁爱之心，仁爱之心就是能做到爱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古人也说，没有做过臣子就不知道怎样做领导。因为没有做过臣子，就不知道臣子的不易，不知道他们的付出、劳苦，所以不能换位思考。好的领导者具备三个条件：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为

领导者不仅要管理、率领属下，还要做属下的亲人，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去关爱他。此外还要作之师，“师”就是为人师表、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这三点做到了，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做臣子就是臣忠。“忠”，朱熹解释为“尽己之谓也”。竭尽全力把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办好，就是尽到了忠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如果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样加以关爱，被领导者就会加倍地回馈，把领导者视为自己的腹心一样更加关爱，君臣关系就处理好了。

“父子有亲”，父子关系讲“父慈子孝”，即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从“慈”字就能够感受到父母对待儿女的态度。“慈”上面是“兹”下面是“心”，就是念兹在兹，父母的心中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儿女。儿女早晨向父母请安，是让父母看到自己今天的精神比较好，睡得比较足，让父母安心。因为父母心中时时记挂着儿女，拿起电话就会嘘寒问暖说个不停。但是儿女体会不到父母的用心，还觉得你怎么这么烦？不知道我很忙吗？儿女处处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他会觉得父母很烦、很挑剔、很啰唆、很唠叨，不能体会到父母的用心。这是因为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现在的孩子做错事也不知道自己错了，就是习惯成自然。

“子孝”，现代西方人说孩子和父母之间有代沟，有“代沟”，孝就不存在了。因为儿女没有尽心尽力，没能有耐心、有智慧地去和父母沟通，所以才会出现代沟。翻开中国历史，几千年间从来没有发生孩子和父母之间有代沟的现象。现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也有代沟，也是因为做学生的没有主动及时地去向老师请教汇报。

父慈子孝做好了，儿女对父母有正确的态度，到学校对老师才有正确的态度，走上社会对领导才有正确的态度。孩子对领导的态度、老师的态度，归根结底反映了在家对待父母的态度。如果在家对父母说话不耐烦，他到工作的场合对领导说话也会不耐烦，在家违逆顶撞父母，到单位

也一定会违逆顶撞领导。这都是一以贯之的。

“夫妇有别”，“别”并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而是说在职责上有分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在农业社会，创造经济收入的责任主要由男子承担，女子在家相夫教子，把儿女教导好，把他们培养成圣贤人，这对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最大的。

夫妇有别，然后才能够互相感恩。如果妻子也很能干、很能挣钱，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感谢你？你能做的我都能做。正是因为男女有别，男子创造经济收入，女子在家相夫教子，让男子能够事业无忧，才能够互相感恩。

“长幼有叙”，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出生有一个自然的顺序，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应该给予尊重，要做到兄友弟恭。

“朋友有信”，朋友之间相处一定要守住一个“信”字。朋友，其实就是讲同辈人之间相处一定要做到言而有信。“信”字是单立人加一个“言”字，人言为信，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不能经常改变。《弟子规》中也说“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人所讲的话必须守信用，否则就不能取信于人。孔子说的这个“信”字对于人而言，用现在的话说，就像车子的发动机一样，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他说的话别人不相信，做的事别人也怀疑，这个人在社会上就会寸步难行。这五种就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循的伦常大道。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智慧、仁爱、勇敢是天下人需具备的三种德行。有仁爱没有智慧，就会“慈悲多祸患，方便出下流”。有人确实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去做事，但是做事不够圆融，没有智慧，却适得其反，想帮忙反而给人添乱，这是没有智慧所导致的。还要有勇敢，“勇”主要指勇于改过，当然也表现在勇于践行智慧和仁爱。这三种是天下人所必须具备的德行。特别是做正确的事也需要有勇。因为大多数人都做得不正确，如果一个人想坚持做对的事，也需要勇气。

“所以行之者一也”，践行这些大道和美德都要靠一个字贯彻始终，这个字就是“诚”。例如，如果不知道如何去服侍别人，但是只要有诚心，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就能够观察到对方的需要，就知道应该怎样做。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有的人天生就知道，有的人是经过学习才知道，有的人是下过苦功才知道，但是知道之后，其中的道理都是相同的。如仁爱，有的人天生就有仁爱之心，有的人是通过学习才有了仁爱之心。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有的人做善事、做正确的事是心安理得。如果他不是出于仁爱之心去做事，而是有害人之心他就会感到不安。这就是“安而行之”。他只有做符合道义的事、仁爱的事才能心安理得。有的人是为了利益去做事，他知道做好事才有好的结果，做恶事会有恶的果报，他是为了利益去做事。有的人则需要勉强去做，例如，他做善事就给以奖励，他不去做善事要给以惩罚，最后他会勉勉强强地去做。但是等他做到一定的程度，做成功之后，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结果也都是是一样的。

